



第一章 愤怒与软弱

……理解通常是一种上升的运动，这就是为何领悟总会被凝固的原因。（人绝不可能到达洞穴之外，因为他本身就来自洞穴。）

——西蒙·韦伊：《最初与最后的笔记》

1

摘自1960年9月我的日记：

我的孩子使我感到极度痛苦，我对这种痛苦感受至深。这种痛苦是自相矛盾的：苦涩的愤怒、赤裸的粗鲁与幸福的温柔、巨大的满足总是致命地交替出现。有时，我似乎对自己的感觉也会像对这些瘦小、无罪的生命，一种自私和不容异己的怪物的感觉一样。他们的声音会撕裂我的神经，他们永无止境的需求，首先是他们出于无知和不厌其烦的需求，让我的内心充满了一种失败的绝望感，



也让我为我的命运感到绝望。这将会造成一种我无法去适应的身体机能。有时,由于被愤怒的情绪所控制,我会感到非常虚弱。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当我感到唯有死亡才能使我们彼此得到解脱时,我会十分嫉妒那些不能生育的女人,尽管有很大的遗憾,但她们过的却是一种自我和自由的生活。

然而,有时候我又会被他们的无助、魅力、不可抗拒的美——他们那种能够继续去爱与信赖的能力——他们的坚定、正直、无私深深感动。我爱他们。只不过在这种深厚而不可避免的爱中掺杂有不少痛苦的情感。

1961年4月:

我对孩子那种祈福的爱一次次把我吞没,这让我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这些幼小、不断成长的生命中,我获得了一种审美的快感,一种被爱的感觉。不管这种感觉带有多大的依赖性,但它还是让我觉得我并不完全是一个不正常、泼妇式的母亲——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我是这样的母亲。

1965年5月:

在母性、自我中心、神经官能症的意义,为怀上、要



还是不要一个孩子而感到痛苦,有时,这种痛苦是由一种无助感而引起的,有时它又出于那种知性智慧的幻觉,只是不管在什么地方,这种痛苦都会发生在身与心的两个层面。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就在于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是一个人自身生命的组成部分。

由于被卷入爱与恨的波涛,我们甚至对孩子的童年都会充满顾虑,为他的成熟充满希望与恐惧。渴望免除责任的拖累,摆脱人之每一条纽带的束缚。

那是一种奇怪的原始保护本能的反映,连野兽都会保护它的幼崽,当有人袭击或指责他时,我相信没有谁比我对袭击者的表现更为强硬!

1965年9月:

消减愤怒,对孩子的愤怒。我怎样才能学会化解暴力,弄明白唯有关心才是最重要的?愤怒的平息。意志的胜利。代价太高,近乎奢侈!

1966年3月:

也许人是一种怪物——反女性的怪物——是某种被动的、对其他人身上那种正常的、富有吸引力的爱、母性、



欢乐无动于衷的存在之物……

以下是一些没有经过检验的设想：首先，人们设想一个“自然的”母亲是一个没有进一步身份的人，是一个整天都围着她的孩子打转，在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以孩子为中心的过程中能够获得她主要满足的个体；人们设想在家中母亲与孩子彼此的孤独是理所当然的；设想母爱是，也应该是，完全出于无私的动机；设想孩子与母亲是使双方彼此痛苦的“原因”。我纠缠在这种认为母爱是“无条件的”陈规老套里，在这种字义、形象单一的母亲身份的意象中不能自拔。要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存在角色与这类意象毫无关系，那这些角色岂不成了一些变态的怪物吗？正如我现年21岁的大儿子读到上面的话所说的：“你似乎觉得在有的时候你都应该爱我们，但这种要求你在每一个时刻都去爱别人的人类关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的，我试图向他作出解释，但女人们——首先是母亲们——一直都被人们设想是以这种方式去爱的。

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我记得一种周而复始的现象。它常常发生在我拿起一本书，试着写一封信的时刻，或者甚至发生在我与某人通话中找到了自我的时刻，在通话过程中，我的声音对之表露了诚恳，流露了大量的同情。孩子（或孩子们）也许会被吸引到他的忙碌

之中，沉迷在他自己梦想的世界里。但只要他感觉到我溜进了一个没有把他纳入其中的世界，他就会拖着我的手，要求帮助，用手猛击打字机的键盘。此刻，我能感觉到他的愿望是欺骗，是一种企图，哪怕是对属于我自己生命中的15分钟时间，他都要进行敲诈。我自然会愤怒至极。我会觉得任何试图去挽救我的想法都会落空。此外，我能感觉到存在于我们之间的那种不平等：我的需要总是与孩子的需要发生冲突，并且总是以失败告终。即使是出于自己的考虑，为了安静，与我的孩子分开一刻钟后，我也会对自己说，要是我能给予他们更多的爱就好了。就这么几分钟！然而，这就仿佛一根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无形的线索突然发生了断裂，考虑到孩子那种无可告慰的被抛弃的感情，就好像我逃进了——显然不是肉体上，而是精神上——一个远离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就好像我的胎盘已拒绝向他提供他生存所需的生命之氧。像大多数女人一样，我耐着性子，期盼着他们父亲下班回家的那一刻。其时，至少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那种存在于母子之间的周期性反应将会得到缓和，我们之间的紧张感会得到消释，因为在家里出现了另外一个成年人。

我无法理解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极富魅力的领域，它不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从理智上讲，我肯定能理解，但从一个在其中我发现



自己扮演的是一个大妈角色的带有情感与深厚传统色彩的形式看，似乎它又像潮水一样不可避免。由于这种形式，这种我的孩子和我可以在其中形成一种小范围的、私密情感联系的环境，我们有时能够在其中（如天气恶劣或有某人生病之时）一口气度过好些日子。在这段时间中，除了他们的父亲，我们见不着其他的成年人。当我好像要从他的身边溜开时，一种真正的需求就会产生，而这种需求是他向我提出其他要求的基础。他会一直安慰自己说，在我身上仍然存在一种对他的热情、温柔、持续的爱和不变的信赖。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他母亲——也许作为一个女人就要逊色得多——我的那种独特性和唯一性唤起了某种需求，这种需求比任何人所能获得的满足更宽广，除了从黎明到黄昏，并且常常是午夜付出的那种不断的、无条件的爱，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

2

1975年在一间客厅里，我和一群女诗人呆了一个晚上，她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有了孩子。有一个还把她的孩子带在身边，她们在隔壁的房间睡觉或玩耍。我们谈论诗，此外还谈到一個本地妇女的杀婴事件。她是八个孩子的母亲，从她生第三个孩子以来，就患上了严重的忧郁

症。她最近杀死并肢解了她两个最小的孩子，屠杀就发生在她郊区住宅房前的草坪上。其中几位能直接感受她绝望的妇女联名给当地的报纸写了信，对新闻界接受她行为、公共精神健康组织控制她行为的做法表示抗议。那间屋子里每个有孩子的女人、每个诗人都对她的做法表示认同。我们谈论由她的故事在我们内心炸开的一口口愤怒的黑井。我们谈到在孩子面前萌生的那种置人于死地的愤怒的时刻，因为没有谁，也没有任何事能够在此刻消除我们的愤怒。我们用一种时而迟疑，时而亢奋，时而苦涩、嘲讽、毫不修饰的语气与口吻来谈论那些女人，她们把我们平时的作品、诗歌汇集起来，并且在一种让人不能接受，但又无法争辩的愤怒之中为它们寻觅到另一个共同的基础。当时谈论的那些话被记录了下来。于是，禁忌被打破了，母性那层神秘的面纱被彻底揭开。

几百年来，没有人谈到过这些感受。20世纪50年代，在一个以家庭为中心、消费至上、普遍信奉弗洛伊德学说的美国人的世界中，我成了一个母亲。我丈夫迫切地说他想要一个孩子。我父母等待着他们孙子的出生。我不知道我究竟想要什么，对于我想要的，我又不知道该如何作出选择。我唯一知道的是，拥有孩子就意味着成熟的女性身份将会得到充分的体现，就能证明自己也成了“和其他女人一样”的女人。

要变得和“其他女人一样”，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问题。从十三四岁开始，我就感觉我仅仅是在扮演一个女性创造物的角色。在十六岁的时候，我经常用墨水来涂抹手指，用唇膏和大耳环来劳神费力地进行打扮。1945年，我非常认真地创作诗歌，抱着一种要去战后的欧洲做新闻记者的幻想，睡在被炸毁城市的废墟中，记录纳粹倒台后欧洲文明的复兴。但同时，我也像我认识的每一个女孩子一样，把时间花在熟练地涂抹唇膏、抚平长统袜上的皱纹、谈论“男孩子”上面。我的生活已经被分割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除了写诗，对旅行的幻想和自我满足似乎对我更加真实。我感觉作为一个新型的“真实女人”，我是一个冒牌货。尤其当我遇到年轻的男孩子时，我会惊得目瞪口呆。我想我能感觉到男人们都会受骗——或希望受骗——把我想象成一个真正的“女人”。我猜想就像一颗子弹一样，一个孩子一眼就能把我看穿。这种扮演某一角色的感觉会导致一种犯罪感，即使这一角色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的。

对我结婚后的那天，我有清晰而敏感的记忆：那天，我正在擦地板。也许，地板并不真的需要去擦；也许，我完全不知道除此之外该去做什么。只是当我擦地板的时候，我想：“现在我是一个女人。这是一种古老的行为。这是一件女人们一直都在做的事。”我感觉我在屈从于某种

古老的仪式，它太古老了，以致不成其为一个问题。是的，这是女人们一直都在做的事。

一旦我明显怀上了孩子，在我青少年和成年的生活中，我第一次没有了负罪感。我沉浸在一种被赞美的氛围中——即使在大街上我行走在那些陌生人旁边，就仿佛我身上携带着芳香。在这种氛围中，所有的疑虑、恐惧、担忧全都无影无踪。这是女人们一直都在做的事。

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前两天，我身上一下子长满了皮疹，被医生暂时诊断为麻疹，由于是传染性疾病，我被送到医院，在那儿等待分娩前的阵痛发作。对我未出生的孩子，我第一次萌发了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和负罪感，因为我身体的这种状况，很可能导致“流产”。在旁边的房间里，住着九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病人，除非穿上医院的白大褂和戴上口罩，任何人都不允许进入我的病房。要是在怀孕期间，我对我的身体状况有一点模糊的察觉的话，那我以后就可以完全依赖我的产科医生了，一个高大的、精力充沛的、像父亲一样的男人，充满了自信，常常会主动用手捏我的脸颊。我在整个怀孕期间，情况都非常好，只是好像被催眠了似的，有一种梦游的感觉。我参加了一个缝纫班，在此期间，我做了一件宽松的、裁剪得很糟糕的孕妇衫。为孩子的房间做了窗帘，选购了婴儿用的衣服，尽最大的可能抹掉了几个月前还存在于我身

上的那些明显的女人特征。我的第二本诗集当时正在印刷中，但我已经不再写诗，除了读一些家庭杂志、育儿方面的书籍，我几乎不再读其他书。作为一个孕妇，我感觉我是被世界完全接受的，这一切似乎显得非常轻松，没有更多的困扰，我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认可自己。我孩子出生以后，作为对怀孕的过敏反应，身上的“麻疹”又出现了。

没出两年时间，我再次怀孕，我在一本笔记本中这样写道：

1956年9月：

是怀孕早期的极度困乏，还是因为某些更为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我能感到就诗歌而言——读诗和写诗——似乎为时已晚，除了厌烦与淡漠，我不能感受到其他东西。尤其对我自己以及我周围的同龄人就更是如此。当我收到一封约稿信，或有人提到我的“职业”时，我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逃避所有的责任，而只去关心那个写作或曾经在写作的人。

要是我的生活会发生一场严重的危机的话，我想，现在就有可能是这场危机爆发的最佳时刻。很长一段时间以前，我就对我自己、我的工作感到极其不满。

我丈夫是一个敏感的、充满感情的人，他想要孩子——这在20世纪50年代那种看重专业和学术成就的环境中，显得极不寻常——并且乐意为我提供“帮助”。但显而易见的是，我只能把这种“帮助”理解成一种宽宏大量的行为，因为他的工作、他的职业生涯在我们家庭中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实上，这就是这么多年我们之间没有出问题的原因。我理解我作为作家的那种努力是奢侈的，是我的一种怪癖。我的工作几乎不能带来任何报酬，甚至还会花掉不少的钱，因为只有当我雇上一个保姆时，我才有可能在一周之中挤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来用于写作。1958年3月，我曾经这样写道：“不管我试图要他给予我什么，但主动提出的一方肯定是我。”我感到沮丧，经常冒火，陷入了一种困境，因为他爱我，我仿佛就成了他一种必须要去承担的包袱。尽管给他带来的是负担，但能够被人爱，我仍然充满了感激。

但我仍在努力，以便让我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我没有真正放弃诗歌，也没有放弃改变我生活的决心。当时的生活大概是这样一种情景：坎布里奇一个廉价公寓的后院，充满了一群孩子，吵闹声反复出现，夜不能寐，安静与沉思的时刻经常被打断，荒唐滑稽的餐饮聚会，到场的全是年轻的妻子，一些人具有很高的学历，她们把所有

的聪明才智和人生中重要的东西都奉献给了孩子的幸福和丈夫的事业，试图再次酝酿波士顿文人雅士们的那种宜人气氛，陶醉于法国的烹调与毫不费力的矫揉造作——最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彻底消除了那股认真严肃劲，女人才会受到尊重——当然，这一切还不足以对那一时期的生活作出概括与分析，只是我清楚我必须去谈论我的生活。当时我不明白我们这些生活在学院环境的女人——就像那个时期生活在中产阶级社会的大多数女人一样——人们期待我们去扮演的只不过是两种角色：悠闲的维多利亚式的太太、家庭中的天使，另外就是维多利亚式的厨娘、洗碗的佣人、熨衣的女工、保姆，还有护士。我唯一能感到的就是有许多虚假的消遣在吞没着我，我想不顾一切地剥离掉我生活中的杂质，去面对一种真正的生活。

1958年6月：

这几个月，我完全被一种愤懑与恼怒的情绪弄得乱成一团；为社会，为自己感到痛苦、幻灭，对人世满怀敌意，拒绝参与一切。那么对我来说，什么——如果有的话——才算是具有肯定意味的东西呢？也许就是那种想去谈论我生活的愿望，那种仅仅想通过时光的流逝和转换来拯救我生活的期盼……

摆在我面前的工作既严肃又困难，我一点也不清楚该如何去下手。思想与精神的自律，表达的独一无二性，日常生活的有序化，人本身最有效的作用，这些东西我都想拥有。迄今为止，我一直有能力去做的就是尽量去珍惜时间。对周围的很多东西都采取一种拒绝之态。

大约在1958年7月，我再次怀孕了。我第三个孩子，正如我决定的我最后一个孩子的诞生成了我生命的转折点。我已经知道，我的身体并不受我控制。我并不打算怀上这第三个孩子。我比以前更加清楚，一次新的怀孕，一个新生的婴儿对我的身体和精神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并不想让孩子流产。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他的两个哥哥比起来，我生第三个儿子是一种更加主动的选择。因为当时我就知道，我是由于他的缘故才怀孕的，所以也就没有再出现梦游。

1958年8月：

当早晨的阳光照射在山坡和西边的窗前，我写下这些。与孩子一起凌晨5:30起床，喂了他奶，然后进早餐。这是少有的一个早晨，我没有感受到恐怖的精神压力和身体的极度困乏。

……我必须让自己弄明白，我不应该作出要更多孩子的选择，我应该去期盼一段岁月，在不远的将来，届时，我能重获自由，不再如此身心疲惫，应该去追求一种或多或少带有智慧和创造色彩的生活……我目前唯一能去做的，就是坚持不懈通过大量艰苦、有意义的工作，以避免我现在的的生活原封不动地重复。另一个孩子意味着这一切将会往后拖延好几年——而这几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不能轻易地把它搁置一边。

然而，总有某种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事物的本性，或者是人的一种顽强的宿命，在以某种方式使我意识到，实际上有一些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会满足于那么多的作为一种反抗堵塞、停滞与精神之死额外手段的生育行为（因为真正的死亡是我对一种能够被认可的、独立的自我，对诗歌和生命的一种创造所一直怀有的恐惧——是对粉碎那张没有生命的面具的恐惧，为了赋予这张面具以生命，我的整个生活曾经为之战斗不息）。

如果更多的努力必须要付出，那我愿意尽我所能。如果更多的绝望必须要伴随我的生活，那我想我能正确地

对待,并且通过它而生存。

当时,我们以一种不同寻常和超乎预想的方式,真心地期待着我们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当然,这里存在着一种经济上的,同时也是精神上的理由,它允许我不把第三个孩子的出生当做一种我自己死亡的证明,而是看做一种“反抗死亡的补充手段”。我的身体,尽管关节炎经常复发,但它仍然是健康的。我受到了很好的产前护理,我们并没有生活在营养不良的边缘。我清楚,我的所有孩子都会有饭吃,有衣穿,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事实上,这方面不幸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倒有可能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从一种非物质的层面讲,虽然在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的问题上我不太弄得清楚,但我知道我一直都在为我的生活奋斗。我总是试图赋予我的生活以新的生命与活力,并且以某种倔强与朦胧的方式,决心在这一过程中甚至采取怀孕和分娩的形式也在所不惜。

在第三个孩子出生之前,我就决定不再要更多的孩子了,并且做了绝育手术(在这个手术当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东西从女人的身上被拿走,排卵和月经仍然在继续进行。然而语言所暗指的却是切除或毁掉她最重要的

女性特征,就像那个古老的词汇“不育的”所挑明的,女人意味着永恒的空虚与匮乏)。尽管我丈夫支持我的决定,但他还是会问我,是否确信这真的不会给我带来那种“丧失女性特征”的感觉。为了真的要做这个手术,我必须提交一个由我丈夫签字的信函副本,使那些能够批准此类手术的医生委员会的成员相信我已经生了三个孩子,并且要向他们陈述我不想生孩子的理由。因为我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已有好几年,所以我能向那些负责讨论我病历的男性委员提出一个可让人信服的理由。一般的情况下,我的陈述往往不会被他们接受。我孩子出生后的24小时,当我从手术中苏醒过来时,一个年轻的护士看着我的图表冷冰冰地问我:“你切除了卵巢,是这样吗?”

第一位伟大的节制生育的身体力行者马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说,在20世纪初期,就有成百上千的妇女给她写信,为避孕的起诉辩护,所有人都谈到为了成为她们孩子更好的母亲,她们希望拥有健康和强壮的身体,或者希望对她们的丈夫表现出肉体上的亲密而不必伴有怀孕的恐惧。没有人在完全拒绝她的母亲身份,或要求过一种安逸悠闲的生活。这些妇女——大多数都很贫穷,许多人只有十几岁,却已有了好几个孩子——完全感觉到由于她们家人的缘故不可能做得“更出色”,因为家人期待的是要她们继续提供服务 and 操持家务。然而人

们对以下的说法一直都心存，现在也仍然怀有一种强烈的恐惧心理，这种说法认为，在如何使用我们身体这个问题上，最终还是女人说了算。这无异于说母亲的痛苦、作为母亲的女人的那种最重要的身份对人类社会的情感基础来说是如此必要，以致人们在各个方面（包括那些最没有问题的方面）都应减轻这种痛苦、取消这种身份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3

“Vous travaillez pour l'armée, madame?”（你正在为军队工作吗？）在越南战争初期，一个法国女人这样问我。听到这话时，我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1965年4月：

愤怒、沮丧、消沉。一阵突如其来的泪涌。一种强烈的匮乏感油然而生，从瞬间到永恒……

我为存在的诸种关系感到困惑，比如我对最大那个孩子的愤怒与拒绝、我敏感的生活、反战的思想与性（我指的是这个词最广泛的那种含义，不是仅仅指人的肉体欲望）——这是一种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存在关系，要是我



能对之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使它有充分的存在理由,那它们就有可能在我的生活中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但我却深陷其中,只能在这些黑暗之网中摸索。

我伤心流泪,流泪,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像癌细胞一样在我的全身扩散。

1965年8月:

必须遵循一种更不具屈从色彩的生活原则。

认识到盲目的愤怒是徒劳无益的。

社会具有局限性。

为了工作与独处,应更好地利用孩子去学校的时间。

不应为自己的生活风格感到困惑。

尽量珍惜时间。

为诗歌努力,更努力。

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经常问我:“你没有写过关于你孩子的诗吗?”我同时代的男诗人就写过关于他们孩子的诗,尤其是关于他们女儿的诗。对于我来说,诗歌是一个我还没有成为人之母时曾经生活过的场所,是我作为我自己时曾经存在过的地方。对于我来说,那糟糕和美好的时光都不是多余的。我记得这些时光,当我给我

的每个孩子喂奶、看见他们把眼睛睁得圆圆的直盯着我时,我就会感到:我们每个人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不仅通过嘴唇和乳头,而且还通过我们彼此的注视:那种深邃、安详、热情、专注、充满深蓝色眸光的眼神。我记得有一次孩子吮吸我乳头时,我充满乳汁的乳房给我带来的那种生理上的快感,当时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那种由饕餮之饮带来的掺杂有负罪感的快感外,我根本就没有其他类似的快感。我记得当初那种矛盾的感受,那种无人可以做出选择的进入一个战场的感受,那种在无止境的欲望的角逐中,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的感受。由于我有三个七岁以下的孩子,这就意味着这一切都有可能在我的身上发生。但我也记得每个孩子各自不同的身体,每个孩子的精巧、瘦削而结实、温柔、优雅,记得这些小不点儿的美丽,他们并没有被人教导说,男人的身体必须要僵硬而刚直。我记得那些静谧的时光,其时,我能心安理得地一人走进浴室。我记得我经常从质量差的睡眠中突然惊醒,必须对孩子的噩梦作出反应,披上毛毯,把奶瓶弄暖和,带某个半睡半醒的孩子去卫生间。我记得我清醒地返回床边,由于恼怒而变得虚弱,心里很清楚这残缺的睡眠将使我的第二天变成地狱。因为疲惫不堪,我会无缘无故对孩子冒一些他们不能理解的火。这势必会导致更多的梦魇,从而引起对安慰更多的

渴盼。我记得我以为我不会再去做梦了（当睡眠中的梦好几年来都背离了她时，难道在一个年轻母亲的下意识中，她还会去相信梦所提供给她的那些信息吗）。

许多年以来，我都不敢去回忆孩子生命中第一个10年中的那些日子。在这转眼即逝的10年中，我看见一个笑容满面的年轻女人，穿着孕妇服，或者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一个半裸着身体的孩子身上，渐渐地她的脸上没有了笑容，面带一种冷漠略为悲伤的表情，就仿佛她在倾听着什么。在这段时间中，我的儿子逐渐长大，我开始改变我的生活，我们开始彼此平等地交谈。我们一起生活，共同经历了我和我丈夫的离婚，经历了他们父亲的自杀。我们成了幸存者，成了四个由结实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人。由于我总是试图告诉他们事物的真相，由于他们新的独立就意味着我新的自由，由于我们彼此信任，即使在我们对事物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所以，他们在小小的年纪就变得非常自信，并且对他们不熟悉的事物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有些事情让我知道，如果他们能够容忍我的愤怒、我的自责，仍然坚信我的爱和我们彼此之间的爱，那他们就是强大的。他们的生活一直都不是，将来也不会是轻松的，但他们真实的存在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馈赠，他们的活力、幽默、机智、和善、对生活的爱、独立的人生态度随时随地都在感染我。我不知道是怎样通过他们

好斗的儿童天性和我防范的母性性格来促成我们自己与我们彼此之间的那种认同的。也许，这种由社会 and 传统铺垫的彼此认同一直就存在在那里，从母亲和吃奶的婴儿她们之间的第一次凝视开始就存在了。但我的确清楚，在好几年的时间中，我都相信我绝不可能是谁的母亲，那是因为我只能感觉到自己强烈的需要，并且常常粗暴地表达这些需要，因为我是卡莉(Kali)^①、美狄亚(Medea)^②，是那头吞食它小崽的母猪，那个背叛女性特征的没有女人味的女人，是一个信奉尼采学说的怪物。即使到了现在，一读到那些过去的日记，一回忆起往昔的事情，我也会感到悲哀和愤怒，只不过这些悲哀和愤怒的对象不再是我和我的孩子。我感到悲哀是因为那些年我荒废了我的生活，愤怒是因为存在于母子关系中的那种残缺和人为控制，而这种关系本应是爱之伟大的经验与源泉。

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早春的某一天，我在大街上碰到了一个年轻的女朋友。她带着一个瘦小的婴儿，用一条浅色的棉带把婴儿吊在她胸前，她宽松的短衫挤压着

-
- ① 卡莉(Kali):印度教女神,形象恐怖吓人,既可创造生灵,又可毁灭生灵。——译注
- ② 美狄亚(Medea):希腊神话中 Colchis 国王 Acetes 的公主,精巫术,曾帮助 Jason 取得金羊毛,并与他私奔。后被遗弃,愤而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女。——译注

婴儿的脸庞，婴儿用手紧紧抓住她衣衫的一角。我问：“她多大了？”那位母亲对我说：“刚好两周。”我感到吃惊，因为内心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欲望，想再次把这个幼小的、新的生命紧紧地抱在我怀中。那婴儿就存在在那里，蜷曲地熟睡着，悬吊在母亲的双乳之间，就仿佛她蜷曲地睡在子宫中一样。那位年轻的母亲——她已经有了一个三岁大的孩子——说：一个人很快会把拥有这个无瑕、完美新生命的那种纯粹快乐忘得一干二净。我带着回忆、妒忌从她身边走开。只不过我还知道另外一些事情：她的生活并不是简单的；她是一个有着两个不到四岁孩子的数学家；即使现在，她也仍生活在别人生活的节奏里——不仅有那婴儿经常的啼哭，而且还有那个三岁孩子的要求，以及她丈夫的问题。在我们居住的公寓里，女人们仍然单独地带着孩子，在她们各自的家里日复一日地打发光阴，在家洗衣服，推三轮车去公园，等待丈夫回家。如果那儿有孩子坐浴的池子和儿童游戏室，年轻的父亲们也会在周末推着婴儿车去那里，但看管孩子的重任仍会落在母亲的肩上。我羡慕使一个两周大的婴儿蜷曲地靠在某人乳房前的那种感性愉悦，但我不羡慕电梯中充满小孩的那种嘈杂，不羡慕洗衣房中婴儿的那种号啕大哭，不羡慕冬天把七八个孩子塞入其中，为了使他们不伤心，能够安静下来，由一个大人来看管的那个房间，不羡慕他

们生命中的那种基调与底色。

4

但有人仍会说,这就是人的处境,这处境就是痛苦与欢乐、破碎与完整不可分离的统一。是的,要是15或18年前,我也会这么认为。但与强奸、卖淫和奴隶制比起来,母性身份的父权制习俗一点也不显得更像是“人的处境”(那些竭力强调这种处境论的人通常都没有受到过这种处境的压迫——无论是性别的压迫、种族的压迫,还是劳役的压迫)。

母性——在征服与农奴制、战争与和约、扩张与帝国主义的历史中,并没有被人们提及——它具有自身的历史,拥有一种意识形态,它比宗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显得更为重要。我本人的,似乎又是一个母亲的隐秘的痛苦,一个个体的,似乎又是我周围和身边那些母亲们的痛苦,无论我们的阶级和肤色如何,在每一个极权主义制度和每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中,那种由男人来控制的女人的生育,由男人在法律和技术上对避孕、人口出生率、流产、产科学、妇科学及宫外受孕实验的主宰——这一切对父权制社会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种父权制把不是母亲的女人看做是女人的一种消极和可疑的状态。



在整个父权制神话、梦的象征理论、神学和语言学中，以下两种观点总是并肩而立，同时存在。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女人的身体是不洁的、堕落的，相对于男人的身体而言，它是释放、流血和危险的场所，是精神与肉体败坏的源泉，是“邪恶的入口”。另一方面，作为母亲，女人是慈善的、纯洁的、神圣的、无性的、滋养的，母性身体的潜力——由于流血和神秘的同一个身体——是她独一无二的命运和生命正当存在的理由。这两种观点一直都深深植根在女人的心中，甚至植根在我们当中那些最具独立性的女人心中，但好像正是她们在试图去开创一种最自由的生活。

为了坚持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它们之间是非常矛盾的，男人的想象力就不得不对女人们进行分门别类，用一种非此即彼的方式来看我们，或者迫使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看自己，要么善良，要么邪恶，要么丰孕，要么不孕，要么纯洁，要么不洁。没有性征的维多利亚式的天使妻子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妓女就是由这种双重思维创造出来的产物。实际上，这种思维方式与女人真正的官能特征毫无关系，而与男人对女人的主观臆想关系甚密。这种思维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权宜之计是最无耻，也是最富戏剧性的，人们在此会发现，性别主义与种族主义成了同一个东西。社会历史学家A. W. 卡尔霍恩(A. W. Calhoun)对人

们纵容白人农场主的儿子对黑人妇女的强奸行为进行了描述,在一种为了生下更多混血奴隶的有意行为之中,人们认为生下这些混血儿是有利可图的。他摘录了19世纪中期两位南方作家就这一女性主题所作的论述:

在奴隶制环境中,白人最沉重的种族负担就是那些出现在白人门口、白人寓所里的非洲妇女,她们具有强烈的性本能,但缺乏性意识。”“……在奴隶制条件下,对白种文明整体性的沉重打击是在那个反抗力最薄弱的时刻,由那位淫荡的混血女人的恶劣影响造成的。在上层白人母亲和妻子那种不妥协的忠贞中仅仅存在着一种种族未来品质的信念。①

由强奸所造成的母亲身份不仅被人鄙视,而且被强奸的妇女反倒成了有罪的人,成了袭击者。但又是谁把黑人妇女带到白人门口的呢?是谁的性意识缺乏才产生了这些在经济上有利可图的混血儿呢?应该问的是,是否“纯种的”白人母亲和妻子就不会被白人种植主强奸,

① 请参见 A.W.卡尔霍恩的《从殖民时代到现代的美国家庭史》(克利夫兰:1917年)。另参见加德·勒纳(Gerda Lerner)的《白人美国中的黑人妇女:一部纪实史》(纽约:出版于1973年),第149~150页。
——原注

因为人们设想她缺乏“强烈的性本能”？在美国南方，也像在别的地方一样，生孩子是一种经济上的需要，那些黑人和白人母亲仅仅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一种工具。

不管是“纯洁”的，还是“淫荡”的妇女，不管是所谓的女主人，还是女奴隶，也不管是那位由于把自己降格为传种动物而受到赞美的女人，还是那位被人蔑视和惩罚而成了“老处女”或“同性恋”的女人，她们都不可能通过对这种女性身体（暂且不提女性的心灵）的颠覆来获得那种真正的人生自由和自主人格。然而，由于对那些无权无势的人来说，短期的利益通常是唯一可看到的东西，所以，我们也会在延续这种颠覆的过程中一直扮演我们的角色。

5

大多数关于儿童护理和心理学方面的著作都假定，向成熟个体发育的那个过程从本质上说都是一部儿童成长的戏剧，此戏剧围绕着他的单亲或双亲而展开。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展开过程中，其单亲或双亲的角色是固定不变的。当我知道我仍处于一种无视自己存在的状态中时，就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够把我从我曾是一个母亲（那些固定角色中的一员）这一现实中剥离出来。那位安静、自信、内心平和的女人，由于翻阅我读过的那些指南手册而

深受感动，她作为一个宇航员似乎和我不大一样。完全有理由相信，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从已经存在于我和一个生命之间的那种关系中分开，这个生命曾经被怀在我身上，现在被抱在我手中，由我的乳房供给他乳汁。在整个怀孕和哺乳过程中，人们只是劝女人应尽量放松，要表现出一种夫人太太般的安详，但没有人提到过怀第一个孩子时母亲所承受的那种精神上的危机，那种长期潜伏在心里的要成为人之母的欣喜之情，那种有能力还是无能力一方面要去胜任母亲之职，另一方面又要去涉足一种新的身体和心理体验的困惑，这种困惑必然是一种被强化了了的感受，此感受可能是喜悦的，也可能是迷惑和耗费心血的。没有人提到过那种对一个如此瘦小，如此需要依靠，如此把自己缩成一团的生命所能引起的神奇诱惑，这种诱惑恰如恋爱早期那样专心致志、压倒一切，尽管这生命是也可能不是某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母亲关心她的孩子开始，他们就被卷入了一场不断变化的交流之中，在这样一些时刻，这种交流是非常具体的，比如：听见孩子的哭声，她就会感觉到乳汁充满了她的乳房；孩子第一次吮吸，她的子宫就会开始收缩，然后又恢复到正常的大小；接下来，孩子的嘴会吸舔乳头，在他曾经呆过的子宫中便会产生一阵阵生理的快感；或一旦闻到乳房的气味，哪怕是在睡眠中，他也会开始寻找

和摸索乳头的位置。

孩子有关他存在的最初意识是通过母亲回应的手势和表情来获得的。就好像在母亲的眼睛、微笑和触摸中，孩子第一次读到了这样的信息：你就在那里！同时，母亲也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发现她自己的存在。通过一条最尘世、最无形的纽带，她与这个他者相互联系在了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在遥远的过去她的婴儿与她母亲相互联系这一事实，她又可能没有和别的什么人联系在一起。她也需要去作出努力，从那种一对一的身份关系中进入到一种新的现实，或者对她要成为她自己的那种存在再次作出肯定。

给孩子喂奶的行为，与性行为一样，也许是紧张的，伴有生理上的痛苦，会产生一种文化上的不适感和罪恶感。或者也像性行为一样，能给人带来一种生理上的快感，情感上的慰藉，让人的内心充满一种情色的温馨。但就像情人们在做爱后不得不分开，以便再次成为独立个体一样，母亲也必须使自己与婴儿分开，婴儿也必须从母亲那儿独立出来。在培养孩子的心理学著作中，从孩子的方面着想，人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让他随心所欲”之上。但为了她自己的利益，母亲也需要同样多，或者更多这样的随心所欲。

母亲身份，在那种与某个特殊孩子或几个特殊孩子

紧密关系的意义上说,它是女性历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在女性所有的生命岁月中,远不止这样一种身份。处于40岁阶段的家庭主妇也许会开玩笑地说:“我感觉我像个打工的人。”但用社会的眼光来看,只要我们曾经当过母亲,那我们不是母亲,又会是什么呢?“随心所欲”的过程——尽管要是没有这么做,我们会感到自责——是一种抵制父权制文化后果的举措。仅仅让我们的孩子去随心所欲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也需要重新返回我们的自我。

只要生过和哺育过孩子,我们就能明白,实际上正是父权制与生理学的结合才形成了对女性身份的定义。但同时也意味着女人能用一种强烈的方式来体验她们的身体和情感。我们不仅要经历生理、肉体方面的变化,而且还要经历角色定位的转变。我们知道(常常是通过痛苦的自我惩罚和自我麻痹的方式)我们身上的那些品质被人们设想为“天生的”,比如:忍耐、自我牺牲、乐意没完没了去重复那些使一个人社会化的家庭琐事。另外,我们也(这一点常使我们惊奇不已)为爱和暴力这两种感情热血沸腾,这两种感情比我们曾经了解的任何感情都显得更强烈、更残酷(有一个反战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母亲,最近就站在一个讲台上这么说过,“如果有谁敢把他的手放在我孩子身上,我就宰了他”)。

我们难以做到把这些相似的经历抛在一边。有点奇

怪的是，即使是那些对看护孩子方面没完没了的要求咬牙切齿的妇女也会发现，要她们承认孩子的成长实际上与她们关系不大这一事实也是十分困难的。她们仍然觉得她们必须呆在家里，保持警觉，最好变成一只总是聆听危急之动静、求助之呼唤的耳朵。孩子的成长并不是一条平滑上升的曲线，而是一段凹凸不平的历程，他们的需求如同变化的天气一样反复无常。就一个8岁或9岁的孩子而言，文化的“规范”在决定具体的某一天她（他）将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性格，或决定她（他）将会如何去面对危机、孤独、痛苦、饥饿完全是无能为力的。一个人应该始终认识到在青春期到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人除了不是一种线形的存在，他可能会是任何其他东西，因为一个6岁大的孩子仍然是一个人。

在一种部落，或者甚至封建制度的文化中，一个6岁的儿童也许会被赋予沉重的责任和义务，我们的文化没有这种东西。但另一方面，人们并不认为在家带孩子的妇女正在做的是重要的工作，人们仅仅期望她去发挥母性的本能，去做一些男人们绝不会染指的琐碎家务，对她所做之事的意义，人们基本上不加评论。所以孩子和母亲同样被鄙视，因为只有能付出劳动力的成年男女才被认为是具有“生产性”的。

母与子的那种权力关系通常就成了父权制社会权力

关系的一个缩影：在“你愿意这么做，因为我知道什么对你好”与“你愿意这么做，因为我能够使你这么做”这两者之间，人们就难以区别。无权的妇女总是把养育儿女作为她们拥有权力的一种方式（一种狭隘，而且没有深度的方式）来加以利用，也把它作为一种她们报复世界的需要来加以利用，而这世界一直都在把某些东西强加在她们头上。她们用手拽着孩子穿过房间去洗漱，为了让孩子多吃几口某种他们不喜欢的食物，她们便哄骗、威吓、贿赂孩子，而这种做法对按照“科学育儿法”的文化传统必须建立起来的标准来说是多余的。于是，她（他）就成了现实的一个碎片，世界的一个片断，这个世界能够通过一个女人来施加影响，甚至得到塑造，而这个女人只能对诸如尘土、食物之类的无生命的物质施加影响，而不能对其他任何东西发挥作用。

6

当我试图回到第一次怀孕、还是26岁那个年轻的¹身体时，当时，我没有顾及自己怀孕方面的生理知识，同时也逃避了我的智力生活和职业生涯，后来，我才意识到，由于母亲身份的习俗，而非事实，我真实的身体和真实的精神这两者实际上是分离的。这种习俗——就我们所知，



它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一个基础——只允许我获得某些观点，拥有某些期望，无论这些观点、这些期望是表现在我产科医生接待室的小册子中，我读过的小说中，我祖母的认同中，我对自己母亲的回忆中，还是表现在西斯廷教堂那幅圣母像，或米开朗基罗那幅《圣母怜子图》中，情况都一样。一种肤浅的观点认为，怀孕的女人是一个安于满足，或者完全就是一个安于等待的女人。女人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种等待的动物：等待被要求，等待来月经，在恐惧中等待它的来或是不来，等待男人们从战场上、从工作中回家，等待孩子长大，要不就等待一个新生儿的降生，或等待绝经期的来临。

由于否认了我生活中那些主动、积极和充满活力的因素，所以，我在怀孕期间就完全陷入了这种等待的状态，陷入了这种女人的宿命。我感觉我最近的、目前的、身体的经验与我阅读、思考、写作的经验是脱节的。就像一个在机场候机的旅行者，她乘坐的飞机被耽误了好几个小时，于是她便胡乱地去翻阅她平时根本不会认真读的杂志，去逛她不会感兴趣的商店，我沉溺在一种外在的宁静与内在的烦躁之中。要是烦躁完全是焦虑的一层面纱，那我就应该知道，作为一个女人，与其去探究隐藏在我西斯廷式平静之下的那种焦虑，还不如让自己烦躁透顶。我那真正诚实的身体最终给了我回报：我对怀孕产生了过

敏性反应。

我相信,正如本书将要说明的,女性生物学——那种来自阴蒂、乳房、子宫、阴道的强烈而弥漫性的生理性灼热和官能性快感,那些发生在女性身体中的行经的周期,生命的孕育与完成——与我们理解的比较起来,将会有一些完整得多的解释。父权思想已经把女性生物学限制在了它狭隘的范围之内。为此,女权主义的目光应该摆脱女性生物学的桎梏。我相信,这样就会使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特征看做是一种资源,而非一种宿命。为了过一种完整的生活,我们不仅要控制我们的身体(尽管这种控制是有先决条件的),而且必须考虑到我们身体状况的统一与平衡,考虑到我们与自然法则的和谐,还有我们心智的身体基础。

由于女性创造生命的那种能力,古代那种经久不衰的对男人的妒忌、敬畏与恐惧一直都对女性在其他方面的创造能力采取一种憎恨的态度。人们不仅要女人去忠实于她们的母亲身份,而且还告诉我们,我们在智力和审美方面的创造是欠缺、没有结果和见不得人的,仅仅是想变得“像男人一样”的一种企图,或者是逃避成熟母性“真正”责任的一种企图,这种责任就是结婚、生子。对于那些试图逃避身体陷阱的女人来说,试图“像男人一样”一直都既是赞美,又是囚禁。这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因



为许多有知识和创造力的女人都坚持认为，男人才是最初存在的人，而女人只不过是派生出来的附属物，这些女人一直都在贬低她们的身体特征以及她们与其他女人的那种亲密关系。对女人来说，身体造成的麻烦是如此之多，以致很容易经常对它嗤之以鼻，把它当做一种行走的游魂。

只不过由于有对本身存在于女性生物学中那种实际上在发挥作用的生理机能——作为文化扭曲的一种对立面——的新的探索，这种对身体的反动现在正在变成一种更为复杂的混合物，不管在利用它时，我们作怎样的选择，也丝毫不能限制母亲的作用。

我自己的故事，已经贯穿在本书中，它仅仅是一个故事。最终我找到的是—种决心——就一个女人所能做到的和与其他女人—道尽可能去做到的而论——我决心去弥合存在于身与心之间的那道鸿沟，绝不想让自己在精神和肉体方面再次迷失。慢慢地，我懂得了存在于“我”母性经验中的那种矛盾，尽管它有别于许多其他女人的经验，但它仍不是独一无二的。我懂得了，作为一个女人，只有抛弃了我那种关于唯一性的幻想，我才有望去过—种完全可靠而可信的生活。





第二章

神圣的召唤

1

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的《被奴役的母性》(1928)中引用了一封女人的信。这个女人想得到有关节育的建议,以便她能毫无恐惧地与丈夫相处,尽到母亲和妻子的责任。她写道:“我并没有什么热情,但我试着摆脱我在性爱中应有的羞涩,保持自然,扮好角色。正如你知道的那样,现实和女孩们梦想的生活可大不相同。”半个世纪前,一个普通的女性用那些话总结出传统意义上的母性历史和异性关系(对这个例子来说是婚姻)历史。她只想知道怎样去实现“保持自然,扮好角色”——那两个自相矛盾的,对女人来说是不可能的要求。羞愧的母亲应该怎样对待女儿?让她了解失去爱,失去家的恐惧,不满成为女人的恐惧,并去教她——教我们所有人——

假装性高潮。“女孩们期望什么？”也就是说，如果她想要的不仅仅是世俗告诉她的浪漫与所谓超凡体验？如果她知道一些她真正的需要，譬如柔情，譬如某种爱抚的方式，譬如不仅仅被当成是一个性交和生殖的躯体？是什么给了玛格丽特·桑格写作的勇气，以及尝试适当控制她的身体使用的勇气？是她孩子们的需要？她丈夫的要求？模糊不清，而又无法抑制的自我之声？我们应该把那三点都算上。一代代的女人总是宣称，她们的勇气是为了他们的孩子和丈夫，然后是为了其他人，最后才是为了她们自己。

传统的母性并不等同于生育和照顾孩子。这种不同甚至大于传统的异性恋与亲密性爱的不同。两者都给出了做出选择或拒绝选择的惯例和条件。它们并不是“实在”，但它们形成了我们生活的氛围。研究女性历史的学者已经发现，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男性创造出的社会行为传统和准则对女人的真正生活并没有必要的意义。不过任何被普遍传播的传统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体验，甚至影响了我们用来表达它的语言。母性的体验与性别特性的经验都受到男性趣味的引导。那些威胁传统的行为，比如：私生、流产、女同性恋主义，都被认为是不正常和罪恶的。

传统的异性恋理论已经告诉了女人几个世纪：我们是

危险的、不洁的，是肉体情欲的化身。所以我们变得“没有激情”，冷淡，性被动。如今它带来了西方妇女的“感官享受”和“性解放”和中国对禁欲主义的革命，以及所有否定女人对女人之爱的地方。传统的母性思想要求女人的“天性”，而不是智慧；要求自我忘却，而不是自我意识；要求依靠他人，而不是创造自我。只要它的后代是“合法的”，母性就是“神圣的”——也就是说，只要孩子继承的是一个合法控制他母亲的父亲的姓。根据1914年社会主义者的一篇短文，那是女人“最崇高、最神圣的使命”。而且1910年一个南方种族主义者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女人使家成为了现实，而家是所有制度的基础，是社会的支柱。”

更现代一点的论点来自英国评论家斯图尔特·汉普希尔(Stuart Hampshire)。在下面的悲观的寓言中，他把今天“解放的妇女”视为易卜生笔下那惊恐的，走向自我毁灭的女英雄海达·伽布勒(Hedda Gabler)(她也拒绝了母性)。

一个被完全启发的思想，目前只关心它的力量与作用，最终会腐蚀和漂白它所有为之尊重的东西——共同过去的传统和记忆。它带来对未来的道德决议：所有软弱和平常的柔情的缺点都将不复存在，没有感情的分化，因此没有任何的依恋。那么为什么还要有家庭？为什么

还要有民族？最近兴起的女性怀疑主义可以带来如此全面的颠覆。

父权制似乎不仅要求女人为物种的进步，承担起痛苦和自我否定的担子，而且那一物种的很大一部分——女人——应该保持最初的无知和愚昧。女性的这种“被使用”意识是由人类家庭的道德和感情生活决定的。就像他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多年前的先人一样，汉普希尔认为，当女人开始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时，这个社会就受到了威胁。脱离了母性和异性爱，父权制就不能以传统的形式存在，所以不得不以看似公正和自然的方式对待她们。除了在某时某地，容忍某些个体“变换的生活方式”外，根本问题并没被正视。

2

“神圣的召唤”当然有种完全实际的情形。过去在美国的殖民地，一个普通的家庭有12到25个孩子。一个“老女佣”可能只有25岁，她受到的不是嘲笑，就是责骂。她没有办法解决经济上的窘迫，被迫随着家人四处漂泊，做户主和孩子们的帮手。对她来说没有其他的“召唤”。一位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度过童年的英国劳动妇女写

道：我是母亲的第7个孩子，在我之后，又有另外7个出生了。总共14个孩子，把我妈妈变成了一个完美的奴隶。大体上来说，她并不想生孩子，或给婴儿喂奶。那时候她已经有了8个孩子，而最大的那一个还不能自己去学校。

在美国的奴隶制下：

……农场主要求女人和女孩生孩子是很正常的。在南卡罗来州一个有着100名奴隶的大农场，农场主威胁要抽打所有的女人，因为她们没有生育。她们告诉他，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她们不得不在一两英尺水深的麦子沟里干活。在咆哮和恐吓之后，他让监工的老婆告诉她们，如果她们有了身孕，就让她们到干地上干活。

那些白人开拓者里的母亲和黑人女奴隶每日都为经济的发展扮演着全职生产者的角色。黑人妇女常常把孩子捆在她们背上到田里干活。在历史上，女人不仅要生养孩子，还必须得从事必要的生产劳动。到19世纪，反对“劳动母亲”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且提倡“母亲留在家里”。当科技的发展全面减少了平常辛苦的体力劳动，而且家庭规模开始缩小的时候，这些呼声达到了顶峰。全职母亲的概念在1850年后开始形成，而“家”成为宗教上的一种结合。

19世纪30年代，男性的传统声音这样喃喃道（摘自《美

国社会论》):

母亲对后面几代人的幸福都有很大的影响,就其他所有尘世间因果的结合……当我们的祖国充满虔诚和爱国的母亲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这里将充满道德和爱国的男人。在神灵的保佑下,拯救世界的这种影响力,一定是来自于母亲的双唇。她作为第一个有罪的人,必须成为俗世的工具来赎罪。母性的影响,毕竟是以上帝之手的名义,必须把我们内疚的民族领向责任和幸福。

母亲承受着夏娃罪过的重罚(她是第一个罪人,被污染者和污染源),正因为如此,她被指望担负拯救男人的重任。唯恐她失败,有许多恐怖的例子来警告她:

正是拜伦的母亲让他犯下了深重的罪孽……如果这个诗人的罪过应该受到世界的诅咒,这个世界不会忘记正是他的母亲在他年轻的心里培养了疯狂的激情,让这个儿子成为对同伴的诅咒。

不过女性的呼声也一齐高涨。玛利亚·麦金托什(Maria McIntosh)在1950年这样描述理想的妻子和母亲:

她丈夫总能在她脸上看到安详的神情，神圣的至福和“内心纯洁的祈祷”。她的孩子们把她作为世界完美之爱的典范。他们从她身上学到的，比从她的教训中学到的更多。他们懂得了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人类，为他们的上帝而活……她教会他们爱自己的祖国，并为它的荣誉而奉献自己。

很显然母亲为父权制带来了益处：她是个人信仰，社会意识和民族主义的榜样。母性传统再现和更新了所有其他的传统。

尽管如此，19世纪“呆在家的母亲”，不得不忍受着相似的不幸品质，比如压抑脾气。

……当一个母亲不能掌握她自己的时候，是否还能掌握她的孩子？……她必须学会控制自己：克制欲望。她必须给她的孩子一个温顺的榜样。可以让一个母亲感到痛苦；让她拥有镇定和见解，察言观色，循规蹈矩。但千万不能让她表现她的愤怒，或是流露出生气的神情。

这是来自男性的期待。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 (Lydia Maria Child)的《母亲之书》(1931)建议：



你是否会说一个人不可能总是控制自己的情绪？其实方法是有的，而且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祈祷。你会说，也许自己并没有闲暇在每次发火或心碎的时候去祈祷。那并不需要什么时间——“神呀，帮助我摆脱这个诱惑吧！”这种内心突然的祈祷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突然迸发。如果对着那狂躁的骇浪谦卑而真诚地呼喊“冷静！保持平和”，那会使你苦恼的灵魂再次恢复宁静。

对母亲的这种建议让我们意识到了女性大体是怎样意识到自己的愤怒的。在《小妇人》中，那个充满怒火的亚玻伦(Apollon)女儿玛默对乔说：

在我的生活中，几乎每天我都在生气。乔，但我已经学会不把它表露出来。而且我仍然希望学会不再生气，尽管那也许会让我再花上40年的时间。

我想起了自己童年时代受到的相似教导：我的“愤怒”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回应，而是内心黑暗、邪恶的污点。我童年的怒火常常被看成是魔鬼引发的“脾气”，从中我把成人世界理解为某种占有。后来，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我记得自己因大发雷霆而给孩子树立了“坏榜样”而内疚。就好像我也应该教导他们“情绪”是一种性格弱点，

与发生在灼热肌肤之外的世界之事毫无关系。母爱被认为是源源不断的，无条件的。爱与愤怒不能共存。女性愤怒时刻威胁着母性传统。

3

在19世纪和20世纪，理想中的母亲和孩子是被禁闭在家的。女人的母亲身份被专门化，她们脱离工作赚钱的“男性世界”进入家庭。奋斗、野心、好胜、力量；从“家庭”走向“公众”或“政治”——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历史发展后来的事了。但是理想和现实的力量都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的意义明显地变得不再单纯和唯一。

这个概念是怎么开始的？它的意义又是什么？

从最早的定居生活到作为生产中心的工厂大规模增长期间，家并不是一个庇护所，一个使人安乐和逃避残酷“外部世界”的地方。它是世界的一部分，一个工作中心，一个生存单元。在那里，女人、男人和孩子都尽早地开始了周而复始的劳动：种植、收割、准备食物，加工皮革、芦苇、黏土、染料、油脂和药草，生产纺织品和衣物，酿酒，制作肥皂和蜡烛，治疗和照顾病人，把技巧和手工艺传给年轻人。很少有女人无所事事，她们总是需要照看一个或多个孩子。女人和孩子是繁忙社会中积极的一



分子^①。劳动是艰难的、辛苦的，常常让人精疲力竭。劳动的种类繁多，而且常常是公社制的。怀孕和生子期间，以及失去幼儿后，妇女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女人寿命的短暂往往被天真地浪漫化了，它被解释为是由于不断地遭受营养不良、饥饿和疾病的打击。但是奉献母性和把家变成私人避难所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女人工作的中心。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也没有被限制在一种孤立的状态。

在威斯康星州的边远地区，开拓者母亲们是一些小旅馆的老板、学校教师、药剂师。她们维持着家里的生计，也许带着10到15个孩子，给过路客提供食宿。母亲“采集野生植物、浆果、茎皮、野花和草根……她把她们晾干分类……便于辨认……有时她是个外科医生……拿着纱布，

① 阿格尼斯·斯梅德利(Agnes Smedley)描述了她的祖母——一个精力充沛的妇女，在世纪初是怎样参与生产劳动的。每天早上和晚上，她用男人般的力气和动作给奶牛挤奶。她搬运一桶桶的脱脂奶，给猪喂食。当她为烤面包揉面时，面粉在她手下噼里啪啦啾啾作响，她的手臂工作起来活像蒸汽活塞。她在黎明叫醒男人，在晚上打发他们上床睡觉。她指挥大家采摘水果——苹果、梨、桃和各种浆果。她教她的女儿们怎样把它们晾干保存，以便过冬。秋天，她指挥屠宰猪牛，然后把肉放进烟熏室。夏天，当糖料作物成熟后，她把它们砍下来，并监督这些长短不一的茎秆在山角下被碾磨成糖。这个女人自己有五个孩子，丈夫和前妻还生有另外八个。(《地球之女》，Old Westbury, N.Y.: Feminist Press, 1973, 18-19)

包扎处理受伤的手指,或是从脚里取出生锈的钉子,并清洗伤口……救护伤者”。不过母性真正的、耗人的重担是肉体上的:不断怀孕的代价,以及让人精疲力竭地生育和哺乳。

19世纪见证了西方家庭、工作、女人,以及女人和社会生产率之关系的决定性变迁。最早的工厂实际上产生于开始生产纺织物、铁器、玻璃和其他一些商品的农民家庭。它们被卖给了中间商,他们像经营成品市场一样出售那些原料。甚至在铁匠店,女人也和男人并肩工作。女人几乎垄断了酿造行业。尤其是纺织业,一直依赖于妇女。早在14世纪的英格兰,女人们就不仅仅为自家纺织,而且对外出售。

逐渐,那些仍用手工织布或在家纺织的妇女在织布机的竞争下,只好转行到了磨坊。那时,还没有限制劳动时间的法律。一个女人工作了12小时后,还得回家挑起家庭的担子。1844年一个英国工厂的检查员可以这样报告:“夜工和白天长时间工作中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女性。她们的劳动力价格更便宜,而且她们比男人更容易学会应付身体的劳累。”

那些把年幼孩子留在家的妇女的情况都差不多。要么是让一个六七岁的女儿来照顾,要么是祖母,要么雇邻居家的孩子。有时母亲们会花钱把婴孩交给年长一点的



妇女来照顾，而取代母乳的是很稀的燕麦粥。如果一个母亲负担得起的话，就会被要求买牛奶来喂她的孩子。人们给这些孩子注射鸦片酊，来让他们保持安静。外出工作让母亲们没有机会亲自培养子女，这给孩子和母亲都带来了许多的困难和不利影响。

由于丈夫的工资不够，或者根本没有工资，一些妇女不得不去工作。由于她们的劳动更为廉价，男性工人们把女工看成是一种威胁。妇女参加工作明显地颠覆了“家庭”与父权制的婚姻。不仅一个男人有可能在经济上依靠他的妻子，女人也可能从经济的角度支配婚姻。双重力量——对儿童幸福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对父权价值的担忧——促使控制儿童与妇女劳动的法律的产生，并且主张：“家庭的管理和事务，才是女人真正的领域。”^①

这样来定义家庭是前所未有的。它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与某种神力有关的理想，并且它的影响力至今还存在。女人的生产力（再生产除外）第一次被看做是“对时间、财产、道德、健康和生命的浪费”。人们警告她们，离开家不仅仅意味对孩子的忽略，如果她们不让家里舒适，

① 社会历史学家 A. W. Calhoun 建议在美国为妇女开办一种新的经济独立的工厂，它在殖民时期或边境开放时期是没有过的。保持家庭父权制的需要，那至少是儿童劳动法规和限制妇女工作时间和环境的法律背后的动力之一。

她们的丈夫就会离开家去艾尔啤酒店。男人和孩子的幸福才是女人真正的天职。既然男人们没有照看孩子和家的天职,那么解决之道就是把女人们从工厂里赶出来。

公众开始重视那些母亲在磨坊工作的孩子们的命运,开始尝试设立托儿所。但是就像20世纪的美洲一样,在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人们反对政府资助照顾儿童,理由是它亵渎了“家庭与私生活的神圣……家庭是立宪政府的组成单元,是建立在人类的崇敬和羡慕之上的”。迄今,无论法律怎样制定,都没敢涉及这一神圣的领域。即使丈夫和妻子很贫穷,他们在工作或烦人的应酬之后,都能在家里得到补偿,找到力量、恬静和关怀。

1915年英国的“妇女合作协会”出版了由体力劳动者的妻子们写的信,这些信是关于她们在家作为母亲和劳动者的生活。那种生活尽可能地受着理想传统家庭的保护,远离残酷的工作和斗争的现实。一个女人一般有5到11个孩子,还有几次流产,许多人得不到产前护理和足够的营养。“当她可以吃饱的时候,她往往克制自己以节省食物。在工薪家庭如果能有节省的话,并不是由于丈夫和孩子,而是因为那个母亲吃着残羹剩饭,‘嚼着没有肉的骨头’。”那些信件充满了关于不停分娩带来的不安与疲惫的话题。为了流产,许多女人违背她们的天性,不顾丈夫的反对,服用避孕药。但是那些药往往没多大作用,



还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带来了不少病痛。不过伴着这些女人所写的身体虚弱、神经紧张、精疲力竭，是非凡的精神毅力、能应付现状的愿望和对境遇不公的强烈意识：

在我做母亲的头几年，我把那时女人不得不经受的痛苦看成是理所当然的。那对让人有良好行为以及避免大惊小怪非常有用……我已经有了最糟的经历——不安的分娩，伴随对着精神和身体失衡的担心；对增加一个人来分享已经很少的津贴的担心；对很快坐完月子，太快挑起家庭担子的担心；或对患上新的疾病，成为生活和所有事情的负担的担心。

许多人写了由于无知带来的伤害。这些年轻的女人根本就还没有为婚姻和怀孕做好准备，更没有料到丈夫会在她们怀孕期间或是刚生完孩子不久无情地提出性要求：

在母兽怀孕期间，那些公兽会为了它们，完全克制自己。但对女人来说却不是这样，她仍然是男人发泄的对象，就像她根本没怀孕一样……如果一个女人感觉不好，她也不能说出来。因为如果她不让步的话，那个男人会有许多惩罚她的办法。

这次生育,我不怪我丈夫(这个女人有七个孩子和两次小产)。由于我病了,他耐心地等了十个月。当认为是安全期的时候,我把那看做是一种责任,我知道在有限的家庭成员中,不能对丈夫怀有多大的信任……是时候讨论一下怀孕的问题了。而且我们必须让男人们知道我们是有理想的人,向往成为一种比他们用以满足自己的东西更有意义的人。

女人在她们的一生中不仅仅要受孕,还得承担繁重的劳动:拖着大盆子擦洗地板,熨衣服,用煤和木头点起火做饭,还不得不停地添加照看炉火。流产后的恢复期,女人不顾医生的叮嘱,在床上搓衣服,熨衣服。尽管她们怨恨丈夫们的性要求以及他们对流产的反对,在家里,她们仍试着容忍她们那辛苦工作了一天和有更多压力的男人:

我不敢在我的丈夫情绪不稳定的时候让他听见我痛苦的哭喊,但是阵痛却不总是能控制的。医生再一次帮我开了安眠药,正好是能在我经受分娩的剧痛时对付我丈夫的剂量。因此当他在另一个房间里熟睡时,我经历着分娩的阵痛,生下那个让一个母亲满心欢喜的最活泼的男孩。



而对女人而言,并不存在从工作中返回家里的说法。

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海外,现实与理想总有所差距。1860年的美国,100万妇女被雇佣。在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仅在纽约城就有75000名妇女工作着。1973年美国人口普查报告有超过600万名六岁以下儿童的母亲做着全职工作。每个为了谋生而每日不得不离开她孩子的妇女,失去了自由、空间和照料小孩的机会。从那些统计数据中,可以想象出有多少的不安、内疚、自我怀疑、经济压力和紧急状况。那些呆在家里的母亲的形象——尽管不是真实的——萦绕在挣钱的母亲生活中,责备着她们。但是就像对女人一样,对男人而言的一个危险典型也被树立起来了:母亲——是这无情与冷漠日益增长的世界中的天使的爱与宽容的源泉,是由男性逻辑和他们“客观”、“理性”判断力所控制的女性的、变化的、感性的元素,是这个充斥着战争、残酷竞争的世界之道德典范和柔情,是对人类弱点的轻蔑。

4

压在母亲身上的肉体与精神责任,无疑是社会重担里



面最重的。这没法与奴隶或苦力的劳动相比较,因为一个女人和她孩子之间的感情联系使她在很多方面受到的伤害是那些被迫劳动者无从得知的。他可以去记恨或者害怕他的老板或主人,憎恶繁重的劳动,幻想反抗或自己成为一个老板。母亲往往被更多复杂的、颠覆性感觉所俘获。爱与愤怒是可以并存的。随着对我们自身不够“慈爱”的恐惧,女人对母亲角色的愤怒有可能转换成对孩子的怒火。我们在社会里为自己的孩子所做的微不足道,满足不了人性需要带来的痛苦,这转化为内疚与自我折磨。一个女性团体称它为“软弱的责任”^①,那是一种比维持生计更重的担子。即使贫穷和失业,很多母亲仍在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下维持着生计。但是评判母亲是否高尚,作为女人她是否合格,是看她有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失望”。

无论众所周知的事实怎样,母亲仍被看做“和孩子是一体的”^②。她最终还是那个负责她孩子们的健康、他们

① 1986年,一个名叫“女家长”的女性团体。

② 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有2600万在外工作的母亲带着孩子,800万的家庭是女人当家。(艾丽斯·罗斯:《女人生活中的孩子与工作》,一篇在亚利桑那州大学发表的论文。)

1986年,美国人口普查处在1984年3月的现行人口报告显示,3240万18岁以下的儿童和他们的母亲被迫劳动。记录有1040万的“嫡亲儿童”(亲生的、被收养的、被继养的)在没有丈夫的单身母亲家庭生活。



的穿着、他们在学校的表现、他们的智力以及综合发展的人,即使她是家庭里唯一的支撑者,不得已送孩子去便宜的托儿所或糟糕的学校,并不得不独自忍受因此而来的内疚。她自己竭力应付着一个超出她控制的周围环境:营养不良、老鼠、铅中毒、毒品交易、种族歧视,但在社会看来,母亲就是孩子的周围环境。工人可以成立工会,举行罢工,但母亲却彼此隔离在家,带着慈爱的感情与孩子们在一起。我们那些小野东西们的捣乱,常常让我们的身心处在崩溃的边缘。

对母亲们而言,家庭私有化不仅意味着权利的减少,还意味着一种绝望的孤独感。一些东伦敦的妇女和汉娜·加夫农(Hannah Gavron)谈起在一条有着成排的房子街上和在战后伦敦崭新的高大公寓楼里抚养孩子,两者会有什么不同:后者失去了街坊邻居,生活屈辱,孩子们在一条普通的马路上玩耍时遭受白眼。20世纪50年代,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一些结了婚的毕业生住在建在“小道”旁或是街道上成排的风子里,那里孩子们可以在一个普通的园子里玩耍。一个母亲可以把她的孩子托给邻居一小时,孩子们在相互的风子里穿进穿出,他们的母亲也是如此。大家都分享着一种随意的、自在的友谊。随着旧状况的改善,人们开始移居郊区,开始是搬到一些小一点的风子里,然后是更大的房子、私人别墅。随着丈夫在

物质上的成功,与其他家庭隔离的“家”开始形成。

工薪阶层母亲们住在她们的新公寓里,传统妻子们新的富裕环境里,她们都失去了某些东西:她们开始等级分化,变成了被家庭束缚的孤立女人。

李·桑德斯·卡默尔(Lee Sanders Comer)是位英国的马克思女性主义者,她重申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核心家庭的评论——一个包括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还有他们孩子的私有化小单元。在这一劳动分化中,男人是主要的,或者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女人的角色是家庭主妇、母亲、商品消费者,以及男人和孩子的情感支柱。“家”的确指“母亲”,她承担了大部分的子女培养任务,而且还得忍受丈夫从工作中带回家的沮丧和愤怒(常常是家庭暴力的形式)。虽然她的工作是在家为丈夫提供怜悯和舒适,以便他们有每天从工厂或矿窑回家的需要,她自己的怒火反倒成了不合理的。卡默尔把这种分化看成是资本主义的需求。但为什么资本主义就得要求女人扮演这个情感救助者的特殊角色?为什么总是由女人,而不是男人培养孩子和照看家?这些问题又有多少真的和资本主义,和这一体系有关?就像叶利·扎列茨基(Eli Zaretsky)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是存活于社会主义——父权制——之下的。



男孩最初对女人依靠，女人从她们的身体里孕育出新的生命，从乳房里酝酿出乳汁，对男人来说，这都是女人存在的必要性。在他们的情感上，女人是生命的再造者。我们必须意识到那已经从他们身上萌芽出来，想要改变这些惯例的尝试。在父权社会主义下，我们发现母性传统在某些方面被重新修订和改革了，女人被容许以两种身份去服务（正如在我们的历史里，我们一贯去服务一样）——孩子的生产者、培养者和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全职工作者。儿童照料中心、青年野营、学校，促进了但没有真正激发工作女性普遍的“双重角色”。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劳动部门的倒闭能把大量的男性带进儿童护理中来。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制度里，母性和异性恋仍然是纳入规定的。只有异性的婚姻和家庭被看做人类的“正常”情况和新社会的基础成分。计划生育也许对女人有效，也许没效，这取决于经济、军事和人口统计的压力。在某些地方，妇女成为新的计划生育方法的牺牲品，但是却没有反对男性对女性身体控制的革命。女人的身体正是父权制存在的基础。





第三章 父性王国

1

普遍认识的发展，第一次在历史上使父权体系不能自圆其说。但那是偶然、短暂的。那种文化交叉，全球性的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无法再被否认或辩护。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撕开了所有权力关系核心中的关系，一种贪婪、暴力、占有、恐惧、有意识的渴望、无意识的敌对、多愁善感和理性化的混乱：社会和政治体系下的性别构造。第一次，我们站在父性王国的角度和标准审视自己。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体系，它所记录的文明还未曾被主动挑战过，它是如此普遍，就像是一部自然法典。

父权制代表的是父亲们的权力。男人或靠强势直接地压迫女性，或者他们决定了仪式、传统、法律和语言、习俗、礼节、教育，以及对劳动的分工，对女人应该扮演的角



色、不应该扮演的角色和在哪里女人必须完全听从男人，通过这些来压迫女性。那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有权力的女人，或是所有女人在被授予的文化中就没有某种力量。譬如在母系的克劳族人里，在仪式和节日中，女人担当了主要的受尊敬角色，但是禁止她们在月经期间进行社交和宗教活动。当男人和女人同样地经历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时，它便显示出由于性别所带来的巨大不同。“戴面罩男人的地区，像在北非的图阿雷格人中间，地势的偏僻提高了个体的地位和权力，但是在戴面纱的妇女那里却很难起到作用。”“底线已经被画出来了。”尽管在每个文化中不同，它还是被画出来了。

父权制并没有让父亲的权力在儿子身上直接延续，尽管这一权力关系曾经毫无疑问，比如在封建社会或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德国精神分析学家亚历山大·米切尔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研究了在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和劳动分化的推动下，父子关系的减弱：由于“工作”扩展到家以外，社会变得更加复杂，而且让父亲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里，丧失了他原有的“实”权。甚至，正如米切尔利希指出的那样，“在我们社会中，父权结构的组成部分和神秘主义观点有很密切的关系。为了成为社会组织自然法则，它制定了父与子、神与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全能与无能的关系”。这种全能与无能的关系

系存在于所有男人与女人之间,并且教育、社会机构和我们自己的“神秘主义观点”仍然受着家长式统治形象印迹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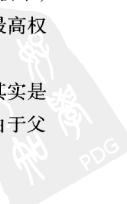
父亲们的权力很难被掌握,因为它无孔不入,甚至我们试着用来解释它的语言也受了它的影响。它既分散又集中,既抽象又具体。它是普遍的,但在各地的变化又使它的普遍性含糊了。在父权制下,我可能戴着面纱生活,或是去开卡车;我可能在以色列的合作农场抚养我的孩子,或是背着我的孩子去参加反对堕胎法的示威运动;我可能作为一个“赤脚医生”在中国的农村公社工作,或是生活在新西兰的一个女同性恋社区;我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世袭的或民选的领袖,或为一个百万富翁的老婆洗内衣;我可能大清早在柏柏尔的一个乡村土房子里给我的丈夫做咖啡,或是参加大学生游行。无论我的地位或情况是什么,经济收入是多少,我的性取向怎样,我都生活在父亲们的权力之下,并且我得到的众多特权或势力都是父权制允许下的,我必须为得到男人的许可而付出代价。这种权力超出了所有的法律和习俗。用社会学家布丽奇特·贝格尔(Brigitte Berger)的话来说:“直到现在,对社会和文化的诠释在根本上仍受男性智力和精神的支配——不管这一诠释是来自男人还是女人……基础的男性设想塑造了我们整个道德和文明史。”



母系社会或是家族关系的追溯和财产的继承随女方家族,或是与女方家族同住的社会,或是丈夫搬到妻子娘家的房子或村子里,它们作为我们熟悉的西方父权家庭式样的变种存在。在父系的、女人居住在男方家的社会里,一个没有父姓的孩子是“非法的”。但是那些变更仅仅代表男性实现地位和财富的不同渠道。他们可能会授予女人更多的地位和尊严或是减少一夫多妻的可能性,但他们是不会与之和“母权制”混淆的。像安格拉·戴维斯(Angela Davis)说的那样,一个家族里的黑人妇女领导者也是不可能被称做“女家长”的,因为在更广阔的社会中,她是没有权力的,是被压迫的。

在母系血统的族群里,女人要负责照看孩子,而且每个孩子都由一个特定女人来负主要的责任,甚至当其他的女人照看这个孩子的时候也是如此。成年男人对妇女和儿童有他的权力。而且与异族血统的通婚(与母系家族以外的人结婚)是必要的。大卫·希奈德尔(David Schneider)很清楚地阐述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女人和儿童在男人的权威之下,“也许除了这个社会,极少数女人特殊的限定的情况。非母系族群里的最高权威地位将……很平常地被男性占领”。

对处在父系秩序上的母系的女人来说,优势其实是很微弱的。一个母亲和她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由于父



方血统家族竭力把孩子和母方家族拉开而受到了限制，尤其是在孩子是男孩的情况。“父亲与孩子的经济合作与财产转移”对母亲情感和精神权威的削弱有强制性的作用。反过来在父系社会却不是这样，因为母亲无论她与她的孩子有多强大的情感纽带，并没有力量超越那种可能挑战父权(血统与继承随父方)的关系。

“母权制”、“母权”和“母系社会”或者“母系制度”阶段趋于不稳定，常常是交替变化的。罗伯特·布里福(Robert Briffault)^①历经千辛万苦去证明原始社会的母权制并不简单的是父权制中权力性别的不同。他研究了“女性统治制度”阶段，在那种制度下，女人掌握经济控制财产。他指出在任何社会的母权元素都有一个功能起源——即怀孕、生育、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母性功能。因为这些功能，在早期社会带来了很多活动力和权力，如今它们已转移到在家庭外的男人的领域。布里福的母权社会是指女性创造力量的普遍和女人拥有根本权威，而不是女人建立和维持对男人的支配与控制，就像在父权制中，男人对女人的那样。

根据布里福的观点，母权社会的女性权力可能存在一种自然的赞许，因为她与那个社会有实际和神秘的必

^① 《母亲》(1927)，对布里福的更多讨论，见第四章。



要联系。因此他把母权制看做是自然的原则：由于农业、手工业和发明创造的整合，进入了以母亲和她孩子们为中心的生活，女人可能介入多种创造和生产角色。以布里福的观点，父权制发展于男人反抗这一自然发展的秩序。他们开始掌控经济和取代以前被认为是女人领地的神秘力量。“女统治者社会”，像父权制一样，意味着一种控制武力或经济的力量，并且只有当私有制和一个团体较另一个团体具有经济优势的时候，它才能存在。

父权制的核心是独立的家庭单位，它们由财产和让自己的财产被子孙们继承的欲望组建起来。西蒙·波夫瓦(Simone de Beauvoir)把这种野心和意识深处对永恒的渴望联系起来。她说：“财产拥有者把他的存在传递和转移到其财产上，对此他比对他的生命更在乎。它溢出了他短暂凡人生命的限制，继续存在，超越了肉身的消逝——永恒灵魂的俗世与物质的混合。但是这种救赎只有在当财产仍在拥有者的手里时才生效。只有当它属于他的个体，并能从中预计自己时，它才能超越他的死亡。”人类意识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到来——男人发现正是他自己，而不是月亮或春雨或死魂让女人怀孕，那个她孕育出生命的孩子是他的孩子。这个孩子能从神秘和现实的角度都帮他到达永恒，因为在他死后，这孩子会用祈祷和祭品来取悦众神，会从他那里继承财产。在这性别占有和财

富控制的十字路口,超越死亡的渴望,使我们已知的情况得以发展:父权家庭存在的日子和它那神化了的阳具,它那由性别产生的劳动分化,它那情感的、肉体的和物质的占有,它那白头偕老的一夫一妻理想(和它所支持的妻子对丈夫通奸行为的惩罚),非婚生孩子的“非法性”,女人在经济上对男人的依赖,妻子在家的无偿服务,女人和儿童对男性权威的顺从,异性角色的印记和延续。

父权价值观全面或部分地流行起来,无论是正统派犹太教家庭里的在外面挣钱以供丈夫学习教律的妻子,还是欧洲与东方那些都是专业人士的有钱阶层夫妻,他们雇佣人来做家务,为孩子请家庭教师,甚至在女人是名义上的“家庭领导”的地方,父权制也同样盛行。因为正如她扮演的同等身份的养家者或所谓的她自己家庭的母权,每个母亲不得不在她的孩子在他们出生后的一些年里去接受父权的教育体系、法律、宗教、性典。实际上她期望使他们准备好进入一个没有反叛和“失调”的体系,而且让它一直保持到他们自己的成年生活。父权制依赖于母亲受到的传统观念影响,即使是在最初母子关系似乎最独立最私密的几年里,也给未来的成年人输送父权价值的观念,而且惯例和传统从某一点来说,也告诫母亲应该停止让孩子——尤其是男孩——按照她的轨道来培养。很显然,母亲的形象是在原本的基础上被母性传统



夸大了,而且它被转变为唤醒男性力量的一种动力。

对于那些形象和它们所包含的所有一系列的人类关系,仍有许多没有被人提到。女人既是母亲又是女儿,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很少。而且我们得知的大多数母性的文学和视觉形象,都是通过了一个集体或个人的男性意识的过滤。一旦女人知道一个孩子正在她的体内生长,人们便向她灌输她新生活的理念、理想,不停地向她描述新生活的楷模。她被这些力量所压倒。这些舆论力量几乎都不是来自于其他女人(尽管其他女人可能传播它们),不过自从她意识到自己是个女性,并且是个潜在的母亲的时候,它们就一直围绕着她。我们需要知道在所有我们的猜想和思索中,应该用什么来让我们理解历史上为什么有如此残酷的观点存在,到底是什么让母亲们自己去扶持父亲们的力量。

2

就像女性主义哲学家玛丽·戴利(Mary Daly)注意到的那样,女人们开始问一些问题,尽管父权的思维方法认为那不是问题。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把男人归为认知者,而女人和自然都是他们知识的内容,男人朝着某种智慧的趋势发展,但他们仍然有蒙蔽我们想象力的能力。

任何不同于那种文化标准的東西都会被当成消极的事物清除：那里“合理性”是建立在清醒的合法的方式之上。“真实的想法”，任何的不同，直觉的、超知觉的或诗意的认知被贴上了“不合理的”的标签。如果我们仔细倾听“不合理的”所集中的含义时，我们听到的弦外之音是“歇斯底里症”（那种病症曾被认为在子宫里就开始产生）、“疯狂”（凡是不具备“理性的男人”所赞同的思考方式的人）、随意和混乱的无序。因此没有必要试图发现一种与技术理由无关的次序或语言或形式。而且，“合理性”的内容是去清除所有它拒绝与之合作的对立内容，所以它认为自身是将不合理的因素都过滤掉，而不是去寻求对它自身超现实和非线性因素的认定和理解。这一错误也许比我们所理解的更加让父权思想残缺不全——尤其是科学的和哲学的思想。

也许“内在”可以更清楚与“外在”分离。在弗洛伊德的《否定》中你能找到对这一看法的简明阐述：

用最原始的语言表达，也就是本能的口头表达冲动，改变是这样的：“我想吃那个，或者我想把它吐出来”，或更进一步“我想让这个进入我里面而让那个呆在我外面”。那就是说，它或者在我的里面，或者在我的外面……（关键是原始的愉快的自我）什么是坏的？什么不同于自我？什么是外部的开端？



作为一个在女性身体里待过的人，这样的叙述让我一怔。对我来说，自我的边界比“里面”和“外面”这两个词的含义更让人费解。我并不把自己看成是一座只让密探进入而把其他人排除在外的围城。问题要多样化和复杂得多。一个女人或许被强奸——阳具强迫进入她的私处，或被迫把阳具放进嘴里，在这种情况下，她必然有了对外部入侵者的体验。或者在和恋人做爱时，她自己把阳具放在手中或让它进入自己的私处。在做爱时，并不只是“性交”那么简单，常常会有一种很强的相互渗透，体肤融化之感。把一个人身体和精神的渴望传递给另一个人，模糊了身体与身体的界线。从其他女人那里确认高潮，就像那是自己的高潮一样，这是最强烈的个人体验之一。在那一刻，我已没有“里”和“外”之分。即使是通过自我爱抚，阴蒂或多或少也不会向阴道，以至子宫传递那么多能感觉或触摸到的颤动。

但是我怀孕期间，并没有经历弗洛伊德所说的强烈的内在感应时期。但是某些我和我的内在的东西却每时每每天都在分离，按它自己的方式脱离我成为它自己。怀孕早期，胎儿的活动犹如幽灵萦绕在我的身体里，后来又犹如被囚禁在我里面的一些运动。但是这两种感觉都是我的感觉而已，都归于我自己身体和精神空间的意识。

毫无疑问，在某些情况下，女人会觉得自己的身体里的

孩子是一个外来的异体(在奈尔斯·牛顿的专著《母性情感》中,她例举了对怀孕期间呕吐的研究,指出和呕吐有关的并不是因为对怀孕本身的厌恶,而是频繁的希望没有欲望的性交和缺乏性高潮的情况)。然而即使是被强奸的妇女,似乎吸收了产生于暴力的那个人类种子,不过她把它看成是诞生于自己身体里的,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入侵的。胎儿当然两者皆是。无论卵子是否与精子相遇,我们都在排卵。我怀了九个月的孩子并不会被说成像我或不像我。女人远非处在单纯的“内部空间”模式,无论是强大或柔弱的女人都生存与“内”和“外”之中,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两者是相连的,而不是孤立的。

对二元论的否定,对我们大多数智能训练中积极与消极元素的否定随之而来,并成为女性主义思想的一股暗流。对它们的否定,让我们对再次确定了数世纪以来被否定的群体:并不仅仅是女人,还有“低层的人”、“柔弱的人”、“非白人”、“没有文化的人”和“隐姓埋名的人”。我们迫使面对两个根本的问题:强势和弱势。

权力既是父权制下的一个关键词汇,也是一种根本的关系。通过对女人的控制,男人把财产和他的孩子视为己有。通过对孩子的控制,他确保了在他死后他财产的延续和灵魂的升华。因此看出来,一直以来男人的身份和个性都依赖于权力,以某种特定的意义依赖于它:凌



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开始于女人和她的孩子。人类的所有权与日俱增：历经奴隶制、农奴制和封建制，从老式或指定的婚姻到有嫁妆的契约婚姻，再到后来“为了爱情”的婚姻，但仍免不了妻子在经济上的依赖性。有权力的一方（几乎都是男性）为无权力的一方做着决定：健康人为病人，中年人为老人，“神智正常的人”为“疯子”，受过教育的人为文盲，有势力的人为势力之外的人。

尽管男人也许最初是从作为母亲的女人那里获得的权力，但第一性奴役期间，这种权力在我们的社会中扩散开来。每个被征服的人都被其征服者定义为软弱的、阴柔的、无法自治的、无知的、落后的、衰微的、没有理性的、需要开化的。另一方面，这些被征服者可以被认为是神秘的、自然的，并与世界——人类之母造出的万物——紧密相连。但是说那些被征服者被这样理解，并不意味着他们被真正理解。

占有他人之上的权力意味着，这种权力被允许通过某种捷径来穿过复杂的人性。他并不需要直觉地进入弱者的内心，或是去倾听他们用很多语言说出的话，包括沉默这种语言。强权主义靠这种捷径存在——若不为什么如此少的人拥有如此多，而他们能理解的东西却如此少呢？

许多作品都写到了这一情况对弱者心灵的影响，它

们都适于女人,尽管那些作者是男性和男性至上主义者。没有权力会导致厌倦、自我否定、内疚和消沉。它也能产生出某种精神上的敏锐,一种精明、警觉和对压迫者的熟练观察——“洞察力”发展成为一种求生的工具。由于拥有权力的人总能依赖于权威之捷径或者强行实现他的愿望,他没有对这种洞察力的明显需求。而且,实际上,对他来说,过深地探究弱者的内心是危险的。南方白人在黑人民权运动的年头里干得很好,让“我们的黑人”真的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满意。类似地,当男性心理分析家和哲学家们编织着关于女性的那些臆想和未经确认的理论时,一个满足的丈夫将会宣称他的妻子是一个“被解放的女人”。拥有权力的人似乎在关键时刻总能很好地压制或否认其他人的现实状况。对于别人的内在,以及自我的起点,权力似乎是要产生一种自愿的无知、道德的愚笨。而这些特征被各式各样地描述为“超然”、“客观”、“全面”,好像对另一个生命的认识就会打开恐慌和歇斯底里的闸门。福斯特(E. M. Forster)在他的小说《霍华德庄园》(1910)中,为企业家威尔科克斯先生和他的儿子性格赋予了这种特征。这两人的个性都是斤斤计较和危险的:

……对他妻子来说,他身上有一种特质是她永远也无法适应的,尽管她多次提醒自己这一点:他的迟钝。他

就是对事情漠不关心，没有什么别的能说的……他从来听不出隐晦谈话中的暗示和手势，从来不关心那些精辟的、反驳的无穷无尽的观点……她就此责怪他。他感到很困惑，但报之一笑回答：“我的格言是专注。我不想把我的精力浪费在那种事情上。”“那不是在浪费精力。”她反驳道，“它让你更强大。”他回答道：“你是一个聪明的小女人，但我的格言是专注。”

威尔科克斯先生作为富有的男性统治集团中的一员是强大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已经停止了城市的扩张，形成了投机性资本主义和特殊的抽象的阶级关系。这本小说里的阶级压迫，与男性对女人的鄙视和不齿是分不开的，威尔科克斯和他的儿子就提供了无数例子。作为一家之主和家庭道德准则的独裁者他也是强大的。他以保护第一任妻子在这个家庭中的财产的名义，竟然隐瞒了她临终时的遗书。他的儿子也是以保护家庭荣誉和财产的名义犯下过失杀人罪。谎言和压迫，但最重要的是一种强大的没有公开声明的人类个性造就了威尔科克斯的世界。玛格丽特成为威尔科克斯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她和妹妹海伦正确地看出这些男人的空洞和隐藏在他们内心的“混乱与虚无”。其实这种男性力量是来自一个意识形态：植根于传统甚至宗教的一个思想框架。

一神论断定神永恒的性质是他(原文如此)的万能:他能将巴比伦和尼尼微夷为平地,为埃及带来火和瘟疫,分开海洋。但他最具毁灭性的力量是在人们头脑中的信念,这种信念让他们出于恐惧,出于惩罚而服从他,而去反对其他(通常是女性)的神,因为他们坚信在任何竞赛中他都将是胜利者。他称自己为“圣父”,但我们肯定记得一位父亲就是一个拥有和控制一个女性(或者多于一个)和她下一代的男性。我们并不是从上帝从圣父那里得到父系权力的信念,而是在让父权控制家庭的争斗中创造了上帝圣父。他的话语即为法令,对他力量的信念变得比任何证实了的信念更重要。它被内在化为“良心”、“传统”、“内心的道德观念”。

对力量的信念就这样成了信念的力量,它渗透于所有其他的力量观念。在东方和西方,性爱都被看做是凌驾于某人之上的力量,或是拜倒在某人的力量之下。阿拉伯传统说坠入爱河就是屈从于巫术的力量。西方的恋人犹如“被施了魔法”或“被迷住”,即:毫无力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责任,对另一个人作为人的正确了解不再必要。父权制力量的语言是建立在一种分化上:一个拥有权力的人,而其他必须毫无权力。

因此,当女人开始宣扬人道主义时,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关于权力的意义。从毫无权力中起步,我们将驶向



何方?大多数女人从父权压迫和控制别人的意识里,所感受到她们自己的力量是母性。即使是这一力量,像我们即将看到的,已经被男性所扭曲和操纵。

旧式的母性充满了超自然的力量,这已被像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和埃里希·诺伊曼(Erich Neumann)这样的作家在作品中探讨过了。然而无助的孩子处处授予母亲某种狭隘的力量,一种她不一定渴望的力量,但同时也是一种对她在其他所有地方毫无力量的补偿。母亲的力量,首先是给予或拒绝给予营养和温暖,给予或拒绝给予生存本身^①。再没有别的地方女人能拥有超越生与死的如此直白的力量(除了一些极其罕见的特殊例子,比如一个凯萨琳·德·麦迪奇那样的完全统治者,或一个集中营的女看守)。不管怎样,当孩子接受对世界最初印象的那一时刻,她的生命一定会离孩子的生命最近。用波伏瓦的话来说就是:“作为母亲的女人让人害怕,在怀孕时她必须被美化,被奴役。”对母性力量的信念被驯化了。在被美化、被奴役的女人,子宫——这一权力的最终源泉——被历史性地扭转来针对我们,而它自身成为了无权力的源泉。

① 我从未读到放弃对所抚养的孩子的生命,或是有关引起弑婴罪的问题。



3

在母亲对孩子——往往受到男性干扰——的短暂权力之外，女人经历了“迫于权力”的两种形式，两者都是负面的。第一种是男人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力，并伴随着同其他男人争夺权力的血腥斗争，无论在身体、经济或制度上。他们为人际关系和情感价值所作的绝对牺牲是为了占得支配地位。像其他被支配的人一样，我们不得不学会去操控和引诱，或抢夺男人的意愿并使之成为我们的，男人有时会把这些塑造为我们身上的“力量”。为了得到恩惠或为了苟活，孩子或情妇用“力量”哄骗别人，依赖者依靠“力量”隐瞒她的感情，甚至对自己也隐瞒。没有什么比这些“力量”更强大的了。

使女人拥有“权力”的可能性被多愁善感和神秘主义历史性地模糊了。19世纪30年代，克里姆克姐妹开始为反奴隶制度社会发表言论，她们与禁止妇女出现在公共讲台的传统决裂。这时，一封来自公理会的指导信这样反对她们：

《新约》很清楚地阐明了女人的恰当责任和影响。除了强大力量的来源，那些责任和影响应该是不突出和隐晦的。当顺从、依赖和温柔作用于男人严厉的思想，也从



上千种方式影响到社会。女人的权力是她的依赖性，上帝为了保护她所赋予她的柔弱。但是当她像一个社会改革者一样夺取了男人的地盘和腔调……她放弃了上帝为了保护她所赋予她的权力，而且她的个性变得不自然……

奥莉芙·施赖纳(Olive Schreiner)在她的小说《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中似乎对这样的情绪做出了回答。她的女英雄利达尔在她朋友沃尔多说了“一些女人也拥有权力”后回答道：

“权力！你听说过有人问男人，其他的灵魂是否应该有权力吗？他们生来便有权力。你可以围起喷泉让它变成不能流动的沼泽，或者你可以让它自由喷发，但你不能说它是否应该在那儿。它就在那儿。而且它将行动，如果不是开放善，便是隐藏恶，但是它会行动……权力！”她用她的小手猛击扶手突然说道：“是的，我们是有权力，而且即使我们没有把它表达到开凿山川，治愈疾病，制定法律，金钱和任何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把它表达到你身上。你是我们的货物、我们的商品、我们实验的材料……我们不能研究法律、科学和艺术，所以我们研究你。在你的男人的本性里根本就没有勇气和品质，不过我们知道这一点……”

有那一刻，在这一段里，奥莉芙·施赖纳清扫出权力的一点不同定义，但仅仅就是那么一刻。她的利达尔是

一个很有活力的女人,渴望受到教育和把精力倾注到“无关之事”。如果除了“女人的恰当责任和影响”外,不能发泄那个精力,她便把它看成是对自己的潜在诽谤。数世纪以来,女人都魔化了她们积极和有创造力的冲动。但是男人魔化和惩罚这些冲动的时候并不比女人少。安娜·霍金森(Anna Hutchinson)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

除了男人行使于我们之上的权力,以及我们对自己内心一些被否定被拒绝的事情的察觉,在表达男性创造意识的基本话语中,女人也感到了男人的权力。从一段变化的音乐或一个建筑物空间上的和谐或一个智能结构的组合与力量中,我们感到了那种权力。就像一个充满能量的自我,与我们的自我有所不同,它被许可开放自我,面向世界。如果我们经历了男人争夺权力的残酷战争的恐惧,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常常直接地感受到这一恐惧,那么我们就了解了其他的权力。不是我们自己,是这些权力在我们面前设置了衡量人类渴望的尺度,而且我们经常渴望与那种权力结盟(在一本我那代的高中年鉴中,最有智慧的学生之一这样写道她的抱负:嫁给一个优秀的男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为直接分享权力走得最远的就是与男性权力有所联系。那权力是多么微不足道和渺小,意味着我们活得无助而脆弱。大多数女人对权力的看法是与男性或与对力量的利用分不开的,常常两者



都是。

但更直觉更无意识地，我们经历了男人对我们权力的想象，这些想象植根于他们的幼年时代，可以追溯到历史的某一神秘区域。不管它们起源何处，对大多数女人来说，由于男性幻想转弯抹角地呈现，所以没法看清真正的景象。数世纪以来，我们看到的是对女人表露力量的憎恨。对非常独立的女性的定义是：天性奇怪、没有性别、性冷淡、男性化、变态、危险。我们看到对母亲似的女性犹如“受控制”一样的恐惧，和对有依赖性的、易受影响的“女子气的”女人的偏爱。渐渐地，一些弗洛伊德追随者的作品中也反映了男人在很大程度上对女性的恐惧和仇恨，但这却是女人拒绝察觉的。就像卡伦·霍尼 (Karen Horney) 说的：

有一点并不真的明显 (我们惊奇地问自己)，当一个人考虑这一明显的事实中的诸多元素时，为什么很少意识和注意到男人对女人的秘密惧怕？更明显的是长期以来女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忽视……

她指出女性忽视这种男性恐惧的原因是“焦虑和被削弱的自尊”。焦虑当然是有的。这种焦虑是当她认识到无论她多么希望让自己快乐和无所畏惧，尽管她觉得女人这一抽象概念与她无关，但她仍无法避免一些作为女人的恐惧。自从男人对女人行使政治和社会的巨大权

力,便很难让人意识到你的同伴或员工也许也会惧怕你。如果一个女人希望找到一个兄弟、一个爱人、一个平等的人,而不是主人,她怎么去解决这一畏惧呢?如果把她性别里固有的力量带给她的亲密伙伴,那力量将被看做是敌意的、毁灭性的、控制性的和一种中伤,正是对这种力量的观点毒害了她。我们应该回到对女人的惧怕这一点上来,现在我们必须重复女人对力量的主要体验至今都是被加倍否定的。我们经历了男人对我们压迫的力量,我们经历了由于我们自己的活力和独立给男人带来的某种程度上的恐惧。即使当我们做出被动的“女性的”举止时,我们也意识到男性对我们潜在的毁灭性的想象。

人们重新对巴赫欧芬、罗伯特·布里福、约瑟夫·坎贝尔、罗伯特·格雷夫斯、海伦·汀勒(Helen Diner)和简·哈瑞森(Jane Harrison)的著作产生了兴趣,戴维斯(E. G. Davis)的《第一性》回答了很多问题。女权主义理论论文开始涌现,如简·阿伯特(Jane Alpert)的《母权》。它们都试图证明父权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退化,若是女人行使权力,她们将采用完全不同于男人的方式:非压迫性的、非暴力的、非毁灭性的。一个“关于母权制的争论”直接从这一探索中产生,并且这一争论成了反抗“生物学”的催化剂,对女性主义思想早期舞台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

海伦·汀勒（20世纪20年代晚期在德国初次发表作品）和伊丽莎白·古尔德·戴维斯（写作时期为20世纪70年代）是两位博览群书的女性理论家。为了讨论女人的生理构造是她先于父权的最初力量来源，自然的循环和过程创造了她生活本身的源泉，并且她比男人更好地与两者结合，两人都吸纳了一些早期作家的观点，尤其吸纳了巴赫欧芬和罗伯特·布里福的观点。所有的那些作家都构想出一个以女人为中心的史前文明。女人既是母亲又是家族首领，并且是早期神话主角，如伟大的女神提阿玛特、瑞亚、艾西斯、伊斯达、阿斯塔蒂、得墨忒尔、狄安娜，她们也有另外的称呼：生命的永恒给予者，包括死亡在内的自然次序的象征。

对汀勒和戴维斯来说，女人作为母亲很自然地形成了母系社会：由女性管理和对女性强烈崇拜的社会。其他的一些作家，包括西蒙·波夫瓦和舒拉米思·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她们否认了“母权的”或“母系的”次序曾存在。她们把女性母性构造直接和确切地看做是我们被压迫的根源。无论什么样的结论，母性的概念与力量的概念之间都存在着无法逃脱的联系。

以社会学家菲力普·斯莱特为例，他看到希腊由早期的母权文化转化到后来的父权制的真实证据，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太敢去假设在其他文化中权力由母权向父

权的转化,因为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原始母系制度在遗传学上的体验是普遍的,并且可能为这一传统提供很多源泉”。换句话说,(这也是弗洛伊德的观点)在最初的婴儿期,每个女人和男人都曾生活在母亲的力量之下,就这一事实可以解释那些反复出现的关于一个典型的具有权力的女人或一个由女人统治的黄金社会的梦境、传说和神话。即使这样一个年代,就算不是黄金年代,曾存在于某个地方;即使我们拿出所有最早期的记忆痕迹;即使我们渴望与一个女性身体过去的个体联系,这个身体大于我们自身,强于我们自身;即使我们渴望女性的温暖、哺育和温柔,整个社会仍缺少关于女性力量中固有的可能性的新概念;而且即使在私人的范围,女人的行动也受到了可怕的限制。

4

父权制的历史已经被记载——我不是指男人的历史,而是出现兴起的一个观念的历史,这一观念具有自己独特表达形式并且被证明是自我毁灭性的。达到如今的状态,近代历史经历了四五次运动。其中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所谓的性解放运动,它被简单地认为与妇女解放是一致的。一些人认为“避孕药”能把女人从怀孕的恐惧中



解放出来,从而摆脱双重的道德标准,并且能让我们在性方面与男人平等。由于很多原因,它证明了一个神话,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自由地讨论自己的性欲,而是我们被希望按照男人对女性性欲的观念来行动;就像任何严守两性道德规范具有很强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的妻子,尽管这些观念自身改变了。而且“避孕药”本身是一种机械的父权的装置,最近还被证明有可怕的副作用。但是性观念的解放,婚前和婚外性行为的增长,离婚率的上升,对同居家庭的认可,的确带来了对父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种种矛盾的新认识。

这些运动与生态变化和人口的零增长也不无关系。但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对女人任何关注引起的,而是由于科技社会的浪费带来的压力、不合理的分配,以及对这个星球能源的垄断。这些问题与饥荒问题和人口过多问题同样重要。在以科技为主的社会里,从生态学的分析中我们认识到出现了一些新的价值考验,并不只是社会中反复无常的浪费与目光短浅的暴利,而且还有越来越多价值观的消失,比如对生命的亲密和保护,对多样化与差异化以及自然进程的尊重。从某种程度上,这一分析可能被看成是对父权制之前的价值观的再主张。尽管如此,这些运动实现了其他的目标,降低了出生率。如果它们起了作用,也可以假定它们打算通过宣传唤起

那些希望在生理上成为母亲的女人的内疚。

再者，女人控制自己的身体从未在这些运动中被看成主要问题。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一次全球国际人口大会，一位英国的女权主义者记录道：

尽管人们有口无心地讲夫妻和家庭(从不是女人)应有权力决定他们孩子的出生数量和间隔时间，但这一权利从未被视为比经济的需求更重要。对发达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过去50年历史的简单回顾，便能证实人们总是期望女人调节她们的生育使之符合劳动力或战争炮灰的需求，从未调整经济使之迎合增加或减少的出生率。

相形之下，黑人民族主义运动宣称计划生育和流产是“种族大屠杀”，如果黑人妇女不生育孩子来继续黑人的生存斗争，那么她们应该感到羞耻。越来越多的黑人妇女拒绝接受这一夸张的说法，并且批评道：“在争斗的边缘，一种对年轻女孩的这种不负责任的可怜思想在我们的国家和文化中蔓延。这一思想让每位姐妹都放弃给她带来决定性力量的避孕药，这种力量是我们中很多人所能知道的全部力量。”(这些句子当然是写在公众知道避孕药可怕的副作用之前。)简尼斯·莫瑞斯，一位母亲和社团组织者说道：“黑人妇女已经知道考虑在怀孕期间和孩子出生后，怎样才对孩子最好，而且常常是她们不得



不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所以老实说，当姐妹们告诉她们的兄弟‘我不打算要这个孩子’的时候，那只是她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别人的。”

这些运动中，不管是否反对生育限制，没有一个是设身处地为女人着想，而都是用来对女人发号施令的，就像父权制总是发号施令一样。并且不管是在何种环境下去“生产”孩子，情况也如此。就像社会学家杰西·贝纳德总结的：

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母亲的身份问题才在我们国家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就像其他许多问题一样，它并不是清楚地出现的，而是在控制生态的大企业，环境保护和“福利混乱”中模模糊糊地产生的。它带来了一股“降低出生率”的风潮。引出的问题是怎样阻止女人生育太多婴儿。生态学家用上百万人由于缺少空气而窒息的景象吓唬我们，恶意的革新者用妇女——尤其是用生育来继续福利的黑人妇女的形象吓唬我们。第一阶层的团体总是把矛头指向中产阶级妇女，而第二阶层把矛头指向靠福利救济生活的妇女。

这一历史模式的另一部分是科技。在实验室里进行着遗传学革命，这场革命已经开发出精子库和人工授精，而现在进行的有：克隆实验，通过控制生长重组某些被挑选的物种，以及从一个单独的母体上得到的细胞来创造

一系列完全相同的下一代。舒拉米思·费尔斯通，一个主张用人工母性代替生物学母性的激进分子看到：如果我们预想选择由父权制控制人类的类型、性别和能力，那些将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会吓我们一大跳。另一方面，如果生物学上的母性成为真正的选择（有别于完全用法令强制规定或给予），那么视女人为子宫和“生物学上的宿命”的这些观念会变得难以维持。同样那些从一开始便支撑着父权制的观念也会如此。

5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分散的男作家，比如迪尼斯·德·荣格蒙特和埃里希·诺伊曼，开始意识到从野蛮和自我毁灭中建立的文明社会对诺伊曼所说的“女性化”的拒绝。他们要求重新树立“女性原则”在卡尔·史登(Karl Stern)的《来自女人的斗争》中，一个变成天主教徒的犹太精神分析家，把由笛卡儿开始的科学型知识看成是对“女性”型知识的拒绝，“女性”型知识是和直觉、灵性和诗歌联系起来的。他宣称“安卓珍妮^①的迷……显露在历史性的危机中”。更多的现代作家，从哲学家到诗人

① 希腊神话中一位雌雄同体的神。——译者注



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都主张回归“女性化”(马尔库塞称之为男人的女权运动)。这是物种发展进程中的又一个舞台像“雌雄同体”一样,这一“女性原则”,对他们来说仍很难懂,很抽象。它与他们日益增长的对女人的希望与意识还是有些许联系。实际上,马尔库塞和勃莱也许可以同比圣西门和雪莱。后者同样在理论上坚持女性化的重要性,并显露出他们对父权的狭隘主义的不屑一顾。

菲力普·斯莱特把女人看成是社会中的无足轻重的成员,因此“冲动地在一个更好的处境解放(它)”——不管这指什么,反正他不太相信女人确实会起来反抗父权的价值观念的可能性。在他对“专横父亲的概念”的探讨中,他勉强得出了一个结论:就像他所记录的,在美国人的下意识里,真实具体的父亲被抽象的权力、想象的父亲概念或科技本身取代了——他暗示父权制正是对他正在描述的体系的真实名称。这对人类的存在是很危险的。

那些作家中没有一个人提到“回归女性化”会牵涉到的真正痛苦和恐惧,以及来自男人方面的猛烈抵制。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没有再找到像费尔斯通、米利特、戴利作品中那样对父权的本性与程度的强有力的分析。但它们向我们证实了一种意识:在一些少有公开的层面上,父权制对它女儿的贬低和压迫,也使得它的儿子感到失望。

这样的一种意识——虽然没怎么被察觉——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中闪现了出来，尽管强大的性别歧视主义表面上也反对种族暴力和越南战争。那些拒绝服役的人和由于他们的决定坐牢或被流放的人，显示出对权力主义、军事主义、民族主义和“做个男子汉”的父权固定模式的厌恶（中性衣着、男人打扮自己、温顺的举动和长发，这些“反主流文化运动”作风只是表面的标志。另外在我们的时代里，应该像他们自己宣传的那样，更多地描绘在各色衣着下掩盖的男性特权和权威）。这场和平运动表现出暴力、高科技和帝国主义的价值观的性别歧视（“小姐们总对说不能的男人说是”）。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学生通常表现为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父亲的反抗，“表现出”他们具有恋母情节的愤怒。实际上“反主流文化运动”（其中的大多数东西被吸收进大杂烩的文化）曾在一无意识地批评了构成父权制的被权威渗透的角色或武力。人们曾一时反对权威的教育，头一次教师们被要求用一个人的标准评判他自己，而不是他职业角色的标准。一味听从被看成是反学习的。个体教师用非人性的彻底男权主义面对教室时，教育中的权力关系问题总是呈现出好斗的、反理性的、破坏性的风格。它也产生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本能地对非人性事物的某种反抗，产生于作为“一个编号”的认识，或产生于一个存储着信息的宝库。



但由各个反男权理论指导的这些反男权主义斗争还非常幼稚，非常容易被男同性恋者运动或民主国家学生和天气预报员的大男子道德规范所淹没。这种道德规范包括了他们对女人的性利用和他们从父权的革命中继承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种被SS视为纳粹主义情色和法西斯主义美学形式自然地出现了，我认为这并不是意外。随着女人的意识变化和新的自我定义的四处蔓延，突击队员礼服的魅力开始上升。纳粹对女人和她们的属性有一个清楚的明白无误的政治公式：男人、孩子、教会与厨房的母亲。20世纪没有任何一个体系像它一样赞扬“纯种”女人的健康身体，它把它们视为儿子们和英雄们的孵化器。

6

20世纪的女权主义风潮比它的前辈们走得更远，要求得更多。就像父权制本身，反父权的妇女运动的程度和影响力很难被掌握。它并不是由特定的组织、团体或宗派定义的，尽管它们大量存在。它存在于全世界许多最具地方性、最活跃的发展舞台，就像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网，就像一个成长着的分析与理论婴儿，就像在道德、精神和哲学上重新渊博地评价作为“人”的意义。在这个

运动产生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它已经给各个年龄阶段和经济水平的女人带来了决定性的价值、关系和身份的变化。它给女人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尽管有些似乎很隐秘和不合逻辑。这些选择成千上万地增长，促进了一股新思潮的形成。伊丽莎白·奥克斯-史密斯(Elizabeth Oakes-Smith)是一位19世纪早期的作家和传道者，主张妇女有参政权。她在1852年说道：“我们是否真正明白我们的目标是对现行社会制度的完全颠覆，解除整个社会存在的契约。”在1970年，费尔斯通回答道：“并不是要把关于女性的信条集中到一个‘隐秘的’地方……我们想重新传播它——第一次从最底层创造社会。”玛丽·戴利在1973年继续阐述道：只有激进的女权主义能表达“最终动机”，因为所有的改革者开启了充足的人类意识，去渴望没有独裁者，没有压迫，没有以性别歧视为基础典范和压迫根源的社会。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是同一时代的两位西方思想的强大塑造者。就像是暗中商量好的一样，在数世纪的进程中，“人”被划出心灵/肉身、精神上的/政治上的。1949年，西蒙·波夫瓦用一种现象学来阐释“探索女人”：

所以……我们拒绝弗洛伊德的性学一元论和拒绝恩格斯的经济学一元论的原因是一样的。一个精神分析家会把女人所有的社会要求解释为“男子气的抗议”现象。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正好相反，她的性欲只是以或多或少的情结和间接的方式表达了她的经济情况。“阴蒂的”和“阴道的”范畴，就像“中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范畴一样，不适合包含一个具体的女人。就像在所有人类经济历史背后一样，在所有独立的戏剧性场面背后，有一个有关存在的根据，让我们明白在它的统一里的那个我们称之为人生的特殊存在形式。

男性特征的智力系统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们缺少女性意识提供的贡献，没有整体性。把“他者”和“第二性”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体系建立在一个致命的错误之上。真正解放女人意味着改变思想本身：重新用结构、理性和智慧定义那些下意识的、主观和情绪的东西，去实现福斯特的那句名言，“连接散文和激情”，最终消除那些分裂。女人被用作新娘来出售；她因“不育”和不能生儿子为父亲争光，而被否定；经济学和性特征、守法主义和神秘主义、种姓制度和个人恐惧、交易和欲望，这些不可逃避的事实的存在，使得只有在父权控制和父权否定之外的世界，她们才能被看成是独立的。

在1949年，波夫瓦仍把妇女解放看成由社会主义革命导致的许多可能发生的解放中的一个。社会主义所承诺消除私有财产和父权家庭，实现女人和男人在经济上的平等，妇女解放是在这个承诺范围内的。从此她的经

验与分析让她走得更远。但现在激进的女权主义宣扬“雌雄同体”社会的“女权革命”，创造了崭新种族的“女权革命”。

7

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在阿巴拉契亚山区和新罕布什尔州乡下，一个用柏油纸搭的小屋的一端，一个有四个孩子的18岁母亲正在孕育她的第五个孩子，她的第一次经期一直是她的最后一次。她的双腿因水肿而失去颜色，她的腹部永久性地胀大，她的乳房已开始下垂，她的牙齿，她满口蛀牙因为缺钙：一个实用的文盲，过一小时算一小时，过一天算一天。她的夜晚被婴儿们的哭声扰乱。为了生存的生活像很多嘴吸干了她的能量。她的生活里从未有过避孕和产前检查，而她自己作为11个孩子中的一员，也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自从她在13岁的时候有了第一个孩子的概念，她就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孩子。当他丈夫强奸她的时候，尽管她不把那叫做强奸，但在她记忆中遥远的某处，徘徊着一个12岁女孩的不安、好奇和自然的力量，还有萌动的渴望。甚至，也许有一些模糊的想象，想象她的生活也许会和她的母亲的不同。她没有清楚的时间意识，所以不可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脱



离了其他生命的个体。偶尔当她看镜子时，她看见自己正在成为自己的母亲。

在这个场景的另一端，让我们想象一个实验室——据说是在历史上最强大的男人的控制下——进行着一项极其微妙和精确的工作，从经过挑选的人类组织身上分离出的细胞培育一系列多样化的同源胚胎。这些胚胎将按照他们准备好的程序形成意识，因为它们被目前的一代选来为父权制提供新一代，以便继续他们自己的特性——尤其是那些理性的天赋，对抽象概念的天赋和把“工作”与“私事”的问题、困扰分开的能力。他们也培育女性，让她们具有特殊的生理特性，而且她们被分为两类。一类的体型，或者说体型范围是为了让一些男性能勃起，不是因为生殖问题，而是因为自从结束生理上的父子关系以来，阳痿便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另一种是身体和心理上都能适合某种特殊目的的类型，比如“人控的”航天飞机要求精细的制造，需要制造者有适应性、生理上的忍耐性和很低的情感敏感度与很少的对人内部联系的渴望。这种新型的男性将不再受母爱和母亲控制力的影响，而这种新型的女性也不会再有性别挫败感，因为在大量生产她这种“类型”时，不会选择这些人作为榜样：红十字会的琼·伊丽莎白一世、玛丽·戴利、玛丽·沃斯通克拉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安妮·哈金森（Anne

Hutchinson)、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乔治·艾略特、艾玛·古温、玛格丽特·桑格、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艾米莉·狄金森。被男人选出来并且和男人一起工作的杰出女性,不仅被用作社会运转的贡献者,也被用作细胞核的提供者,用以确定一些标记的女性是能按要求生产出来的。所以,它证明了有适当天赋的女性——尽管在数量上要少很多——具有和男性同等高的价值。

以上两个场面都是不难想象的。建立在父权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一场革命也许可以废除柏油纸小屋,但谁能说它能废除男人建立的社会运作方式?所以,尽管男人在理论上也许会要求在他们可以控制的某一社会次序下的“妇女解放”,无论他们多希望结束性别的等级制度,他们都被禁锢在自己的主观洞穴中,拒绝恐惧和渴望,并且几乎没有男人可以直面世界的阴暗面。对父权制来说,无论它怎样让他们失望,无论它怎么把他们从他们自身分离,它仍然是他们的次序,肯定他们的特权。父权制心脏中心的模棱两可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他们,以免他们去严肃对待那些性别等级问题和根深蒂固的厌女问题:母性的神圣概念和女人的救赎力量,与在男人创造的次序下对女人的贬低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四章

母亲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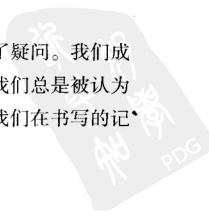
母亲对原始人来说……曾是柔弱和神秘的，被压迫的，还是充满恐惧的。她受男人没有的生育力量所控制，人们对那些力量只是一知半解……似乎让全世界用恐惧填满了他……男人对女人的看法，尽管不如女人对男人的看法那样神秘，但在今天仍是个谜。

——简·哈瑞森，

《忒弥斯：对希腊宗教社会起源的研究》

1

作为女人，我们同过去的关系充满了疑问。我们成为所有文化的核心困扰（和压制对象）。我们总是被认为至少占人类总数的一半，如今是多半。我们在书写的记



载里很难找到我们自己。面对这一“伟大的沉默”，我们显然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仔细分析对我们的压迫，详述那些针对我们的法律和处罚。另一条是找出那些打破沉默的女人，那些尽管经常被宣告有罪、被误解，尽管她们的工作被忽视、被禁止，尽管成为孤独和不被接受的象征但仍然体现出力量、勇气和自我肯定的女人。简而言之，成为我们楷模的女人。

审视过去，审视大多数女人未被记录的生活，审视贯穿历史女人被浪费的头脑和天赋，审视史前的时期，那时不是少数，而是大多数女人使用出她们的极限能力，这些审视变得非常有吸引力。人类学，远不只历史，被给予了那种渴望。一旦人们开始像认识人类社会体现的一致性那样认识到它的多样性，一旦人们开始不从野蛮的、发展迟缓的和西方的初期形式的角度审视非西方社会，而是从它们自己的价值观出发，我们就有可能去想象西方文化的父权、父系家庭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必要，那样必然。去想象曾在全球盛行的是母权，而非父权的早期文明成为可能。在那里，母系和母权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那里，女人是所有文化里受人尊敬的积极参与着。进而去想象在一个对女人来说完全不同的存在于这个世上方式。如果不是“本性”简单地让我们与“被动”、“温顺”和“非理性”这些人类的个性联系在一起，如果正是传统



和文化决定了我们的“本性”，那么“母性”带来的牺牲和否定可以被看成是母权时期的反面。

女人强烈需要被证实，渴望清楚地确定过去，并对传统女性力量进行研究。如果女人曾经强大过，一个先例；如果女性生物学曾是力量的源泉，那就不需要继续它曾经变成的样子：无力之根基。对很多女人来说，任何历史争论的不确定性，男人书写历史的事实，以及她们确定我们在判断未来时不需要回顾过去，已足以让她们漠视过去的母权理论，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在和将来。对另一部分人来说，自我重塑的信念仍需要对历史的遗留物抱有好奇心。并不是要一些发生了的事件的证据，比如一个梦想家的笔记，常常是不完整但令人信服地描述他（她）奋斗的工作中的困扰、拒绝和想象过程。我相信事情的连续性，但我自己也很难弄清“过去”在何处结束，“现在”自何处开始，而且更谈不上确定教我们保持传统，我们称之为过去的东西是什么。我认为对女人来说，一个对过去的评判追溯可以变得非常激进。但是我们需要有对我们来源素材的限制性的批判意识。

某些作家，如伊丽莎白·古尔德·戴维斯，把存在看成是一种偶然，把古希腊阿卡狄亚的母权制看成是一个特例。这一理论的来源，除了格雷夫斯的《苍白的女神》外，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两个男人的作品，J. J. 巴赫欧芬和

罗伯特·布里福。巴赫欧芬的作品早前被海伦·汀勒在她的《母亲与亚马孙人》中提到过。这本书1929年在德国出版，1965年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也许汀勒完整地读了巴赫欧芬的这一作品，但她并没有引用他的话，我们便有理由认为她也许只是使用了1926年的德文删节版。在她的序言里，对巴赫欧芬和布里福都表达了敬佩^①。

汀勒和戴维斯的读者似乎都有一个印象，觉得巴赫欧芬是女性力量的司仪神父。他并不是把“母权”年代简单地看成是在全球舞台的所有文化里一闪而过的一瞬，而是把它看做是一个黄金时期，一个如果人类够幸运，可以回归的失落乌托邦。仔细看由曼赫姆翻译的巴赫欧芬的作品片段，就会产生不同的印象。像其他许多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一样，巴赫欧芬习惯对女人怀有普遍的伤感情绪。女性主义原理对他来说“不光是靠敏锐与自由的外形来定义的，更多是靠预言性的感觉。更多的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经常把思想和女人特有的奇怪的毫无目标的斗争分开……总徘徊在愤怒和回音，感官享受和贞操之间”。性别间存在着冲突，他试图从神话中得到一些启发。“思想的王国属于男人，日常生活的王国属于

^① 美国的第一版，约瑟夫·坎贝尔带着一种盛气凌人的口气为此版作序。这一版本后来被安切尔的版本取代，这一版本中有一篇布丽奇特·贝格尔的评论性介绍。



女人”。“短暂的日常生活与母权关系密切。而父权和不朽的光芒万丈的超常生活紧密相连”。母系氏族时期被认为与农业,与特鲁似(源于大地的)湿地生活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巴赫欧芬认为与性乱交有关)。同样地,它是一个高级的阶段,但它实质上是通向更高级的父权阶段的阶石:

就这方面而言,女家长制的建立代表着向文明社会迈进了一步……女人通过她母亲身份的尊贵地位来反对男人对他那具有优越感的力量滥用……在这第一阶段,男人越是残酷,女人用来约束他们的力量就变得越是必要……女家长制对教育人类,尤其是男人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儿童首先是由母亲训练的,所以男性族人也首先是由女人训练的。在男性能领导之前,他必须先服务。驯服男人原始的力量,让它走向仁慈的道路是女人的天职。

巴赫欧芬也对理想化的亚马孙主义有所承认。根据他对历史进程的看法,古代亚马孙族经历了两个女家长制转化时期。一个时期是性混乱时期,高级妓女与女人反抗性利用相联系的亚马孙时期,拿起武器,反抗男人对她们身体的伤害。不过根据普塔克(Plutarch)引用的神话和巴赫欧芬的诠释,早期的亚马孙人依次被母亲的某种精神胜利所击败。女家长制被女人看成是对她“自然天性”的认可。并且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是不允许离婚的。这

是一种“配偶制的女家长制”，它与巴赫欧芬所认为的女人身份颠倒的亚马孙族，与一种“非自然加强的女性力量”是对立的。

德米特的女家长制，据巴赫欧芬说，是“朴素的……建立在严格次序的基础上……是高尚美德的源泉，并且尽管有它思想的局限性，仍是可靠和有序的”。这一时期开始向迪奥尼索司或阿佛罗狄特的女家长制让步，一个衰落期“一个紧跟着另一个，表现出它的艰难性，一直地，让女人注意节制”。尽管如此，对它的高傲的道德标准来说，德米特的女家长制仍和湿地草坪、物质和身体紧密相连，有别于（甚至是有悖于）父权和父权胜利的“文明”和“高尚”。对巴赫欧芬来说，那些相悖的地方常常是在辩证的斗争之中，而这种斗争从纯粹的男性观点看来，“母性附属于男人的身体本能，这是他与动物的唯一共同点，而父亲的精神理念只属于他自己。在那里他冲破了很多特鲁假设^①，把他的目光伸向宏观世界的更高区域”。尽管男人打破了女家长制的契约，对女人开始轻视和贬低，仍然为亚马孙主义带来了新的浪潮，迪奥尼索司剩余的后代被逐个征服，建立起了父权制度，以作者的观点来看，

^① 特鲁假设(tellurism)，由德国凯瑟教授(dr. keiser)提出的有关动物磁性的假设。——译者注



从此世界受到启蒙。

理解巴赫欧芬我们需要借助一些铺垫者的解释：一些由诸如普鲁塔齐斯、特拉博、赫诺多图斯、奥维德^①和希腊的剧作家们记录和撰写的真实神话。而19世纪巴赫欧芬自己的德国男性意识，也屡次自我否定^②。这有点像我们在夜晚看一幅画在窗玻璃上的映像。有时，巴赫欧芬的表述缺乏精确和清楚，人们试图把问题归于曼赫姆翻译章节的支离破碎，这让人有点沮丧。

我们最好大胆地假设有时巴赫欧芬表达的并不是他自己的思想，而是传说里所确立的思潮。举个例子来说：他宣称女人被“一件贪得无厌的血衣”操控时，是由（阿修鲁斯和阿波罗多瑞斯^③讲述的）一个故事为证，这个故事

① 普鲁塔齐(Plutarch)(公元46—127年)，古希腊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评论家。

斯特拉博(Strabo)，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著有《地与志》17卷。

赫诺多图斯(Herodotus)，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被尊为“历史之父”。

奥维德(Ovid)(公元前43年—公元17年)，古罗马诗人。——译者注

② 除了巴赫欧芬，可参看拉尔夫·曼赫姆的《神话、宗教与母权》(1967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③ 阿修鲁斯(Aeschylus)：公元前525—前456年，古希腊诗人、悲剧作家。
阿波罗多瑞斯(Apollodorus)：古希腊文法家、历史作家。——译者注

讲的是勒蒙斯女人怎样差一点因为他们的男人和史瑞斯女人同居而进行大屠杀。他引用了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阿尔恩与梅狄亚》(Ion and Medea)作为一个这样刻画女人性格的依据(而在别处,他把女人看成是贞洁的,带来次序与和谐的人)。我们很难确定何时巴赫欧芬把男人的神话与诗歌看成对女人客观的描述,何时把它们看成是某些特殊男人在特殊时期对女人的看法。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巴赫欧芬自己的观点里,没有对未来母权制的渴望。他对过去女家长制的看法非常矛盾,对女性的存在,也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

2

罗伯特·布里福的《母亲》分为三册,第一次出版于1927年,是一种孤独、狂怒和强迫性思想的产物。他开始在书中说明人类历史中社会化元素是“源于本能的运转,这些本能是和女性功能相连的,而不是那些男性”。他把父权制家庭在本质上看成是反社会的:“一种对个人主义的男性和他附属依赖物的委婉叫法。既然一个社会结合的家庭意味着一个由它最有侵略性的个人主义本能所运转的个体,那么它就不是社会的基础,而是社会应该否定的。”真正的社会纽带产生于“原始母亲对她所创造的团



体自然与生理的支配地位，人们对她的敬畏与她神奇的天性和力量紧密相连”。这样的社会结合产生于“生殖的原始神秘和有共同的血液与食物的原始宗教仪式，这种仪式被赋予给了有追随者的理想部落”。

布里福在追溯这些自然的支配与结合时，他的参考书目就有将近密密麻麻的200页。他的三册书都有很丰富的注释，他习惯博学地包罗万象，以便让每一表述不仅仅只依靠一两个例子。未删节的布里福作品（有两个删节的版本，一个是他自己编辑的，另一个是由G.雷特瑞·泰勒编辑的）是所有对他著作年代之前的有关女人的历史、传奇和人类学感兴趣的人的知识宝库。无论他作何结论，尽管也许我们想与之争论，但我们很难不对这样一个男人产生感激之情，他如此坚定地发掘出在文明进程中女人影响力的细节和样本。我们不可否认他用他的特殊天赋（吸收和理解大量的材料并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取得了很大成就。在他著作结尾他转向了婚姻，直言不讳地阐释了婚姻、女性与男性的智力差别以及女人拯救文明的必然性（但就像他表达的那样，没有“煽动”男女之间敌对）。我们注意到在他最后一章里对父权的强烈厌倦：“我们生活在一个父权原理不再有效的父权社会……权力、能量、野心、智慧和好斗的男人的兴趣，不再履行他自我存在的职责，同样不再自己建立起一个人类社会。”

布里福渴望并不是回到女家长制（他在著作末尾只是零散地提到这一时期，尽管在开头他进行了非常详尽地说明），而是一场运动，一种“新型的婚姻”和一个“对母亲充满敬爱，男女相互热爱，组织的、建设性的智力所取得的成就在迷雾中褪色”的地方。

也许布里福自己的见解进入了迷雾，而不是进入了一个清楚的观点，认为智慧的与母性的利他主义可以共存的观点，因为它证实了女人对思考、分析、建设、创造的自然能力，以及养育孩子的，且不仅是我们个人的孩子的天赋。

3

如果巴赫欧芬是一个19世纪中期的德国父权的神话收集者，利用了历史记录的神话和传说，那么伊莉莎白·古德·戴维斯就是同时代的第一个女权主义神话创造者。《第一性》出版于《母权》110年后，这本书有时会有错误、偏见和不专业的表述，不过所有的这些指控并没能真正把它否定掉。此外，戴维斯未能提及或考虑到东方的或殖民前非洲与美洲的关于女性力量的神话和传说，这局限了她作品的广度，对西方文明来说明显有些无意识的眼光狭窄。学术性女权主义者总严格专注于用传统和正



统定义组成的严肃知识来搞研究,对她们来说,戴维斯的作品毫无疑问是个阻碍。然而以一个引人注目的题目开头,它的冲击力是巨大的。作品缺乏学术性的地方,很容易而且已经被列举出来了。戴维斯首先开始省略地引用句子,并且重组为新的段落。另一方面,“专业的”历史在有关女人的问题上却没有学术性,很盲目。戴维斯所做的正是发掘出各种元素的价值——一些神秘的、一些历史的、一些考古的或文学的——就像某人搅动火堆,唤起一阵沉睡在灰烬中的火星。她扮演一个被征服者,一个部落讲述者的角色,述说他们过去的传奇,提醒他们,他们的母亲曾是女王和女神,坚强而又勇敢的领袖。从臆想与现实的混合中,传言、回忆和欲望的碎片中,她试图在散文里重温早期的诗人在史诗或者民谣里做的事——征集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不同的情况,让今日的女人构想其他的生存模式。

与西蒙·波夫瓦和海伦·汀勒不同,戴维斯的作品有详尽的脚注,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它能被人像博士论文一样来阅读,来评论。因此,学院派学者认为它作为“专业的”研究并不合格,尽管为了如实地表演过去,觉醒的女权主义者也许会被它的声明所吸引,就像曾经被圣经所吸引一样(尽管如此,她的参考书目自身也是很有价值的资料)。如果我们把戴维斯看成是回忆与想象的催化

剂,而不是不可动摇事实的记录者或一个失败的空谈家,我们将更好地认识到她作品的价值。

被戴维斯放到一起的母权制的神话也许永远不会被彻底地证明是错误或正确。但是针对所有的女人受压迫的详细情况,戴维斯的作品首次脱颖而出创造了一种相反的形象,而且使它得到了巩固,没有任何学院派的历史学者和人类学家可以轻易地击垮它。

很显然,尽管一些女权主义人类学家否认“母系氏族”时期作为一个普遍的文化阶段曾实际存在过,他们并不非要把母权制思想当成是“疯狂”或谬论抹去。正如正统的人类学家简·哈瑞森曾表达的,一个神话故事并不是从想象里跳出的“清楚明了”的东西,而是对周围环境的回答,是心灵与它外部世界交互作用的结果。它表达了一种需要,一种渴望。而且神话故事总是在累积,在增多。神和英雄的形象总是随着外部情况的改变而改变。如果戴维斯的作品把女人描述为最终唯一对现实和精神有所远见的人,如果她预见到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女人创造着精神与政治的次序,而男人被留下来笨手笨脚地修补玩具般无关紧要的小部件,这是对我们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夸大的面孔有力和充满想象力的回答。男性领导者的面孔,他们是父权制的纯粹产物,信誉越来越少,责任越来越少,越来越缺乏管理任何团体的能力,越来越多地

用技术的力量贬低和破坏人的生活。对许多女人来说，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戴维斯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纪，唤起了对女性力量的自然性与可能性的沉思：一个通向女权主义渴望的跳板。

4

“普遍的母权制是否曾存在过？”由于这个问题的不确定性，和许多关于过去的那些起催化作用的问题，我很难做出回答。因此我用女性主宰时期来阐述人类文化的一些阶段，在这些阶段里，以女性为中心的信念和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共同存在。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考古学的证据证明曾有一个时期在一些方面女人是被崇拜的对象，这是原始的母系时期。那时盛行对神的崇拜，并且神话故事描述了强大和受人崇敬的女性形象。从最早的手工艺品中，我们得知最初的力量是来源于女性的。

现在把那些塑像是出于女人还是男人之手的问题放到一边：它们表达了女性充满对她本身重要性的意识，对她生活意义深度的意识，以及对在必要和神圣的事物中心存在的意识。她以几乎被我们遗忘或者被认为是丑陋的方式美丽着。她的身体拥有巨大的内在深度、内在的平静和平衡。她并没有微笑，她的表情表达了她的精神

与狂喜。有时她的双瞳似乎能通过空气燃烧。像往常一样，如果她的胸前或者腿上有孩子，她就不会把思想集中在男人身上（随后是“对处女的爱慕”，那个圣子成为世界中心）。她并不是特别年轻，或者甚至她已经很老了。她总是专注于自我，甚至是在给婴儿喂奶的时候，甚至当她像狄安娜一样，以一个包含了许多乳房的形象出现的时候。有时她向人群炫耀她的尖牙，有时她被毒蛇缠绕，但即使是在她最和善的一面，古代的女神也没有召唤她的崇拜者。她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哄骗或安慰男人，而是为了表现自己。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塑像对现在的一个女人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如果它们没有为她做其他的事，它们肯定在精神上证明了她（就像我们当代的雕像不能证明她一样），让她的神情不再被乏味和琐碎笼罩，让她意识到自己参与了本质的神秘事情。没有任何仁慈可以做到这点，甚至是埃及阿玛南神圣家族高贵的女王也不能。在那里当太阳王把手放在他儿子头上站起来时，他的配偶，即使能像帝王一般，也始终只是个配偶。父权制以前神祭的塑像发挥了一个作用，它们告诉女人那种力量、敬畏，是自然让她们拥有了中心位置，并不是特权或奇迹，因此女人是居于首位的。早期艺术中的男人通常以孩子形象出现，常常是渺小无助的，或是平躺在女神的臂腕里，或

是坐在她的腿上,或是吮吸她的乳房。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那些图形——新石器时代的、哥伦布以前的、塞浦路斯的、基克拉泽斯的、克利特的、埃及王朝前的——它们并不能告诉我们早期女人对自己的感觉。它们是男人的作品,那些象征意义的形状所表达的是男人对大地和自然的感受。埃里希·诺伊曼,一位荣格派分析者(1905—1960年),就倾向于这一观点。他创立了由以下几点形成的三合一关系:①“孩子与提供营养的母亲的关系……”;②“男人最大限度依赖于土地和自然的历史时期”;③“自我与自觉对无意识的依赖”。根据诺伊曼的观点,“女性是营养的给予者,在每个地方她们都成为了令人崇敬的自然之原则。男人既享受又痛苦地依赖这一点。他们无助地依赖着自然就像婴儿依赖母亲一样。他们那种母亲的孩子形象一直都再被重新激发”。换句话说,当男人表达他对女人的看法,以及他和她的关系时,我们再次以一种不同的创作,以艺术的形象把女人视为承担者和支撑者。

一个事件改变了本来已确立的对最初文化年份的看法,不管怎样,诺伊曼写作于这个事件之前。近代人们对中东,以及诸如以色列的耶利哥和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进行了考古发掘。它们显示了在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新石器时期文明以前两千年,或者更多年以

前,文明已经在小亚细亚存在。它们也为“新石器时期前”崇拜仪式的存在提供了证据。被发掘出来的东西还包括了一些小雕像和“象征性地装饰的小礼拜堂——极好地展现了后来的母性女神神话的所有基础概念”。詹姆斯·梅拉阿特(James Mellaart)是位活跃于安纳托利亚挖掘的考古学家。他相信那些女神塑像,就像在那里发现的其他艺术品一样,是女人的作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塑像、小雕像、灰泥浮雕或壁画都完全没有性特征(他是指性别特征)。生殖器官从来没表现出来,那地方是阳具还是阴户不得而知。而且在安纳托利亚以外的地方,这一点在旧石器时代最后一个阶段,在新石器时代和以后的文化中更加显著。对于这一表面上很让人迷惑的问题似乎有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因为艺术对性别的强调一定与男性冲动和欲望相关。如果新石器时代的女人是那时宗教的创造者,艺术品的性别模糊就很容易解释,并且建立起一种不同的符号论,乳房、肚脐和怀孕代表女性信条,而角或有角的动物暗指男性^①。

① 它促使人们问为什么在新石器或其他时代的艺术中,性欲“一定与男性的冲动和渴望相连”。但我并不是要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我引用梅拉阿特的话,是想说明有一些记录支持了早期女人的塑像是由女人自己创作的这一观点。

我们可以直接从布里福和诺伊曼那里找到对这一假设的支持。他们列举了众多的例子来说明是女人发明了那些令人十分佩服的陶器制作艺术。它对男人来说是种禁忌,是一道神圣的工序。并且“制作那些罐子就像制造孩子一样是女人创作活动的一部分……在陶器制作中,女人感受了……原始的创造力……我们了解这些神圣的容器在原始时期扮演了许多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作为一种有魔力的活动的媒介。这一魔力暗示了女性变化角色的本质特征,这些特征与作为变化符号的容器紧密相连”。布里福称祖尼妇女制作的罐子实际上是以乳房为模型的。他进一步阐述“陶罐的制造,就像原始社会多数生产一样……总带有仪式或宗教特征”,并且“这些罐子与天母的定义都通过世界更伟大的一面,深深植根于古代信仰”。

看来女性制陶者并不是以简单的容器为模子,而是以她自己的形象,生活的容器和用血汗换来生活和奶品的人。以这种方式,她表达着,庆祝着,并以这种方式,为她作为拥有不可或缺力量创造者的感受赋予了具体形象。没有她生物学上的天赋,孩子,这些部落的未来和继承者就不会出生;没有她的创造和技术,罐子或水桶,这些最神圣的手工物品就不会存在。

这些罐、桶、缸、壶并不是装饰或随意的容器。它使长时间贮存颜料和谷物成为可能,并且是用来煮熟生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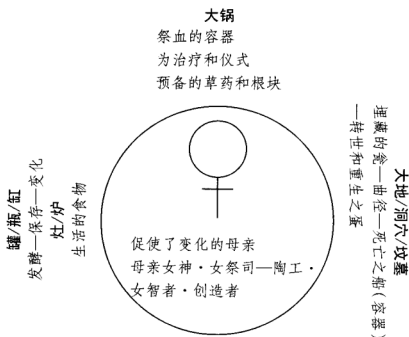
的容器。有时它也用于贮存死者的骨头或遗体。陶器制作工艺向精细的发展体现了生活的潜在改进和巩固。这可以与技术时代最复杂的革新相比——对天然石油的提炼，对核能的运用。这些革新给了它们的控制者们巨大的力量。这一类比甚至让我们失望，因为制陶者与陶器之间那种带有秘密和精神相通的关系，在今日的技术中，已不为人所知。

一些人，就像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 Erikson)对女人“内在空间”的意义与价值进行了沉思(凯特·米利特机智地进行了分析)。所以当我们把女人和“容器”一起讨论时，很难不引起否定的回答，如果不是受人嘲笑的话。旧联盟开始灌输：女人是“善于接受的”一个“容器”。小女孩“本性地”想玩过家家，然而男孩却没兴趣。女人的地盘是家的“内部空间”。女人的构造建立在一个伦理的诫命之上，被要求成为受虐的、忍耐的、平和的母亲。没有孩子的女人是“不完整的”、“不育的”和“空洞的”女人。男性在女性结构上对我的诱导的消极性是如此强烈，以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当我看到母亲般的女神塑像那夸张的乳房和肚子的时候，就会感到厌恶或心中充满极大的矛盾。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摆脱男权的束缚，以及那些形象中所表现和传达的阴柔气质，并且把力量与正义相结合。我们不是把“内在空间”作为女人适当的社会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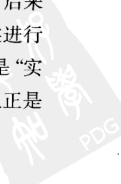


能决定因素来讨论的,而是作为最初的一串关联,我们能
看到女人/容器延伸的关联(我们也必须在心里承认,原始
时期容器绝不是“被动的”物品:它是可以改造的、活跃的、
强大的)。

一个图表也许能帮助说明问题:



早期的雕刻反映了这些改造对生命延长的必要性,表达了女性力量。用诺伊曼的说法就是“女性充满魔力的手总是握着那些具有魔力的锅罐,像女祭师,或者后来的女巫师”。最初并不是对永恒的思索激发了人类进行宗教活动,而是生存的斗争。就像布里福说的,它是“实际的,而非理论的”,是与日常需要有关的。而女人正是



解决那些需要的人。他进一步表明我们现在的性别不平等在父权制以前是不存在的。父权制中发展起来的行政和官僚的权力关系在那时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改造的力量，而不是压迫他人的力量，曾是首要和根本的力量。在父权制以前，女人自己就明白了这一点。

5

在很长一段时间，性活动与怀孕之间的关系都不被认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奥托兰克》(Otto Rank)、《超越心理学》(Beyond Psychology)、《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中都提到了这一事实，并且指出男人对父亲的角色不仅是无知，而是强烈否认。这种否认让男人相信让女人怀孕的是死者的灵魂，部族的图腾动物是它们的象征。兰克认为两种冲动在这里起了作用：对个体不朽的渴望（即在后代中重生）；对能担负部族生存之物的渴望，即不同于个体男性的图腾动物。马林诺夫斯基发现特罗布里恩群岛居民认识到处女是无法怀孕的，并且女人只有在阴户张开后才能怀孕。尽管如此，他们仍坚持认为，女人怀孕是由于另一个部族成员的灵魂把一个完整的孩子的灵魂通过她的头脑引入她的身体。



当然最后母与子明显的自然关系由于它的真实性，不得不显得比依赖于母亲的截然不同的父子关系更加可信。

阳具在父权制以前的生活中与在父权(或男权)文化中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含义。那时它并没有作为独立的个体被崇拜，或者被看做具有独立的力量。它和其他的一些东西一起被看成是女神的附属物，比如公牛、猪、新月、蛇、月形斧、双头斧和坐在她腿上的孩子。长满叶子的树并非阳物崇拜的象征，而是种女性的符号，因为“它结果、转变、滋养；它长叶、分枝，枝干被它‘包容’并且依赖于它”。它的灵魂让它栖息在某处，并包容着它。神圣的小树林对女神来说也是神圣的。诺伊曼看到了树向阳物崇拜的父权符号的转变——作为木桩或柱子，脱离的叶子和自然的根——或者转变为根在空中的世界之树，一种“非自然符号”(一个装载自然因素的父权容器)。父权制以前的阳物礼拜式是由女人用施肥的工具来进行的，而不是由男人用他们的“男性身份”或个体的父道。天母为人所知的只有成为其他女人配偶的儿子，而没有丈夫。

父权制以前，女性主宰下的母亲身份优于妻子身份，母亲的关系和地位远比妻子的地位更重要。就像芭芭拉·西曼(Barbara Seaman)指出的，原始人一定对生产行为有着强烈的敬畏——甚至比现在的人更强烈，对许多观看者和参与者来说，随着它产生的是强烈的非同一般

的感情。女人在她身体之外创造着男人,创造着女人,创造着不断的存在。她为一个神圣的生命赋予了精神,她是每个孩子蔬菜、水果、营养的来源。不管她有没有生孩子,作为制陶者和织布者的她创造出了最早的不仅仅是物品的物品,她创造出了艺术品。尽管带有神秘色彩,她也创造了最早的科学产品。她也开始了解药草和根的知识——治疗病人和养育下一代的艺术。

在其他的活动中,女人在生物学上的母亲身份不仅仅是生活的生产者 and 巩固者,也是转换者。人们曾相信经血能转化进婴儿身体(一个仍存留的观点。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是一个有智慧并博览群书的好奇女人,一位哲学家的妻子。她曾告诉我经血是“废掉的孩子”)和母亲乳房流出的乳汁里。对今天的许多女人来说,也许是被动的情况和超出意志以外的事情,曾被认为是转化的力量,和其他的转化相联系,包括转世。如果罐子或者水缸与女人的身体相联系,那么由粗糙的纤维到线的变化则与操纵生存与死亡的力量密切相关。阿里亚德妮(Ariadne)提供了迷宫的线索,希腊命运三女神或纳维亚命运三女神或掌管生命线的老妇人都与这个过程相联系。

女人不仅仅是给予生命,她让孩子的生命得以继续。她的乳房是他们的第一种食物来源,但是她对孩子的关注使她超越了一对一的关系。布里福把原始劳动的分工

看成是狩猎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因为“不同性别的不同力量和才能……任何女人的身体劣势,而是身体结构功能让她必须照看下一代,不得不缺席对其他劳动事业的承担”。人类婴儿对母亲(或成人)的依赖远远长于其他的动物。为了创造一个能让她们安全有效地养育孩子的环境,女人成为了创造文明者、农业和社会的发明者、语言自身的继承者。

6

女人的身体具有启动和带来力量、滋养新生活的潜在性。它穿越了数世纪的矛盾田野:那里既充满了力量,又充满了巨大的软弱;既有神灵般的人物,又有肉身的魔鬼;那是个矛盾心理的贮藏地,这些矛盾心理使女人丧失了在被确定的文化中集体行动资格。这一生活的矩阵决定了最早的劳动分工。并且,就像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展现的那样,男性到处试图模仿,强占和魔法般地与人共享她的力量。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高度可疑),仅仅是被苏珊娜·阿姆斯(Suzanne Arms)称做的“男人逐渐增加的篡夺女人生产过程,并称它为自己的尝试”。“人口过多”如今已是全球性的问题。人们更多地关注对妇女(主要是黑人妇女和第三世界国

家妇女)节育和控制出生率的问题,而不是寻找新方法生产和分配全球食物的问题。这并不仅仅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关,而且与每个需要感觉到自己有控制女人生殖力量的男性有关。

人们对神话(和诗歌)有一个激发能量的回应,研究动物行为的学生鉴别出对某些符号的天然生物学的回应。约瑟夫·坎贝尔在对原始神话的研究中,比较了这两种回应(一只鹰的木制模型或影子出现在刚出壳小鸡的笼子前面时,小鸡们狂奔寻找庇护,而海鸥或其他鸟类的模型或影子却不能让它们如此。人类的婴孩会对与人类面孔相似的面具作出回应,但这个面具必须表现某些特殊的特征,不然它就不会激起任何反应)。他找到了某种人类头脑的早期印记——婴儿在羊水天堂般的护佑中无重力地漂浮;第一次呼吸时对窒息的斗争和恐惧;从母亲的乳房吮吸乳汁和母亲不在时的被抛弃感——它们永无止境地被再现、被寻找或被隐藏,它们是神话、诗歌和艺术让我们再次经历的有力回应。他进一步认识到“对经血的恐惧和经期的孤立感,出生仪式,和所有关于魔力的学问证明了我们在人类想象力兴趣的主要中心领域之一……对男人来说,对女人的恐惧和对母亲的不解带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响力,并不比对自然世界本身的恐惧和误解带来的少”。



在女人生育的周期和月缺月圆的神秘周期之间，女人不时需要保护自己不受男人性侵犯和男人对那种抑制在性方面的反应之间，很显然曾有一个非常古老和强大的矛盾关系。在这些角色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关系：怀孕与月经消失之间的、绝经与绝育之间的。从月经中得到的这些知识，甚至是原始妇女也明白她自己是否怀孕，她是否能怀孕。

一般来说，人们似乎可以推测经期的禁欲（女人在她日常行动里的退缩，包括性）就是原始的禁欲。权力的不同决定了这一禁欲最先是来自男人还是女人。布里福把它看成是“最开始女人对男人性本能的拒绝……那些女人表示拒绝男人禁令……”根据他的研究，经期的禁欲和孩子的出生，女人都是禁令的下达者，并且她的自我隔离让男人感到这种时候她有“危险的影响力”。C.G.哈特利（C.G.Hartley）声称自我中心的、非社会性的男性团体的压制统治强迫女性团体建立社会行为的法律。诺伊曼说女人“通过加于男人身上的禁欲驯服了他，就这样建立起最早的人类文明”。根据他的观点，性成熟并不是开始于男性青春期仪式，而是第一次月经期间的有关仪式。女人把经期的禁欲加于男人，异族婚姻（血族关系以外的婚姻）禁止了乱伦，阻止了男人对住在身边女人的性利用。同时女人的“不贞洁”经历，父权制以前的女人可能会把它

理解为她们神圣的谜之一。

根据荣格派哲学家以斯帖·哈丁(Esther Harding)的叙述:

在原始社会,一个女人一生都专注于她生理周期的规则变化。在家劳动的周期、与邻居之间的社会生活交流周期和与丈夫间的夫妻关系周期随着这一隔离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在有规律的间隔里,她被强迫孤立。所以她不能做饭,不能照料菜地,也不能离开屋子。她被禁止干任何往常的工作。她被强迫独自呆着,走向自我,走向内在。好像是规定一样,人类学家总是对部落的习俗比对个体的心理感兴趣。他们并没有问是女人自身的什么造成了那些习俗。因此,这种周期性的隔离必然对女人与生活的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哈丁和贝特尔海姆都认为男人的成年仪式——包括隔离、净化、斋戒和“寻找先见之明”——尝试获得一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女人是在最初的月经周期和生产失败中获得的。哈丁认为同时期的女人也许仍然需要利用她的经期来寻找自己的主观性,生活得更加接近她内心最深处的旋律——并不是因为经期是一个让人神经质和有魔力的时期,而是因为它们如果被利用,能成为洞察力的来源。

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她关于研究污染



和禁忌的一书《纯净和危险》(Purity and Danger)中指出：男人占支配地位之处是毫无疑问的，女人完全被暴力征服(比如澳洲中心地区的土著人)，没有经期禁欲的存在。并且在她看来，那个禁欲是男人强加禁欲，为了避免不受来自女人的危险感觉的侵扰。许多其他作家，包括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都断定经期禁欲是男人由于对血的原始恐惧而创造的。但是 Paula Weideger 在《经期和更年期》中写道：“既然所有的血都具有神秘的来源，为什么男人，并且只有男人把经血看成是不同于其他血的精神物质？是什么使女人对待血的态度如此不同？……原始人并不是受抑制发展的受害者，他们有能力了解关于重复出现的自然事物的存在……每个女人在生命中很早的时候就上了关于经血的一课，也许男人也如此。”

无论女人是不是禁欲的始作俑者，经期禁欲的存在，无论好坏，显示了对力量的一知半解，以及女人的恐惧和她母性身份的神秘。我认为如果女人首先创造了经期禁欲，无论是出于她们自身的神圣秘密，还是出于控制与驯化男人的需要，这一禁欲本身增加了她们表面的力量，授予了她们仪式性的魄力。女人经过深思熟虑对男人的回绝被看成是具有潜在危险或敌意的行为，一个阴谋，一种颠覆，一种不必要和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然而那些我

们都熟知的辩解却为男性团体对女人的排除找到了借口,无论它是个神职团体、会餐俱乐部、远足垂钓团、学术委员会还是黑手党集会。至今女人的自我隔绝(大多数是在女同性恋的关系中,但也存在于围绕在安妮·哈钦森^①周围的团体,或1848年法国革命时期的女性政治集会,或现在的女生班,或那些意识上升的团体中)都被看做对男人的威胁,就像一个用神秘调音的文化,免不了有令人害怕的泛音。

当然,女人的月经周期也经历了父权思想的彻底调查,被定为是不吉和不利的。把这种看法内在化,实际上我们意识到自己被玷污了。我们的肉体厌恶倾向(男人在我们中传递的对女性身体的嫌恶)被强化了,以至于在“高级”的社会中,我们身上仍存在着宗教的禁欲。一个男人对女人经血无意识的害怕,会让女人觉得自己的经期是一个受到玷污的时期。男人常常高看精液和把它浪漫化(我认识的一个男人就把它的味道和栗子花的香味相提并论),而把经血贬低为非自然和令人嫌恶的(另一个男人向我担保与经期的女人性交并不让他反感,但却让“这个”阳物很恼怒)。

① 安妮·哈钦森 1591—1643: 生于英国,移民美国后,因其宗教观点被波士顿流放。——译者注

今天人们认识到月经和经前女人会有压抑、不安和怒火阵阵的特征，其原因也许有水分的保留和荷尔蒙的变动，但心理和文化的因素更重要。在父权制人们对月经的攻击下，女人会有骄傲与羞愧（和恐惧）共存的矛盾心理，有时年轻的妇女会完全对此拒绝和反感。相似的既害怕又欣慰的矛盾心理也常常存在于更年期初期。对被定义为母亲的妇女来说，这可以意味着，终于不会再有不想要的怀孕了，但同时她的女人身份（这样定义的）、性欲和某种功能也会消失。

撇开经血，男性对月经的态度是，女人来月经后的岁月如果不是她肯定成为母亲的岁月，就是她有潜在可能成为母亲的岁月。在父权制下，直到最近（并且仍然十分艰难）一个分娩的女人才可以走向她自己，宛如远古的处女，话语充满权威。没有结婚的母亲承担着教堂和社会的最苛刻责难，并且也承受着经济和社会压力的负担。女人熬过行经期，在她隐藏的和公开的感觉某处，经期和强大的矛盾心理相联系。那是对被征服和对被接受的母亲身份的矛盾。

7

女人出现在父权制以前宗教思想的每一角落。月亮



是最先的自然崇拜物体,并且以往月亮和女人紧密相连,它变化周期和女人的月经周期一致。根据哈丁的说法,月亮女神是处女,具有最初的伟大意义——并不是花蕾里的女孩,而是属于自己的女人。或者,用爱斯基摩人的说法,“她是一个永远不会有丈夫的人”。她有许多的情人和许多儿子,而且儿子常常成长为情人。有时月亮本身就是个女人,以女神塞勒涅、阿耳忒弥斯和露娜为代表。有时月亮从来自天母(和来自所有女人)的男性那里受孕。即使如此,月亮仍在根本上和哈丁所说的“女人的神秘”紧密相连。换句话说,无论是男是女,最初和月亮的神性相联系的母性的处女女神,她是“自我的”,并且她的力量从她的母性方面放射出来孕育了整个世界——丰富的农作物、四季的规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话。

但是曾经月亮仅以女人的一面出场支配着世界。父权制以前的思想解释了一切。草木和营养来自大地子宫,就像婴儿来自母亲身体。表示母亲和泥土(植物生长的土地、软泥、塑造“男人”的尘土和黏土)的词在很多语言里都极其接近: *mutter*, *madre*, *mater*, *materia*, *moeder*, *modder*。“大地母亲”这个词仍在使用,尽管在我们的时代,它被意味深长地赋予了离奇的、古老的和感伤的光环。

草木在冬季退回大地子宫,并且人类的身体死后也归于大地,返回那个子宫,等待重生。古代中东的坟墓被



很精心地设计成母亲身体的样子——和那些迷宫和螺旋一起象征她的内在结构——所以灵魂可以在那里重生。G.雷切尔·利维(G Rachel Levy)表示这种设计最先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山洞里,是母亲的自然象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关于母亲概念和死亡概念的许多联系之一——一个在父权思想中仍很强大的联系。

海的潮汐就像女人的月经,是对月亮引力的回答。海洋和人类生命开始的羊膜里的流动是一致的,人们可以在海洋的表面航行,但在它的深处隐藏着怪兽,水手们在那里只能经历死亡——这一海洋在地球和大地间自然的某处。从人类的眼光来看,海洋是能接近的,而月亮不能;它是不稳定和可怕的,而大地不是;它每天都孕育新的生命,但也吞没生命;它像月亮一样善于变化,不可控制,也不能被摧毁,它是永恒的。海洋无法被制造,也无法被消灭。它是一个没有新意的很咸的地方,但它也自然地创造着生命、养料、食物,尽管它们和陆地动植物有很大的不同。天母都是在水中被找到的:“带着神光的轻舟循环于天国的海上,产生生命的海洋在大地的上面和下面。所有的河水、溪流、喷泉和雨水都属于它。”

月亮曾被看做是男性的神,他让女人和大地怀孕。但女性主义的泛神论把天空本身想象为女性,而太阳和月亮则是她的儿子。在诺伊曼提到的许多文化和传说中,

“女性的天空是个不变的持久要素”。这些传说有埃及的、阿茨特肯的、吠陀的和巴比伦的。天母，女性之原则，最初被人性化时，同时具有黑暗和光明的一面。父权制的宇宙进化论的发展，把她限制为完全的“崇尼克”^①或居住在地球上的神——黑暗、冷漠、沉睡为其代表。

① 崇尼克是希腊神话中的地神的统称，指称在地下世界生活的神和灵魂。崇尼克神一般被认为来自希腊史前居民所信仰的巫术，其行为和显圣的方式都和奥林匹斯神大相径庭。——译者注



第五章 母性的驯化

……有一个波斯的传说是关于圣经以前的世界创造者。在那个传说中，一个女人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是用她那男人无法模仿的自然创造力来行动。她生了许多儿子。这些儿子对他们无法模仿的能力感到很困惑，变得害怕起来。他们想：“谁能告诉我们，如果她能给予生命，她就不能带走生命。”所以，由于他们对这个女人神秘能力的恐惧，他们杀死了她。

——弗里达·弗罗梅·赖希曼 (Freida Fromm-Reichmann),《对女人性快感的否认》

1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用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出现定义



了母系氏族的结束和父权制的产生。他看到女人由于经济上的依赖性，而被强迫结婚和卖淫。他预言性别的解放将随着私有制的废除和男人对经济独霸的终结而发生。对恩格斯(就像对几代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而言,对妇女的压迫,简单来说有个经济的原因,也会有个经济的解决办法。实际上,他不鼓励我们去尝试思索怎样为性别平等的到来而转变:

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做出他们自己的实践,并且造成他们的据此来衡量的关于各人实践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

卡伦·霍尼说:“男人热衷于隐藏‘两性间存在着斗争的事实’,并且他们对他们思想体系的强调,也使得女人采纳了这些理论。”这是对那句话的最好例证。在她用

词优美的评论《两性间的不信任》中，她说出了所有男人对女人的令人愤怒和不安的庇护——她甚至说“包括那些来自和有意识地 and 女人保持良好关系，并且把她们当成人来尊重的男性的庇护”。唯物主义的分析和男性的偏见让恩格斯断定一个经济上的解决之道将净化错误的观念，创造一个关于性别的新概念，清除过去的病症，开辟新的未来。但他没能理解母子、母女间的关系，也许不只这些，他同样没能理解作为购买者的男人和作为商品的女人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建立了男性特权的性别政治。甚至在增长的全球性女性意识觉醒的压力下，男性带来了社会主义趋势和革命，并反映了让男性统治地位和控制力永不改变的愿望。至少叶利·扎列茨基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认识，使她尝试对社会主义运动中激进的女权主义带来的挑战进行回答。

经济发展带来的革命并未让妇女受压迫的情况有所改变。男性的特权社会心理传统几乎没有受到女人参与工业生产的挑战，不过家庭观念的加强带动了传统父权观念的复苏，比如对母亲身份的提升。

并且马克思主义断定异性恋家庭传统的劳动分工是“自然的”。但是对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两个19世纪男性智力的产物——似乎没有影响。因为我们把那种“家庭”看成是男人给女人的，被公开的和被隐瞒

的难题,而不是观念。对一个男人来说,一个女人既是个重要人又是个不重要人:她既是可怕的必要,又是必要的可怕。她不仅仅比“被开发的工人更重要”;她不仅仅是“他者”,她首先是母亲,他们压迫、轻视、控制她,以免她把他吞回她的黑洞,或凝视他,让他成为石头。

当然,否认这一事实存在的父权制理论性说明是在左派政党以外。在一本关于血族关系体系的小书中,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用一些温和的句子描述了“基本的女性功能”。他认识到所有人类关系纽带的基础,人类最基本的纽带是母与子之间的。随后他开始解释直立行走的两足人类怎样要求延长子宫外的妊娠期,使得女人成为首先担负长期的哺育重任的人。“也许在此期间会再次怀孕。”对福克斯来说,这一必然是由于让女人变得无能力,必须“被保护”的体系。恩格斯认为是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导致了男性统治,而福克斯认为是“保护者”角色自然而然导致的:“是男人在玩这个游戏,与敌人搏斗,和做决定。”除了关于保护者团体做了多少决定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实际上,不管在最初的社会做决定意味着什么,这一概念很可能原本是从母性角色上分离出来的。福克斯创造了一些早期男性的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形象,暗示了“保护”比力量和权力更应该加以考虑——一个熟悉的修辞。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断定女人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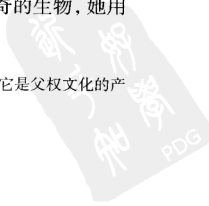


育孩子的本性角色导致了对劳动的“自然”分工,大体上像接受是男人女人对劳动分工一样接受它,我们怎么能证明:与女人有关的法律、传奇和禁令,从早期的父权神话(比如夏娃)到中世纪的女巫迫害和对女婴的屠杀,到现代的强奸法,关于继母的笑话,到我们时代的虐待狂色情产品,这些都充满了敌意和戒备,而不是在“给予保护”?

后弗洛伊德学心理学的话题之一是:男人通过对自己缺乏的基本的、创造性的母性力量的补偿来实现对文化的贡献。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把男性仪式的开始分析为是对这种女性力量深深的男性嫉妒的自然产物。霍尼表明,不管其他任何方面的男性统治,嫉妒和愤怒都在男性统治思想中有所表达(包括“阳具嫉妒”之类的概念)。这些思想中有对母亲身份的贬低(我称之为降格),和文明进程中的厌女情结^①。

她看到除了对女人创造新生命力量的这一古老的愤慨,还有对她能左右男性生殖的这一显而易见力量的恐惧。女人作为基本的力量和性诱惑者,对男人来说,她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人物:“女人是个神奇的生物,她用

① 厌女情结并不只是针对那些憎恨男人的女人。它是父权文化的产物,这一点已经被清楚地证明了。——原注



心灵交流，并且具有伤害男人的魔力。所以他必须征服她来保护自己。”（很有可能，男人越“理智”和客观，他越不会被那些魔力的思想所奴役。）“慈母心”既来自于性魅力（诱惑者），又来自于“母亲身份”（强大的女神），并且以它的“奉献、无私、自我牺牲”被接受。因此，在14世纪，人们崇拜着处女玛利亚，而活着的女人却被当成女巫虐待和焚烧。

2

约瑟夫·坎贝尔通过追溯从史前开始的女神和天母的普遍形象，宣称道：“毫无疑问，在人类历史初期，女性神奇的能量和才能，比起世界本身，更是个奇迹。并且这给了女人巨大的力量，它一直是男子主义人群破坏、控制和终止的目标。”他把农业之外的狩猎和欧里尼亚克时期末（大约公元前30000年）女性塑像的消失与男性针对女人基本力量的自我肯定意识的上升联系起来。他指出女性塑像是：“智慧动物创造的第一个用于崇拜的物品。但是智慧动物的魔力、仪式和雕刻有一个由阴道向阴茎的转变，由本质上的植物性神话向完全动物性神话的转变。”

G. 雷切尔·利维贡献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完美具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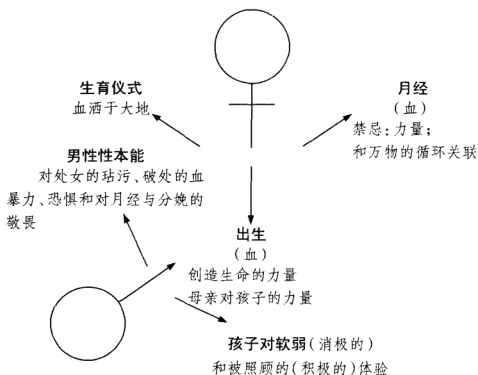
的对新石器时期意识的再创造。经过对欧里尼亚克时期山洞大量手工艺品和壁刻，以及新石器时期之后文化的建筑风格的实地考察，和对贯穿东、西欧的史前兽群活动和野草分布的研究之后，她得出了结论。她表示一个统一的生命给予准则——在山洞里被具体表达的和在女神崇拜塑像中找到女性准则——暗示了狩猎人的存在。她感到对动物驯服和喂养的开始导致了对“时间变化运动”的最先意识，比如季节循环、星辰交替、妊娠、生育和动物与谷物的死亡。“时间变化运动”带来用数字表示关联、平衡和周期性对称的知识，这些依次使得进步成为可能，比如陶器的发展。但是“智力革命”的必然产物之一是增长的二元性意识——一条理解之道通向它的端点和岔道，后来变成了父权意识的基本元素。

认识事物的周期变化(死跟随生，死后转世，潮起潮落，由冬入夏，月缺月圆)，是认识包括了积极和消极事件的过程和延续——尽管作为变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些事件不太可能标记为完全的“积极”或“消极”。对利维来说，父权制以前的意识开始于一个女性元素的联合，并朝着由女性出场主持的动力学意识发展：“对二元认识的增加，就像人类回归与孕育生命的大地一样，天母保留了她以前的持久和根本的地位……在对新石器时期的考古中，没有发现对男性神明的膜拜……女性才能是欧里尼亚克

雕塑的重大主题。”

甚至死亡也是时间变化运动的一部分，是通往转世与重生的循环的一部分。天母“黑暗”和“消极”的一面就这样从一开始就显露出来，并且与她仁慈和给予生命的一面密不可分。就像死亡一样，暴力、杀戮、破坏力总是在那儿，天母形象里潜在的“邪恶”曾被完全分离，然后被分别具化为如龇牙咧嘴的嗜血财母卡利，和杀手母亲美狄亚，那个淫荡和胡言乱语的女巫，“绝育”的妻子或母亲（当我正写这些的时候，我的一个儿子给我看了近期《国家地理》的封面——一张一个秘鲁的印度人划船运载一头纯白美洲驼的照片。它将作为的的喀喀岛一年一度庆典的地母祭品，以换得好收成。这一庆典由女魔法师操作，把这头美洲驼的血洒到“帕夏妈妈”〔大地母亲〕上。这样，生命的礼物，即食物，像古时那样和流血与杀戮联系起来，并且它们与天母相联系。即使这样的风俗在今天很少见，它也曾流行一时）。

女人的血不同于男人或其他动物的血。它不仅和经期禁忌的“诅咒”神秘相连，并且和玷污处女的魔力、出生的变幻奥妙、生育本身相连。因此产生了源于女性一些方面的关系的复杂融合，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下图的关系：



正如约瑟夫·坎贝尔认识到的：“分娩和月经的自然神秘和死亡本身一样能直接令人信服，并且延续到它们成为宗教敬畏的开端和主要源泉的那一天。”

在反复出现的英雄神话中，男婴成长为儿子/情人，随后他将经历出自他母亲之手的暴力（谋杀和阉割）。屠龙的神话（又一个暴力的/血腥的神话）讲述了对一个年轻男子的考验，他试图克服对可怕天母的畏惧——他对女人的自然恐惧。根据迈锡尼的神话，为了进入德尔斐，阿波罗不得不与一个女性的龙搏斗，随后那里成了他的圣地。

新石器时期的三角形和神圣的通道——通向圣地的

人口上雕刻的女性生殖象征——这一反对女性力量的斗争中,变成了龇牙咧嘴的卡利,或美杜莎的脸和她咆哮的蛇发。“坟墓边吸走刚死的人的灵魂”的仁慈“鹰神”转换为怀孕的怪兽:“河马、鳄鱼、母狮和女人的结合。”

诺伊曼把成年男性的自我看成是个可以与天母有创造性关联的东西——既然完全的成人身份最终需要与死亡本身有创造性关联,就可以假定与她的仁慈和阴暗面都有关。青少年的自我还未自我确定,但仍把女性看成是种威胁,看成“无意识和非自我……黑暗、虚无、空虚和无底的洞”。当然,这里的问题不是在男人20岁时就能结束的,或是人类意识更原始的舞台所能解决的,这里的问题是男性性欲,并且很有可能在大多数男人身上并延续到中年或以后。事实上,对女性的否定,父权制生来就试图“屠龙”。并且在父权社会,一个完全成年的女人可能仍然经常只找到一个青春期的儿子/情人。甚至当他和她在一起让他惧怕她握有的阉割和死亡力量时,他仍然希望她成为他的情感粮食。这种恐惧就是必须被摧毁的真正的龙。

3

女人总是把自己看成女儿和潜在的母亲,然而,男人

总是从概念中分离出各个步骤，先只感觉自己是儿子，非常晚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父亲。当他断定他的父亲身份，并肯定地声称由此能对女人和孩子行使权力的时候，我们开始看到他为了补偿而开始的一些程序，也可以说是为了报复，报复他以前作为母亲儿子的角色。

父权的一神论并不是简单地改变性别上的神圣性，而是剥离了女性的神性光环，像是个讽刺，只让她专门作为母亲（不管她用巨大的魔力创造了父权制以前的文明）——或一个神圣父亲的女儿。她成了将成为父亲的丈夫的财产，而且她来到他身边时，必须是个完整的处女，而不是“二手货”，或者她只能是仪式性的破处。如果他该了解“他的”孩子，他必须控制他们的下一代，那意味着他必须完全独占他们的母亲。“合法”问题很有可能不仅是向自己的血脉传递财产的欲望，简单地说男人的需求是：“我有生产的力量——那些是我的种子，我自己创造的孩子，我基本力量的证明。”进一步来说，当然，孩子是未来世袭财产的接收者。通过他们的祈祷者和祭品，他们将确定父亲在死后灵魂会有个安全的去所。但是他们自身也是现有的资产，被派去田里干活、钓鱼、狩猎和对抗敌对部族。一个妻子的“不育”（知道近期人们才声称“不育”也可能是丈夫的问题）是祸根，因为最终她是进行生产的人。男人需要孩子来加强他在这个世界的地位，并且男

人尤其需要儿子。耶和华的“多多繁殖”^①命令是一个完全父权的命令,并且他不是要求在要求天母,而是在吩咐他的儿子们繁殖更多的儿子。因此,恩格斯关于在父权家庭,丈夫是资产阶级,而妻子和孩子是无产阶级的著名论断是正确的。但是它们各自对对方来说不仅仅如此,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并且能比经济上的奴役更长久。

在中东,人们至今相信女人的不育是神对她的不虔诚的惩罚(女人被定为罪人,而不是男人),并且生女儿是个灾难,不仅对母亲是灾难,对女儿也是灾难。希伯来学者拉斐尔·帕泰(Raphael Patai)说:“从阿拉伯的历史档案中,我们知道从史前时期一直到19世纪,在一个女儿刚出生或稍晚些时候,一个父亲常常决定她的死亡。通常的方法是把刚出生的女儿活埋进沙漠里,直到她死亡。”他引用了一个叫科兰父亲问自己关于他新生女儿的话:“是带着耻辱保留它,还是把它埋到土里?”我已经讲过的早期女性是首要地位的背景,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以用来反对这一问题里的暴力——还有一个事实存在,耶和华的拥护者野蛮地镇压了拥护阿斯塔尔特(源自坦尼特、阿

① 《创世记》中的这一命令当然是在亚当的传说之后。在亚当的传说中,女性的生殖力量被否定了,并且她是从男人的身体里取出来的。当亚当和夏娃被诅咒后,夏娃被告知“(她)将在悔恨中生育孩子”。
——原注



瑟拉或伊什塔尔)的宗派,并且宣称所有女神崇拜都是“令人厌恶的。”

女神母亲被逐渐贬低和否定,并且女人的机会也渐渐减少,高贵逐步降低。父权制的男人让“他的”妻子怀孕,并且期望她递送“他的”孩子。她的自然力量越来越被看为是她所提供的服务和所表现出的功能。在《埃斯库罗斯的欧墨尼得斯》中代表母权的厄里倪厄斯宣布了对奥雷斯特弑母罪过的惩罚,但阿波罗却称奥累斯特的弑母是对他父亲阿伽门农之死的报复,并且他继续说道:

母亲并不是那个被称之为她孩子的家长,只是照料新种子生长的人。家长是那个骑在上面的他。

雅典娜也是父权的代表者。她否认有任何母亲,她是从父亲宙斯的脑袋里蹦出来的。她像个真正的女人典范那样行动,就像她毫不犹豫宣称的那样,只忠于“那个男人”。中世纪的教堂还保留着一个很小的,但完全成形,并具备灵魂的胎儿。它曾被男人安放进女人的身体,就像被放进孵化器。

神圣家族的形象也在发生着改变。无论是在苏美尔、弥诺斯、迈锡尼、克诺索斯还是叙利亚,女神总是个年轻的形象,她的儿子、仆人或配偶常常只是她的陪衬。E.O.詹姆斯把那些年轻的男性人物形象看成是对男性在受精中角色认识的首次标志。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余下的

年轻的神更多的是儿子，而不是丈夫；更多的是配偶，而不是伴侣。从恰塔尔山神殿中找到的男性人物形象中，梅拉特看到女神儿子的角色“完全是她的下属”。他说：“可以假定他代表着狩猎的方面，这可以用来回答独立的男神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恰塔尔山的原因。”但最初他是以草木之神出现的，为了草木的循环继续，他必须死掉，再重生。一句话，他仍是带来谷物、水果和其他植物的天母的附加物而已。后来，处女母亲和她年轻的孩子搭档被父亲、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替代了。相反地，伦纳德·帕尔默(Leonard Palmer)引用了迈锡尼的“神圣三人组”的故事。它是由两个王后和一个国王组成。我们发现这样的三人组合也出现在埃及的阿马那家庭，它是由一个父亲，他的儿子和他的小孙子组成。母亲不再是处女，不再“走向自我”，而是“走向丈夫”，变成他的不平等的配偶，或和他的城堡一起，成为他的财产和附属品。

对女神的崇拜大批减少。帕泰描述了犹太人的父权一神论与留有金牛犊的女神宗派间的斗争（世上长角的公牛或母牛对女神来说是神圣的）。他讲述女人为耶路撒冷庙神殿里的阿瑟拉编织“遮蔽所”——也可能是外衣，并且为阿斯塔尔特或阿纳特烤蛋糕。一些女性存在的遗留物和被荣格称为灵魂计划的东西保留在了谢赫拉的概念里：“爱、欣慰、母性、苦难、悲伤”。（数世纪来犹太母亲



还有什么含义)一位女神也在13世纪犹太神秘教的复兴中重新出现了,她的名字是马特罗丽特(Matronit)。根据帕泰的说法,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经常独自出现的女神,但她身上似乎还有些犹太教主流思想的遗留。在《古兰经》和《旧约圣经》中,被定为不洁的猪在女神崇拜的宗教里是个反复出现的动物。在克里特岛,大母猪被视为是神圣的。有时,它也是伊希斯的化身,是阿芙洛狄特盛宴上的祭牲,是崇拜得墨忒耳的伊纽瑟斯宗派的象征。“在禁止吃猪肉和把猪视为不洁的地方,我们能非常肯定它最初的神圣特征。”

简·哈里森叙述了对一个希腊神话人物,来自克里特岛的大地女神潘多拉的贬低。她由完全的给予者变为一个漂亮的姑娘,用所有奥林匹斯山的神赠与她的礼物引诱男人。潘多拉那著名的“盒子”打开时,把各种不幸和麻烦放到人间。它的原型是大地女神用于储存诸如酒、谷物和水果这些东西的坛或罐。赫西奥德(Hesiod)讲述了一个传奇:“他全是为了天父,并且在他创造的奥林匹斯山上,天父不会有任何伟大的大地女神。”那之中“丑陋和恶毒的神学的敌意”让简·哈里森吃惊不小。

斯莱特(Slater)认为整个奥林匹斯山神话都浸透着对成熟、母性的女人的恐惧。广受爱戴的女神雅典娜是从父亲宙斯的脑袋里出生的,是个没有孩子的处女,并且像我们

所知道的那样，她坚称对男性的忠诚。赫拉是个嫉妒忌的竞争性配偶，并且像该亚、瑞亚、美狄亚和克莱特蕾斯塔一样是个毁灭型的母亲。他从15世纪希腊的性别政治信条中得出这一恐惧的理论。在那个时期的希腊女人很少受到教育，被买卖进婚姻并且只能充当孩子生产者的角色。男人的性爱好是同性恋倾向的，为了知性的友谊，男人寻找着情人或另外的男人。他断定母亲充满着对她儿子们的嫉妒和愤怒，并且，由于她自己的挫败感，会在她儿子的早年过分地控制他们。她的儿子们会觉得她的感受具有潜在的毁灭性敌意，这一点后来被表现在神话和古典戏剧中。

4

对太阳的崇拜，总是迟于对月亮之神（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的）的崇拜。这是父权思想的另一特征。古人并不认为月亮是受阳光的反射，而把它看成是在夜晚黑暗中独立的发光体；太阳只是个居住者，而不是白昼的光源。

很难看清，像阿马那时期埃及艺术中一样，太阳是如何开始拥有支配地位的。尽管一个太阳之神曾处于埃及宗教思想的中心地位，但仍有很强烈的女神崇拜体现在伊希斯、哈特霍耳、努特和内普瑟斯的人物中。公元前14世纪，法老阿肯那顿（Akhenaton）彻底改变了埃及的宇宙

论,他把阿腾或太阳圆盘设为新宗教信仰的唯一化身。在他的首府,阿马那的阿滕宝座之地,他鼓励一类艺术,这类艺术反复表现着太阳圆盘和它的万丈光芒所传播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一神论,以太阳为中心和父权宇宙。

当我们想起阿马那艺术时,总会想到著名的内费提特(Nefertite)半身像。但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因为她受到欢迎而夸大她自身的重要性。实际上,阿马那艺术所反复表现的女人和家庭的形象,看起来与当代的固定模式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在那些雕刻的形象中,阿肯那顿即是君主,又是神明(阿腾的化身)。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王后内费提特,她具有非凡的举止和高雅,与当代的理想女性形象非常接近,并且比大多数父权制以前的女性人物具有更高贵的美丽。但她毫无疑问是次要的,只是个配偶。即使被描述为高贵和骄傲的王室女神,但在本质上,她只是个象征性的女人。在一块石碑上,描绘出这一王室家庭(阿肯那顿、内费提特和他们的三个女儿)不拘礼节的,甚至亲密的家庭场景,表现了许多尘世的亲情。但在他们的上方,阿腾放出光芒,那才是这个作品的中心和要点。

为了建立对阿腾的崇拜,阿肯那顿不仅重新整理了已被破坏的早期的神的形象,把他们名字从纪念碑上除去,并且禁止了“神”这个词的复数形式。西里尔·奥尔

德雷德(Cyril Aldred)说：“表达‘母亲’和‘真理’的词是从它们旧的联想中净化出来的。”这其实只是在逗弄人，因为象形文字中代表“房屋”或“村镇”的字也代表“母亲”，和强调个体培养一样强调了集体观念。

在《埃斯库罗斯的欧墨尼得斯》中，希腊的太阳神阿波罗成为父权的代表者，受到那个否认她母亲的女神雅典娜的支持。阿波罗也是诗歌和里拉琴之神，也和光明、树木和治愈的艺术相连。他有一个双胞胎姐姐。简·哈里森说明了阿波罗来自欢乐女神，她的土地长满可以止血的牡丹。那种可以止血的药草在东方受到了普遍尊敬。但是她的妹妹阿耳忒弥斯，作为被贬低的女神，也和治愈药草相联系。阿波罗和树木的关系很有趣：美丽的少女黛芬妮为了避免被他强奸，把自己变成了一棵月桂树。阿波罗把这棵树当成他的个人标志。在德尔斐，他杀死挡道的女龙，接管地球女神神谕的圣殿时，手中握的正是月桂树的树枝。

阿波罗吸收了许多天母非常有魅力的方面——甚至和月亮配对。树木，药草的母亲和生命的保护者，变成了一个男性的神，并且月亮女神成为了他的妹妹。斯莱特称他为“反母权的具化形象，天神的缩影，反地球之神的战士。他皆具阳光、奥林匹斯、坚定和理智”。当然，用简·哈里森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父权“独立”

的例子。正统的希腊人不会允许认为阿波罗有“黑暗的行为和梦想”。他完全是个清澈和光芒四射的男子。哈丁认为对月亮的崇拜代表了对本性和自然法则智慧的尊敬；而对太阳的崇拜是与控制自然力量的观点相联系的。当然，阿波罗被定为骑着太阳战车的神。“阿波罗的崇拜者”理智地控制着自然，与崇拜狄俄倪索斯宗派的凭直觉行动正好相反。与无意识对抗的意识力量，母权之上的父权盛宴一起进入到这一神话中。

为什么太阳应该代表一个独立的意识，而月亮崇拜允许对立的共存，这整个的过程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月亮本身会持续变化，人们可以看到它的许多不同形状，然而太阳只以一个单独的、唯一的形象出现。这也许说明了人类的各种感觉能够强有力地从一个事物移到另一个上。不管怎样，随着太阳崇拜宗教的出现，天母的多重性格和外表开始遭受削减。并且一些部分从她身上分离，一些经受了性别的转变。从此以后，女人自身将生活在父权的体系中，生活在男性神学的法律之下，生活在男性公正的“光辉”中。

5

男人与作为母亲的女人的联系确实有两种方式：现



实的与神秘的。他曾经完全地依赖于她。显然地，在所有文化中，女人和男人都是从女人那里了解了爱抚，了解了温柔亲切地嬉戏，了解了需要被满足时的舒适，也了解了需求不能被满足时的不安和痛苦。

布里福深信母性的情感早于交配的本性，并且最早的爱是母亲对孩子的爱。他认为温柔的情感是女性的第二性别特点，它来自于女性有机体的生物学自然进化过程。男人渴望从他母亲身上经历过的温柔。正是这一渴望导致他把自己的性本能按照女人的或稳重或冲动的交配习惯来进行调节。据玛格丽特·米德的说法：

男性天生的性冲动与生殖之间似乎已有学术上的回答……男人的性欲似乎原本并没有什么目的性，只是直接地发泄。是社会让男性渴望拥有孩子，渴望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这些渴望控制了他原始的冲动，并将其复杂化。

父权制以前的生活中，男性儿童在早期把女性生殖的力量看成是超自然的。女人是神圣、力量与创造力的象征。当不再为生存斗争，或是在仪式上明白了(女性的)支配生与死的力量时，父权制以前的男人一定留下了些门外汉的东西。就像米德所说的：“对小男孩来说，他那爱(性)的玩意儿是很明显的——但是成为一个父亲意味着什么？是把某种东西从一个人自己的身体里取出，在

另一个身体里延续。”人类学家利奥·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引用了一个阿比西尼亚女人的评论。她把女人生理上的丰富复杂的天赋与男人的作了对比：“他的生活和身体总是一成不变的……他什么也不明白。”

从性欲和感情的挫败中，盲目的需要和身体力量中，无知中，情感基础上分离出的智慧中，父权制下的男人建立了一个体系。这一体系反对女人自身的生理天性，这天性是人们对她敬畏和她原始力量的来源。在某种意义上，女人的进化被切断了，现在我们无法想象迄今它可能有怎样的发展。最后，我们只有试着把它交回女人的手中。

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是基本的人类关系。在父权家庭的成员中，暴力进入到这一基本的人类单元。女人的意义和能力并不是简单地被严格定义的界限驯化和限制。甚至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当她安全地被禁闭在她的母性一面时，她仍然是个不被信任的、令人怀疑的、让人厌恶的人。并且女人的生殖组织，人类生命的矩阵，成为了父权技术的主要目标。





第六章

血肉之手，钢铁之手

1

女人怎样生产？谁帮助了她们？怎样帮助，为什么要帮助？这些并不是简单的助产术和产科学历史的问题：它们是政治的问题。女人等着她的月经，或等着阵痛的开始。女人躺在手术台上，经历着流产或引产。女人安上避孕环或吞下她每日的避孕药。这些女人都在数世纪印记的影响下做着那些事情。她的选择——当她有选择的时候——必须是在法律条文和专业编码、宗教约束和种族传统之下，她的选择也有可能被这些东西定为非法。从这些东西的产物中，女人被历史性地排除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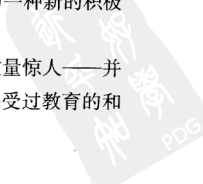
在犹太基督教的理论中，女人的产痛是来自上帝的惩罚（把产痛视为惩罚的观念也能在其他文化中找到），《创世记》中非常清楚地描写了降临在夏娃身上的诅咒。



19世纪时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他们认为生产中的母亲应该经受痛苦。但更重要的是，直到最近30年，人们仍断定她应该顺从地忍受痛苦。在1951年，一个叫阿格尼斯·辛普森的接生婆被烧死在木桩上，因为她试图用鸦片或鸦片酊减轻生产的剧痛。在19世纪，氯仿终于被允许用于麻醉产妇的意识，让她可以完全地被动生产，当她醒来的时候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已经完成了生产。其他人为她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情。在早期的助产术手册中，“自然”要比用钩子和镊子的手术“艺术”显得更明智。但是女人也许会自己学会了解这一过程，并把她自己的方式和智慧融于其中。她自己的本性的和身体的仪器永远不会被隐藏。具有被动受苦的“勇气”是对产妇的最高褒奖。

我开始思考，假设男人逐渐强占了接生者的角色，由此宣称控制范围可延伸到女性力量和魄力来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接生婆和产科医师合为一种职业——顺从地受苦和女人生产体验的原型被看成是一致的。因此顺从地受苦成为一个普遍的、“自然的”女性命运，被带入我们经历的各个领域。直到我们完全明白这一点时，我们才能把自我认识从数世纪“忍受者”变为一种新的积极的生命。

临产时，坚持不想知道太多的女性数量惊人——并不只是贫穷和未受教育的妇女，也有很多受过教育的和



中产阶级的妇女：“把我搁那儿，让我的医生来解决。”在20世纪50年代，我也曾是那些女人中的一员：良好教育，知识分子，对心灵有艺术家般的好奇，认为我的身体是那些“专家”的事情，尤其生产是产科医师的活儿。甚至那时，一部分的我仍不能顺从地忍受，但我把那部分定为“非女性的”，并且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我试着确定自己为一个“女性化的女人”。如果人们要求顺从，那么我应该把自己归为特例。当然，我也曾不信任和疏远自己的身体。然后，在60年代中期，为了能再自如地走路，我经历了一系列关节炎手术，这让我常常经受痛苦的物理疗法。“女性气质”不再是个问题了。不过从那些经历中，我也产生了某些政治观点，关于反抗，关于由忍受痛苦到行动主义的转变，还有关于分析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需要。我随身带着本笔记本，试着研究医院系统是怎样把病人降格为儿童或物品，即使是术后练习这种强烈的想法和决心也伴随左右。最后我明白了，如果我没有生我那三个孩子，我便无法承受被当成一件物品。并且后来我知道了无论是怎样的疼痛，我都可以积极主动地生下孩子。

当我们读生产史时，我们不得不“非常仔细地阅读”当代男人的医学助产史。我们也可以细查那些充满激烈争论的小册子。这些争论是在女接生婆的反对者和支持



者间进行的。不过重要的是知道那些作家很难对他们卷入的修辞学和政治的争斗不感兴趣，并且我们渴望拥有的母亲思想和文献——常常几乎完全被漠视。

2

18世纪医师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这样描述美洲的土著母亲：

自然是她们唯一的接生婆。她们的生产过程很短，几乎没什么痛苦。每个女人在一个私人的小屋里生产，甚至没有一个同性别的人来服侍她。在冷水中清洗自己过后，没几天，她又回到她平时的工作中。

当然，“原始”妇女的分娩没有痛苦或忙乱，然后她们继续日常工作，这概念围绕着很多浪漫色彩。尽管如此，一些自然的事实确实显示了同族的简单文化中的妇女可能比在异族和文雅文化中的妇女经受更短和更容易的分娩。

首先，在最早的人类群体，所有的人都是更矮小，并且小的胎儿更容易被生下来。再者，胎儿和母亲都具有同样的体型。来自地中海的小骨骼女人并没有遇到来自北方高高的大骨骼男人，因此她不必从狭小的盆骨生下一个大骨骼、大头颅的孩子。她从十几岁开始生育，在第

一次月经后不久。她不用等到特定的年纪才能拥有配偶，并且年轻给了她一个强壮的体格和那些30岁女人所没有的灵活性。她的盆骨不太可能因为驼背而畸形——这与文雅文化和更多的室内生活一起随后到来。她不太可能被感染，因为她自己分娩，没人能摸到她体内。此外，她以一个本性的、自然的下蹲姿势分娩，重力会帮助她产出孩子。所有这些对于正常分娩都是真实的。不过，复杂因素——臀部朝下、双胞胎、早产——对母亲或孩子几乎必然致命，因为独自分娩的女人不能操纵她自己和孩子的身体来降低分娩的难度。

从对分娩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在今日，理论上大多数的分娩是“正常的”。接生婆的主要工作是在母亲分娩前和分娩时和她在一起，帮助她排出胎盘，剪掉脐带，并护理新生儿。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在有记载的历史前，大多数分娩也是正常的。

当父亲意识到他的父亲身份时，一些男人也许会在女人分娩时照顾她们。在简单社会中，有很多女人在孩子父亲的膝上分娩，就像在她亲戚的帮助下在产凳上分娩一样。就像一个当代的接生婆宣称的那样，在父权被认识或被理解以前，孩子父亲帮助分娩似乎是不恰当的，事实上，直到今天在许多文化中，一个怀孕或分娩的女人除了她女性亲戚外，其他人是不能碰的，并且男人

是被禁止进入产房的。最常见的是，女人在祖母、女性亲戚或朋友、有经验的女性团体的帮助和精神支持下分娩。最后这些女人中的一部分将被认为是“有经验”和“明智”的。

直到18世纪才有人质疑把生孩子看成是女人领域里压倒一切的事情。只要因为女人直接经历了分娩过程，这看起来便极其自然。即使是在很早以前，男性就有了合理借口来说明为什么应该是这样。例如：一方面我们被告知雅典的接生婆比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医师（似乎非常相似）对女人的生殖器官了解得更多；另一方面，催生行为是在男性医师的“尊严之下”进行的。后来雅典男性让分娩观点符合女人——尤其是母亲，就像斯莱特所表达的——所持有的浅显观点。

雅典的接生婆不仅仅是帮助分娩的人，她们也开春药和避孕药。通过吟唱和朗读咒语来减轻分娩痛苦的女祭司经常和她们在一起。医师是禁止实施流产手术的，不过只有他可以把胎儿不利于生产的姿势调整过来。并且这种限定给了男性执业医生一种特权，尽管它数世纪地盘旋在背景里，仍能在助产术的历史中被找到。

早在公元前1500年的希腊就有了把胎儿不利于生产的姿势调整到脚朝下姿势的技术，以及为了更好地牵引，在生产通道中把头朝下的婴儿倒转过来的技术——这些

技术不是由接生婆或医师实施的，而是由祭师^①。在古希腊，只有当分娩变得确实非常困难时，人们才会叫医师，并且我们被告知把胎儿不利于生产的姿势调整到脚朝下的姿势是由他们掌握的技术实施的。纵观对助产历史性的记录，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正常的分娩是由接生婆应付的，但若有紧急情况，必须召唤男性医师或祭师^②。而事实上，在15世纪的希腊，女人也是不可能成为医师的。但把胎儿不便于生产的姿势调整到脚朝下并不是外科手术，也不是治疗疾病，它是只和产科有关的技术，并且实施这项技术要求观察大量正常分娩过程和具备女人内部器官的知识。很难知道希波克拉底是怎样不可思议地掌握了这种技术，除非他最初是从接生婆那里学到的。

剖腹产手术(通过切开母亲的腹部取出孩子)显然是由印度人和希波克拉底实施的，但常常以母亲的生命为代价(很长一段时间，它成为一门失传的技艺，1500年在西欧被阉猪匠所运用，而不是医师重新发明)。但在难产

-
- ① 最古老的医学论文，埃及的《埃伯斯纸草文稿》(Ebers Papyrus)仅提到分娩一次——据R.P.芬尼(R. P. Finney)的《母性的故事》(The Story of Motherhood)(纽约: Liveright, 1937, 第23页)。——原注
- ② 在公元早期的几个世纪也有个例外，印度的上流阶层妇女即使是正常的分娩也由祭师接生，而阶层低些的妇女由接生婆接生。见哈维·格雷厄姆(Harvey Graham),《永恒的夏娃》(Eternal Eve)(Hutchinson, 1960, 第23页;芬尼,引证,第26—38页)。——原注



时，改变胎位和流产手术带来的痛苦有可能比分娩本身的痛苦更剧烈。在很多文化中，对助产士“挤压”腹部都有记载（像挤牛奶一样迫使孩子出生），直接往下面有胎儿的腹部踩，或者用布紧裹母亲的身体，以强迫生产。如果她的阵痛不明显，她也许会被“摇晃”，或被吊到树上。数世纪以来，钩子不断地用于取出碎胎——一种被称为“破坏性产科”的手术，包括颅骨切开术、碎胎术、钩子提取术和截肢术。

无论这样的分娩如何频繁，只有那些看见过、经历过或听到过它的女人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很早以前，分娩的过程——世上最自然不过的过程——开始带有恐惧的文化色彩，尤其带有一种特殊的惩罚色彩。在一些文化中，如果晚产的婴儿被定为是邪恶的，或是被魔鬼附身的，这样的婴儿会被处死，有时连母亲也会有同样的下场。因为怀上这样的孩子已足以对她进行判决。

在古罗马，有三种接生婆：助产接生婆、她的助手和为分娩成功祈祷的女祭师。以弗所的索拉努斯，公元2世纪的一位医师，为接生婆们写了一篇介绍助产方法的论文。很难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的有关知识，因为男性助产士是不会出现在正常的分娩过程中的，除非他是从接生婆那里得来的知识。但是写书的不是女人。并且作为一门技艺的接生的真正发展史，被男性产科学完全从历

史中抹去了。只有在中世纪以后，当男性势力和男性为控制产科学的斗争开始起步时，我们才开始听到这一医学分支里的“英雄”，确实有一些英雄男性努力拯救分娩中的女人的生命，但是那些伟大产婆的名字却几乎被遗忘。

3

西方基督教的建立对分娩有着自己的影响力。对于医学研究的两大经典来源——希波克拉底和盖伦（Galen），教会更偏向盖伦，并不是基于他的科学而是他的一神论。盖伦教导说手术和医学无关，手术只是一门技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因此只需要一个最强壮的胃和某种野蛮的自信。在需要产科手术时，是由“理发师和阉猪匠”来实施的。在中世纪和往后，助产不管怎样都被看成是一门不洁的行业。教会神父们的厌女情结把女人——尤其是她的生殖器官——看成是魔鬼的化身。她的生殖器官参与了分娩过程，所以男性被禁止在分娩时出现。产婆被告诫，她应该关心的不是母亲的舒适和安宁，而是婴儿的洗礼——在子宫里，如果必要的话，用装满圣水的注射器。在适当的三思后，产婆和阉猪匠被分为一类，两者都担负着必要的但被贬低的职责。无论如何，她，并且只



有她，而不是牧师，可以进行洗礼——因为一个婴儿可以被诅咒杀死，只有当它无法存活的时候，人们才会去找牧师。

不管怎样，男医师对女性器官的认识都有相当的局限性，因为教会同样禁止解剖尸体，因此一般而言，这抑制和阻碍了解剖学的研究。所以在数世纪里，关于怀孕、分娩过程、女性身体结构和催生方法的知识，都完全是由女人收集的。一直到15世纪，绘画和雕刻中都只有女助产士的身影。直到17世纪，我们才找到男助产士出现的场景。他出现的时间是当男性医学行业开始控制治疗的实践，拒绝女性和那些长久以来在穷人中工作的人拥有“专业的”地位。他最先出现在宫廷里，侍候上层阶级女人。很快地，他开始宣布产婆是下等的，并且把她的名字和肮脏、无知、迷信联系在一起。

在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和迪尔德丽·英格利希(Deirdre English)经典的小册子《女巫、产婆和护士：女性医治者历史》里，她们追溯了医学行业男性精英的崛起。他们是在对女性医治者的压迫下，在数世纪对女巫的追查、迫害和谋杀下出现的。数以百万的被认为使用巫术的人中，被处决的有85%是女性。她们被套上各种子虚乌有的罪名，从诅咒男人的生殖器消失到给邻居家的母牛带来死亡。不过有智慧的女人、医治者和

产婆尤其成为女巫追查者们的目标。我已经举过那个英国产婆被处死的例子，因为她给分娩的女人用了减轻痛苦的麻醉剂。并且更多的产婆被指控在魔鬼的驱使下，使用“异教的”魔力和咒语。在美洲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产婆常常被投以怀疑的目光和被指控使用巫术。

安妮·哈钦森的例子是很有教育性的，因为它阐明了美国清教徒产婆在各个层面上都被看成是可怕和危险的。“所有信仰者的神职”这一教条和清教徒作为上帝的传达者对个人意识的强调，似乎鼓励了女人和男人一样自由地思考。但事实上，男性神学和男性行政站在了女人的个人意识、心智和上帝之间。男人被分配了阐释上帝“不可知的万能”的任务——尤其是他的诅咒和救世。然而为了男人能去解决承诺的神学问题，女人必须投身于对“世俗问题”的处理。简而言之，就是待在家里并且远离男性神学的地盘。上帝通过男人向女人显现。本·巴克·本菲尔德(Ben Barker-Benfield)认为16世纪新西兰妇女经历了不安、挫折和无能，生活在对上帝意愿的一无所知和不能参与男性对那种意愿的阐释的双重压力下。这使得女人成为杀婴犯、企图谋杀者、自杀者和“完全绝望者”。更多其他的斗争的声音，摇撼着男性教士政治。

安妮·哈钦森也曾是个助产士，她是个很有思想的女人。即使不是她的仰慕者的温斯洛普执政官(Governor



Winthrop)也把她描述为“不逊和激烈的姿态,口齿伶俐,比男人更大胆”的女人。她在波士顿开设了一个课堂,由60至80个妇女组成。她们每周见面,讨论各种教条和阐释《圣经》。就像巴克·本菲尔德的认识:

通过这个实际的女性专有领域——产科护理,安妮·哈钦森指出了在她班里讨论过的关于需要的范围和成分。这已足以促使一些女人谋杀她们的孩子。女人变为产婆,生命向前的助手,与独占精神助理的男人完全相反,他们令人窒息地对待自己和孩子……(执政官)温斯洛普看到了哈钦森入侵男性秘密的要求与她在分娩中的角色间的密切关系。

生育当然和性事紧密相连。人们相信清教徒产婆提供春药,使得女人能控制她男人的性事(另一种想法是认为女巫施魔法带走男人的阳具)。约翰·科顿(John Cotton)把那个“淫秽心灵的女人社团”——哈钦森与其他女人一起讨论教义的团体,看做是在领导滥交。如果清教徒社会男人统治的教士政治改变了,即女人变成人类与上帝关系的思考者和规则制定者,结果就是纯粹的混乱与兽行。因此,产婆挑战宗教教义时,她那对生命本身的强大的专职和力量变得十分可怕。她成为了一个女巫。安妮·哈钦森并不孤单。第一个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被处决的人是玛格丽特·琼斯(Margaret Jones)。她是个被定

施巫术罪的产婆。并且另一位主妇哈金斯(Hawkins)，哈钦森的产科同事，也被指控“与魔鬼沟通”。

纵观历史，似乎很明显只有很少的职业对女人开放，产科肯定唤起了女人的智慧、能力和自尊。艾伦瑞克和英格利希认识到女巫的许多根本上的治疗方法和提议都是“纯粹魔法的”，并且起了作用。她们指出了中世纪晚期巫术疗者和男医学者的一个重要区别：

……女巫是经验主义者。她更多依赖自己的感觉，而不是信仰和学说。她不是持被动的宗教态度，而是主动地询问。她信任自己解决疾病、怀孕和分娩的能力——无论是用药物还是魔法。简而言之，在她的时间里，她的魔力就是她的科学。

在中世纪末期，没有与教会教义起冲突的医学培训，而且几乎没有我们能真正称为“科学”的东西。医学学生……花费数年学习钢琴、亚里斯多德和基督教理论……而一个学生、一位医生几乎见不到任何病人，而且没有任何的实践……面对病人时，大学训练出来的医师，除了迷信外，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这就是当魔法疗者由于成为拥有“魔力”的实践者，而被迫害时，医药“科学”的状况。

19世纪晚期，人们才知道消毒。之前人们对疾病通过细菌和脏手传染一无所知。肮脏在所有的医疗中出现——真正的肮脏，而不是男人加在女人身体上的厌女性



肮脏。照料分娩中女人的产婆要比医师携带更多的病菌。

不过围绕在女人分娩时的厌女情绪有很多种形式。《曼科德的出生》遭到了许多反对。它是关于产科的，原文是拉丁文，在1540年被译成英文，很可能是因为普通人不懂拉丁文。下面是对它的一些争论：

事实与那些侮辱……母亲身份……的粗俗言语并不相符，越多的男人读到或听到它，更多的憎恨和厌恶就会伴随女人。每个男孩和恶棍就像阅读传奇一样阅读它。

简而言之，女人的身体只能让人厌恶。并且对女人的这种肉体厌恶——尤其是对她作为母亲的角色——理所当然地被当成男性的特征之一。

古代的医师总让产科处于他的威严之下。并且在基督时代男性行医者是禁止进入产室的，因为那被认为是有损他男子尊严的。医学的历史学家们一再地重申只有当男助产士或医师完全取代女助产士时，产科学才能前进。荣格断言：“产科学知识的倒退是女人完全垄断这一行业的直接结果。”另一个产科历史学家下意识的看法是：“也许甚至今天产科的医学实践也赶不上其他学科，因为从一开始它就产生于女人之手，并且数世纪以来被看做是不适合男人的职业。”尽管如此，正如艾伦瑞克和英格利希指出的，在很多方面，女人比男人更懂科学。她们了解女性结构，而男人不知道。她们不仅比男人更多地实

施身体手术,并且自身体验它们。当然,隐藏在以上引用的话语中的意思就是:只有男人才能成为医师。

4

产科开始进入男性领域,通常我们认为从1663年,一位叫布歇(Boucher)的宫廷医师那里开始的。他是路易十四的宠妃路易丝·德·拉·瓦利耶尔的医师。很快雇佣男助产士的时尚在法国上层阶级蔓延开来。就像一位历史学家率直地表述的:“一小部分被公认的在这一行很有资历的医师很快就发现自己被王室和财富所围绕。他们对突如其来的好运也非常吃惊,迅速地专注于产科实践中。”当然,他们也专注于能付好价钱的人。

至少有50年的时间,男医师利用他们的特权去发现他们的专业中尚不为人所知的技术,因为那时只有女巫和有智慧的女人拥有知识。1551年,昂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é)写了一篇关于产科的论文,论述了他对把胎儿不利于生产的姿势调整到脚朝下姿势的技术的看法。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种技术在医师中失传时,是否产婆们仍在使用它。无论如何,帕雷使任何懂本地法语的人都能了解它。在16世纪的最后十年,医学人员在马尔堡偶然发现了麦角的功效。它是一种发现于枯萎的



谷物中的菌类，数世纪以来女巫和产婆们都用它帮助分娩和加强不明显的收缩反应。女性治疗者在她们的护理中，长期观察了这种温和毒性的麦角对女人分娩的影响，并且指出，这种物质在几分钟内就会对分娩产生作用。现在马尔堡的医师们认识到了“女巫”治疗法的价值。

男助产士所写的书一般都和荣格所说的奥伊夏尔斯·勒斯宁(Eucharius Rösslin)一致：“他的作品大部分是转述和他联系的产婆们，来自她们的标准权威和信息碎片。所以他自己的知识是很有限的，他用以举例的胎儿和子宫的木板插图完全是错误的。”直到17世纪，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才发现了血液循环，并通过自己的解剖和观察描述了妇女的生殖器官。

第一位伟大的产科女行医者——“伟大”是指她不仅训练其他女人(和男人)，并且写了三本关于产科的书——是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她嫁给了一位外科医生，本人就是位母亲。她的丈夫曾由昂布鲁瓦兹·帕雷训练。当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她对产科产生了兴趣。她不仅从丈夫那里，也从他那著名的导师那里接受了指导。随后，她获得了助产执照，既在王宫，也在巴黎公立医院进行实践。在巴黎公立医院，她领导了对助产士们的培训，并且教导产科医生进行外科手术。她关于助产的作品《观察与变化》最先出版于1609年，被翻译

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她也出版了关于她曾护理过的玛丽·德·梅德西斯(Marie de Médicis)的产期记录。后来，她发表了一系列信件似的作品，致“我的女儿”——女儿或年轻的助产士——她劝导助产士们尽可能少地收取贫穷家庭的费用(“因为即使很少的一点，对他们来说都很多了”)，并且也应该为无法负担费用的人提供帮助。她的道德感和敬业心是非常高的：

学无止境，并且要懂得谦逊，因为自大是不可能赢得那些知道秘密的人的心的。一辈子也别冒险使用那些别人叫你使用的药，无论是对穷人还是对富人，除非你非常确定它的疗效并且确定无论是服用它，还是敷在身上都是无害的。不要隐瞒你从医师或是产婆那里得知的药物，以免沦为那些吹牛者。他们在不同病例中，都只知道使用一种药物，并吹嘘说会有惊人的成效，其实他们所做的不过是隐瞒自己的实际水平罢了。

那些年代中，女人生命的消逝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在消毒法被发明和解剖学尚不完善前，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都很高。但许多是能避免的，如果我们记得一个怀孕的女人、一个分娩的女人的痛苦并不同于一般的疾病。产婆对药物和手术的无知，另一方面医师对女性结构和助产技术的无知，这又是不可避免的。他们都是约定俗成的厌女情节的结果。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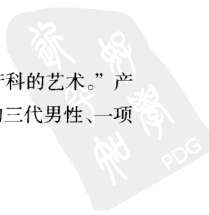


婆的成就要么被“好学”的科学家们以论文的形式偷窃或复制,要么被当成“异教的巫术”、“老太太的谣言”来对待,并且贬低她们的自尊。就像哈维的朋友珀西瓦·威尔吾伯(Percival Willughby)在他的《对产科的观察》中写到的:“自信高傲的产婆们,再不会试图保持她们的信誉和掩盖她们的无知。”

数世纪以来,产婆都在她的姐妹中使用她那“被贬低”的技能,但她的效力随着上流社会行医者的增长而减退,女人不允许在上流社会行医的。这是曾接生过千百万婴儿,并帮助千百万女人分娩的女性血肉之手,这双手随后使用工具在产科实施手术的可能性被否定了。男性的“钢铁之手”——产钳——曾经并且仍然经常带着机械性的野蛮和漠不关心催促一个正常的分娩。这导致了婴儿的大脑受损和母亲的器官穿孔,两者都是完全没必要的。在男性统治社会里,即使是最有才能的女行医者也被男性的偏见和力量所怀疑并拒之门外,这无疑是极大的浪费和损失。

5

“产钳比任何其他的工具更能代表产科的艺术。”产钳的历史非常特殊,包括了一个家族中的三代男性、一项



科学发明的商业开发和通过对那项发明的男性垄断有效地对产婆的取代。

得从 16 世纪晚期一位名叫威廉·钱伯伦 (William Chamberlen) 的雨格诺教徒说起。他为了躲避法国天主教堂的迫害移民到了英格兰。这位钱伯伦有许多儿子，其中有两个同是男助产士，都叫彼得 (就像王室一样，他们被称为彼得一世和彼得二世)。这两位彼得在人们面前表现出来的是粗鲁、“轻率”和反体制的想法。所有的助产士都知道他们，并且彼得二世还被医学院正式谴责过，因为他试图建立一个有证件的公司形式的助产士组织。我们很难了解最终助产士因此被组织成一个独立的团体，还是他们被希望成为彼得二世的跟随者。不过很清楚的是，这两位彼得以及彼得二世的儿子 (真是混乱，他也叫彼得) 都与医学院对抗。经过更多的调查之后发现，他们都为王宫服务过。实际上，彼得三世在海德堡、帕多瓦和牛津学习后，拿到了他的医学博士学位，由此为家族带来了无可置疑的名声。

钱伯伦一家并不是简单的浮华和上流，他们有他们的秘密。一个秘密仪式和他们一起成长：他们去解决难产的问题时，总会坐着马车去，两人抬着个雕花的大箱子，里面的东西没有其他人见到过，甚至由他们接生的女人也被蒙骗了。他们在难产接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一家庭秘密几乎被隐藏了将近一个世纪。箱子中的东西包括三种器具：一对产钳、一个可以抓住胎儿头后部的控制杆和帮助拉出胎儿的带子或细绳。它们被用于牵引不正常胎位胎儿的生产。讽刺地，虽然那些器具在很多年里确立了钱伯伦一家的成功地位，在彼得三世的儿子——休·钱伯伦(Hugh Chamberlens)的试验中却失败了。他继承了家族传统，同样是位男助产士。他试图把这一秘密卖给饱受赞美的法国医师弗兰西斯科·马里切奥。马里切奥让他挑战一个看起来毫无希望的病例。分娩的病人是个矮子，脊椎发炎，骨盆畸形，那是她的第一个孩子。钱伯伦失败了，马里切奥也在天价面前停止了对秘密的追逐。

钱伯伦是个非常自负的人，他并不承认失败。在为马里切奥的产科教材的英文翻译版本写介绍时，他提醒读者们那个著名的法国人并没有掌握“那个秘密”：

我的父亲、兄弟和我自己(正如我所知道的，在欧洲再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在上帝的保佑下长期以来我们致力于帮助妇女分娩，对她们和她们的婴儿丝毫没有任何偏见，但他们……如果要完全避免伤害，其中之一，或两者必须承担钩子的风险。

从钱伯伦的言语中，我们听到了即使在知道成千上万女人和孩子能被拯救的情况下，也沾沾自喜、自鸣得意

地准备牺牲他们的生命，并用“上帝的保佑和我们的事业”为之辩护。代表了产科技艺，发展产钳的人从中获取了不少暴利。

信守他们的原则传统，钱伯伦一家最终把他们的秘密卖给了一个荷兰行医者。当他们收到他们的钱时交出了那个秘密。但他们玩弄了那个荷兰人，只向他提供了半个产钳。让·帕尔菲勒(Jean Palfyne)是位比利时的外科医生。或是通过看到的卖给那个荷兰人的那部分，或是通过钱伯伦仪器的那些流言里，他对整个仪器进行了推测。1721年，他的再创造发表在了《巴黎科学学会》里。用哈维·格雷厄姆的话，它包括：

……两个有木把的大匙状物。它们被称之为铁手，当然是被设计来抓住婴儿头部的粗糙的人造手。它们源于多年来用于清理碎胎手术后胎儿碎片的匙状物。最重要的不同是它们的弯度与手柄。早期仪器的长轴是直的。既然从子宫到阴户的产道有很大的弯度，那么具有相应弯度的仪器显然可以更深地进入身体，并且远比任何直的仪器有效。

钱伯伦产钳的真正设计——在三代人的严密垄断后——终于被外科医生兼助产士的爱德华·查普曼(Edward Chapman)找到了。1773年，他在他的《产科进步集》中描述了这一设计。从那时起，产钳成为了产科所有男性——



几乎没有女性——行医者的工具。

6

随着钱伯伦仪器装置的公开，一场产婆与外科医生之间的公开争斗爆发了。审视双方在表面和理论上的争论时，在头脑中理清几点事实是很重要的。和内科相比，外科手术被认为是一种更低级的技能，并且外科医生并不是接受过全面训练的医师。此外，我们必须摆脱我们与事情不符的印象：一边是经过严格训练完美无缺的男产科医师，身穿朴素的长袍，戴着口罩和手套；另一边是肮脏的乡下干瘪老太婆，带着她那个魔法袋子喃喃自语。那时感染和消毒都不为医师、外科医生和产婆所知。19世纪晚期，医学博士约翰·利科(John Leake)在他的产科论文中为产科护理的试验和认证辩论，他认为它们“应该与医学和外科手术的其他分支一样平等对待。无论是男是女，我们都不应该看到无知和一知半解的行医者在城镇在乡村跑来跑去”。男医生的爱清洁程度并不比同时代的人要高，并且也没有证据显示医生普遍比产婆细心。对正常分娩的接生，产婆远比外科医生或医师要有实际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她在产房中感受到了传统和性别同情，而男行医者即使在手术中也没有，但情感仍然在

厌女情结传统的乌云下, 如果不是非常紧急的情况出现在产房中,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罪恶。最终由一些男行医者, 如法国的朱利恩·克莱门特(Julien Clement)和英格兰的约翰·利科(John Leake)建立了切石术在分娩女人中的受欢迎地位。产婆们使用的产凳或直立的姿势仍普遍地被排除在西方文化和西药盛行的文化之外。目前在北美和南美, 对产婆这一职业的反对势力又开始复苏。

在这场斗争中, 产钳是男性的武器, 但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同样热衷于它。利科这样警告世人: “与医药或手术的其他东西相比, 病人的安危更直接依赖于手术实施者的技术。” 在他对产钳用途的说明中, 他指出如果使用这一工具时太用力, 很有可能伤害阴道和膀胱, 甚至会撕裂两块耻骨。产婆们甚至更加公开地反对使用产钳, 很快许多人开始撰写小册子来捍卫他们自己的方法。德国的(Justine Siegmundin)和英格兰的莎拉·斯通(Sarah Stone)和其他反对者一起反对对仪器的滥用。斯通也要求建立产婆这一行业的规章制度, 所有要进入这一行业的人必须经过几年的学习和训练。同时, 钱伯伦产钳得到了他人的改良, 尤其是法国的安德烈·勒夫雷特(André Levret)和英格兰的威廉·斯梅利(William Smellie), 两人都是外科医生。伊丽莎白·尼赫尔(Elizabeth Nihell)毕业于神院助产学校, 1760年, 由她出版的《斯梅利》对男助



产士进行了攻击,也是最详尽、最猛烈的攻击之一。

尼赫尔的论文《产科艺术》在女性主义辩论历史中绝对占有一席之地。它从女人天生对接生的耐心、技能和天赋的角度出发,强烈地反对使用仪器。她指责外科医生用产钳贸然迫使分娩,缩短生产时间是为了自己方便或为了实验目的。她承认自己缺乏使用仪器的经验,但她阅读了勒夫雷特和其他人对使用仪器的描述。她坚称在神院助产学校学习期间,尽管每个月有500到600个妇女在那里分娩,她从未见过非得使用仪器的情况。她把女性结构知识引导下的双手视为最合适的“仪器”,而把男外科医生的专用产钳视为一种先发制人的工具。

我承认尽管有对她们专业把握十足的助产士,但数量可谓是少之又少。她们只不过……很接近男助产士的水平,不同的是……她们不会像男助产士一样造成许多实际的伤害……他们没那么温柔,并且更加急促地用他们的仪器工作。一个好的助产士的技术和能力应该……更加有效地同时拯救母亲和孩子,但他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先救母亲。

她的三个主要论点如下:

一、男性进入产科,并不该有“先拯救谁的争论”,因此不值得存在“正派和高尚的……牺牲”。这里也许使用了清教徒的观点。

二、男人通过“诬陷女人无法胜任”和“那些谋杀性仪器的必要性”替自己闯入这一行业辩护（似乎过去所有的产科仪器都承担着一种耻辱，总和破坏性的钩子、刀片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同样也知道产钳本身经常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使用，并且在粗心或未经过训练的双手下，它会变得具有破坏性）。

三、外科医生们自己对哪种仪器更适宜也有不同意见，虽然他们把“众多女人和孩子的生命和肢体”像实验物品一样使用。

尼赫尔并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创造一个指向所有方向的论点。不过她声称一些工作“自然地”更适合女人：针线、铺床、腌菜、做蜜饯——在名单的最后，她无意中跳过了接生。女人，她继续道，当然不会被鼓励去击剑学院。另一方面，神院助产学校对助产士的专业精神令她颇为自豪。在那里的高层中有一位女性，并且那里也教导女性成为外科医生——而不只是助手。她把男性对产科的突然狂热狠狠地嘲讽了一番：

……直到男人发现这一技艺有利可图的时候，才把它变得如此高贵……数世纪以来，这一技艺和它所有的高贵都被认为是在高贵性别的实践之下的。它曾被看做是怯懦的、下流的，并且他们差点就声称让他们干那行是不可能的。



当她拿外科医生接生时的方式和产婆们比较时，显得非常果断和有说服力：

在男人自吹自擂的博学背后，你可以看到某种笨拙的生硬，一种没有感情的机械氛围。那清楚地证明了他们是在剽窃别人的技艺，或是为了从那种技艺中获得利益而干自己不在行的工作……（这一描绘显然包含了真理）

在女人那里，即使她们带着所有被认定的无知，你也许也能看到某种机灵和得心应手，尤其是某种发自内心的热诚……那里面有某种惊人的东西存在，如果自然之物能适当地变得惊人的话。一个女人的温柔通常会给另一个躺着的女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她也反复提到产婆对女性身体和正常分娩的丰富亲身经验，这让产科的男学生们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据她所说，斯梅利用他自己发明的一个机器向学生们讲解产科知识。这个机器的组成部分有：

……一个代表孕妇的木人，肚子是皮做的，装满啤酒的囊状物代表着子宫。这个囊用软木塞塞着……在囊中间有个蜡制的玩偶，被摆成各种各样的姿势。

另一方面，她表示在复杂状况下是绝对应该叫医师的。她认为女人没有男人那么骄傲，更乐于承认她们的无知和求助于人。但是“产妇尤其需要及时的护理”和耐

性。她有力地辩论说产钳变成了一个快速催生的把戏，而不是一个用来呵护产妇和解决难产的装置。她不停地重申不应该强迫分娩，即使产婆能用双手减轻分娩的痛苦，并且“有自然赋予的温柔关怀和经验赋予的进步”，也必须允许自然顺从它的次序。她相信次序，并且她感觉到女人比男人更能理解和跟从次序，并最终让我们信任她。男人突然侵入原本留给女人的“低下行业”，我们非常能理解她对此的愤怒和嘲讽。

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产婆试着学习产钳的用法并重新赢得对这一行业的控制？别忘了，领头的专业产婆必须是异常坚强和自信的女人。但是20世纪那样的女人仍和偏见和世俗的阻力战斗，尤其是在医疗和科学领域。数世纪以来，产婆作为巫术审讯的重点目标，并没摆脱18世纪的影响。试想有个产婆小心翼翼地“前进”仍引起了全社会的敌意。产婆们甚至看到了产科中“破坏性手术”的可怕——孩子被从母亲身体里一片片地拽出来，母亲的阴部骨头和阴道被当成器械的支点并且永久性地致残。她们中的很多人肯定能深切地感受到产钳只能是那些强迫生产的工具的浓缩而已。尼赫尔自己写道：

一些，可以说非常少的一部分产婆对那些器械的赞赏，使男人……试着雇佣她们，当然她们至少得像男人一样熟练掌握那些东西。不过她们很快便发现她们从来都

是无足轻重的,并且用这些东西取代双手是很危险的。她们确定用双手进行手术才是更安全有效的,对病人来说也没那么痛苦。

如果让女人自由地使用产钳,尼赫尔还能那样严厉地批评它们的用途吗?也许不会,就像莎拉·斯通,她可能会教导说它们可以被用作最后的依靠,不过得非常熟练和小心^①。她对产婆技术的多面性非常自豪,她们那女性的灵巧“小手”,对她们所护理的女性的真切的“温柔细心”。这些对尼赫尔和其他和他一样的人来说,都使得产钳永远也不会成为产科行业的主要象征^②。

终于,有一个主要的不同来区分产婆和男产科医师。产婆们不仅给予产前护理和建议,并且从分娩开始到分娩以后都一直陪在她身边。她不仅给予了身体上的护理,也给予精神上的支持。而在历史上,男产科医师只有在不能让产婆解决的情况下(把胎儿不便于生产的姿势调整到脚朝下、剖腹产、使用产钳的手术)才出现。与其说他是个顾问、参谋和信心的来源,不如说他是个技师。与其说他是“为”母亲工作,不如说他是“在”母亲身上工作。

① 斯通在她的《完全产科手术》(1737年)中表明,在由她接生的300多个妇女中,她只对4个妇女使用了器械。——原注

② 苏珊娜·阿姆斯记录了当代产婆的骄傲,从加里福利亚到丹麦,她们用自己的双手成功为产妇们接生。——原注

这一不同一直延续至今，现在的产科医生，即使他会在孕妇怀孕期看看她，但常常也是在最后阶段的分娩才出现，有时甚至来不及赶上分娩。而产婆（英语里叫midwife，字面意思是“和女人一起的人”）却在母亲的整个分娩过程中陪伴着她，就像个产室里的朋友和导师。

7

从17世纪开始，持续时间长达两世纪的产褥热和产科里男性数目的增长直接相关（我们应该知道那时消毒、无菌处理、传染、细菌感染还不为人所知。医师或外科医生和那些产婆们的双手都是潜在的细菌携带者。不过与产婆们所不同的是，那些医师或外科医生常常是直接从其他疾病的现场来到分娩的现场，所以传播疾病的几率要高许多。再者，男助产士要帮助许多分娩，总是即时去进行产钳手术，然后去做其他的事情。而产婆和一个产妇在一起，从她疼痛的开始知道分娩结束以后，通常在难产后，还会留下来好几天）。欧洲城市里医院里产妇的得病率——早期只能认为是疾病——达到了传染病的级别。有一年在法国伦巴第省没有一个产妇从分娩中幸存。1866年2月在巴黎妇产医院有1/4的产妇死于分娩。

产褥热曾被认为是一种传染病，并且“传染”是一种

“迄今难以解释的、大气的、宇宙的、全球的变化，有时它们会自我扩散到整个国家”。所有医院的条件都不够卫生——医院是为穷人设立的，他们请不起医生去到家里进行护理。甚至一般中产阶级家庭的卫生大体标准也比那些医院要好得多。那里总是拥挤不堪，尽是肮脏的亚麻布、装着排泄物的敞开的木桶、用过的绷带和随处可见的死亡。

17到19世纪的产科诊所和其他的病房一样，甚至更糟，常常就挨着那些病房。布达佩斯一家新医院的一位调查者在1860年作了以下报告：

……可以看见那些可怜的产妇们，有些倒在稻草上，有些躺在地上，有些坐在木头长椅上，还有些蜷缩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每个人都精疲力竭……你随处可以找到肮脏的亚麻被单和又旧又破的床上用品，几乎都成了碎布片。

据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说，19世纪40年代，在维也纳妇产医院，死于“产褥热”的人太多，以至于医院的人把两个妇女装进一个棺材里，来掩盖实际的死亡率。

产褥热或者产后热曾被误认为是一种致命的血液中毒。在17世纪，威廉·哈维，这位第一个解剖女性尸体和首先观察生殖器官的医师，把产后的子宫比作是“敞开的

伤口”——具有很强的吸收性，极容易受到伤害和感染。任何由助产士之手传播的腐烂的有机物质进入分娩或刚生产完的妇女的阴道时，都是致命的。但数世纪来人们都认为那是一种神秘的流行病，是夏娃诅咒的一部分。女人们明白在医院生产比在家更接近死亡。尽管如此，大多数贫穷的妇女在寻求产科帮助时，还会被要求在公共医院生下她们的孩子。也许有部分原因是需要她们充当教学和实验的素材，就像今天这样。有许多人从医院里逃了出来，而其他的人与其说是留下不如说是在自杀。

同时，这一病症的潜在来源还未被发现，女人在继续死亡——并不是死于分娩，而是死于子宫链球菌感染，这必然和生产过程有密切联系。它杀死了一个我们知道的玛丽·沃斯通克拉芙特和成千上万我们不知道的女人，她们可能的天赋和影响力我们只能去想象了。妇产医院的死亡阴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恐怖，给去生产的女性留下了黑暗的心灵创伤。不安、消沉，作为一个祭品般的受害者的感觉，女性经验的相似成分，这些在女人的孕期和分娩中，变得前所未有的明显。

两百年前，那三个没有选择看得更远的男人身上的漠视和直接的敌意里反映出某种漠不关心和宿命论围绕着女性疾病。直到今天，它们仍旧存在于男性掌握的妇科和外科中。早在1795年，苏格兰医师亚历山大·戈登

(Alexander Gordon)发表了他对产褥热的观察研究报告，产褥热“只出现于那些被接生者接触过或接生过的妇女，或被护士照顾过的妇女身上，这些护士之前护理过已患上这一疾病的病人”。换句话说，这种疾病不是种神秘的流行病，而是传染——通过接触从一个身体传给另一个身体。其他人也确认了戈登的经验，但是给助产士的课本和手册中仍继续没有提及产褥热的可传染性。

大约在50年后，年轻的美国医生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继续了戈登的观察研究。他从自己经历的和别人报告的病例中进行了详细研究。他甚至更加坚定地表明这一疾病是由医师从一个病人带给另一个病人的。他的声明所得到的回应是狂怒，对医师的双手也可能不洁这一暗示的狂怒，因为不洁正能说明长期以来医师都处在产婆的水平。霍姆斯遭受了诽谤和攻击，他被看成是不负责任和寻求轰动的傲慢自负的年轻人。他的论文《产褥热的传染》成为了医学的经典之作，不过那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1861年，维也纳医师伊格纳茨·菲力普·西梅尔威斯(Ignaz Philipp Semmelweis)出版了一本激进和引人入胜的书：《病原学，产褥热的理论和预防》。西梅尔威斯调查了不下五年维也纳妇产医院两个部门的出生和死亡情况（第一诊室全是医师和医学学生，第二诊室全是产婆）。他

发现那些直接在街上产下婴儿的贫苦妇女的死亡率要低于第一诊室。他开始坚信产褥热根本不是种社会流行病，而是和医院有关，尤其是和医师们工作的诊所有关。即使是维也纳的贫穷妇女也知道在产婆的部门比在医师的部门更容易生还。“他们非常惧怕第一部门被轻易推翻，因为那样他们就必须忍受那些让心跳停止的场面：女人跪在地上，挥动着自己的双手来接生，在打败第一部门后，为第二部门寻求入场券。她们非常清楚男人被打败是因为他们不懂行。”

西梅尔威斯被那些痛苦和死亡的景象紧紧抓住了。尽管他还不能捕捉它们的来源，直到他的私人生活出现的那个转折。他去维也纳度假，欣赏那里的油画。在他离开的时候，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也是同事死于进行尸体解剖时留在手指上的伤口。西梅尔威斯听到这个死亡的消息后立刻赶了回去。据他自己的叙述：

科莱特西卡教授……开始由于淋巴管炎和静脉炎而病倒……然后在我离开去威尼斯的那段时间，死于两边的胸膜炎、心包炎、腹膜炎和髓膜炎。并且在他死前，病症转移到了一只眼睛上。我在威尼斯看到的那些医院和科莱特西卡的死亡报告激励了我，使我无法抗拒地要去寻找对这一活跃疾病的定义，科莱特西卡死亡的原因，那些我见过的成百上千的产后死亡的原因。

西梅尔威斯发现那些尸体上的微粒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清洗除去，它们被从解剖室带给分娩的妇女。就像科莱特西卡的伤口吸收了尸体上的微粒，它们像致命的毒药一样进入他的血液循环，所以带有那些微粒的手可以把它们带到子宫里，产生致命的结果。西梅尔威斯号召所有的医师和医学学生在进入产室前，都必须用含氯的石灰对双手进行消毒。很快，第一诊室的死亡率降到第二诊的程度。

西梅尔威斯的发现，他的论证受到了巨大的敌对，以致他被那些有强大政治力量的医师们定为业内的不可靠人士，他们让他在维也纳得不到晋升。不过比起对其他人，他对自己的责备更加严厉：

因为我的罪过，我必须在这里忏悔，上帝知道由于我的错误有多少病人永远地躺在了他们的坟墓里。我接触的尸体要比多数男助产士要多。如果我和另一个医师的说法一样，这仅仅点亮了一个数世纪以来不为人知的真相，显示出人类的可怕结果的真相。

他被迫离开维也纳去了布达佩斯，在一个产科诊所谋职。那里“窗户的正下方是条敞着的阴沟……病理解剖倾倒的废液都流进那里”，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工作，并且看到他辛苦收集的发现被一个又一个国家拒绝，1865年，他被押往维也纳疯人院。在他被关进去的前几天，他

在做手术时弄伤了手。不久他便去世了——和科莱特西卡一样死去，牵系着成千上万妇女的命运。20年后，根据利斯特(Lister)的无菌手术介绍和巴斯德(Pasteur)的细菌感染存在论证，西梅尔威斯对医生们洗手的要求最终被接受和实施。布达佩斯竖立起他的塑像。200年的产褥热走向了终点。生产的麻醉和高技术时代来临了。





第七章 隔离的分娩

1

产科学和分娩的隐喻不断出现在当代妇女运动的作品中。一幅宣传画上的题字是：我是一个给予我自己新生的女人^①。这样的话暗示了一个痛苦的、挑剔的和有目的的程序：创造新生命。不过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实际的分娩无论如何都是没选择余地的，并且只有很少的意识。以前对分娩的预期总和恐惧、疼痛或死亡相联系，所以神学和医学理论中形成了一股迷信错误的风气——简而言之，我们被教导把受害者的挫败感转换成狂喜的成就感。

希伯来书把女人的阵痛看成是对夏娃引诱亚当堕落的诅咒。罗马人把它叫做“poena magna”——“剧痛”。

^① 由时代变革出版社出版，西十四大街 62 号，纽约。



“poena”也可以表示惩罚、报应。古代的作家一次次地告诉我们分娩的阵痛是人类忍受的最可怕的疼痛。1950年，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和维拉·弗格森(Vera Ferguson)在对原始社会神秘的“无痛分娩”的研究中发现，初级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对分娩剧痛的看法是一样的。玛格丽特·米德表示，“无论他们是否被允许观看分娩，男人总是通过表现分娩来参与其中，我见过一个男演员在一部关于痛苦分娩的华丽童话剧中，在地上痛苦地扭动”。南茜·富勒(Nancy Fuller)和布丽奇特·乔丹^①(Brigitte Jordan)报告说，玛雅的印度妇女观察了难产和顺产，不过那些疼痛被产婆和助产士期望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希望丈夫出现在那里，不但是去帮忙，也是去“了解女人怎么受苦。”

一个准备游泳横跨英吉利海峡或攀越新高峰的女人明白她的系统将忍受压力，她的勇气将受到考验，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尽管在这样的尝试中，会有那些对她的心肺、协调性和神经的要求，在根本上，她并不把它视为痛苦，而是看做挑战。大多数女人，无论是否有文化，都带着紧张的情绪去生产，断断续续地产生：神秘感，有时是玷污感，常常觉得有种魔力，像是巨大的折磨或“终极体验”。很少有人把它看成是一种对我们身体的理解和接受，以及发现我们肉体的精神的源泉。



很难去思考痛苦，就像很难思考爱一样。它们两者都和早期生活的交往有关，和进入语言本身的文化氛围有关。不过痛苦也和爱一样植根于母性的意识形态中。它具有如此多奥妙是关于女人的，母亲或者不是母亲的女人，所以我们需要更近地去寻找它的意义。有时人们会尝试把痛苦归为意识范畴(一种对明显刺激的回应)和心理体验。让意识脱离情感，身体脱离心灵，这对我们尝试了解整个女性体验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尤其对一个职责——生小孩。它担负着下意识的个体力量，并且具有强烈的身体意识。

痛苦体验是历史性的——由回忆和期望构成——并且它是相对的。我们能称之为痛苦的东西因人而异，并且遭受痛苦的人会因为痛苦背后的情形而改变对痛苦的定义。在不同文化中，对痛苦的表达也不同。布里福举了毛利和非洲妇女的例子，分娩时不发出呻吟是她们的传统。情感发泄在一些文化中比在另一些文化中更容易被接受。女人分娩时的行为也许反映出情感的一个总方向。

但无论是对母亲而言还是对单纯的女性个体而言，分娩的痛苦是女性和女性关系的痛苦体验的一个特殊中心。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初想法让女人——不仅在分娩时——奉献出自我，或者更糟，封闭自我。我们是否能区分

生理痛苦和疏离感与恐惧？是谁或什么决定了我们受苦的起因、本性和持续时间？不同的文化对此有不同的答案，但是生活在所有文化中的女人都在生育孩子和受苦。

著名的神秘主义哲学家西蒙·威尔(Simone Weil)区分了受苦和受难。受苦表现为痛苦，但会带来成长的光明；受难是受压迫的人的情况，奴隶，集中营里的受害者，他们被迫一趟又一趟拖着沉重的石块穿过院子，永无止境，漫无目的。她反复说明痛苦是无法捕捉的，并且反对让人们不必要地受难。但是无法避免的一点是，痛苦可以转化为某种有用的东西，某种让我们超越有限的经验本身，到达更远的生活本质和与我们同在的可能性。她一遍又一遍地把纯粹的受难等同于没有力量、等待、孤立无援、迟钝，一个受他人支配的人的“不完整的时间”。这一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阐释了女性的情况，尤其是分娩的经验。

威尔对集中营的观点也正好是对被迫劳动的观点——劳动较工作而言，具有一个真正的目标和意义。生孩子的劳动就是被迫劳动的一种形式。数世纪来，大多数女人没有避孕的概念，她们背负着《圣经》上对夏娃罪过的诅咒进入产房。随后，19世纪，消除“痛苦和阵痛”的可能性，为女人带来了一种新的枷锁——没有意识、感觉麻木、记忆缺失、完全被动。女人可以选择麻醉，并且许



多第一次这样做的女人是有意识的选择，甚至是大胆的选择。不过对疼痛的避免——心理或肉体的——是种危险的机械运动，它能使我们不仅丧失疼痛的意识，并且丧失我们自己。并且，在生孩子这件事上，疼痛是贴在所有分娩感觉之上的标签，是简化女性个体身体经验的复杂性的标签。

2

父权制告诉分娩的女人她的痛苦是有目的的——她存在的目的。她带来的新生命(尤其是男性生命)是有价值的，并且她自己的价值就依赖于把它带到世上。生殖的意义在于：没有它，城市和殖民地将不能扩张；没有它，一个家族就会灭亡，并且它的财产将会移交到陌生人手中。她发现自己处于目的的中心，并不是她自己的目的，但她却常常使之纳为和变成自己的目的。产妇可能会认为自己为军队带来保卫部落或国家的新士兵，为上升的农民家庭或中产阶级家庭带来一个新领导者，为她父亲的信仰带来一个新牧师或拉比，或带来一位负担生活的新母亲。有这样的目的，生育让她一年接着一年身体肿胀，痛苦不断袭来，随着这一最后的价值她将毁掉自己。她也可能预计到她的怀孕和分娩也许会毫无意义：孩子

可能无法被养活，或者孩子在出生时窒息而死。那些都是浪费掉的生命。

在20世纪，西方开始盛行对浪漫爱情的崇拜，有另外一个元素进入到围绕着生育的感觉和态度。贵族爱情传统在对待婚姻是什么的问题上，看得很透彻：一种财产的巩固，并且伴随着一系列的真实感情、力量、激情之爱中膨胀的鲜活能量、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关系。为卷入激情之爱的男人生育孩子变成是为了表明那场爱情的独特性，并且为这场爱情带来了一个实体的成果。私生子被认为是异常有活力和生气的。他们来自激情力量，而不是无聊的、义务的婚姻。因此，这个孩子不仅是这一秘密爱情的产物，并且是情人放在女人身体里的一种联系。他也许会抛弃她，他们也许被命运拆散，但她会继续通过“他的”孩子——尤其是儿子——占有他。骄傲地生育一个“非法”的孩子并在社会舆论下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是女人无视父权的一种非常方式。《红字》中的海丝特·白兰(Hester Prynne)用针线为女儿珀尔做出华丽的衣服，并给自己绣上“奸妇”的标签，这就是一种蔑视的姿态。生孩子，也是痛苦的、危险的、无选择的，不过它同样可以转化为一种目的，一种通过女人身体坚持她本质的自我宣布的行动。

意识到自己创造了一个或几个必要的人，完成了作



为女人的使命，对接受或拒绝母亲身份的20世纪女人来说，仍有许多未被弄清的一系列持续的情感。20世纪，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也许会反思她母亲的生活，或试着在社会中创造一种自主的生活，在这个把生殖视为她命运的社会中，找到充分的理由来告诉自己必须做出选择：母亲身份或自我意识、母亲身份或创造力、母亲身份或自由。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女英雄玛莎·金奎特这样表述：

……把一切都看得很明白。俗话说“养个宝宝”是每个女孩对第一个孩子的想法，其实它只是掩盖真相的一个面具。没有什么比让人看见一个麦当娜那样的女人怀抱着一个无助的婴儿更吸引人的了。人们所没看到的是每个人试图隐藏的东西：一无是处的中年女人，她唯一的贡献就是生产出了两三个普通乏味的公民，而世界已经挤满太多这样的人。

玛莎不仅认为这个世界“太满了”，她还坚持认为孩子是以自我为结果的。对贫穷家庭的多产的女人来说，孩子可能被认为是灾难，像“身边的敌人”一样。在科拉·沉岱尔的《艾伯塔与弗里德曼》中，穷困的年轻女作家艾伯塔怀上了她情人的孩子。她向她的艺术家朋友丽舍尔坦白道：

“只有今天我想我能让我的作品有所起色。”她也是

在对自己说，“我有了强烈的写作欲望，不过是和以前截然不同的方式。”

“哦——”丽舍尔摆了摆手，“正是它发生的时候，正是当我们认为我们开始得到某样东西的时候，它就会来打乱一切……”

无论是本能的、心理的还是文化的，都会有种需求，一种与灾难同时到来的需求。艾伯塔开始注意街上带着孩子的母亲们。

她们找不到人照顾他们，他们从早到晚都让她精疲力竭。为了这些小东西，她只能忘记其他任何事情，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他们。艾伯塔的内心开始躁动了。她想：“我还没准备好，我还没干成任何事。我必须只为别人着想，甚至都不看看其他的方向吗？同时，她很吃惊地发现，母亲身边的小家伙们是如此之多。她本能地朝他们那幼小的、裹得紧紧的脸投以一瞥……”

终于，她看见了一位在流动演出帐篷里和孩子在一起的非洲母亲。这位母亲注意到艾伯塔怀孕了，默默地冲她微笑点头。

她第一次不带蔑视和冷酷地感到自己将成为一个母亲。即将到来的敌人是一个光溜溜的小家伙，只有她能



依靠和信任。对他的无限柔情涌入她的心中和眼中……

自我保护和母性情感冲突的深奥性是可以被体验的——我就体验过它——非常痛苦的体验。体验的一部分就是生孩子的痛苦。

最终，经历了自己母亲毁灭性力量——无论有无正当理由——的女人，有可能担心自己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毁灭性。在任何情况下，分娩女人的母亲，无论是好是坏，是活着还是已经去世，都是萦绕在产房里的一个强大的幽灵。

3

在这个世界上，某种强硬的态度围绕在怀孕和分娩周围。没有任何地方理所当然地对待孕妇。她也许被看成是丈夫生育能力的证明，看成是对庄稼或男人的威胁，看成非常容易受坏人或其他邪恶影响攻击的对象，看成一种困窘，看成是药罐子^①。这些态度在分娩本身那里达

① 在我自己的第一次怀孕期间，新西兰的一所历史悠久的著名男子私立小学邀请我去朗诵诗歌。当负责邀请我的人得知我有七个月身孕时，取消了邀请。他说由于我有身孕，那些男孩们不可能静下心来听我的诗歌。那件事发生在1955年。

到了顶点。不同文化中，人们对正常分娩和母亲在正常分娩中的反应的不了解，是由于以前女人总是很少观察女人的反应，并且男性人类学家总被排除在分娩之外，除非是允许男性（比如医生或牧师）介入的非正常分娩。尽管如此，在所有文化中，分娩的女人还是有许多共同的情绪反应。

格兰特雷·迪克-瑞德(Grantley Dick-Read)是提倡“自然”分娩的早期改革者，他在分娩的恐惧、不安和疼痛中，鉴定出一种动力。恐惧占了很大一部分。女人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首先是对未知的恐惧。她一直都在听人说“女人如何受苦”的故事。她也许亲自护理或看到过分娩。最重要的是，她会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充满力量，自然而然地收缩，几乎有被侵占的感觉。我们历史的多数时候，没有教女人把那些定义为“收缩”，产婆、医师、牧师和母亲把那些描述为“疼痛”，甚至描述为惩罚。女人也许会简单地认为是疼痛侵入了自己，而不把它看成是一种功能性的身体过程。不仅社会让她预计到痛苦，分娩过程的神秘也带给了她恐惧。弗里德曼(Freedman)和弗格森(Ferguson)对分娩的研究，除了以上的观点外，还包括了来自有可能“致残和死亡”或生怪胎的念头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总和对未知的恐惧紧密相连。

在许多文化中，人们相信分娩的妇女，就像怀孕时一



样，极其容易受到神秘事物的侵害。这非常接近把分娩看成是一种疾病的观点。奈尔斯·牛顿引用了巴拿马的库纳印度人的话，他们“把生孩子看成是非正常的，所以母亲在怀孕期间每天都得到医生那里去，他们帮助她持续服药”。同样，在美国医院，经常像做外科手术一样接生，常常把它当成是医疗问题。

视分娩为不洁的观点非常广泛。印度的乡下接生婆们常常是“不可接近”的种姓，并且在印度的某些地方，母亲在分娩时和分娩后的十天都是“不可接近”的。同样，有报道称（在1951年），为了不把坏运气带给别人，越南的妇女在分娩后会被隔离很长一段时间。阿拉佩斯妇女在“满是排泄物和经血，喂猪的茅舍”里生孩子。在犹太人、基督徒和阿拉伯人中，从高加索山脉到南部非洲，都能找到对女人分娩后的净化。牛顿认为（和经期禁忌一起）产后的“不洁”也许至少减轻了女人的日常担子，并且是一个让她不受干扰，平静地专注于她和她宝宝的新关系。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也不得不以肉体厌恶为代价。并且在强烈的身体体验中，对自己身体的反感和怀疑并不是什么让人舒服的情绪。

最后，是性别负罪感的痛苦。在一些文化中，产妇会被强迫招供通奸行为。怀孕和分娩的性别内涵不仅可以导致怀孕期间的羞耻感和困窘，还能导致身体暴露在产

室的负罪感。希拉·基辛格(Sheila Kitzinger)认为,对生出怪物的恐惧,是“内心深处负罪感的具体化。女孩想惩罚自己,通过赎罪,通过从她自己的身体里产出代表她自身邪恶的怪物来摆脱负罪感。”女人性别的负罪感和身体厌恶再次不可避免地联系到了一起,成为世上巨大不安的源泉。

在文明和非文明文化中,都能找到这样的消极看法,这让分娩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根深蒂固的普遍观点是把女人的身体看成是神秘的,易受侵害或带来邪恶的。那些看法对她内心的影响,让她对分娩过程尽可能地无知,或让这一过程变成实际的风险和危险。当代的西方文化在许多方面也受到了这些看法的影响,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对分娩期间的妇女进行隔离。

4

文明或野蛮社会中,对分娩痛苦的恐惧可能是(并且常常是)来自口头传说、警句、逸事,并且被文学性地进行了加工。当我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时,我一遍又一遍地读那些反复描写分娩的小说,试图去想象实际的情形。我没有生孩子的影片或照片来启迪我,不过在我最喜欢



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我找到了从吉娣·列文丈夫的角度，对她分娩的描述：

吉娣的脸发烧，显得很痛苦，汗涔涔的额上粘着一绺头发。她向他转过脸来，找寻着他的目光……

她说得非常快，非常快，还想笑一笑。可是她的脸色突然变了，她将他一把推开。

“哎哟，不得了啦！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快去，快去！”吉娣叫起来。于是他又听到了那种不同寻常的尖叫……

他站在隔壁屋子里，头靠在门楣上，听着从没听到过的惨叫和哀号。他知道这声音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吉娣发出来的……

他忘乎所以地冲进卧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丽莎维塔的脸。她的眉头皱得更紧，脸绷得更厉害了。看不到吉娣的脸。在原来是她的脸的地方，有一个样子紧张得吓人、有惨叫声发出来的东西……恐怖的叫声没有停止，越来越可怕，并且达到了顶点，接着突然安静下来……只听得低低的奔忙声、衣服的窸窣声和急促的喘息声，以及她那断断续续、富有生气的温柔而幸福的声音，低低地说：“全完了。”

《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夫人在分娩的时候可

没有这么幸运：

喊声停止了，又过了几秒钟。隔壁房间忽然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不是她的声音，她不会这么喊叫。安德烈公爵跑到门口，喊声停止了，传来小儿的啼哭声。

……一个女人跑出来，她一见安德烈公爵，就在门槛上犹豫地停下来。他走进妻子的房间。她死了，仍然像五分钟前他看她的时候那样躺着……

当然那些段落都是一个男人创作的，并且是带着父亲的意识创作的。

我曾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到“生活真相”启蒙的年轻女人。我的母亲不像我许多朋友的母亲一样，她用易懂的话向我解释了性交和性的概念。但是分娩过程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我设想是婴儿的头通过狭小的阴道时带来了疼痛。那怎么可能不疼呢？我听说过用“产钳”接生，我把它想象成一个拽婴儿的时候能撕碎母亲的巨大装置。但是疼痛怎么可能在分娩结束之后立即消失呢？公爵夫人怎么可能就“仍然像五分钟前他看她的时候那样躺着”那样死掉呢？是什么杀死了她？一切怎么可能发生得这般迅速？在托尔斯泰对女人经历分娩痛苦的暗示中，有某种让人觉得非常恐怖的东西——“这声音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吉娣发出来的”……“一声凄厉的惨叫，不是她的



声音，她不会这么喊叫”。疼痛袭来时，人们会被它完全控制或丧失人性。

除了仅有的几部小说中对生孩子的描述外（赛珍珠的《大地》是另一个来源），我知道我自己的分娩非常漫长，一直陪伴着我的母亲简直能称做“女英雄”。在我父亲的藏书室里，我偷偷瞄了瞄一本厚厚的、深红色书封的书：《威廉的产科学》。这是接生了我的医师写的一本教科书。在里面的图片中，我没有找到任何分娩的女人的脸，全是关于会阴、外阴切开术的。从中我认不出哪部分像我所有的，哪部分不像。我伸了伸懒腰，那被拉出的婴儿的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像许多年轻女孩一样，我简直无法想象我的身体经历了这样的大变动。

迪克-瑞德说有人告诉他，许多女人尖叫，并不是由于疼痛，而是由于对疼痛的恐惧。她们要求被全身麻醉，以逃避对未知的恐惧。盛行数世纪的产褥热，让死亡幻想在实际的统计上有了一个准确的、毋庸置疑的基础。即使是在母亲的死亡率很低的地方或阶段，一个母亲对她在分娩时死亡的幻想也有着很正确的隐喻。尤其是在父权制下，常常会牺牲母亲的生命来换得孩子，并且她作为一个独立生命的自治权，似乎也注定与这个她将要抚养的婴儿相矛盾。对那些对自己拥有希望、期待和幻想（尤其是当这些希望和幻想从未付诸行动）的女孩，天

母的自我否定、自我毁灭角色(常常含蓄地与痛苦和压抑的怒火相联系)会宣判她们的“死亡”。对一个贫苦女人,或在经济上只能依靠自己的女人来说,一个婴儿的出生可以意味着另一种死亡——仅为生存而奋斗的新责任。

有另一种恐惧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对变化、转换和陌生的恐惧。怀孕有可能被体验为自我消灭,就像一位欧洲妇女在日记中写道:

对我来说,镜子中自己的脸是那样陌生。我的个性模糊了。莫名的孩子气的强烈渴望向我袭来,还伴随着孩子气的反感。我向来是个冷静的理性思考者,但在那时,我的理智模糊了、分解了,泪水无能为力地流了下来,不是我的眼泪,而是另一个无助的、孩子气的人的眼泪。我同时成为了两个人。他在我肚子里活动着。我是否能用自己的意愿控制他的运动?有时我认为自己可以,但其他时候我发现他在我的控制之外。我什么也控制不了。那九个月是小心沉闷的,丝毫没有男人经历的充满信念、兴高采烈的时刻。那时我不再是我自己……然后随着一阵让我认不出是自己声音的尖叫,他出生了。

当然,并不是每个女人都感觉怀孕是“强加”给她的“陌生的事情”,就像这个女人用她自己所说的“平静、理智”感受到的一样。我们可以说她那时的大部分感觉都来自被她的本性隐藏和拒绝的部分。不过怀孕和分娩,



的确宣告了每个母亲生活的巨大改变。甚至是放弃自己的孩子选择堕胎的母亲，在打掉孩子前，她也经历了无法逃避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而选择做母亲的女人，会发现她的生活节奏和倾向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即使在最细小的事情上也如此。长期以来期盼着一个孩子的女人，会对成为母亲有许多幻想和渴望，但是她也必须从熟悉的世界中走出来，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而这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5

产钳和男性对它的垄断毫无疑问把一个新的男性医疗设施附加到了分娩上。佐治亚州的一位医师发现疼痛可以通过吸入乙醚来消除。很快，乙醚和氮氧化物被引入牙科。由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提议的麻醉方法，很快便盛行起来。1847年的苏格兰，詹姆斯·辛普森在一次接生中使用了乙醚，他发现即使产妇处于昏迷状态，子宫的收缩仍然会继续。他继续对减轻分娩疼痛的氯仿麻醉进行实验。神学的反对越来越强烈，牧师攻击麻醉为“撒旦的腐蚀，明显地取悦女人，但最终将让社会变得冷酷，并且让上帝不能及时听到那些真挚的求助尖叫”。解除对夏娃的诅咒威胁到了父权宗教的根基。女人在分

娩中的尖叫声是为了上帝天父的荣耀。女性痛苦的缓解被认为是让社会变得“冷酷”，好像对痛苦的母亲来说（以圣母玛利亚为代表的谦卑的母亲和永恒的痛苦），唯一选择就只能是把男人盯成石头的美杜莎。

在反对堕胎者的说辞中，也能找到这一观点。他们把它扩展到大多数女权主义问题中。败血病让玛丽·沃斯托克拉芙特痛苦而缓慢地走向了死亡。在她死后，理查德·波尔威勒(Rev. Richard Polwhele)自满地评论道：“她的死指出男女的巨大不同，指出了女人的命运，患这种疾病的多数是女性。”

像男人一样，女人也认定女性的角色就是受苦，这与把女人当成母亲的概念不无关系。认为女人的被动受苦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观点，在历史上披上了很多种不同的外衣。不仅有夏娃和圣母玛利亚，还有后来像海伦·德琪(Helene Deutsch)所说的有被动性和受虐倾向的“正常”妇女。如果中世纪的妇女认为自己的每次分娩是为了偿还夏娃的罪过，那么19世纪中产阶级的妇女就可以在家扮演天使和受难者的角色，她的阵痛恰好确定了她的女性气质。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为我们提供了这一说辞的一个版本：

即将成为母亲的女人或是怀抱着她的新生儿的女人，无论是她们给婴儿喂奶，还是伸展她疼痛的双腿时，都应



该异常小心并且充满爱怜。当街上那些流浪者出于同情帮助她那被逐出家门的姐姐时，光明的母性正封印在她身上。法律无休止地报复……让她丝毫没有机会乞求怜悯。礼拜仪式上庄严的祈祷者从生活加给她的严峻考验中带走了她的悲伤，并在她为难的时候，替她找到了借口。

一个女人一生的价值也许会随着她怀孕或分娩显露出来。那些拒绝成为母亲的女人，人们不仅对她们带有不信任的情绪，还觉得她们是危险的。她们不仅拒绝繁衍人类，还剥夺了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力量——让母亲受苦。直到20世纪20年代，人们仍确信：“女人在分娩中经受了痛苦，这种痛苦是她对下一代的爱的最重要元素之一。”

所以，1853年，维多利亚女王在生她的第七个孩子时接受了氯仿麻醉，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她统治期间的真正剧烈震动。她决定反对牧师和父权的传统，以及所有对女性的传统观点。由于她强大的影响力和威望，她的决定为外科手术打开了使用麻醉的大门。

也正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女人的身体变得更加禁忌、神秘，更加被怀疑为“挑剔和混乱的”，还有其他更无知的想法也比以前更多。男性神学建立起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对性的热情是种病态。“关于柔弱女性的神话”萦绕在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妇女的生活中。女性接受教育，被

看成会让女性生殖器官萎缩，而女性的选举权被看成和“在每个国家设立疯人院……在每座城镇设立离婚法庭”一样可笑。阴蒂和卵巢切除手术实施于女人身上，这被认为可以减少她们的“麻烦”、“自杀企图”和“色情倾向”。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格兰、美国，对（上流社会）女人的公开“尊敬”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夸张的假正经。在分娩的开始，女人被摆放成切石术（仰卧的）姿势，被氯仿麻醉，身体变得完全被动。医师就像是在人体模型上手术。产室变成了一个手术的剧场，而分娩是场医学的戏剧，医师是剧中的英雄。

20世纪早期，大量的专门用于分娩的麻醉方法发展起来：“轻度昏迷”，一种吗啡和莨菪碱的混合物被广泛使用，直到它被发现对婴儿有很强的毒性。阿米妥钠和宁比泰镇静催眠药被发现（缓解局部疼痛后）会引发失忆症。关于宁比泰镇静催眠药，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的女英雄在《瓶中美人》中说道：“我觉得它听起来就像男人发明出来的某种毒品。”局部麻醉的发展意味着女人仍能有意识地看着她的孩子出生，尽管她的腰部被固定着。斯裴特（Speert）和葛德玛哈（Guttmacher）在他们的教科书《产科手术》中承认：局部麻醉会延长分娩的第二个步骤，让“子宫迟钝……母亲没法进行主动的努力”，所以，为了让孩子能更快地出生，在没有设备的地方为医师提供产

钳成为“必要”（并没有提到应该考虑到经验不足可能会造成永久性损伤的事实）。

6

在1940年，迪克-瑞德观察到恐惧和紧张能引起疼痛，他开始训练准母亲们，让她们放松、正确呼吸，让她们了解分娩的过程，并且通过锻炼让她们增加对肌肉的控制力。迪克-瑞德也强调了助产士应该冷静、并能给予鼓励，尤其是医师，应该表现为信心和安全感来源的来源，而不是不必要地干涉或促使分娩的人。他认为麻醉是可以使用的，但不能强加给不愿意接受它的妇女或是不分情况地使用。迪克-瑞德的研究会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他的许多评论至今仍有宝贵的价值。无论怎样，他对女人的态度在本质上是父权的：尽管对女人生产新生命的能力非常敬畏，他仍写道：“女人天生的依赖性”让她很自然地依赖于医生。他把分娩过程看成是自然的“狂喜”——“在生物学上，母亲角色是她的渴望，”他写道，“在分娩时，这种渴望最强烈。”对他来说，生孩子是女人的荣耀，是她生活的目的，她体验的高峰。除去恐惧，增添狂喜，分娩可以成为“自然”的事，即没有实质的痛苦。但是男性产科医师仍控制着所有局面。

三四十年代，一些苏维埃的产科医师开始在接生中应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原理。俄罗斯的医生使用催眠方法，让产妇在催眠后的状态下顺利分娩。这导致人们关注“诱导”作为孕期训练的基础的重要性：“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反射将出现在孕妇身上，她们学习生孩子就像孩子学习阅读或游泳一样。”对疼痛的条件反射被改变了，新的反射出现。这种方法被描述为“口头麻醉”。巴甫洛夫观察到：

对人来说，谈话可以产生条件反射刺激，它就像其他任何刺激一样真实……谈话描述了成年人之前的所有生活。它与内在和外界刺激相联系，这些刺激可以到达人细胞膜，向它们传递信息，让它们去极化，因此它能唤起由实际刺激本身决定的所有那些生物反应。

1951年，法国产科医生费尔南·拉马兹 (Fernand Lamaze) 考察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产科诊所，在那里使用着“心理助产法”。他通过在他所就职的产科医院为冶金联盟的成员提供服务，把这一方法引进到了西方。拉马兹比迪克-瑞德走得要远，他强调女人应该积极地参与分娩的每个步骤，并通过有节奏地控制呼吸来帮助分娩。在迪克-瑞德鼓励“意识迟钝”第二步骤，拉马兹让母亲们保持清醒，让她们通过吸气、用力、呼气对助产士的一系列的口头暗示做出反应。苏珊娜·阿姆斯特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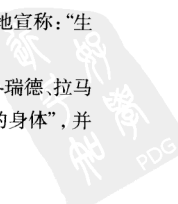


明,不管怎样,拉马兹的方法“有不幸的副作用,女人从身体里感受到的分娩的自然体验,让它转换为被控制的分心”。“当她的身体处于严格的控制下”时,她与“身体分娩时的感觉、气味和眼界分离了。她受到过度地……控制……”

在英格兰,希拉·基辛格的“性障碍”法包含了更广泛的分娩概念,把分娩看成是女人整个存在背景中的一部分。她强调女人必须学会“相信她的身体和直觉”,并且了解她分娩是复杂的情感网络。基辛格坚持在身体和心理上进行分娩教育,让母亲愿意保持“自我、自控、选择的力量,主动做决定,积极与医生和护士配合”。她非常喜欢在家为产妇接生,通常还带着一个助产士。

她自己就有五个孩子。她明确地指出“产痛是足够真实的”。不过她也描述了分娩时阴道打开的感觉:并不是疼痛,而是一种力量,并且常常是愉悦的。她对女性实际情况的认识要比迪克-瑞德或拉马兹深远。但像其他讨论心理预防法的作者一样,她认为只有结了婚的夫妻才应该生孩子,并且丈夫应该出现在产室,成为妻子的精神依靠,他是产室里的重要人物。她也毫不犹豫地宣称:“生孩子的体验是女人生活的一个中心。”

更晚些时候,美国的许多团体兴起了迪克-瑞德、拉马兹和希拉·基辛格热。女人号召“带回我们的身体”,并



开始了妇女健康运动。这两者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转向产婆,远离男性医师和非人性的医生。在60年代后期,开始有少数人在家生产,拍了许多非常年轻可爱的孕妇的美丽照片。照片上她们或是裸体;或是穿着花裙子;或是在乡间,就像被浪漫化的嬉皮士风格的大地母亲。贫穷、营养不良、被孩子父亲抛弃、不恰当的产前护理,这些影响了大多数产妇的因素却在那些书中被忽略了。“心理预防”和“自然”分娩法在美国中产阶级中颇为流行,但即使改革者们也认为一个女人的分娩体验与她的生活环境有关。法国医生皮埃尔·威雷(Pierre Vellay)说,在“正常”情况下(正常的骨盆、合格的体型、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在分娩中女人可以不经历疼痛,假如她在分娩前没有对家庭、金钱和社会的不安……女人生育孩子的最佳条件是有一个有很多房间的光线充足的漂亮房子,足够的金钱和没有对未来的担心”。拉马兹承认“增加一个孩子确实会让一个房子狭小,丈夫没有足够收入的家庭感到不安……当一个母亲的未来很惨淡的时候,她担心孩子的未来是很自然的”。费尔斯通作为当代妇女运动的早期理论家,她怀疑“自然”分娩作为反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与整个妇女解放运动是否有些关系。这种怀疑是理所当然的。

尽管费尔斯通仅仅把分娩看成是纯粹的受害者的体



验,但它毕竟是在父权制下的。“怀孕是野蛮的,”她宣称,“分娩是痛苦的。”费尔斯通没有全面地看到自然的怀孕体验和分娩的不同政治和情感背景,用这一肤浅的、没经过验证的观点抛弃了自然的母性。费尔斯通太过追求技术上的东西,以致她没能发掘出母性与感官享受,疼痛与女性的疏离感之间的关系。

理想上,女人不仅可以选择生育的时间、地点和环境,还可以选择是自然受孕还是人工受孕。理想上,创造另一个生命的过程应该是自由和英明的,就像一个女人或是驾着吉普车穿越国度的身体和精神之旅,或是进行一次考古学“挖掘”,或是选择干其他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可能把这些观点带到未来,并实现它们,如果我们不审视那些阴暗的形象,那些夏娃的诅咒和母亲作为社会受害者的形象。这样做,是在拒绝我们自身那些迟早会跳出来的方面。

7

我分别在1955、1957和1959年生下了我的三个孩子。在全身麻醉下,三次分娩大体上来说都是正常的。在第一次怀孕时,妊娠反应让我出了许多麻疹,所以使用了一些药物。后来每次我都用的是同一个产科医生。和第一

次完全一样的，我感到被“惹恼”了。在我第一次怀孕时，我和我认识的许多女人都在看迪克-瑞德的《自然分娩》。我很怀疑他所宣称的分娩是让女人入迷和愉悦的经历。我只是感觉青春期时被分离的身体在经历一个很长的重组过程。那时，我的思想在一个地方，身体在另一个地方，肉体的享受，甚至是性当中的享受，对我来说都充满了疑问。我知道愉悦在字面上的意思，在音乐、观点、风景、谈话、油画中我能感受到它，甚至在迪克-瑞德的书里。不过在他书里，我更多地认为在“自然”分娩中，那是产科医师们感受到，而不是他所坚信的他的病人所感受到。我对他的理论还有些兴趣，不过从没有想过把它们用到自己身上。由于孩子与母亲身份的神秘和女人对它们的渴求，分娩对我来说就是某种必须经历的事情。

在那些年，与那些使用或尝试过迪克-瑞德方法分娩的女人谈话时，我总是带着愧疚。她们告诉我，“疼死了，不过很值得”，或“这是我整个生命中最痛苦，却又最让我心醉神迷的体验”。一些女人发现所谓的心醉神迷事实上就是剧痛，她们哭喊着要求麻醉。而另一些在产台上被非自愿地麻醉。那时，与现在的情况相比，一个女人对分娩方式所做的“选择”，更多的是她的产科医生的选择。尽管如此，在那些产妇有意识的分娩中，她们的注意力更多的是忍受疼痛上，而不是在积极地进行身体配合上。有



时，我觉得我那三次无意识分娩是我作为一个女人的自我怀疑的另一个标志，因为“真正的”母亲是“那些醒着经历那一切的人”。现在我认为我对清醒的拒绝（经过我的医生的批准后实施的）和我朋友们经历的愉悦与她们克服的痛苦，都有一个共同根源：我们试图用一些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承受所谓的女性被动受苦的命运。我想，我们中没有人有真正掌握这一过程意识。由于对自己身体的无知，在关于分娩的问题上，我们实际上和19世纪的女人没有差别（不过不像我们欧洲的姐妹们那样，我们中没有人梦想在接生婆的帮助下，在家生下我们的宝宝。在美国，那是极度贫穷的人的命运）。

首先，我们是处于男性医疗技术之下的。医院的绝对权威，分娩被定义为一次急诊，身体与思想的分离，不管有没有麻醉，这就是我们生孩子的环境。唯一在场的女性就是护士，对她们的训练和安排，大大削弱了她们的温柔（我记得在我第三次生产后，在“康复室”醒来时，发现一个年轻的实习护士握着我的手时，我是多么地感激和惊喜）。被固定在一张小床上，迷迷糊糊地躺着；产室里传来其他难产女人的呻吟；那里除非是为了做骨盆检查或打针，“没有人来”，这就是隔离分娩的典型经历。孤独、被抛弃感、被禁锢感、无力、丧失人性，这就是在美国医院生产的女人的主要回忆。

不仅是在美国医院，科拉·沉岱尔的描述了在这个世纪初，她的女主角艾伯塔在巴黎医院生她的私生子的情形：

她坐在浴缸里，水没到她的脖子，她被上帝和人们抛弃了。他们关上门离开了，就像她可以应付自如。如果他们忘了她怎么办？如果在她安全地回到床上以前，疼痛再次袭来怎么办？怀着越来越沉重的心情她向门口张望。

他们在那儿！她舒了口气。

但那只是只拿走她放在凳子上的衣服的手，放下一件白色亚麻浴衣后，又关上了门。她叫喊着，没有回答。她是个囚犯，没有任何逃走的机会。

那些发生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外面，夜色笼罩着整个城市……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另一个世界住着她认识的，曾和她很亲密的人……无能为力，给她早期生活中留下了阴影。他们不会意识到当她被遗弃在这简陋的仪器、穿着白大褂的人和发亮的瓷砖墙壁之中时，是怎样一种苦涩。她被囚禁在那些东西之中，直到她分娩完毕，一个变成两个时，才能被释放。

人类学家布丽奇特·乔丹在研究跨文化的生育时，把美国医院的常规接生描述为：

……所谓的为了母亲和孩子的最大利益，一系列复



杂的操作都是在药物的基础上进行的……随便举几个例子：用药物引产，刺激分娩，常规护理中用镇静剂和药物镇痛。对产妇没有任何的心理支持；手术导致的羊膜破裂；例行的外阴切开术；常规的产钳接生和仰卧姿势。

乔丹是说分娩是一种“文化产物”，并且在美国总是无情地使用一系列相同的方法，没有顾及一些个别的特殊分娩。没错，为了避免损伤会阴，医生使用了外阴切开术，女人仰卧着分娩要比在产凳上坐着分娩，或（像宇卡坦半岛一样）在吊床上分娩，更容易受到损伤。产钳在仰卧分娩中，也使用得更频繁，因为那种姿势没有重力来帮助孩子出生。

8

分娩是（或也许是）一个女人整个一生的一个方面。她的一生由她从母亲身体中自己的出生，从她自己吃奶和被一个女人抱着的感觉开始，然后是她最早的阴蒂性兴奋和由阴户产生的快感的察觉，她对自己的身体和它的力量与日俱增的意识，她的自慰，她的月经，她与自然和其他人类在身体上的联系，她与另一个身体的第一次以及以后的高潮体验，她的观念、怀孕，直到她第一次抱着自己孩子那一刻。如果我们不是以父权制的观点把分

娩看成是一种生产,而是看成女性体验的一部分的话,不过那一刻也仅是我们生命过程中的一点而已。

分娩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婴儿的照顾和与婴儿在身体上的联系,它们会对性事、排卵和月经以及性欲的频率产生影响。在怀孕期间,整个骨盆部位的血管分布(动脉和静脉的总量)会增加,导致了对性敏感度的增强,大大地增加了高潮的密度和强度。怀孕期间,生理系统的荷尔蒙猛增,这不仅导致了新的血管脉络的增加,也增强了高潮中阴蒂的反应和肌肉的运动。生理学上,生过孩子的女人产生性快感的能力会增加,除非她的骨盆器官在分娩中受到了损伤,就像常常发生的那样。许多女人在生了孩子后才第一次经历性高潮,或者在哺乳期性欲增强。弗里达·弗罗姆-赖克曼、奈尔斯·牛顿、马斯特和琼生等都记录过女人分娩时的性兴奋感觉。但既然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要女人成为母亲,丧失性能力,直到最近,女人在分娩中或给婴儿喂奶时的性兴奋也被感受到它的女人拒绝,或是引起她们的内疚。就像牛顿提醒我们的:“女人……比男人拥有更广的性愉悦遗产。”据社会学家爱丽斯·罗西的观察:

我怀疑越是由男人掌控的西方社会,性欲与母亲身份越是分离。男人为了自己在性方面的利益而限制女人与异性性交的性满足,尽管代价是减少了女人和孩子在



心理上和身体上有价值的东西。

父权制社会对分娩的隔离和权力的分配不仅要求母亲受苦，而且剥夺了她们享受性的权利：圣母玛丽亚，处女，完美的贞洁。女人只被允许在生活中一些特定时间性交，成熟女人的感官享受，尤其是在她们变老的时候，被看成怪异、可怕和不当的。

如果不是男性文化硬要介入母亲身份和性欲，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性欲的形式和我们母亲或非母亲身份的条件，女人也许就可以达到真正的性的自治（与“性解放”相对），母亲应该有权选择怀孕的方法（生物学的、人工的或单性生殖的），分娩的地点，她自己的分娩方式和为她接生的人：产婆或医生由她来定，也可以是一个她爱和信任的男人，男女亲戚朋友，或者她另外的孩子。如果她真的渴望，没有理由阻止一个“亚马孙探险队”——仅由女人来接生的队伍，和她一起经历分娩的产婆和就是单纯爱着她的女人（目前，父亲是美国医院唯一合法允许出现在分娩现场和进入产房的非医护人员，即使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待在那里是合法的，但母亲愿意他待在那里的决定还是会不予考虑）。

不过不在医院分娩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在家或在诊所分娩。分娩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设想各地有一个每个女人都可以去的中心，女人可以到那里讨论避孕和堕胎，

做怀孕测试,得到产前护理,上分娩班,观看关于怀孕和分娩的影片,进行常规的妇科检查,孕期和产后那里有专业的医疗和咨询团队,包括一个安胎诊所。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女人就能开始思考、阅读和讨论怀孕、生产、哺乳和照顾孩子的整个过程和母亲的身份转换,以及她们的整个人生。然后分娩也许可以成为我们公开的各种各样与性有关的事件中的一个:并不是一个关于性的必要结论,而是一种带领我们自己走出恐惧、被动和对我们身体的疏离感的体验。

9

我是给予我自己生命的人。在那心理变化过程中,当力量消失,努力结束时,会有一个“过渡时期”,我们在精神上,甚至在肉体上感到“骨子里的厌恶和冷漠”。在这样的时期,成千上万的女人向医生寻求帮助,她们成为他们用药物麻痹疼痛的顾客。这样的药物治疗也许可以消除不安和绝望,但它的代价是让女人脱离她自己的必要过程。不幸地,针对这种分娩,只有很少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精神助产士。而那些心理产科医生、药物贩卖者,那些让我们在心理上处于切石术姿势的人,仍然控制着心理疗法这一行业。



去呼吁寻求帮助与要求被麻醉“失去知觉”是不一样的，女人——包括肉体分娩与精神分娩的女人——需要去了解那种绝境和“转化步骤”的意义，去学会要求主动地照顾和支持，而不是“轻度昏迷”或麻痹。只要分娩在隐喻和现实的意义上，仍是被动地向男性权力和技术交出我们的思想和身体，那么我们与我们自己、与力量和我们身体外部的世界的关系，将不会因为其他的社会变革产生多大的改变。





第八章

母亲与儿子,女人与男人

1

父权制下的母亲,正如被她儿子所见:控制性、欲望、阉割、心灵受难、充满内疚、让人内疚;冷酷的表情、巨大的胸部和贪婪的深渊;罪恶的毒蛇在她的双腿间;沼泽地的草丛中或齿间蠕动;在她的腿上总是坐着个无助的婴儿或受苦的孩子。她为了一个目的而存在:生育和抚养儿子。“我真的从未在任何时候见她单纯是个女人,过着没有我参与的生活。”她从他的身上找到了存在的理由:“只有儿子……才能源源不断地带给母亲满足。这是最完美的事情,是人类关系中最没有矛盾的。”“母与子之间的……关系……为永远不变的柔情树立了最纯粹的例子,并且不受任何自私想法的影响。”作为引诱者的母亲,儿子渴望与她睡觉的母亲,对她来说,那种乱伦禁忌的思想是最为强烈



的,比如,乔卡斯塔(Jocasta)、格特鲁德(Gertrude)^①。尽管父亲强奸女儿和兄弟强奸姐妹的事情经常发生,但在任何文化中,母亲和儿子间的乱伦都是始终不变的禁忌,并在男性作家作品中受到了最密切的关注。

在跨文化的禁忌中,岳母也是其中之一,并且对妻子和母亲来说都是可怕的替代。

班克斯岛上的女婿只有等到潮水把岳母的脚步冲刷掉后,才能跟随她去海滩;纳瓦霍人(Navaho)称呼岳母为“doyshini”,意思是“我可能看不见的那个她”;在尤卡坦半岛,与岳母的相遇足以阉割一个男人。母亲在生活中处处保护着儿子,使他们变得懦弱。“这一切总是开始于那个爱我的妈妈。作为她爱意的证明,以及她对这个大小孩命运的担心完全控制着她的所作所为,她想把我抱紧,隐藏、逼迫、俘虏在她的子宫里。这种冲突和矛盾将会伴随着我从子宫到坟墓……1941年9月23日,我终于甩掉了母亲对我的管制,我感觉自由了。”母亲认为应该帮助儿子,她挑战着父亲的专制,不把儿子移交给男人们审判和支配。“母亲无意识地在狩猎中扮演了一个使猎物从掩蔽处惊起的人的角色。即使你的(他父亲的)抚养方

① 路易·马勒的电影《好奇心》表达了对这一故事的另一看法,即母子之间的吸引力远不是什么“黑色传奇”,而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家庭事件罢了。——原注

法可能使我变得自负、厌恶一切甚至自我悔恨(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出现),母亲却可以通过她的善良,通过体贴的谈话……通过为我辩护再一次地抵偿掉这些,我又再次回到了你的轨道,不然我可能会偏离了这轨道,看不见你的优点和我自己的优点。”她试图阻止孩子的出生,孩子的出生是她的创伤。“她就是敌人。她站在了孩子与生活之间。其中只有一个可以获胜;这是你死我活的战斗……怪物再次降临……”她潜伏在罪恶背后:

“噢,母亲,母亲,”他真的哭了!

“你应该为我的死负责,

因为在小的时候我就受你训练,

只为今天我被送上绞架。”^①

她在死后仍然保持了她的强大和嗜血性:“如果她死后,她的未满足的灵魂必然会回到她的孩子的身上,并且要求他履行那些应该只有活着的肉体才能够完成的事情,那么一个母亲为了她的孩子牺牲她自己有什么用呢?”而且,在一个完全是连续整体的两个极端,她是卡莉,印度教中的“黑色女神”,齜着毒牙,脖子上挂着全是头骨做成的

① 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其《反对我们的意志:男人、女人和强奸》一书中写道:“女儿可能也会害怕她的母亲再次把她‘吞噬’,但是女儿也知道她自己很可能会变成她母亲的继承人:她同样也会用她的身体创造出一个新的生命。”



项链,在她丈夫的尸体上跳舞;但是在米开朗基罗的白色缎纹大理石雕塑圣母怜子中,她让她那无瑕的人体雕像的脸高于抱在她膝上冰冷的、玩世不恭的儿子的尸体。

不知何故她和他的关系与死亡有着联系。当他看着他的母亲(或任何成熟女人),除了压制,是不是非常容易就想到他的存在仅仅是一个小斑点,一个弱小的、盲目的,生长在她身体里的一块肉?当他什么都不是时记住的一个时间,是不是他被迫知道他不再存在的那个时间?①当然我们知道他对埋葬方式、洞穴、坟墓和代表女性身体

- ① 最近,这个“波士顿杀人狂”,连续性伤害和残杀多名妇女,震惊了整个城市。精神医学委员会(Medical-Psychiatric Committee)应陷入困惑的警察局的邀请为扼杀者头脑影像剖面作了详细研究。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把想象中的扼杀者母亲的剖面放在一起分析。鉴于第一批受害者年龄比较大,其中一个已经75岁,委员会认为……这个疯狂杀手很爱干净,时间观念强,穿着讲究,很可能已到中年,可能阳痿,或者是同性恋者。他完全沉浸在对他的母亲的仇恨之中,因为其“体贴,有规律,爱干净,易冲动,会引诱,要求苛刻,强势”……精神病学家推测,由于他对母亲的仇恨,罪犯选择用一种“既有虐待性又带有爱意的”方式残害和谋杀老年妇女。Albert DeSalvo,他揭示自己以及他的青少年记录也表明,他完全地束缚于他的母亲。而且,她仍然活着,但并不是十分体贴人、爱干净和强势。DeSalvo极大的愤怒是强硬地直接针对他那野兽般的酒鬼父亲。他的父亲经常打他、他的母亲和那些经历悲惨青春的其他孩子……他在他的孩子面前和妓女性交,教他的儿子去商店偷东西,弄断了他的妻子的每一根手指并且敲掉了她的牙齿,还有……在Albert 8岁的时候遗弃了这个家。

的洞穴迷宫进行过选择;或者是被掏空的死亡之船,在英雄神化中它也是一个摇篮。他也许会害怕——而又希望——再次遗失在女性的身体里,合并和拉回到一个深度意识的状态;看穿一个女人可能是一个充满焦虑举动,在这期间他必须忽略或否认真正活生生的人,必须征服或占有她的身体,如同征服或占有领地,但尽管如此,他对那个身体仍然感到恐惧(像古代的战士一样,宇航员在离开地球之前要避免与女人有性接触)。他必须将可以性接触的女人和“母亲型”的女人分开,即使这样,浪漫的性爱故事总是与死亡有关。

否认这种对其母亲的焦虑的表现形式可以有很多:需要把她看成家中的天使,显示出明显的爱意,仅仅是其中的一种。一位刚刚离婚有小孩的母亲告诉我,现在与她正在交往的那个男人向她保证过:“母亲会让他兴奋——她们要比其他的女人真实得多。将来她们有地方立足。没有孩子的母亲早已经死去了。”他所说到的那种女人的客观表现毫无疑问地混合着一些蔑视、探索的需要,甚至于她的母性(这个男人进出她的公寓所做第一件事情总是打开冰箱)。我认为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他在“寻找一个母亲”,或者,那个母亲已经在那里,他在尝试着在她面前显示自己的性爱。

但是母亲就在那,看起来,不管怎样,没有孩子的母



亲也是一样；对于成年的男孩来说，母亲隐现在每一个女人中。或许没有哪个文学作品会像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第三首》那样清晰地将这些揭示出来。他在其中称呼“女孩”或者年轻的女士为“亲爱的”，向她努力形容她在他意识中的位置和她代表的一切。通过做这些事情，他在对（年轻女孩很快就会搞不懂的）母亲的“史前”理解中创造了一个男性精神的风景：

但是他可曾经开始过自己呢？

母亲，你使他变小，是你开启了他的人生；

对于你来说他是全新的，你将他全新的眼睛定格在

这个友好的世界，避开那些不友好。

噢，你以美妙姿态站立在他和天崩地裂的混乱之间，

那些岁月哪里去了？

你就这样向他隐瞒了许多；你使那夜间可疑的房屋变得无害，你从你充满庇护的心中
将更富于人性的空间和他的夜之空间混在一起。
你并没有将夜光放进黑暗中，不，而是放进了
你的更亲近的生存，它仿佛出于友谊而闪耀。
哪儿都没有一声吱嘎，你不能微笑着加以解释，
似乎你早就知道，什么时候地板会那样震动

于是他聆听着，镇静下来……

他，那新生者，羞怯者，他怎样陷入了圈套，
并以内心事件之不断滋生的卷须
与模型，与哽噎的成长，与野兽般
追逐地形式交织在一起。他怎样奉献了自己——
爱过了。

爱过他的内心，他的内心的荒芜，
他身上的这个原始森林，在它缄默的倾覆上面
绿油油地立着他的心。爱过了。把它遗弃了，
从自己的

根部走出来走进强有力的起始，
他渺小的诞生在这里已经被超越。爱着，
他走下来走进更古老的血液，走进峡谷，
那儿潜伏着可怕的怪物，饱餐了父辈的血肉。

……这时，女人，出现在你面前……

所以少女对于他来说是在他“恐怖畸形”的内部生活
中的一个调解，就像母亲在他童年时期调解他的夜晚恐
惧和陌生世界一样：

……噢，轻点，轻点
给他安排一项可爱的，一项可靠的日课，





——把他

引到花园附近去，给他以夜的优势……

留住他……

这个女人，再次治愈他，帮助他，给予他温柔和安全。角色（或者法则）很清晰：《哀歌》中没有一处暗示一个男人可以为一个女人做这件事，或者容许这个女人有她自己复杂的内心。至少里尔克与角色可能发生的改变格斗过一次。在《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笔记》中，他问：既然数世纪以来女人们就做“关爱”这件事情，那么现在是否是男人做一点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像所有一知半解的人们一样被简单的快乐惯坏了，并且被神秘的气息笼罩着。然而如果我们不去看重我们的成功，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学着去爱（而我们一直被别人爱着），那会怎样？如果我们当时继续并开始去爱，现在是不是会改变了许多？”

但是在他的思维中，里尔克不会知道，甚至不会有一丝模糊地知道，对男人的这项“爱的工作”——简言之，母亲的爱——对于女人来说的代价是什么。依赖着一系列女人、知心者以及女赞助者的鼓励和保护，他从本质上就是一个儿子。他在1902年记录了与雕刻家韦斯特霍夫（Clara Westhoff）的新婚状况：

我们在12月的时候有了一个亲爱的小女儿,名叫露丝。自从有了她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对于女人来说——我深信——小孩是所有陌生感和危机感的终结和释放:它同时也是精神上成熟的标志;而且我深信一个曾经或者现在有孩子,并且爱着她的女艺术家不会逊色于一个成熟的男士,她有能力在同等条件下达到所有男人可以达到的艺术高度,而我所说的同等条件是指如果他是一个艺术家……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和我的妻子有了一个小家(在离沃普斯韦德不远的小乡村里),但是这个家花费太大了,所以我们同意各自工作生活,每个人像从前单身时那样生活。

但是对韦斯特霍夫来说,作为一个孩子的母亲,永远不会变得“像以前那样”了。最终,她为了继续工作而把露丝委托给她自己的母亲照看。对于一个女艺术家或者任何女人来说,要一个小孩意味着没完没了的护理琐事,为将来计划,学习一切女人们认为“天生”就知道的东西。作为母亲一天要做的真正的体力和情感工作,他从孩子的角度看待夜间猛醒,睡眠不足严重影响了女人的生活和工作——所有的这些里尔克通常像孩子一样,像男人通常理解的那样,认为那是理所当然。



我们读里尔克的片断是因为他的言语和观察似乎常常比其他的男作家更有深度、更广阔,至少从中了解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要比文学想象中的更暧昧,更朦胧。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男人写女人,从不写他们深不可测的恐惧、内疚和对感情的关注,而这些对于女人来说,除了母亲就是反对母亲者才能够体会得到。

是一些成年的男孩子告诉我们,告诉他们彼此:在美索不达米亚我们是“陷阱,洞穴,壕沟”(坟墓?);在印度教教律中,不论是什么阶级和社会地位,我们天生就是不纯洁的,善于引诱的并且要求生活在男性的控制之下;在公元元年,我们是“罪恶之首,恶魔的武器,被逐出天堂的,罪恶之母”;作为父权社会的理想女人,我们的额头上雕刻着“神秘”一词,并且自我牺牲是我们的特权;我们的子宫是一个“放纵的”、“含氮、充满盐分和贪婪”的哺育之地;根据维多利亚时代的医学家的解释,我们不会好色,并且“花天酒地的生活”会使我们不育,而且“真正的女人会把所有男人看做……像继子一样,用母亲的温柔将心靠近他们”;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我们是我们自己“生物学悲剧”的受害者,而这个悲剧不是合法的社会变革能解决得了的;根据新弗洛伊德学说,“男人有可能不幸患上的退化综合征,基本上来源于母子关系”;在中国,对于女人来说,女人的爱是中产阶级的反常表现,是资产阶级的

作用。

但是,在我们是母亲之前,我们首先是有血有肉有头脑的女人。

2

大概在六岁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听关于母亲和孩子的故事是“勇敢的斯巴达母亲”甘愿把她们的儿子送上战场:带着你的盾或者躺在上面,意思是这个少年凯旋或者战死回来。一幅画面不停地在我的脑海里显现:这个少年,深受重伤,没有了盾牌,回到他母亲的门前。她会不会拒绝开门呢?

你愿意为军队作贡献吗,夫人?

我仍然留有一本儿童书,在小的时候读过很多遍,我引用在了下面的信件中:

尊敬的女士:

我在战争部的文件中看到你是五个儿子的母亲,他们光荣地死在了战场上。我尝试说服您从如此巨大损失的悲痛中走出来,但却感到自己的言语是多么的无力和无用。可是我不能不向你传达悼念,你可以在共和党的感谢词中找到这些。我祈祷我们神圣的上帝可以减轻你

失去亲人的悲痛，让你停留和沉浸在那些快乐的爱的记忆中，你庄严的骄傲就是你为自由的神坛做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

庄严致敬

亚伯拉罕·林肯

除了这些早期印象以外，我第一次怀孕的时候，我内心就认定是一个儿子（在儿时“过家家”的游戏中我总喜欢扮演男性的角色，然后说服或者强迫妹妹扮演女性角色）。我时常把自己看成男人；我认识的男人看起来很少会因为自我怀疑和犹豫不决而后退，似乎有更多的机会向他们敞开。在25岁时，我想要生孩子，为没有生过小孩的我自己，为那个受以父亲为中心的家庭压迫的自己，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原始的人——感觉自己在脑海中闪过这些可能，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和作家，在怀孕期间，我把自己封闭起来。如果我想生产一个男性的自己，这是因为男性看起来根据性别继承了这些品质。我想要一个儿子是因为我的丈夫说希望要一个“小男孩”。或许他也想生产他自己，去重新开始。一个男人，他想要一个男孩。一个犹太人，并且是长子，他想要他第一个孩子是男孩。一个成年男性，他想要“一个小男孩”。

我也想要一个儿子，为了想做一些我母亲没有做的

事情:养育一个大男孩。我想要他,作为对我父亲的挑衅,而他“只”生了女儿。很巧合地,我的大儿子在我父亲的生日那天出生。

你愿意为军队作贡献吗,夫人?一代又一代,我们把儿子送进战场:不一定是如同斯巴达战役和南北战争那样直接和血腥。生儿子成为了女人在世界上留下“她的”痕迹的一个手段。六年后,我最小的儿子出生后,一个聪明有才华的女性朋友写信给我:“这一个……肯定是天才。这就是为什么他是带着阴茎而不是阴道降临的原因。”

但是,抚养三个儿子,我发现我自己生活在最深层次的激情和迷惑中。三个小生命,很快变成三个大人,我常常感受到他们的关怀在我的生活中渐渐消逝,而他们的美貌、身体的魅力让我感到吃惊。我不把他们看做“儿子”和即将继位的继承人,而是把他们看成亲爱的婴儿的肉体,在小孩子的身上真实地存在着探索身体的坚持,全神贯注的纯粹,悲伤或快乐,一点一滴地把我和早已遗忘的地带联系起来。我曾经是一个鲁莽的,没有耐心,疲倦的,反复无常的母亲,成为母亲是一个打击,让我退却,但我知道我狂热地爱这三个小东西。

我记得一年夏天,我住在佛蒙特州的一个朋友家中。我的丈夫当时在国外工作几个星期,大多数时候我和三



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另外一个五岁)待在一起。家中没有成年男性,就没有任何理由作什么安排,午睡,定点准备饭菜,或者早睡,两家的家长们可以聊天,体会到了我们感觉到的一种美好却有负罪感节奏。那一阵子天气异常炎热,天空晴朗,我们几乎都是在外面吃饭,只求吃饱;我们半裸着,熬夜看蝙蝠、星星和萤火虫,读文章和讲故事,很晚入睡。我看着他们男孩修长的身体被晒黑,我们用在太阳底下晒热的花园水管中的水洗东西,我们如同在某个只有母子的孤岛上生活一样。夜晚他们入睡时不会喃喃自语,我不睡觉,像原来做学生时那样,读书写作直到凌晨。我记得思考过:这就是同孩子们生活的样子——不用上学,没有固定的日程安排,不用午睡,没有既做母亲又做妻子而没有空间做回自己的矛盾。曾经有一次,因为看夜场的汽车电影,我半夜才开车回家。经过有鬼火显现寂静而又曲折的佛蒙特州路,三个睡着的孩子躺在车厢后座,我感到十分清醒,兴高采烈。我们一同打破了睡觉的时间规律,打破了夜晚的规律,打破了我自己认为我在城市中必须遵守的法则或者我变成一个“坏妈妈”的定律。

我们是同谋,违反了做母亲的宪法;我感到我全面地控制了自己的生活。当然宪法再次向我们关闭,带着对原型的不满,我又再次不信任自己能做一个“好妈妈”。但

是在那时我就知道我不想要我的儿子们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更不想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去杀人或者战死。我想要为自己生活,爱他们每个人。

3

这种个人的价值观和对自己的热爱是不是只属于善于自我表现的灵魂呢?或者是否我还没有达到人生的成熟阶段?或者是否因为我是女人所以要恪守永恒的法律放弃这些而孤独一生?这看起来是我一生中一件无价的礼物:感谢上帝我要选择拥有一个享有母爱的大男孩。

当然父亲会对儿子有所要求;作为继承人,农业工人、士兵、机器的进料员,自我的形象和外延;他们不朽的声名。对社会上系统的杀害女婴的案例,可以理解为女人们想要男孩,而不愿面对怀胎九月生出孩子会被他人当做废物对待。但是,在组织男性守护领土和侵略的现实情况中,女人有了儿子,他们就真正是在为军队工作了。压抑这些,或者相信她自己的孩子会在战争中躲避死亡,要比杀死女婴要容易得多。在一个对女性制裁充满迷惑的社会中,母亲可能本能地赋予儿子更多的价值——或者说更多的希望,就像在“黑色骄傲”没有流行之前,一些美国黑人在评价一个拥有白皮肤和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小

孩时会感到压抑和强迫。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到没有生机，没有成就，可能会无意识地表现出来，就像上面引用自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年轻时的笔记本中的一段文字所表述的一样(作者当时马上要结婚，但从不希望生小孩，最终离开了婚姻变成了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和女权主义者)。

“拥有一个享有这些的大男孩。”所以我们始终站在弗洛伊德的阴影下。在过去的40年里，弗洛伊德的著作不断被修订和解读，以至于接受和反对“弗洛伊德学说”大多是由于其著作选择的观点，把他人的观点进行了过滤(我们不应该低估电影、戏剧和笑话的力量)。在他的理论中，没有一个观点能够比其所谓的恋母情结影响更大。没有读过弗洛伊德的女人用这样一种信念来抚养孩子，她们坚信：向她们显示肉体上的爱慕是“引诱性”的，应针对男人的行为方式对她们的儿子施加影响，这种方式是作为女人的她们深恶痛绝的，去“阉割”他们，或使其变成“‘贪婪的’、‘盛气凌人的’人物，这种人物出于心理健康成长的原因，她们的儿子肯定会加以拒绝”，要不，她们坚信，如果她们的儿子变成了一个“大可不必”的同性恋者，那完全是她们，仅仅她们的责任。

毫无疑问，弗洛伊德在某些领域是先锋。比如，他认为情感的折磨不仅仅是道德犯罪，无意识的冲动促成了

普通的人类活动。他关于梦的分析我们现在看起来有些原始,但他的确重新确立了对梦的认知,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此以前几个世纪的医药“科学”都没有承认这个观点的正确。但是弗洛伊德也是一个男人,受到他的文化和性别的极大限制。卡伦·霍尼是他早期最关注的评论家之一。霍尼指出了他观点中其严密的生物学和机械论基础,他把心理学特征转化为解剖学原因,他固有的二元思维方式,即本能和“自我”,男性和女性,消极和积极,看起来都是完全对立的。她特别质问了他的的一生都在重复或回到童年的事件中的观点;一个她感觉正确的否认人的器官发展和我们生命每个阶段的质变。

霍尼接受恋母情结,但是有着严格的限制条件:不同于弗洛伊德,她不认为小孩对父母的强烈情结是由生理决定,所以是普遍的。她把们看成是一些,但不是全部小孩经历的具体情况的结果。她的批评在当时是非常大胆和勇敢的,因为当时恋母情结,不论是受压抑的还是爆发的,都被认为是精神生活的中心。她与弗洛伊德的分歧使得她在两年后被逐出了权威的纽约心理学研究所。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她的观点发表得太少了。

对于一个小男孩,弗洛伊德认为恋母情结的过程包括男孩第一次经历对他母亲的强烈的性感觉,然后学习,

将他自己和他母亲进行区分，通过他的父亲来识别男性而不是把他看做为对手，然后进入一个切入点，让他的性本能可以转移到其他女人身上而非他的母亲。弗洛伊德认为男孩婴儿时对其母亲的性感觉会使他担心其父亲会嫉妒而用阉割来惩罚他。对于这个男孩来说，理想的解决办法就是放弃与母亲的联系，通过认定父亲，把父亲认知为权力的最高象征。保留他的阴茎的代价就是接受他的父亲，在弗洛伊德的术语中叫“超我”——总之，了解了等级规则的最高级，本能的戒律，异族结婚以及乱伦的禁忌。

弗洛伊德建议在这个危机时期有一系列可能：男孩可能会真正因为手淫而害怕被惩罚阉割，嫉妒的父亲可能真会给青春期的儿子行割礼（象征性的阉割）。但是，这些事件也可能只是发生在想象中。

从根本上假设母子二人关系本质上是倒退的、循环的、徒然的，那个文化取决于父子关系。母亲为儿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依赖永存，它阻碍了事情的进一步发展。通过解决恋母情结，男孩进入了男性世界，一个充满等级和命令的世界。文明——当然意味着等级文明——要求作为母子相互关系的第三号人物——父亲来做介绍（他的出现已经在九月怀胎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用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的话来说，恋母情结变成了

“人类文明的入口”。但是父亲不仅代表权威也代表文化本身,超我控制了本我的盲目乱撞。文明意味着认同他的父亲而不是他的母亲。

弗洛伊德也认为小女孩缺少阴茎类似被“阉割了”一样,作为女人,她必须用怀孕和小孩来替代失去的男性器官。基于这样的假设,他应该把这个“欲望的”、无意识的品质投资到母子关系中:儿子已经不再是小孩,他拥有他母亲渴望拥有的阴茎(但是,很难理解弗洛伊德怎么会设想母子关系脱离了矛盾和“自我考虑”)。

母性冲动的观点一次又一次地被女分析家挑战着。不只是霍尼,还有克拉拉·汤普森(Clara Thompson)和弗里达·弗罗姆-赖克曼(Frieda Fromm-Reichmann)都主张如果女孩希望要阴茎,唯一的原因就是她看到了拥有这些特征的人的特权和好处。他们把阳具当做一个隐喻,认为希望要男孩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冲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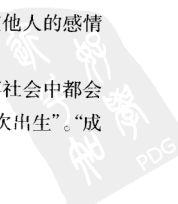
尽管我们在挑战或驳斥弗洛伊德的理论构架,但是问题出现了:男孩怎样把自己和他的母亲区别开,这是否必然意味着他必须“参军”来形成父权价值观?在父权制下,母亲能不能代表文化?如果可以的话,她需要做什么?最重要的,与母亲的分离对于儿子意味着什么?

当然,首先意味着生理上的出生,离开了温暖的、柔软的羊膜囊,意味着婴儿渐渐地感觉到母亲的胸脯、面容,



她的体温属于另一个人，不是单纯地为他存在，可以消失也可以重现，而且会根据他的哭喊、微笑、他的生理需求来进行回应，但不会增加，也不完全符合他的欲望和痛苦。这是一个双重过程，其中母亲首先没有出现在孩子面前——暂时或更长的时间，然后他体验着捉迷藏的游戏，并最终可以自己在离母亲不远的地方散步。分离也意味着断奶，认识到母亲周围的人也可以照顾他，母亲不在时他也是安全的。毫无疑问，孩子在每一阶段都会感到焦虑和孤单，害怕那些安全感、温柔和依赖将永远离他而去。非常有必要出现第三个人或其他人来消除这种焦虑，拭干他感觉被抛弃的眼泪，让他重新感到所有的关怀和爱不是单单出自他的母亲一个人，让其接受她的分离，接受独立的自己。但是经常这个第三个人还是一个女性：祖母、阿姨、姐姐、护士。事实上，她可以给予比母亲能够给予的更多的关爱和快乐，她可以在情感上变成一个母亲。如果是男性角色，孩子的经历就会少些实际的关怀和快乐，比起孩子身旁的女性们，男性出现的间隔更大，更有距离感，更具判断力，更为自己着想。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孩子在早期体会到了性别与适应他人的感情有关。

最终他必须被这些男性们所接管。部落社会中都会要求举行青春期男孩进入男性群体的“第二次出生”。“成



人接纳仪式中……年轻男子就被这个男性世界的守护精神吞噬,重生为这个精神的孩子不是其母亲的儿子,而是天堂之子,而非地球之子。这个精神上的重生代表着‘更高层次的男人’的出生,甚至从原始的角度来看,他与仪式,自我和意志力……有关。男人的世界,代表着‘天堂’,代表法律和传统,至少在早先的上帝都是男的。”这件事情经常伴随着动物阉割和牺牲、符号性的创伤、苦难,也伴随着一个公开拒绝母亲的仪式:就像斐济人一样袭击她,像阿帕切族和易洛魁印第安人一样用剑刺伤她。但是无论制定什么样的仪式,这个有阳具的小孩就被寄希望于他和其他有阳具人的在一起。如果这个儿子生长在强大女人掌控的所谓的女权家庭中或者母亲是家长的家庭里,这个仪式就不怎么重要了。根据这个观点他还是必须与父亲在一起,父亲是法律和传统的代表,镇压者,主流文化的创建者和承担者。

无论他的母亲的最原始的本能告诉她什么,她都被希望于能够对此有所促进。我的祖母时常带着痛苦描述我的父亲——一个身材瘦小、苗条的犹太男孩——是怎样在十岁时被送进军营。“军队的制服对于他来说太大了……我至今清晰记得那个所有孩子中最弱小的男孩,恐惧地站在站台等待着那辆火车。”但是,她还是把他送了出去,去接受“更好的教育”,去成为一个男人。在20世

纪早期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她能有什么选择?

事实上,在所谓的恋母情结的三角关系中的第三阶段是父权力量。把恋母情结作为人类发展理论进行抢救的努力都应该出自于此。人类学家谢里·奥特纳(Sherry Ortner)认为,尽管弗洛伊德假定“恋母情结过程”发生在生物学层面的家庭中,但是有可能存在一个更加基本的社会化理论,其独立于任何特定社会和性别角色。“这是一个强大的……辩证的理论;人们会经过一个与征性人物的爱、欲望和权力做斗争的过程。”奥特纳建议即使一个孩子被两个或更多的异性或同性家长抚养和统制,这个框架都应该存在。同她指出的那样,尽管“由父母及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分裂了,比如在基布兹,托儿所的老师全部或大多数都是女性”^①。

重读弗洛伊德和支持弗洛伊德的人的著作(特别是朱丽叶·米切尔,与其说她是马克思主义或女权主义者,不如说她是弗洛伊德学说的追随者),总是关于阳具嫉妒、阉割、孩子(尤其是儿子)是阳具的替代品等概念,给人留下的最强烈印象就是语言的含糊不清。这也许是心理学家以“科学”的角度感受记忆、梦、幻想的结果,即与诗歌

① 国家权力完全或者大部分被男性占有,即使戈尔达·梅厄和甘地是女人也不能改变这些权力的男性特质,它们最终会从男性制度中散发出来。

对立的科学的错误认识的结果^①。一个阴茎、一个乳房具有的想象含义远远超出了它们的生理存在意义(就像我们眼睛、耳朵、肺、阴户,或我们拥有体现智力和肉欲身体的其他部分)。是这些含义没有被挖掘;生理形象的强烈感觉和共鸣遗失在术语的复杂还原中。尽管是十分惹人注意的阳具,在弗洛伊德的理论看来只是一个可怜的东西,完全否定了其广泛用处,如同其作为生育能力符号和在前家族制祭祀中,天母的附属物赫姆那样。这些限制——根据霍尼的解释,来自于弗洛伊德严密的生物学和二元论方法——尤其是在男人的梦和幻想中有母亲(也是女人)形象出现的地方。

朱丽叶·米切尔反复谈到我们不应该责怪弗洛伊德,有些他没有探索到:就像他自己知道的那样,社会条件的分析会对女性心理学作出贡献。引用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的名言,就是“每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至少有一个盲点:弗洛伊德的?是女人”。但是事实上周围一切是清晰可见,没有什么所谓的智力“盲点”——也就只有我们和男人的头脑中掩饰女人大范围存在的时候,那个盲点才会出现。在父权制思维下,弗洛伊德不需要为了更深体会女性人物——特别是母亲的思想和

^① 我不是说科学和诗歌是一回事,只是想说不需要把它们对立起来。

需要而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是，关于他自己宣布的方法和目标，他也真的失去勇气并退回到了关注女性的地方。这不仅影响了他对女人的态度，也必然影响了他关于男人以及阳具对男女的重要性的观察和研究。弗洛伊德关于儿子的看法中充满了他对母亲的敌意情绪。

当然是弗洛伊德自己强调了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说双重含义的话语、健忘、只言片语都表示了我们不会有意识地对所说的含义负责。伊丽莎白·简维(Elizabeth Janeway)注意到在涉及小女孩时他经常使用的短语“阉割的事实”。“我们假定他是有意识说这句话的，那我就认为它引导我们走向弗洛伊德对女性这一性别的复杂内心。”简维认为尽管“小女孩不会‘真正’被阉割”，弗洛伊德不用去作调查也肯定清楚女人，作为社会的人，遭受的强烈反对和剥削。总之，弗洛伊德把女性阉割当做一种隐喻。但是，准确地说，因为他没有研究社会对女人的残害的精神意义(这也迫使他更深入研究男性心理)，所以他的著作，不论关于男人还是关于女人，缺少了一种真实，这种真实被人叫做政治，而我叫它诗意科学。

4

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母子关系。在小说、戏剧、



电影和奇文逸事中儿子对美国犹太母亲的嘲讽来源于耶和華崇拜者痛恨女人的传统,以及在主张社会同化的美国犹太男人和女人所遭受的境遇。犹太女性移民在变成“美国人”的过程中地位大大下降,在很短的时间内失去她的角色:与外部世界连接的中间人、女商人,企业家、家庭和财产的管理者,生存的策划者。变成了她“美国”丈夫的一个“美国”妻子。因为现在他的威望取决于能够养家糊口和事业有成,而不是修炼犹太教法典的学生,他的跨大西洋的男性主张,要求(或者看起来要求)她退到家庭成为一个家居母亲。

把弗洛伊德的关于“完美的”、“和谐的”母子关系的田园诗与体现了对母亲的痛恨和蔑视的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小说《波特诺伊的抱怨》或者丹·葛林宝(Dan Greenburg)的非小说《怎样成为一个犹太母亲》进行比较,你会感到非常有趣。但是,田园诗和现实被约束在了奇怪的美国犹太文化双重影像之中,母亲不是多愁善感就是鲁莽无比;不是太过吵吵嚷嚷,太好强,太精力充沛(性精力?)就是性压抑。按弗洛伊德的话说,她在遭受“家庭主妇精神病”,她用犯罪和有害食品欺负她的孩子,在哀悼或点亮安息日蜡烛的间隙她才感到尊贵。

保琳·巴特(Pauline Bart)描绘出中年女人在情绪低落时所造成人性上的伤害。情绪低落有很多种表现:高



而尖的嗓音、自我贬低的紧张的笑、常年依赖安眠药和助眠器睡觉等等。但是这些被驯化的美国犹太女人们还是有一些热情和快乐的。犹太妇女从女人的角度要求得到尊重,但是这个特殊的亚文化滥用贬低了它^①。她是一个女幸存者,长着尖牙和爪子,有她自己神经系统的战士。像她的黑人姐姐一样,她承受一个人在她背上的重量。然而她一方面生活在儿子对她的依赖诋毁中,另一方面又生活在内疚和压抑愤怒之中。

这个黑人母亲因为“阉割”她的儿子同时被白人和黑人男性起诉,她在她所谓女权制的家庭中养家糊口,做决定,抚养孩子。不必说她作为“女权制”的“力量”彻底地被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贫困所限制。再次被误读为力量的是生存能力、勇气和提供她的孩子生活所需要的一些东西的决心,即使这意味着为了他们能够有衣服穿有食物吃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因为该黑人母亲对她儿子象征性的阉割行为,使得白人男性种族主义,这个真正阉割了成千上万黑人男性的种族主义,再次显示了其与

① “在犹太村舍中,犹太女人一起持家的景象和顺利过渡到新世界是非常相似的,即这个同化的过程……变得像祈祷除魔的过程了……她们的鸡汤变成了有毒的春药。”(出自 1975 年纽约 Dial 出版社出版的由 Charlotte Baum、Paula Hyman 和 Sonya Michel 三人合著的《美国的犹太妇女》一书,第 244—251 页)

性别歧视的不可分割的关联。

5

“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女性,那请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或者去读诗歌,或者等到科学研究能给你更有深度、更一致的信息。”因此,在尖刻但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局限的情况下,弗洛伊德完成了他的作品《关于女性》。

在他写下这些文字后的四十余年中,发生了一件伟大的事情。通过玛丽·珍·薛飞(Mary Jane Sherfey)、马斯特(Masters)与琼生(Johnson)奈尔斯·牛顿、爱丽斯·罗西(Alice Rossi)这样的科学家的著作,我们开始积累有关女性生理、性以及它们与心理学的联系的知识;妇女运动发掘并刺激了女人新体验的出现;当然女诗人也有了话语权。

虽然是逐渐地,女性体验正在变化的一个方面是表达出来的对儿子的渴望。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有而且以后继续还会有喜欢男孩的女人,她们仍然对男孩子抱有更高的期望。但是,随着一些女人更多地关注自己生活,标志着对儿子作为男性的过分看重也正在发生变化。

很多女人表达着这样的感觉:在人类历史中,这个时期做女人要好得多;女人自我掌握命运的要求不断拓展和深化,并创造了大量的可能,展示自己想法的机会和激



进主义。毕竟一个新的相互目标和分配观念存在于女人之中；我们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巨大变革之中。此外，很多女人感觉到她们经历的关于女权运动的第一次愤怒，如多年积聚的洪水暴发，把她们卷进与作为男性等级制度一部分的男孩子们的痛苦矛盾之中。“你不可以让孩子疏远他自己的文化。我的儿子养成了很多我不喜欢的性格，他们蔑视女人……我爱他们（她的儿子）。我不可以把他们看做为我的敌人。”不论这个女人的困惑是什么，她在表达一个并非她独有的冲突。

人们越来越害怕让男孩疏远“他的”文化，甚至是那些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在反对这个文化的女人们也在害怕。在60年代初，我回想起那些自称和平主义者的母亲们共有的一个担心：禁止玩具机关枪和手榴弹会让孩子同他的玩伴“疏远”，甚至可能使他们“变得阴柔”。（或许这些母亲也本能地感觉到枪是阳性的，它代表的远不只是杀人；或许他们只是害怕被起诉，就像母亲经常被起诉一样，因为“阉割”她们的孩子）。但是主张男女平等的母亲却越来越害怕她的儿子疏远“他的”文化。

我们害怕什么？害怕我们的儿子会起诉我们让他们流落街头？害怕他们遭受我们所遭受过的父权制报复？我们是否害怕他们可能会丧失了男性的特征和特权，甚至是在我们努力去铲除这个不平等？女人为了教育孩子不

需要模仿男性的“宏观”特征,是否必须把孩子看做敌人?一个母亲怎么会真正爱一个对女人蔑视的儿子呢?或者这是不是常常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中的安抚的错误的爱呢?当一个母亲自己开始颠覆女性传统形象的同时,却看到他的儿子沉迷于电视暴力、橄榄球,这些被罗伯特·瑞德(Robert Reid)称之为“一个男性可以作为主宰出现的雄性动物表演世界”,这肯定是一个痛苦的矛盾。这一切太过容易,以至于无法无意识地接受这种内疚,所以会很快转而攻击任何一个想要扩张自己存在价值的女人,这对她的孩子必然会有某种伤害。这种内疚是女人控制社会最有力的形式之一,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对其完全无动于衷。

隐藏其愤怒的女人可能会很好地培养儿子的男性攻击性,她没有比这更自信的了。她可以真的让儿子攻击自己,压制自己。他小小的男性特质中存在着双重身份:这个年轻的、炫耀的雄性动物伴随着伤害过她的整个男性领域,但同时,他又是她的一部分,可以自由地表达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她原谅了他的Khamstvo(一个俄语词,它兼有“粗野、好斗、兽性和残忍”之意,苏联女人曾用这个词来形容她们的男人。)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是19世纪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领袖之一,同时还是五个



儿子的母亲^①。她承认母亲照顾儿子的重担以及其讽刺性的本质：

我用我的双手细心照料这些男孩……我多么渴望不去干家务和照顾小孩……但是我觉得还是等到时机成熟时再更加详细地告诉他们我所受的苦……

……明天太阳会发出耀眼的光芒，我亲爱的宝贝会睁开他那漂亮的蓝眼睛，欢叫着，充满爱意的看着我，使我再次感到生活的快乐……

当想起女人得到的大量错误待遇和不公，我羞愧万分，因为我不能一直对此保持长期愤怒，不是很瘦小，不总是眼睛充满泪水，嘴里全是诅咒，我的双手没有反对每一个男人和兄弟！啊，我怎么才能忏悔我为男性洗漱，为他们缝补棒球手套和裤子，以及手脚被弄断的罪恶啊！

但是女人为了追求女权而从情感上或其他方面放弃了他们的儿子，想起来也很荒唐。当然，母子关系——如同所有的感情关系一样——在进行重新的评价，不仅是在母亲对于男性意识形态关系的变化方面，而且她对儿子的希望和担心方面都在重新被评价。如果我们希望得

① 其中一个名叫 Theodore 的儿子与姐姐合作编辑了斯坦顿作品的其中两卷，他还写了自己的书：《欧洲妇女问题》。——原注

到儿子——同希望女儿一样——他们就可能在成长过程中不被性别角色伤害以及对各种形式的厌女情结敏感。我们还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在历史的当代舞台中,我们的儿子可能会在男性世界中感到非常的孤独,几乎没有与其他男性的亲密关系(这不同于为保护男性特权的男人之间的“兄弟情深”)。当儿子停止充当其母亲参与社会的触角时,因为她伸进了自己内部,他就对她没有什么帮助了,就可能变成一个独立的人。

有时出于好奇,有时出于隐藏的敌意,有人曾经问我:“你的儿子对于这个是怎么想的?”(“这个”大概是说女权主义,特别是我对女人的承诺。)当有人怀有敌意这样问时,言下之意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必须仇恨男人,是非男性化的;“这个”当然是对我的孩子造成伤害的;这问题会让人有负罪感(显然我唯一的回答是“你必须去问他们本人”)。但是,我们放更少的精力让我们的儿子变成我们的工具,或成为让我们没有权利的系统的间谍,我们的儿子就更不需要在他们母亲毫无生气的生活的重担之下。

诗人苏·西尔维玛丽(Sue Silvermarie)写他的小儿子,不仅是作为对男性权利和特权赔偿,也是作为她“母亲身份”的深层次意想不到的揭示:

我对女人作为男性的母亲的深深偏爱看起来有些矛盾。但是这就是我的偏爱,它让我洞察到了母性的吸引

力。每天的角色任务会很容易模糊了这种吸引……激情变得清晰——当我肚中怀着他时，写出了一系列的爱情诗歌……有勇气公然地反对所有称他为私生子的人……医院病房里我抱他在怀中，抬头看我自己的母亲眼中充满了泪水……当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天空变得晴朗，但是当我们关系不和时，乌云密布。当我有这些憧憬时，他的性别界限已经变得不再重要。……没有怨恨，自由地爱他。对于我来说，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我不需要牺牲我的完整，但是我也不能牺牲我儿子的完整。这种母性吸引的热情需要整个人的投入。

然而，在她的诗《致男孩》中，这位母亲也承认可能有困惑和分离的时候：

我颤抖地去看你的体温。
失去你对我意味着什么是那么的明显。
为你那么困惑
已经是一个小男人了
你被看做权力的东西所引诱着
至少一半是
我用你的枪做什么？
你在犯法，但我认为
是我在法律之外
而你在其中



同意,
谁能对法庭视而不见……

当然,在此“阳具”变成了母亲完成使命的对立面。把她孩子看得弱小而深切地关爱着,她从他仅有的一点男性特征中得不到任何东西。她担心阳具给他的代价——这个男孩接受并被控制在父权法律下。但是她也不希望他的孩子是女孩;她肯定了性别世界的复杂和痛苦。

罗宾·摩根(Robin Morgan)用特殊的方式向她儿子表达:

小心肝,小心肝
你在我腹中歌唱,如同盘旋的赤杨芽
你,给了这个母亲生命
需要多久才能领会得到?神秘的你……
你像狼蛛一样黏着我
的后背;狼蛛母亲,
无论在哪里跌倒,我都等待
等待着你爬起继续前行。

然而你已经快五岁了
我现在却什么都不知道
可以完全从你出生的地方把你劫持





我就写到这里。

我想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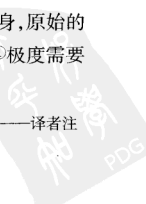
你是母亲的孩子

不管多老，你的容貌对于我来说都不会改变……

也许很客观地说，这些母亲也想要利用她们的儿子，培养他们的反男权主义价值观。但是向我们儿子大量灌输反对的观念和希望他们能够像我们现在一样解脱自己二者有着很大的区别。我在摩根的诗中感到了一种希望和期待，对这两者的表达——或许乐观地——使人信服；而在西尔维玛丽的著作中不仅结局有很大的不同，对儿子不得不从“男性群体”和他自己的人性之间做选择的认识上也有很大分歧。

我们再回到单个的问题上。对于儿子来说，保持摩根所说的“母亲的孩子”并不是保持自己的孩子气和依赖性，教育的接受者而不是给予者，一个永远的男孩。这看似很矛盾，使这个“父亲的儿子”坚持到处寻找女人，与女人在一起他感到自己还是小孩子，是需求的化身，原始的小孩，斯坦利·柯瓦尔斯基(Stanley Kowalski)^①极度需要

① 斯坦利·柯瓦尔斯基：电影《欲望号街车》的男主角。——译者注



女人。父亲们的世界,这个男性群体,太沉迷于侵略和防御,以至于不能认可害怕、自我怀疑、致命弱点和泪水,不能在这些出现时给予安慰。父亲的儿子在痛苦的状态下学会蔑视自己,只向女人袒露心扉,而他肯定当时也对她们报有蔑视,或怨恨她们知道他的弱点。“母亲的儿子”(首先爱自己的母亲)更有机会认识到坚强和脆弱、铁面无情和感情丰富、培育和统治并不是相对立的,并不是某单独一种性别的继承使然。但是这暗示了一个对母子之间爱的新的理解。

普通的心理分析学家有这样一个观点:“母亲的儿子”之所以变成同性恋者,不是因为母亲权力的推波助澜,就是因为反对和抗议传统的男性角色。事实上,我们很少知道是什么东西和事件导致他们对自己性别产生情爱。而对于异性恋,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生物功能,巨大的社会压力使他们必须维持这个功能,这个程式化的冲动完全远离了该生物种类的现有生理需求。为什么男人选择男人作为性满足的对象或生活伴侣而不选择女人,对于5世纪的雅典人,这是一个不能过分简单化回答的问题。而对于那些母亲想要“留住”他们而弱化他们男子气质的儿子们,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回答(歌德和弗洛伊德两人都不是因同性恋而变得赫赫有名,但是他们都是被关爱被钟爱的母亲的儿子)。一个男人可能要寻找另一个男



人的爱来回应其父亲的Khamstvo,以及他把女人作为性对象的恶心的虐待,或者他可能想要替代一个经常不出现的父亲。男性同性恋的范围——从真正喜欢和关爱女人的同性恋者到轻蔑替代女性压迫的易装女王,这只是我们知道的最浅层的方面。我认为所有的男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害怕强壮的女人,但是我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在同性恋人群中这种恐惧程度就要大于其在那些自称为“正常”的男人中的程度,男人们创造出的系统是同质化的系统,它排斥和贬低女性或者否认女性的存在。而我们排斥这些系统的最常用的理智的手段就是成为或应该成为母亲。异性恋和同性恋男人都受到这些系统的保护。但是因为我们的气力、我们的言谈举止会“把我们的儿子变成同性恋者”的担心仍然不断出现,甚至那些并不指责同性恋的女人们也有这样的担心,因为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存在,一个男孩变成“真男人”看起来或许是一个更好的命运。

6

我们想从儿子那里得到什么?这个问题困扰那些开始挑战父权制价值观的女人们。在心灵的最深处,我们想要他们是母亲的儿子,但是他们还是成长为自己,发现新途径,去做一个男人如同我们发现新途径去做一个女

人一样。我们可以希望有更多的父亲——不是一个,是很多——也可以是儿子,有感情有承诺的父亲来帮助他们进入男人世界,在那里他们不用把女人看做营养和慰藉之源。这种父亲几乎不存在,但只要有一个优秀的人出现,那就有希望,不过这只解决某个人的问题。如简·拉扎瑞(Jane Lazarre)指出的那样,象征性“介入”的父亲不是一个个人的解决办法。直到男人们准备好承担他们的责任,把全面地专职照顾孩子当做社会第一要务时,他们和我们的儿子将不会有一致的关于非父权制男人世界的憧憬。男孩子所经历的痛苦、挣扎和犹豫并不是摆放在非传统的强壮母亲的门前,那些传统父亲们,甚至当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无时无刻不在抛弃着他的孩子。几百年后,在历史的这个时刻,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最强烈的意识中,大多数的儿子实际上没有父亲。

即使避孕法已经相当成熟,以至于没有一个女人需要迫不得已怀上自己不想要的孩子。即使法律和风俗改变——只要女人并且只有女人是养育者,我们的儿子就会成长,他们从女人那里寻找同情,怨恨女人的“控制”力,在我们进入新的关系时黏住女人。只要社会本身是父权制的——它是反母性的——母亲就永远不能足够地照顾儿子,他们就不能不在父亲的统治下成长,在一个公开的“男性”世界,远离私人的“女性”情感世界下成长。



我们把儿子移交给父权制，以“为军队作贡献”的形式，象征性或真正地容许他们迫害我们以显示他们男性特质；我们帮助他们脱离我们从而变成他们自己，我们需要了解这两者是不同的。以斯帖·哈丁引用被人不断提起的神话“儿子的牺牲”：阿提斯、阿多尼、霍鲁斯、俄塞里斯。在这些神话中接近男性世界的儿子被“她母亲的勒令和赞同”所牺牲。她观察到这些神话都是站在儿子的角度，把神话当做“牺牲他自己的孩子气和依赖……的需要”。她从母亲的角度审视这件事情：“她爱他，但是在神话中她必须牺牲他。”在以前所有说“可以”的事情上（放纵，保护，顺从，完全的慈爱）她必须说出一个肯定的“不”。

对于母亲，也同样对于儿子，一生时间都在做母亲会否定了她自己的完整。哈丁认为对于她自己，也同样对于她的儿子来说，源源不断地来自母亲的保护是不愿意面对生活的艰辛。她更进一步地把“牺牲儿子”看做发生在一般女人和男人之间的需求：

这种牺牲……不会代表阉割，因为男人要求女人的最基本的满足就是他自己的性满足。他感觉到的是在这个领域里……除了要求女人服侍他外，最无助的就是解决自己的需求。就他而言这个孩子气般的要求和给她们的平等的不成熟的母亲祝愿，可能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建立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的联盟。但是当他们的

在需要一个更成熟的东西的情况下……这个男人可能会被迫认识到这个女人不只是他所需要的东西……当她拒绝不再抚养他,不再强迫把她自己的需求变成她的决定来满足他的需求,他会发现自己必须面对现实……女人好像是他的母亲一样,满足男人性和情感上的需求。一旦失去阳物就意味着这个男人必须放弃他的这个需求。

哈丁是在说母性情感可以像禁锢儿子一样禁锢母亲。但是母亲的奉献精神是一个被普遍赞扬和支持的品质。儿子可能顺利进入男性世界,或者他后期的困难可能会怪罪于他的母亲过多的疼爱和保护,但是由于在与儿子的分离过程中她做出的努力,她还是得到了一些支持。

像其他的荣格学派的学者一样,哈丁没有强烈地迫使女人(不只是母亲)与男人保持“给予”、赞同、母亲似的关系。如果拒绝这样做,即使是在轻松的关系或谈话中,都经常会被斥责为“不友善”、“烦人”、“让人不能生育的贱货”。从女人嘴里说出的简单事实经常会被认为是直指男性生殖器的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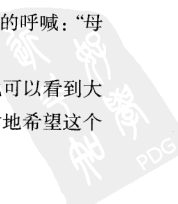
同时女人们也增强了对男人的“母性”态度。一个女人在与男性的关系问题上给别人建议的时候,通常会提及如何对待孩子的问题。一位敏感而又博学的母亲给我写信说:“(我们的)态度可以影响男人对他们自己的理解,



所以他们遵守它。换句话说——在对待孩子时——如果你对一个孩子说‘你很卑鄙！’他或她会同意，然后内化你的评价，从而变得卑鄙！”事实上，两性之间最阴险的形态之一就是女人平等地对待男人和小孩。这对男人来说是把自己当小孩对待，而且还意味着一种不可估量的女性引诱的能量。

玛丽·戴利注意到男人看不见女性彼此的交流。这是他们害怕的真正的分离——女人不应该在那里等待他们从男性群体这个等级森严的阳性世界中回来。男人对女人彼此交流的恐惧，如果不受到奚落或蔑视时，他们常常会说：“不要离开我”——对女人的恳求。但这个女人在寻找她和其他女人的精神和政治团体。“任何新方法、新社会的真正有创新性的憧憬都应该而且必须包含男人”。一个陷入麻烦的朋友写信跟我说道，用的是美国最性感的学院之一的信纸。当女人之间交流并听从她们的时候，他害怕失去“人性”。我猜想他真正害怕的是男人之间人性的缺乏，男性群体的头脑分裂，男人与男人之间不成熟的感情，对目标的无情追逐，肤浅的自卫性的男性友好。在此之下，我所听到的是一个大男孩的呼喊：“母亲！别离开我！”

而且，男人害怕失去特权。非常明显地可以看到大多数“关心”、“支持”女权主义的男人们偷偷地希望这个



“解放”会给他们流泪的权力,但同时仍然享有原来的特权。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描述那个虐待阿尔及利亚革命分子的欧洲警察局局长,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和痛苦以至于他的家庭生活严重被打乱,因此他来这里做精神治疗。

这个男人清楚地知道他的病是由一种在审问进行的房间中的活动直接引起的……因为他不能停止虐待人(这对他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样的话他不得不辞职),所以他直截了当地要求我帮助他消除心灵的刺痛和行为阻碍,完全心情平静地继续虐待阿尔及利亚爱国分子。

男人不断意识到他们的疾病可能与父权制有关,但是他们很少有人愿意从中退出。女人的行为也与母子关系有关:不是由于过去男人的不良举止而对他们的惩罚和遗弃,就是女人可能治愈男人的痛苦,一个母爱的新形式,一点一滴通过轻柔的劝诫,带着一个新憧憬的女人安抚男人进入一个更加人性和感性的生活。总之,女人会继续为男人做他们为彼此或自己做不了或者不愿做的事情。

“为了儿子我们要做什么?”这个问题最终变成了我们为男人做什么以及男人会要求我们什么?(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世界上大多数女人的生活直接被父权制大大地影响。人数众多的家庭,缺乏照料或根本没人

照顾的孩子,营养不良,被迫孤立,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对性别歧视毫不反抗——去要求什么或去问这个问题,但事实并没有使这个问题显得反动或无足轻重。)当然,首要的问题是我们想为自己做些什么?然而,另一个问题始终围绕着我们,无论我们是否有孩子,是否结婚,是否离婚,是否是女同性恋,是否独身,是否是著名的女人,是否是女权主义者,是否是独立派。

如果我能为我的儿子许个愿,那就是他们应该拥有女人的勇气。我是说这些坚强和正确的东西:我在女人中看到的勇气,在她们私人 and 公开的生活中,在她们梦想、思考和创造的内心世界和父权制的外部世界中。她们新眼界的发展,使她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经历着越来越大的风险。有时这包括巨大勇气的小小行动,有时一个公开的举动可以失去她的工作或生命;通常它还包括有时或者长时间地考虑那些不可想象的问题,被指责,或者疯狂的感受;总是失去普通的安全感。每一个把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女人都会这样,她们知道她必须要经历内外巨大的痛苦。我希望我的儿子面对这些苦难不会退缩,不会满足于包括宿命论的自我悔恨在内的那些已有的男性自卫能力。我希望他们这样做不是为我,或者为其他的女人,而是为他们自己,为在这个星球上生活。

在1890年奥莉芙·施赖纳讲了一个寓言,说的是一

个母亲想要渡过一条不能徒涉的深河进入到自由之地的故事。她想要带上她正在吃奶的男婴,但是有人告诉他,不行,你这样保护他会失去你的生命;他必须长大成为一个男人,保护自己,然后你们会在另一端相见。当我们想让这些改变简单,不吓到他们的时候,我们把男人当幼儿看待并欺骗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放下抱在怀里喂养的成年男孩,相信我们自己和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些。是的,我们必须预想他们的愤怒,他们“别离开我”的哭喊,还有他们的报复。

尽管我认为让任何男性群体作他们自己是最具革命性质的首要任务,但是我还没有资格去计划把大量男人共同特质变为一个能够照料孩子的全面的系统。这不但会改变孩子们——因此男人们——对女人和男人的期望;它也会淡化性别角色和两性工作形式的多样性,同时也会改变整个社会与儿童的关系。学习照顾孩子,男人就不会变得孩子气,而且父亲的特权也不会像现在一样因为没有亲身抚养孩子的经历而随便乱用。我可以看见把男人并入照顾孩子的全过程有很多困难和危险。隐现出的第一个就是原来的照顾孩子的观念,因为这一直是女人的工作,所以它是消极的、低水平的,根本就不算工作;或者它仅仅是一种“乐趣”。紧接着的就是男人没有同情认同的能力。我还认为许多女人会喜欢在全天照顾的系

统中,女人做大部分的工作——这有很多原因,但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这么目光短浅或者传统。不论在什么事情中,女人必须而且一定会是需求、计划以及实施这巨大结构和人性的变化的领导者。为了这么做,我们必须更有意识地保持自己的无意识领域,母亲的隐含意义,生物学上和非生物学上的。或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他们的男性教育把他们变成文盲的情况下,男人会需要一种补偿教育。

与此同时,在个人关系领域,如果男人开始承担“爱的工作”,我们就不得不改变爱他们的方式。这也就是说,在他们承担了一部分照顾和培养工作以后,在其他事情中,我们就不再赞美和感谢我们孩子的父亲(没有一个女人因为承担了作为家长的责任而被认为“特别”,而不做这些事会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犯罪)。这也是说我们不再对待男人好像他们的自我是蛋壳包住的,或者好像一个用平等关系换来的男性自我的保存是值得的。这意味着我们开始期望于他们,就像我们期望于女人一样,他们可以像我们一样行动,没有因此而受到赞扬或变得“特立独行”;也意味着我们拒绝他们的把“爱”与“工作”分开的传统。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不会把这个看做为一种爱的新形式。我们会被告知我们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不是

出于怨恨；我们变得“喜欢他们”；没有我们的不断呵护和关注，他们的情感会枯萎。但是经过了几个世纪，那些大男孩们依偎在我们的乳房周围寻求情感的慰藉，我们仍然被称为污浊的、贪婪的、极权的、受虐狂、悍妇、贱货、女同性恋者和妓女。

我们正慢慢地学会怀疑那些话语，包括在开头的那句：母亲比其他任何女人都要真实。





第九章

母亲与女儿身份

母亲

我给家里写信

我孤独

让我的身体回来吧。

——苏珊·格里芬

1

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一个开着口的文件夹就躺在我的身边，也许所有与之相关的资料和摘录卡片都撒落了出来，但没有哪个能够帮我开个头。这是我这本书的核心所在，我作为女人涉及到这个核心，这个女人生于她母亲的两腿之间，总是会一次又一次以不同的方式试图回到她母亲，去重新拥有她，并被她所拥有，试图去找到

那种来自或与另一个女人之间的彼此的确证，这种确证是女儿与母亲都孜孜以求的，同时又想去摆脱的，想去弄清楚这种相互的确证是可能，还是不可能。

任何女人关于温暖、食物、温柔、安全感、感性知觉、人的相关性的最初知识都来自她母亲。最早把一个女人的身体与另一个女人的身体捆绑在一起的东西可能很快或不久之后就会被抛弃或拒绝，感觉它是某种令人窒息的附属物、否定物，或某种禁忌之物。但在当初，它却属于一个完整的世界。当然，男性婴儿也是最早从一个女性身体那儿了解到温柔之情、食物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只是制度化的异性恋形式与母亲习俗要求女孩-男孩改变这些与依赖、爱欲和相互性有关的最初感觉，从最初的女人变成某个男人，如果她会变成一个被人们理解的“正常”女人，那么，一个女人其强大的精神与身体能量就会对男人直接构成威胁。

在看到我自己的经血之前，我就见过我母亲的经血。她的身体是我曾经见过的第一个女性的身体，知道了女人曾经是什么。我就知道我将会是什么。我记得在我童年早期那些炎热的夏天与她一起洗澡，与她一起在冰凉的水里玩耍的情景。作为一个不大的孩子，我觉得她非常美丽，如一幅挂在墙上的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印刷画像，神秘的微笑，头发飘逸，在我的心中，我总是把这幅画



与我母亲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在青春期早期，我仍在偷看母亲的身体，并且充满了模糊的想象：我想我也会拥有乳房，丰满的臀部，两腿间长满茂密的毛发——当时，不管那些东西对我意味着什么，我都充满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想法。同时也冒出了另外一个念头：我也会结婚，会有自己的孩子——只是与她的情况不一样。我将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这一切。

我父亲紧凑、瘦小的身体并没有抑制住我的想象力，尽管有一种权威性与控制欲的东西像带电的灯丝一样充满了他的身体。我经常看见他晃动在一件宽松的系带睡衣下的阴茎。我很早就理解了他和我母亲之间的那种不同。他的声音、出现、风度似乎都渗透在了这个家庭之中。我不记得我母亲那种女性的感觉是从何时开始给我开启了一条通向我父亲自信心灵与性格魅力之路的，也许是在我妹妹刚出生的时候，他便开始教我读书。

我母亲的名字：海伦，对作为一个孩子的我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我仍然认为那是一个最美丽的名字。在很小的年龄读希腊神话的时候，我总会以某种方式把作为我母亲的海伦看成是特洛伊的海伦，或者更多的时候把她看成是我父亲喜欢引述的那个爱伦·坡的海伦：

海伦，对我来说，你就是美，



像昔日那些尼斯港的小船，
温柔地漂泊在芳香的海洋，
那位疲惫的流浪者
正驶向家乡的海岸……

我母亲海伦，她就是她人生之旅的本土之岸。我认为在这首诗中，我第一次听到了我内心的渴望，这是那种由一个男性诗人来表达，用一个男人——我父亲——的声音来吟诵的一个女孩的渴望。

我父亲谈到过许多关于美与期求完美的故事。他认为女人的身体是不纯洁的，他不喜欢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自然的气味。他精神追求的一种方式，就是使自己远离低级存在的领域，那是一个属于流汗、分泌、女人每月排血、怀孕的世界（我母亲会变得非常警觉，在怀孕的最后几个月，她总会回避去看她的身体）。在这点上，他也许是个真正的犹太人，同时还是个非常南方化的犹太人：“纯洁”而贫血的白种女人被人想象成一种梔子花，这种花会被月光染成白色，当有人接触到它的时候，它的边缘就会被弄脏，变成另外的颜色。

但是我坚信，我在我母亲身上得到的那种最早的愉悦与快慰的印象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从整体上被抹杀掉的，即使在我成了我父亲女儿的那几年中，也是如此。我



为那种无形针对女人身体的莫名其妙的自我怨恨感到痛苦，这些女人通常是通过男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我相信我从自己的身体中所得到的那种愉悦，即使在我还没有听说过手淫这个词的时候。毫无疑问，我母亲会主动去抑制这种事实上她已非常了解的快感。只是感觉到通过当初对她身体的爱，我会最终去爱我自己的身体，除此之外，我毫无其他办法，这身体是来自深邃母性的一份遗产与馈赠。我知道我不是一种抽象智性的存在。也许我的精神与肉体是分离的，就像存在于我父母之间的那种分离，只是我却同时拥有这两者。

母亲与女儿一直都在交流着某种知识——它超越了女性遗留下来的一种书面学问的传承——这种知识是潜意识的、看不见的和超语言的：它流动在两个相似的身体之间，其中一个会在另一个的身体里呆上9个月的时间。分娩的经验会把母亲深度的震荡反射到女儿的意识之中；在怀孕与分娩期间，女人会常常梦见她的母亲。艾丽丝·罗斯(Alice Rossi)认为，在给自己孩子第一次喂奶的时候，一个女人通常会回忆起她母亲奶水的味道。关于月经，一些女人会产生一种与她们母亲之间的女性亲密的感觉，即使她们的关系通常是痛苦与冲突的。



2

写到我母亲，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犯难的事情。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写，因为这是我正在讲述的故事，是我对过去岁月的看法。要是她能讲述自己的故事，也许其他的情景就会被披露出来。只是在我和她的这些情景中，却总是会残存一些过去的、无法消除的愤怒之火的痕迹。在她结婚之前，她接受过多年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的训练。出生在一个南方的小镇，被一个强壮、令人失望的女人哺育，她曾经赢得了一个与巴尔迪摩皮博迪自然保护区那位主任一起从事学术研究的奖学金，通过在女子高中教书，她实际上打开了一条在纽约、巴黎和维也纳从事学术研究的道路。从16岁起，她就是一个年轻的美女，她可以在任何想结婚的时候结婚，但是她又同时拥有极不平凡的天赋、自信，以及对自己时间和空间支配的独立性。她阅读广泛，写作优雅，且才思敏捷，这从我童年时她写的游记和至今写的书信可以得到证明。

在10年的婚约之后，她与我父亲结婚了，其间她完成了她的医学学业，且开始在医学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声誉。一旦结了婚，她就放弃了作为职业音乐家的那种可能性，尽管她有好几年也去参加了音乐比赛，她现在仍然是一个技巧非法、颇有造诣的钢琴家。我的父亲富有才



干与抱负,完全被自己的动机所支配。可以设想,我母亲会为了他的发展而完全放弃自己的生活。由于有了医学教授妻子的那份礼节与优雅,她有能力和操持好他的家务,尽管依靠的是一种有限的家庭预算;她会“坚持”她的音乐,毫无疑问,她作为妻子与母亲的那种责任会与她的比赛与练习发生冲突。她被期望去怀上他的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她必须盘算着为家庭的账本上留下最后一分钱——至今我仍能看见那本很大的用她干净、有力的手来画过的蓝灰色的账本;她用手推车去市场购物,后来,当他们能够买上车的时候,她拉着我父亲到处跑,从他的实验室到课堂,她经常在外面等上好几个小时。她哺育两个孩子,教我们所有的课程,包括音乐(直到小学4年级,我们两个都没有被送去学校)。我相信,她是强迫自己觉得对我们的不完善负有某种责任。

我父亲像那位先验主义者布赖森·奥尔科特(Bronson Alcott),他相信他(更不必说他妻子)能够按他那种独一无二的道德与智力的计划来培养孩子,这样就能向世界证明那种启蒙的、非正统方式的教育儿童的价值。我相信,我母亲与阿比盖尔·奥尔科特(Abigail Alcott)一样,在开始的时候,还是真诚而热情地支持这一试验的,只是后来才发现实际上自始至终贯彻的都是她丈夫那种极端而完美的计划,她感觉到这与她作为一个母亲的那

种深度本能是冲突的。也像阿比盖尔·奥尔科特一样，她肯定已意识到当这些思想由她丈夫来阐述时，她的日常琐事、平时的实践就该由她来全部承担（“她会痛苦地说，‘奥尔科特先生在总的原则上对我有帮助，但在具体的细节上却没有人会给我支持。’……此外，她丈夫的评论总会使她弄不清楚，她是否正在做一件意义的事情。‘我做得对吗？我是否做得足够？是不是做得太多了？’”在奥尔科特的第二个女儿露易莎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脾气”与“意愿”常常遭到她父亲的谴责，因为这些东西来自她母亲的遗传）。在母亲习俗的控制下，如果理论证明与事实不符，或任何事情出了差错，那么最先受到指责的就是母亲。然而，即使在早期，我母亲就让一部分计划流产：她并没有生下一个儿子。

多年以来，我都以为我母亲看重的是我父亲，而不是我，为了他的需要与理论而让我做出了牺牲。当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我几乎没有与我母亲联系。我一直都在为我感情生活的权利与我父亲作斗争，为自己的生活而努力，而不是为了他的那些要求与理论。我们的战斗胜败难分。即使由于第一个孩子的原因让我感到恐惧、疲惫、孤独，我也不愿意对自己承认，我想我的母亲，想单独地告诉她，我是多么想念她。当她来医院看我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无法消除那种可以让整个房间暗淡下来的



沉闷的感觉，纷乱的思绪让我回到了她用三天时间来生我，并且我又不是一个儿子的情景。现在，26年之后，由于过敏反应，我躺在一家传染病医院的病房里，全身长满了皮疹，嘴唇与眼皮鼓胀，身子青肿，缝满了线，床边的摇篮里睡着一个我早产的完美、漂亮的男孩。在我不能开始辨认自己之时，我又怎能理解她的感受呢？我的身体已经非常雄辩地说出了一切，然而从医学上讲，它仅仅是我的身体。我希望她再次照看我，像她曾经对我做过的一样，用她的双臂抱我的孩子；只是这孩子却同时又是一个挑战：这是我的儿子。由于她的祝福，我渴望把我生命的一部分给予他；我生命的一部分想把他作为我们女人在不幸的、不必要的争斗中获胜的一个象征。

但是，我这仅仅才开始。就像我当初不可能知道一样，我现在理解了，在那次重要而不实在的会晤中，我们之间存在的那种糟糕的感觉，责任在于她。不久之后，我就开始理解了母亲身上那种沉重的责任，那种每天每夜、每时每刻都压在身上的包袱，比如，我正在做的事情是对的么？我做得足够么？是不是我做得太多了？母亲习俗认为，所有母亲在使她们的孩子表现不佳方面多多少少都承担责任；尤其我母亲，按照我父亲的计划，她一直都渴望去创造一个完美的女儿。尽管有令人高兴的早熟，但这个“完美”的女儿却早就患上了脸部痉挛的毛病，并

且爱发脾气,在22岁时,由于关节炎而长期站不起来;她最终对父亲那种维多利亚式的家长作风、诱人魅力与严厉的控制采取了抵抗的态度,与一个离了婚的毕业生结了婚,并且开始写“现代”、“朦胧”和“悲观”的诗歌,这些诗歌没有旦尼生式的甜美、流畅的韵律,直到最后她草率地怀孕,把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她已经不想去做那个庄重与早熟的孩子,或充满诗意与诱惑的青春少女了。在我父亲看来,有些事情显然已经达到了一种令人感到恐怖的程度。我能想象,不管我母亲别的感受是什么(我知道她会默默地站在我这边),但她还是被动地感到了某种耻辱。自从那次她告诉了我,她所体验的那种“麻木”之后,我就能够想象所有母亲心中的那种内疚了,因为我通过自己已经了解了它。

但是,我仍然还不能说了解。现在对我来说,去写我母亲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太了解这种难度了。我会努力去描述我乐意成为她女儿的那部分内容,但我发觉我被分离了,在她的皮肤下滑行;我的一部分完全与她融为一体。我知道,那种指向她的积累得很深的愤怒在我心中仍然是存在的:这是一种四岁大孩子的愤怒,由于错误的行为就把她锁在一间小房子里关禁闭,尽管是我父亲的意思,但却是由我母亲来执行的惩罚;这是一种被要求长期坐在钢琴前练习弹奏(仍然是他的主张,却是她指

如此。

在20世纪新女权主义思潮兴起的早期,对我来说,去分析我母亲所受的压迫,去“理性”地——并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母亲为什么没有教会我们成为女斗士中的一员,为什么她们要束缚我们的手脚,或完全扔下我们,这未免太嫌简单了。过去的分析是准确的,甚至是激进的,但它仍然像一切政治所狭隘理解的那样,假定人的意识能够理解所有的信息。在我们大多数人当中,这种情况仍然存在,一个女孩-男孩仍然希望得到一种女性的养育、温柔与赞同,希望得到一种在我们保护中的能够被运用的女性的权力,希望得到一种女性的气味、接触与声音,在我们恐惧与痛苦的时候,得到女人那双强有力手臂的拥抱。我们每个人一直都在渴望拥有一个被选中的母亲,用克里斯特贝尔·潘克赫兹(Christabel Pankhursts)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女人的缘故,由于事前估计了(她激进的参政行为的)那种代价,母亲愿意去付出这种代价”。去理解我们的母亲是不够的,我们不应该仅限于此,为了理解我们作为女人的力量,我们需要她们。我们没有必要为我们心中那种女孩的哭泣感到可耻,或者退却;它是我们创造一个世界的欲望的源泉,在这个世界中,坚强的母亲与坚强的女儿将会成为一个必然的结果。

我们有必要去认识这种双重的情形,否则,我们决不



可能理解我们自己。我们甚至不能理解我们当中大多数以这种方式被养育长大的人；我们只能理解，我们的母亲在以某种未可预测的方式站在我们一边。但是，如果一个母亲由于死亡，或者把我们转给别人收养，或者由于生活迫使她染上了酒瘾、毒瘾，导致长期压抑，要不就是由于精神癫狂而抛弃了我们，如果她被迫把我们交给那些冷漠、无爱心的陌生人，以便赚取为我们购买食物的钱，因为制度化的母亲身份没有提供足够多带薪的母亲，如果她试图按这种制度的要求去做一个“好母亲”，并由此变得焦虑、忧伤，成为我们清教道德的守护者，如果由于她想过一种没有孩子的生活而完全抛弃我们——不管我们有多少理性的宽容，无论单个母亲有多大的爱与力量，我们心中的那个孩子，那个成长在男性控制世界的弱小女性，仍然随时都会感觉到没有被抚养。当我们能够正视并理解这种悖论，这种冲突，面对我们心中那个迷失小女孩的那种探索热情时，我们就能够开始去改变它，并且从女人身上反复迸发出来的那种盲目的愤怒与痛苦就会试着去共同构建一个可能会富有吸引力的运动。实际上，在姐妹身份出现之前，那种关于母亲与女儿身份的知识就早已存在，也许这种知识是暂时的、片面的，但却又是原初的与关键的。

3

存在于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心理能量是一个没有被人书写过的伟大的故事,这种能量是自发的,常被歪曲与误用。也许,在人类的天性中不会再有比在两个生物学上相同的个体间所发生的能量交换更为和谐,更容易产生共鸣的了,其中一个在羊膜的保护下躺在另一个的身体里,一个通过分娩赋予另一个以生命。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涉及到人的那种最深刻的相互性和最痛苦的疏离性,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ed)指出:“我们不清楚存在于母亲与女孩之间的那种在生化方面表现出十分亲和的可能性,对母亲与男孩之间的那种差异性也毫无所知。”但这种关系在父权社会的历史中却被人们低估与忽视了。无论在神学教义,还是在艺术、社会学或心理分析的理论中,母亲与儿子通常都是作为永恒、不变的双重性出现的。这不会太令人感到奇怪,因为神学、艺术,以及社会理论一直都是由儿子们创造的。像一般存在于女人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母亲与女儿之间的那种关系,一直都令男人们感到极其害怕。

(那个女人)在身体里孕育她丈夫的孩子……不久之后,通过怀孕的母亲和举行仪式,即使是在出生之前,父



亲就会使这个孩子变得高尚起来。当他这样做时……他实际上是在为世界的延续提升他的第二次生命……这是他生命的再次重生。

在埃及的赞美诗中，阿托恩(Aten)或阿图姆(Atum)是受到欢迎，得到赞美的：

女人身上播种生命的创造者
你让体液流入男人的心中，
是你让那个儿子孕育在母亲的子宫里……

在犹太传统的信仰中，人们认为女人的灵魂是与男人的精子联系在一起的，当然，结果就是造就出一个“男性的孩子”。

女儿一直被认为通过无声无息的方式，同时也通过杀婴的方式被抹杀掉，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在哪儿都成了最主要的牺牲者。“即使是一个富有的男人，也总会去抛弃一个女儿。”德·莫斯(Lloyd deMause)指出，从古代到中世纪，男女的比例在统计学上就是严重失衡的，这是由杀婴的习俗造成的结果。女儿不仅被她们的父亲杀死，而且也被她们的母亲所杀。公元前1世纪有一个丈夫理所当然地对他的妻子这样写道：“正如通常的情况一样，

如果你要生一个孩子,要是这是个男孩,你就让他活下来,如果是女孩,你就扔掉她。”由于这一习俗的长期流行,人们就不会去考虑,一个母亲是否会恐惧去生下一个像她一样的女性。然而父亲却可能会把儿子看做是他自己生命的“再次重生”,这样一种“重生”对女儿的母亲却是否定性的。

在《到灯塔去》中,弗吉尼亚·吴尔夫创造了一种现代文学中仍然是最复杂、最强烈的母女分裂的文学意象。非常明显的是,很少有这样的文本,在其中,一个女人会一直把她母亲作为主要人物来描述。拉姆齐(Ramsay)夫人是一个变化多端的角色,在连续读这篇小说的过程中,她会发生变化,几乎就像我们在发生变化一样,在我们心目中,我们的母亲也在发生变化。女权主义学者简·利林菲尔德(Jane Lilienfeld)指出,在弗吉尼亚的早期岁月中,她母亲朱莉娅·斯蒂芬(Julia Stephen)就把几乎所有的心血、母性的关爱全都花在了她丈夫和她丈夫毕生的事业上——撰写《国家人物传记辞典》。后来,弗吉尼亚和她妹妹瓦内莎(Vanessa)打算在彼此的身上去寻找母性的温馨,利林菲尔德指出,伦纳德·吴尔夫(Leonard Woolf)想给弗吉尼亚提供某种细微的关心,这种关心是她母亲给予她丈夫的。在任何情况下,拉姆齐夫人由于她“奇特的严谨、极端的彬彬有礼”,对别人需要的留意(主



要是男人们的那些需要),所以她具有吸引人的超凡魅力,即使是一个生了8个孩子的50岁的女人——拉姆齐夫人也仍然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她是“美妙的富有……是男人深陷其极度匮乏中的一种生活之源泉与浪花”,与此同时,“她感觉她称为生活的那种东西是令人恐怖和充满敌意的,如果你给予它一个机会,它就会突然猛扑过来抓住你”。

然而就像利林菲尔德指出的那样,她理解“男人的善意与贫乏”,她并不十分像女人,她的生命完全花在了适应男人的需要上。年轻的画家莉莉·布里斯科(Lily Briscoe)用手抱着拉姆齐夫人,坐在她膝盖旁边,她的头靠在她的大腿上,渴望与她成为一个人,“在这个女人精神与心灵的幽室中,她以一种肉体的方式来抚摸她……正如人们认为的那样,难道爱真的会让她与拉姆齐夫人融为一体吗?因为这是无法确定的,仅仅是她渴望的一种结合,而不是刻写在石头上的碑文,所以,它不可能以任何一种男人理解的语言写出来,它仅仅是一个无法言说的秘密……”

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拉姆齐夫人并非她唾手可得。因为吴尔夫显然把自己变成了莉莉·布里斯科,于是,这种情况就具有某种双重含义:这个女儿在追求与母亲的亲近,那个女人在寻找与另一个女人的亲密,不是

她母亲，而是把她的激情与渴望为之奉献的那个人。很久以后，她理解了，只有在她的作品中，她才能够“勇敢地面对拉姆齐夫人”和她那种“超凡的权力”。在她的作品中，她能把“母与子”作为绘画的主题来拒绝拉姆齐夫人和詹姆斯。通过她的作品，莉莉·布里斯科是独立于男人的，正如拉姆齐夫人不能独立于男人一样。吴尔夫以一种最敏锐、最温和的方式戳穿了拉姆齐夫人身上那件人格光华的外衣，就像他们需要她一样，她需要男人，她的权力与力量是建立在别人的依赖与“贫乏”之基础上的。

毫无疑问，在《到灯塔去》中，作为女儿的吴尔夫在描述朱莉娅(Julia)之前，多年以来就把她想象成了自己的母亲。另外，那种令人神魂颠倒的专注之情是针对莉莉·布里斯科的。

她认为，即使有50双眼睛围着那个女人看都嫌太大。在这些眼睛中，肯定有一双对她的美如石头一般盲目。有人想拥有一些神秘的感觉，像空气一样美好，用这种感觉，通过钥匙孔去偷看她，环绕她，看她坐着编织、谈话、静静而孤独地坐在窗前的样子；这种感觉本身会对自己做出反应，并像空气一样被珍藏，这空气掺和有蒸气的烟雾，融合着她的思想、想象与渴望。那木篱对她意味着什么？那花园对她意味着什么？当浪花破碎时，这对她又究竟



意味着什么？

这恰好就是作为艺术家的吴尔夫所取得的成就，只不过这成就不仅仅是对她艺术才能的证明，而且也是女儿对母亲热情的证明，当然，首先是对她需要去理解这个女人的证明。对她来说，这个女人是如此令人崇拜，使人不可企及；她想以一种最复杂的意义上去理解使她母亲与自己分开的那种差异性。

生活在以母亲为主的家庭中的女性活动家与艺术家；也许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觉得，她母亲无法理解或同情她人生的目的与使命，或者觉得她母亲会喜欢与看重一个更加传统的女儿，或儿子。为了学习护理，南丁格尔不得不与由她母亲代表的那种上流社会保守的维多利亚式的母性传统作斗争，不得不与那种局限在客厅与乡村宅第的人生命运作斗争，在这些地方，她目睹了女人们“由于无事可干”而变得疯狂。画家保拉·莫德斯汉-贝克尔（Paula Modersohn-Becker）一生都担心和恐惧——她母亲不能接受她生活的方方面面。1899年，在她写的自己为作品奋斗的文字中，她说：“我专门为我母亲写下这些。我认为，她觉得我的生活是一种长期的自我主义享乐的不断沉迷。”由于离开了她丈夫，她写道：“我曾经非常担心你一直都在生气……而现在你对我却是如此之好……你，

我最亲爱的母亲,就在我身边,祈福我的生命。”写这些话是在她死于生孩子的前一年:

……我长期都感到心慌意乱,并且总是如此……只是偶尔才能稍停下来,然后又再次奔向一个目标……当我看起来不可爱时,我请求你记住这一点。这意味着我的整个身心仅仅关注的是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把这称为利己主义。如果是这样,那它就是最崇高的。

我把头放在你的腿上,这样,我才能继续往前走,为我的生命而对你充满感激。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那个著名的句子,“我从来就没有母亲”,被人们作过不同的理解,但真实的情况却是,她总在某种程度上感觉自己是个异常者,与她母亲过的那种生活是分离的。她最关心的那些事,她母亲无法理解。即使这样,当她母亲在1875年瘫痪发作时,她和妹妹两个人仍是给了母亲周到细致的护理,一直到1882年她去世。在那一年狄金森写的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

……我们母亲的离开是如此令人绝望地震惊,我们



两人都感到失去了知觉……唯有在她去世前的那个晚上，她才显得很高兴，觉得饥饿，并且以极大兴趣吃下了一些我为她做的晚餐，当时，由于开心，我笑了……

由于悲伤，我们弄不清楚该如何去宽恕我们生活中那些已经消失了的人（与她类似的人），如何宽恕我们见到的第一个人，悄然离我们而去的母亲。

尽管窃取了她的可爱的面孔，但我们仍然不能彼此相知，仿佛感觉在与一个醒来时会消失的幻梦搏斗……

女儿的信是以这位诗人的哭诉结尾的：“啊，语言的幻象！”

“在西尔维亚和我之间——就像在我母亲与我之间一样——存在着某种精神的渗透，有时候，这种渗透是非常美妙与令人欣慰的；但有时，它又成了一种不受欢迎的对个人隐私的侵犯。”这是奥里莉亚·普拉萨（Aurelia Plath）从另一个侧面对她和女儿西尔维亚之间的关系所作的描述。这种紧密的关系，似乎已给普拉萨《家信》的某些读者带来了困惑，《家信》是她每周或不到一周写给她母亲的书信，这些书信开初是寄自她读书的大学，后来是寄自英国，内容主要是倾诉对母亲的感情。甚至出现

了某种倾向，把这种关系看做是西尔维亚·普拉斯早期产生自杀想法的一个原因，归因于她冷酷的完美主义和她对“伟大事物”的沉迷。《家信》展示的仍然是一个非凡的女性，一个真实幸存者的形象；正是普拉斯的父亲为其树立了一个自我毁灭的榜样。这些信远非是完整的，直到大量的材料被公开发表之前，人们肯定会对写普拉斯传记与评论所作的那些努力产生质疑。只是在所有的倾向中，大家都为她对母亲的那种需求，当然，也可以说还有对诗歌与奖学金、书籍与孩子的需求作了辩护，为她要生孩子时对母亲的那种渴望，为努力让奥里莉亚·普拉斯知道她为养育女儿所做的奋斗与牺牲作了辩护。在后期的信中，西尔维亚试图去回避她和母亲之间那种“精神渗透”所导致的痛苦。她写道：“有时候，我没有勇气去看你。”解释了她为什么离婚后不想去美国的原因。“去年夏天，在我们之间，你所看到的和我认为你看到的是那么糟糕。除非我拥有一种新的生活，我无法再次面对你……”（1962年10月9日）。三天过后，她写道：“我毁掉了我的最后一件东西……我有（或曾经有过）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上的变化……每天早晨，当安眠药的药性慢慢过去之后，我会起来大约五次，在书房泡上咖啡，像疯子一样写作——在早餐之前完成一首诗……恐怖的琐事，仿佛那些家务已让我感到窒息……尼克（她儿子）长了两颗牙



齿,已能站立,是一个天使……”(1962年10月12日)

精神的渗透。绝望的自卫。这种束缚人的力量是消极的,因为它粉碎了人的意识,有时会对人构成威胁,使女儿返回到“那些神秘的幽室……像流进罐里的水一样,不可避免地变成某种雷同的东西,变成与人所崇拜的客体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要不就是与我们母亲的冷漠与残酷比起来,我们更不能容忍没有冷漠与残酷。

由于对女同性恋关系持有一种病态—悲剧的观点,《孤独之井》成了一部众人皆知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拉德克利夫·霍尔(Radclyffe Hall)描述了存在于安娜·戈登(Anna Gorden)与她同性恋女儿斯蒂芬(Stephen)之间的那种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厌恶之情。斯蒂芬的父亲通过阅读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bing)来“理解”她,把她当成可能是他一个悲剧性的有缺陷的儿子来对待。她母亲从一开始就把她看做是一个陌生人、一个闯入者、一个怪异的存在物。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小说作为作者的一种自我拒绝的流露,是令人痛苦的,她把被人们接受的,但她本能相冲突的观点隐藏在自己的心底。她自我憎恨的症结存在于母亲安娜和女儿斯蒂芬之间那种不可能存在的关系的想象中。然而在书中仍然出现了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中,她表达了对母女关系的那种渴望与可能性——这是一种建立在身体感觉基础之上的关系。

草地的芳香可能会神奇地感动这两个人……有时，斯蒂芬肯定会明显去拉她母亲的袖子——她无法独自去承受这种浓浓的芳香！

有一天，她说：“静静地站在那儿，否则你会伤害它——它就环绕在我们四周——那是一种纯洁的气味，能使我想起你！”当时，她脸红了，迅速抬头瞟了一眼，显得有些惊恐，她设想应该看见安娜在笑。

但她母亲却用一种严肃、凝重的眼光看着她，被这个仿佛完全矛盾的家伙弄得迷惑不解……由于树篱下那些白花绣球菊散发出来的气息，就像她孩子已经兴奋不已一样，安娜也显得情绪激动，因为在这样一种让她们融为一体的方式中，母亲与女儿就只能去使这种关系变得神圣起来，所以，这样一些简单的事物才可能会在她们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她们相互凝视着对方，仿佛在寻找某种东西……一方在另一方身上寻找；然而，等那一瞬间过去之后，她们又一声不响地往前走，在心里也并没有感到比以前更近。

一个在她母亲与自己之间感觉到有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女人，也许会被迫去设想她母亲——就像斯蒂芬的母亲一样——绝不可能接受她的性取向。然而，尽管有对同性恋普遍的无知与偏执的事实存在，有那种以社会的眼光看，她已经以某种方式“伤害”了她女儿的恐惧存在，但母亲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想——通过无声、间接、迂回的方式——去相信那个为女人而爱的女儿。那些完全过的是一种传统的、异性恋生活的母亲一直都对她们女儿的女性情人持一种欢迎的态度，并支持她们的家庭安排，尽管如果被问到时，她们常常会否定这种关系的性质。一个完全并欣然接受她对另一个女人之爱的女人可能会去创造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她母亲不会去拒绝她。但是，这种接受一开始必须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基础之上，它不会像一种意志的行动一样自行出现。

对于我们当中那些拥有孩子，并根据我们对女人感情的深度与宽度来认识与行动的女人来说，与我们的母亲建立一种新的复杂的联系是可能的。诗人休·希尔玛蕾(Sue Silvarmarie)这样写道：

我现在发现，女同性恋者与母亲的关系并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互重叠的。它和我的爱人与我，我的母亲与我，我的儿子与我的关系一样，是一种原始、完全包容和

最重要的母性连接。

在爱另一个女人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种深沉的强烈的欲望，既想去成为一个母亲，又想在我的爱人身上去寻找一个母亲。一开始，我对这种发现感到恐惧。我身边的一切都告诉我，这是邪恶的。流行的弗洛伊德学说谴责它是一种病态的偏激，一种不成熟的症状。但是渐渐地，我确定了对我自己需求与欲望的信念。……现在，我珍惜和相信发生在两个相爱女人之间的戏剧性事件，在之中，每个人都会变成母亲，同时又成为孩子。

再清楚不过的事实是，在调情做爱的过程中，那种日常生活的分离状态就会得到暂时的消除。当我亲吻、抚摸、进入我爱人的时候，我同时也是个再次进入我母亲的孩子。我想返回到子宫和谐的状态中，同时也返回到一个古老的世界。我进入我的爱人，然而她也在她的高潮中完成了这种返回。我长时间地看着她的脸，那种无意识的极乐是一个婴儿从那双闭着的眼睛背后带来的一种记忆。然后，当她向我求爱时……那种强烈的感情同时也是一种推动，一种催生！她进入到这种感情，然后就会与这种新生的狂喜融为一体……这样，我就会再次回到我母亲与这个世界的神秘，就像当母性关系得到赞美时，



必然会发生的一样。

现在，我准备倒回去理解那个其身体实际上把我包容的人。此刻，我可以开始去了解她，为我曾经感受到的那些拒绝去宽恕她，去期盼她，渴望她。我绝不会直到我被一个女人所想时才去想她。现在，我知道作为一个婴儿被人抛弃的感觉是什么，去减少我的无知，其意义何在。知道去和一个女人发生关系，并把我微不足道的力量给予她。知道去拥有这种被珍视的力量。既然我知道，我就能回到她身边，回到那个当我需要爱时却不能给予我的人。我能毫无责备地回去，我也希望她为我做好了准备。

在研究1760年至1880年35个家庭的美国妇女的日记与书信过程中，历史学家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 (Carroll Smith-Rosenberg) 探讨了一种那一时期亲密的、有时明显是性欲面的、维持时间长久的女性友谊模式，确切地说，是一种女性友谊的网络结构特征。这些关系经过了由一方或双方结婚而引起的分离仍能保持那种温柔、奉献的特征。在一个“女性世界”明显脱离男人关心的那个更大世界的情况下，只有女人才会在彼此的生命中占有一种至高无上性。

史密斯-罗森伯格认为：

……一种亲密的母女关系……处于这个女性世界的中心……这些关系的重中之重也许可以被描述成一种培训的制度……母亲与其他年龄更大的妇女会在家政与母性亲份方面认真去培养女儿……让青春期的女孩临时去做家务……帮助分娩、喂奶和断奶。

女儿生下来进入到一个女性的世界……只要母亲的家庭角色仍然相应地保持不变，并且很少有什么选择来与之抗衡，那么，女儿就会倾向于接受她们母亲的世界，会无意识地向其他女人寻求支持与亲密……

也许有人会去思考母亲敌对行为缺乏的问题，今天人们认为这种敌对行为对一个青春期少女争取人身自由的努力来说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可能的情况是，针对女性侵犯的禁忌……对抑制母亲与她们青春期女儿的这种行为曾经显得非常强硬。然而这些书信看起来却是如此生动，女儿对母亲事情的兴趣是如此强烈和真实，以致要从压抑与否定方面去理解她们这种排他性的亲密是困难的。

这样一个女性世界的缺乏对那个新打开的知识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新的知识领域可以通过来自欧洲的



移民妇女其孤独与怀旧情绪的表达来得到理解。这些妇女离开欧洲，远离她们昔日所拥有的那个由朋友、母亲、姐妹构成的网络圈子。大多数这样的妇女一直都在自己住的地方年复一年地焦急地等待着老家的来信，以一种女性特有的方式来与孤独作斗争。一名威斯康星州的妇女在1846年这样写道：“如果我们拥有几个女性朋友，我会感到非常满足。我会想念这些朋友。”如果生活在她母亲与其他女性亲戚身边又没有生孩子和养育孩子，那位开发区的母亲就不会与她走得很近，并与她一起分享她做母亲的经验；要是霍乱或白喉症出现在一个孩子或孩子们身上，她就不得不自己去面对那个由死亡与悲痛引起的残酷的现实。孤独、无法承受的痛苦与罪责很有可能导致她长时间的忧郁或精神崩溃。如果新边疆地区给了妇女某些更多平等、独立和反叛传统角色的机会，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却同时剥夺了一个女性社会中许多情感的支撑与亲密。这种剥夺通过她们的母亲而伤害她们。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世纪女权主义的发展，20世纪年轻女子的“解放”神话（吸烟和随便的性关系），已获接受和实践的女人节育自由选择兴起，也许它们在削弱母女关系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这种关系，一张女性友情的紧密之网才得以在一种共同生活模式与共

同期待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大约到了1920年,由于弗洛伊德思想的普遍传播,强烈的女性友情在学校的女生之间还能作为“热恋对象”来接受,但如果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以后的生活,那肯定就会被认为是一种退化与神经官能症。

4

正如诗人林恩·苏克尼克(Lynn Sukenick)所解释的那样,“厌母症”不是对某个人母亲的恐惧,或对母亲身份的恐惧,而是对成为某个人母亲的恐惧。成千上万的女儿都留神她们的母亲,当母亲在灌输一种妥协与自恨时,她们就打算摆脱这种妥协与自恨,这种东西通过她们,女性生活的束缚与堕落就必然会被遗忘。彻底去恨和否定一个母亲与超越她去理解那些作用于她的力量相比要容易得多。然而何处母亲被恨到一种厌母症的程度,何处就可能同时对她有一种最强烈的吸引力,有一种恐惧,以致假如有人放松了自己的警惕,她就会完全与她合二为一。一个青春期的女儿可能会与她母亲处于一种战争状态,但仍然会借她的衣服来穿,借她的香水来用,当她离开家时,她料理家务的风格也许就是她母亲风格的相反类型:从不整理床铺,不洗碗,在一个女人整洁照料房子



的无意识的颠倒中，她必须把自己从生活的常规中解脱出来。

然而，用格雷丝·帕莱(Grace Palay)的话来说，“她的医生儿子和小说家儿子”都会指责与讥笑那位“犹太母亲”，犹太女儿都会与那个生她们的女人和她们会成为的女人的惊恐、罪责、矛盾心理与自我仇恨捆绑在一起。在犹太女儿的生活中，“厌母症”是一种后来才出现的倾向。事实上是犹太小镇、少数民族居住区，以及早期移民时期的犹太妇女在供养她们研究犹太教法典的男人，哺育孩子，管理家务；是她们在与充满敌意的非犹太世界打交道，以各种实在与主动的方式来使犹太经济与文化的幸存成为可能。只是在后来移民的几代人中，由于日益兴起的民族同化主义思潮和要求男人掌控经济领域的压力，人们才希望女人削弱她们在这方面的作用，去扮演全职母亲与家庭主妇的角色，这种角色是不信犹太教的中产阶级所要求的。

“如果我不结婚，我母亲就会杀死我。”“要是我不结婚，我就有可能杀死我母亲。”由于她的精力没有被其他有吸引力和有价值的事物占有，那么毫无疑问，全职的“操持家务者”就会经常陷入无比混乱、巨大痛苦、被占有欲控制，以及对她孩子神经质般的担忧之中，就会通过那位“犹太母亲”在幻想中得到拙劣的模仿。但是这个“犹太

母亲”仅仅是19世纪的妇女被迫从所有角色(除了一个角色)中退出时杜撰的概念。

厌母症可以看做是女性的一种自我分裂,在那种想去彻底消除我们母亲束缚的渴望中,使我们变成一个独立与自由的人。在我们心中,母亲代表着受害者、不自由的女人和殉难的人。我们的人格仿佛是危险而模糊的,并且与我们母亲的人格相互重叠,在一种想去了解何处是母亲终结,何处是女儿开始的绝望的努力中,我们施行的是极端的外科手术。

当她母亲离开后,马萨(Martha)以抗议的姿态用手捂住她的肚子,柔声细语地对它里面的生命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害到它,自由将是它的礼物。她,马萨,那种自由的精神会通过她,马萨,那种母亲的力量去保护这个生命;母性的马萨,那个敌人,不会被允许进入这个画面。

所以,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主人公——她一直觉得被她母亲完全占有了——当她也意识到将成为一个母亲时,她就使自己处于一种分裂状态,或试图去处于这种分裂状态。

但即使是有孩子的母亲,也会处于一种严重的谨小慎微之中,就像卡特·肖邦(Kate Chopin)在《觉醒》中所



描述的一样：

……蓬蒂内尔(Pontellier)夫人不是一个母亲式的女人。那些母亲式的女人其热情似乎会胜过格兰德岛的夏天。要去了解她们是非常容易的，她们会由于竭尽全力而变得焦躁不安，只要有任何伤害，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她们都会变得束手无策，会去惊吓她们的宝贝孩子。她们是崇拜儿子、敬畏丈夫的女人，并把抹去她们的个性，长一双护卫天使式的翅膀视为一种神圣的荣幸。

埃德娜·蓬蒂内尔(Edna Pontellier)，追求自我快乐与自我认识的她(尽管完全要通过男人们来追求)被人们认为作为母亲是“不合格的”，虽然她的孩子与其他绝大多数孩子比起来，具有非常明显的独立性。科拉·桑德尔(Cora Sandel)塑造了她的主人公艾伯塔(Alberta)，一个反对其母亲珍妮(Jeanne)的女人，她母亲是一个典型的母亲式的女人。艾伯塔是一个作家，“最近几年(由于恐惧)一直为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母性特征与专注于家务而感到困扰”。她觉得既被能干而精力旺盛的珍妮所责备，又被她所厌倦，珍妮始终在用一只眼睛来盯住每一个人：

“不要忘了吃你强身的药，彼埃尔(Pierre)。然后，你

一定得躺一会儿。你会做得非常好。马尔特(Marthe),你已经抓伤了自己;在我把碘药敷在它上面之前,请不要接触任何东西。你应该去看看老太太。普兰(Poulain)、艾伯塔(Alberta),在我卖掉这些多余的沙滩鞋之前……我认为托特(Tot)不会在太阳下呆那么长时间,艾伯塔……”

所以,那些主要把自己定义成母亲的女人也许对那些不这么认为的女人来说,就既是令人恐惧的,又是招人反感的,或者,她们会觉得不适合去扮演像肖邦所定义的那种母亲的角色。莉莉·布里斯科(Lily Briscoe)也会拒绝去扮演这种角色:她不想成为拉姆齐(Ramsay)夫人,她认为要是这样,这对她是残酷的。

5

女儿失去母亲,母亲失去女儿,是女人一生中的主要悲剧。我们知道作为人类伟大悲剧化身的李尔王(父女决裂)、哈姆雷特(儿子与母亲)和奥狄普斯(儿子与母亲),但直到现在仍然不敢去重视产生在母亲与女儿之间的那种激情与沉迷。

曾经有过这样的重视,但我们丢失了它。它表现在埃莱夫西斯(Eleusis)的宗教秘仪中,2000年来,它奠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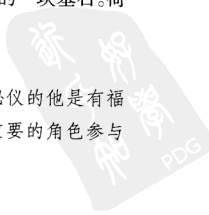


希腊生活的精神基础。根据得墨忒耳(Demeter)和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母女神话的说法,这种秘仪是被严格禁止的,是古典文明的最大秘密,不能在公开的场合举行,只能对新入会的人开放,这些人事先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净化过程。按照公元前7世纪荷马写的得墨忒耳的赞美诗,这种秘仪是在女神本人与她女儿重聚时创建的,在这个神话的一个版本中,女儿珀耳塞福涅被大地之主波塞冬(Poseidon)强奸与拐骗,在之后的一个版本中,强奸与拐骗她的人是冥王哈得斯(Hades)或者布鲁图(Pluto)。得墨忒耳通过禁止谷物——她是谷物之神——的生长来为她失去的女儿复仇。

当她女儿又回到她身边的时候——大约仅仅在那一年的9个月中——她在这些月份又重新让大地充满果实与生命。但是《荷马史诗》告诉我们,在女儿回来所感到的欣喜之中,得墨忒耳送给人类最重要的礼物并不是让植物世界恢复生机,而是在埃莱夫西斯创立了宗教仪式。

大约公元前1400年至1100年开始在埃莱夫西斯举行的宗教秘仪,被人们认为是人类精神遗产的一块基石。荷马史诗这样写道:

在这个尘世的男人中,见到过这种秘仪的他是幸福的。在这样的事物中,他肯定会以一个重要的角色参与



到这种秘仪中。在狂乱的黑暗里,他将是一死去的人。

此外,品达罗斯(Pindar)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也对那些入会者与“所有其他的人”,那些未行秘仪者作出了区别。人们经常引用罗马的西塞罗那句作为这种秘宗的格言:“我们被给予了一个理由,不仅生活在欢乐之中,而且也死于更大的希望之中。”人们已经把在古代精神生活中由埃莱夫西斯秘宗所扮演的这种角色与基督激情与复活所扮演的角色作过比较。只是在由该秘宗所庆贺的这种复活中,主角是一个母亲,通过她的愤怒产生了一个奇迹,一个来自地狱的女儿。

埃莱夫西斯的这些仪式在古代世界的许多地方都被人们所模仿与抄袭。但那个独特而神圣的地方除外,这个唯一的让人有可能体验真知灼见的地方就是埃莱夫西斯的神殿。它位于“处女井”或喷泉的遗址,人们设想这是得墨忒耳坐在那儿为失去的女儿悲伤的地方,这是她回去创建秘仪的场所。2000年后,当阿拉里克(Alaric)统治下的哥特人于公元396年入侵希腊时,这座神殿被摧毁了。

但是在这2000年中,每年的九月都会有一次,那些神秘教者与入教的人通过海水浴来净身,然后举着火把,捧着一束束长春花列队步行到埃莱夫西斯。在那儿,他



们最终会接近那种“目光”——处于那种“始终在看的状态”。猪（还有其他被祭献给那位伟大母亲的动物）被屠宰用来祭奠得墨忒耳，作为入会仪式的第一个步骤被吃掉，以表对得墨忒耳的敬意。只有入教者和祭司长才被允许进入最里面的神殿，那儿是由于雷声的召唤得墨忒耳的女儿珀珥塞福涅显身的地方。在一束强光的闪耀中，冥府女王珀珥塞福涅带着她的婴儿在这里出现过，对人类来说，这象征着“死亡中的诞生是可能的……如果他们信奉这位女神的话”。在创始人分裂使这些仪式彻底中断的某个时期，这种秘仪的真正意义是让生与死合二为一。

按照C.凯伦伊(C.Kerenyi)的说法，我在上面引述了许多他对埃莱夫西斯的研究，在这些仪式结束的时候，那位祭司长会转向入教者，向他们展示一段被切断的谷穗：

所有那些一直在“看”的人，一看到这实物，就仿佛从来世脱离进入到这个世界，他们回到了这个包含有谷物的实在世界。谷物曾经是谷物，不会有比谷物更多的东西，但是对那些入教者来说，它也许就是得墨忒耳和珀珥塞福涅给予人类的全部：得墨忒耳负责食物与财富，珀珥塞福涅负责尘世生命的降生。对那些已经在埃莱夫西斯见到珀珥塞福涅的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隐喻。

一块公元前15世纪建在埃莱夫西斯刻画女神得墨忒耳与珀珥塞福涅的巨大浮雕，在她们之间有个男孩特普托勒密斯(Triptolemus)的头像。特普托勒密斯是那个“最早出现的男人”，他肯定是由于得墨忒耳馈赠谷物才来到她身边的。根据一个神话的说法，通过在埃莱夫西斯的入教仪式，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种暴力、好战的生活方式转变成了一种和平、农耕的生活方式。人们猜想是他传播了那三句圣训：“尊敬你的父母”，“用财富来敬神”和“不伤害动物”。只是凯伦伊表达得非常清楚，特普托勒密斯在埃莱夫西斯肯定不是个重要的人物。得墨忒耳作为“稳稳当当登上王位”的谷物女神早已存在于古代过去，对人来说，她是物产的给予者。然而在她作为秘宗女神的形象中，她的变化却非常大：“她亲自在悲伤与痛苦中去探索传教的方式与途径，致力于秘宗的核心工作，也就是说，她是以作为女儿母亲的身份来做这一切的。”

得墨忒耳与珀珥塞福涅的分开是一件情不由己的事情，它既不是一个女儿反抗母亲的问题，又不是一个母亲拒绝女儿的问题。在传统的家长制世界中，埃莱夫西斯似乎一直都是最后一个伟大女神多样性的复活之地。另外，瑞亚(Rhea)，得墨忒耳的母亲也出现在某些神话中；



但与此同时，珀珥塞福涅却成了一个地狱中的母亲。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认为，那种秘仪是建立在一种非常古老的女性仪式上的，男人有可能被排斥在这种仪式之外，这种可能性告诉我们，母亲—女儿的那种里比多投入是多么可怕与复杂，即使是在有记载的历史之前，也是如此。甚至在基督降生之前的千百年中，每一个女儿肯定都在渴望一个爱她的母亲，渴望一个力量如此强大，以致使她能够摆脱强奸，把她从死亡中拯救出来的母亲。每一个母亲肯定一直都在渴望得墨忒耳的权力，渴望她愤怒的力量，以及与她失去的自我相协调的能力。

6

得墨忒耳—珀珥塞福涅神话的一个离奇而复杂的现代版本存在于玛格内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小说《表象》中。她故事的讲述者——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说她自己“不能爱”，“不能感觉”——回到加拿大的一个岛屿，她和她家人二战时期曾生活在那里。她想寻找她父亲，父亲曾一直一个人在那里生活，然后神秘地失踪了。母亲已经去世。她的情人和另外一对夫妇大卫与安娜——他们都多多少少有点像具有美国风格的嬉皮士，尽管自认仇恨美国所有的东西，但她还是与他们一起回

到了她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她在周围的树林与不被人注意的小屋寻找她父亲行踪的线索。她找到了被她母亲收藏的一本相册和她童年时代的剪贴簿；她母亲的旧皮上衣仍然在挂钩上摆动。另外，还找到了一些她父亲画的古代印第安人石壁画的草图。她那些嬉皮士的朋友整天坐立不安，为岛上落后的环境而感到厌烦，尽管他们不断声称厌恶美国式的技术资本主义。然而正是小说中的这些男人——作为嬉皮士的加拿大人——正在毁灭这个天然圆成的世界，为杀戮而杀戮，砍伐森林；大卫在残酷地占有安娜，性具有一种剥夺的性质。后来，这位讲述者了解到她父亲的尸体在湖中被人发现了，结果证明，他是企图去拍一些印第安人的壁画时掉入水中的。她圈子中的其他人都中途搭船返回了文明世界；但她留了下来，决定重新回到那个地方，与它神秘的力量保持联系。她赤身裸体穿行在树林之中，吃浆果与树根，追寻她的幻想。最后，她回到了那间小屋，以及那座杂草丛生、几近荒芜的花园，在那儿

……我看见她。她站在小屋的前面，张开手臂，穿着那件灰色的皮上衣；头发披散在肩头，那是30年前在我出生时就流行的一种发型；她半侧着身离我有一段距离，我只能看见她脸的侧面。她没有动，对那些头发感到非常



满意：一部分落在腕部，另一部分飘在肩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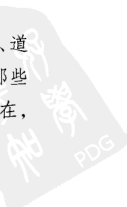
我停住了脚步。开始时，我没有感觉到什么，只有惊奇：那就是她应该所在的地方，她一直都站在那儿，接下来，当我注视时也没有产生我担心的变化，由于害怕，我感到周身发冷，我担心那不是真实的，我的眼睛会伤害纸糊的美人，烧毁她的形象，如果我眨眼睛，她就会消失。

她肯定已经感觉到我的恐惧。静静地把头转过来看着我，从我身边走过，仿佛她知道有什么东西在那儿，只是她完全不能看见……

我跟着她去了她去的地方。林中那些鸟儿在对着我鸣叫；喂食的盘子上仍然有一些剩下的残食，有一些被撞落在了地面上。我眯着眼睛看着它们，试图去看她，试图去弄清楚她是谁。

后来，她在同一个地方产生了一种她父亲的幻觉：

她认识到他是一个闯入者。那小屋、栅栏、篝火、道路全是某种冒犯与亵渎，就像逻辑排斥爱一样，现在那些栅栏也在排斥他。他想，它已经结束了，边界已经不存在，



他想让森林重新长在他心灵已被净化的地方：作为报偿
.....

他转向我，他不是我的父亲。它是我父亲所看见的东西，是当你单独在这儿呆得太久你会碰到的东西……

我现在发现，尽管它不是我父亲，但它是我父亲已经变成的某种东西。我知道他并没有死去……

阿特伍德的最后一章是这样开始的：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拒绝去成为一种牺牲品。除非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必须去宣布放弃，放弃那种认为我是软弱无能的古老信念，由于这一信念，我什么也不能做，这将给每个人造成伤害……那些文字的游戏，输赢的游戏结束了，在那样的时刻，即使没有其他的东西，它们也必须被创造出来……

她不是“自由的女人”，不是“女权主义者”；她与男性身份妥协的方式，与一种男性文化斗争的方式，一直都在麻痹自己，一直都相信她“不能去爱”。但《表象》并不是一部纲领性的小说，它是一部诗人的作品，充满了泛灵论



与超自然主义的内容，对父亲的寻找导致了与母亲的再次融合，母亲生活在被称为动物之主的旷野的家中。以某种模糊而潜意识的方式，阿特伍德的讲述者通过她幻觉的瞬间，通过她母亲短暂而令人惊异的显灵，开始认识并接受了自己的力量。她一直都在努力——通过禁食与牺牲——去超越父权社会的一切。她不能待在那儿：那种原始的做法（她父亲的解决办法，那种男性的——极端法西斯主义者的——解决办法）并不是问题的答案；她必须在这个时代去抵达并活出自己的存在。只是她一直都有自己的解释：她已经理解了她的母亲。

7

那个一直认为自己没有被“母亲照看”过的女人，也许会用她的一生去寻找母亲——甚至会在男人中寻找她们。最近，在一个女性团体中，有人曾经说：“我结婚是为了寻找一个母亲。”这个观点得到该团体中另一个成员的赞同。我本人记得有一次躺在床上的情景，旁边是我的丈夫，在半梦半睡的状态里，我觉得那个靠我非常近的身体是我母亲的身体。也许，所有性的或亲密的身体接触都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最初的身体。但是“没有母亲”的女人也许会有否定她脆弱性，不承认她感觉有任何母

性欠缺或丧失的表现。她也许会花一生的时间来证明她在“照料”其他人方面的能力——就像拉姆齐夫人照料男人一样，这些男人的虚弱让她感到强大，或者在教师、医生、政治活动家、心理治疗师的角色中表现其母性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她给予其他人的那些东西正是她缺乏的；只是这总是意味着她需要其他人的匮乏，以便让她感觉自己的力量。她也许会为平等而感到不自在——尤其是女人之间的平等。

生长在父权制社会的女人很少能感觉她得到了充分的母性；我们母亲的权力，不管是她对我们的爱，还是她为我们而作的努力，其实都是有限的。父权社会正是通过这样的母亲在很早就教导年轻的女性，何为她应有的期求。为了适应一种卑微与令人沮丧的角色，一个女人施加给另一个女人的那种焦虑的压力几乎就不能理解成“母性的关爱”，即使她在这样做的时候，相信这会对女儿的生存有好处。

因为既是欣然又是被动接受这些东西的，所以，那些生活在对其母亲有强烈感情中的女儿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母亲的受伤害几乎不会使女儿感到耻辱，它会使那个女儿变得残缺不全，因为她是把母亲当做成为一个母亲究竟意味着什么的线索来观察的。像中国传统的缠脚妇女一样，她是通过自我折磨的方式来得到承认

的。母亲的自恨与卑微的期望对女儿的心灵来说是一种束缚人的激情。正如一位心理学家观察到的：

当一个女孩子露着大腿在屋子里穿过，让屋子里所有的男性（父亲、兄弟、熟人）感到难堪时，那位无助的母亲就会站在那里，并且留心观察，因为这样的事应该在孩子的心中引起耻辱感和罪恶感。在纽约最近的一次有关强奸的听证会上，一名妇女提供证词说，当她还是一个孩子时，她父亲就把好几块西瓜皮塞进了她的阴道中，让它张开以满足他的嗜好，如果她试图把它们取出来，他就会打她。然而，这个女人之所以直到今天也仍然在表达她的愤怒，那是因为她母亲曾经对她这样说过：“绝不要对任何人谈起这件事。”

另一名姑娘在她高中一年级时被人轮奸了，她母亲对她说：“你给家庭带来了耻辱。你不再是一个正经的好人了。”当她现在谈起这些事的时候，心中的痛苦仍是难以抑制的，就仿佛它完全发生在昨天。

这并不单纯是一件这样的母亲既感到有责任，又感到无能为力事情。她们会把自己的罪恶感和自恨情绪带入她们女儿的经历之中。母亲知道，如果被强奸，她会

感到有一种罪恶感,所以,她才会告诉女儿,她是有罪的。她强烈地要求和女儿保持一致,但通过的是软弱的方式,而不是坚强的途径。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认为,女儿对母亲的愤怒实际上是对她们没有阴茎这一事实的不满。然而,克拉拉·汤普森(Clara Thompson)却指出,在一种早期的令人惊讶的关于阴茎忌妒的政治学观点中,有人认为,“阴茎是有权之人的象征,这种权力是男女文化中一种带有竞争性的人为设置……所以,这种被称为阴茎忌妒的观点与任何社会地位低的人对那些有权之人态度是一致的”。一位当代心理分析学家指出,女儿对母亲愤怒恐怕多半是由于她母亲把她看成是二等公民,同时把儿子(或父亲)看做是她受挫需求的满足引起的。然而,即使没有处于优势地位的兄弟与父亲,一个女儿也会对母亲的软弱无能或斗争精神的缺乏感到愤怒——由于她强烈的身份认同和为自己而奋斗,她首先需要的是既被别人所爱,又需要为这种爱而斗争。

在父权制社会中,女儿的教养需要在母亲身上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教育意识。母女之间那种精神的相互影响会遭到破坏,但仍找不到它何以会如此的理由。一个尊重与热爱自己身体的女人,一个不把它看做是肮脏的或看做是性欲客体的女人,会潜移默化地让她女儿知道,一个女人的身体是一个可供人去享受生活的美好而健康的



地方。一个为自己是女人感到骄傲的女人，不会把那种自我贬低的想法强加在女儿身上。一个能创造性地运用愤怒的女人，不会由于害怕可能会引起自杀就试图去抑制她女儿心中的愤怒。

在某一种制度中，所有这一切都是极端困难的。这种制度一直都在偷窃女人的身体与我们的自我。对那些不仅自我被剥夺，而且由于酗酒、吸毒、自杀的原因对她们女儿无用的母亲，我们能说什么呢？对一个为生存不得不如此劳累，以致一天下来精疲力竭，当工作之后感到麻木、困倦时还要去照顾孩子的女人，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孩子不了解这种社会制度，或母亲习俗，那么剩下的就只是一种刺耳的声音、一双迟钝的眼睛，一个不能珍视她的母亲不可能告诉她，她是多么美丽。对那些在其中女儿感到家就是父亲，而不是母亲，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是父亲给了她爱与支持的家庭，我们能说什么呢？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一个养家的父亲，他取代了母亲，而不是对母亲的补充，他肯定会得到母亲宽宏大量的爱，而不管母亲缺席的理由是什么。他也许会做得非常出色，给出一个男人能给予的一切，但要是对他的爱取代了对她的爱，那这位母亲就是双重的失败。

“与女人相比，我总是从男人那儿得到更多的东西”。这是控制女人的一种陈腐的观念，一种不可思议的思想，

因为我们会欣然去认同每一个似乎能使我们变得强大的人。但又是谁一直处于一个让我们强大的位置呢？一个经常使他女儿得到自我支撑的男人，他会否定他的妻子；他也许会把女儿作为反对妻子的口实来加以利用；他也许很少能感觉到一种来自女儿的威胁，尤其在她崇拜他的时候。

一个男教师也许会增强一个女学生的自信心，同时却会使他妻子和女儿感到窒息。作为个体，当他们选择的时候，男人一直都有能力给予我们力量、支持和某种养家的方式，但这种权力却总是偷取的权力，在父权制社会中，这种权力是禁止给予大量妇女的。最后，我打算在这儿谈谈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只可能是一个女人给予另一个女人的礼物，是我们血液中的遗产。除非有一条爱、自信、榜样的强大线索贯穿在母亲与女儿之间，横跨在一代一代的女人之间，否则，女人仍将在荒野中徘徊。

8

养育女儿究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作为女儿，什么是我们想拥有的？能拥有的？作为母亲，我们能给予什么？从最深和根本的意义上讲，我们需要信任与温柔，这一点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真实的，但那些成长在一个对我

们充满了如此多敌意世界的女人，需要的却是一种非常深厚的爱，以便能够学会去爱我们自己。只是这种爱完全不是那种古老的、已经被制度化了的、叫人去作出牺牲的“母爱”，这样的爱是男人所要求的。我们想要的是勇敢无畏的母爱，最明显的事实是，这种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文化使我们产生的是一种受限制的感觉。一个女人能为另一个女人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启发与扩展她现实之可能性的感觉。对一个母亲来说，这意味着不仅仅去满足儿童书、电影、电视、学校提供给我们的那些简单的女性形象。意味着母亲自己应试着去扩展她已受限制的生活内容，去拒绝成为一个牺牲者。然后，从那儿开始起步。

只有当我们能够富有想象力和无所畏惧地为我们自己希望的时候，我们才能无拘无束地为我们的女儿们希望。但最终，一个孩子并不是一种希望，也不是希望的一种产物。女人的生命——在社会所有的层面——已经在压抑与幻想中生活得太久了，与此同时，我们活动的能量已被培养成和吸收成只知道去关心别人。现在，开始着手去打破这种循环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在产科医生候诊室阅读过文献的人都知道，那些孩子护理的书籍，总会在某些地方向你说明，“你也许有一点郁闷”，并建议“让你丈夫带你到一家法国餐馆吃一顿饭，要不，去商场买一

条新裙子”。(大多数女儿所拥有的那种关于丈夫与金钱的幻想永远都会伴随着我们)然而,那位随时允许自己去“休假”或得到“报偿”的忧郁的母亲既没有向她女儿流露女性压抑的那种状态,也没有向其展示那种无路可走的事实。

作为女儿,我们需要既要她们自由,也要我们自由的母亲。我们不需要成为另一个女人自恨与受挫的发泄渠道。母亲生活的品质是她给女儿最重要的遗产,因为一个自信的女人,一个是斗士,能不断努力去创造她生活空间的女人会向她女儿证明这些可能性的存在。因为对许多贫困的妇女来说,生活的状况要求她们有一种为纯粹的肉体生存而奋斗的拼搏精神,这样的母亲与那些全职的母亲比起来,有时更有可能给她们女儿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是,逆境的重压是要付出代价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去为孩子的生存而奋斗的母亲,也许不得不总是会离开她的孩子,就像蒂勒·奥尔森(Tillie Olsen)的故事所表明的,“我嘲讽地呆在这里”。正如那位母亲痛苦意识到的,因为一个孩子需要某人的关心,对他来说,她就是一个“奇迹”。

许多女人都无法逃避——陷入了两个母亲的分裂状态:一个通常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她代表的是那种家庭生活、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期望的文化,另一个也许是



女艺术家或教师,她变成了一种叛逆的形象。这个“叛逆的母亲”通常是一名体育教师,她以自己的身体来展示其力量与骄傲,展示一种存在于世的自由方式;她或者是一个与思想生活在一起的未婚女教授,她代表的是一种有活力的职业生涯,单身,并喜欢作“如此这样”的选择。这种分裂也许能使年轻的女人去幻想交替过一种或另一种“母亲”的生活,去尝试两种不同的身份。但它同时也会导致这样一种生活,在之中,她绝不会有意识地下决心去做出选择,她会轮流尝试去扮演女主人的角色,并像她母亲所做的一样,去取悦她丈夫,去写她的小说或博士论文。她一直试图去摧毁那些生存的模式,但又走得不是太远,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并没有人告诉她,要去的地方究竟有多远。

我们有必要理清那些具有双重含义的句子。“你能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这句话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理,它忽略了一个女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关于省略掉的那部分内容,我们需要把它们弄明白,而不是在私下里去说那句令人恐怖的连自己都没有弄明白的话:“不要走得太远。”一个女孩子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必要去知道父权社会的诸多麻烦,这些麻烦即使在试图去想象“她们会成为什么”的时候,也是女人们不得不去面对的。那些能够与她们女儿自由谈论性的母亲,甚至可以在青春期就教会她

们避孕的方法，直到让她们脱离这个世界在等待她们的，由那些期望、陈规、虚假许诺和错误观念构成的愚昧。“你能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就仿佛你已经做好去斗争的准备，已经为你创造好了去反对现存文化成果的某些优势，准备好了在面对厌女主义者的敌意时你能够坚持下去。去向一个小姑娘，或者青春期的女子解释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所遭遇的一切是有必要的，就像去向一个非白人的孩子说明，那些反动的东西是建立在他肤色基础上的很有必要一样。

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人们灌输给女儿的是这种东西，她的命运就是去“受苦，并且一直去受苦”，女人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但也有另外一些东西会让她真正明白所有女人都生活在父权制社会中的那种危险，通过语言与信念，让她知道她有母亲的支持，更有甚者，让她知道尽管去呼吁，去言说，去行动是危险的，但当她每一次都默默地忍受强奸——身体的与心灵的强奸——的痛苦时，她实际上是在往自己的寿衣上穿针加线。

9

我与一位优秀而激进的思想家，一个与我同龄的女学者交谈。她向我描述了她早年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她



在那些有许多教授夫人参加的讨论会或聚会上经常体会到的，她们中的大多数已有或将有孩子，在屋子里，只有她是一个未婚的女人。当时，她感觉她那些热情的探讨、工作上的成就仍然把她归入了“贫乏”女人、失败之人的行列，在她们当中有那么多已成为母亲的女人。我问她：“但你能够想象她们中的一些人是多么嫉妒你吗？嫉妒你工作、思考、旅游的自由，嫉妒你作为你自己，而不是某个孩子的母亲或某个男人的妻子进入这个屋子的自由吗？”然而，即使在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就知道：只有当我们理解了生孩子与无孩子这两者是怎样被利用来使女人成为负数和邪恶之承受者的，那存在于“母亲”与“非母亲”（甚至这个术语也是纯粹否定性的，像“寡妇”一词一样，意味着无）之间的那道鸿沟才有可能被弥合。

在语言的缝隙中存在着文化权力的秘密。在整本书中，我被迫回到像“无孩子的”、“无子女的”、“脱离孩子的”这样一些术语上；我们没有熟悉的、为一个女人而准备的专用名字，这个女人通过选择，既不是通过与孩子的关系，也不是通过与男人的关系来定义自己，她自我定义，自我选择。“无孩子的”、“无子女的”这样的词完全是在用一种匮乏的方式来定义她；即使是“脱离孩子的”这个词也仅仅表明，她已经拒绝了母亲身份，而没有说明就她自己而言，在她自己之中，她是什么。“自由女性”这个概念由

于具有自由性交、“自由恋爱”、与男人的关系是自由的联想而显得非常激动人心，但它仍然是通过她与男人的关系来定义女人的。“处女”(面对自己的那个她)这个词的古代意思由于“未开花结果的”、完整处女膜的，或完全根据她与神的儿子的关系来定义的罗马天主教圣母的内涵而变得模糊不清。“亚马孙族的女战士”其狭义指的是那些尚武的未婚女子，除了生育(再次通过关系来定义)之外，她们脱离了与男人的所有联系。在这里，“同性恋女子”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术语，不是所有自我定义的女人都会把自己称为同性恋女子；更有甚者，有无数的同性恋女子都是孩子们的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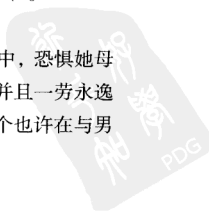
与逃进某些诸如“母亲与亚马孙族女战士”、“部落女族长或游击战士”这种两极分化的形式比起来，不可能还有更简单的关于女人的模式。因为在原始的女族长制部落，不管年龄多大的女性，都被称为“母亲”——即使是小姑娘。母亲身份是社会性质的，而不是一种身体功能。“对社会的另一个女性来说，女人是……姐妹，对所有孩子来说，女人是母亲，而不会把生过孩子的单个母亲视为判断的标准……土著居民从男性的角度把自己描述成……“兄弟身份”，从女性的角度把自己描述成“母亲身份”。不管在什么地方，像六岁那么大的女孩子一直都会照看比她小的同胞弟妹。



“无子女的女人”与“母亲”是一种虚假的截然不同，它是为母亲身份与异性恋习俗服务的。事实上，这么简单的范畴是不存在的。有些女人（像鲁思·本尼迪克特），她们一直都试图生孩子，但却不能生。原因也许是由于丈夫那种没有弄清楚的不孕性，对来自她大脑皮层的信号是拒绝的。一个女人也许一直都把女人的生命看做是与孩子联系在一起，在不变的母亲身份环境中，她一直都会这样感觉，如果她想追求任何其他的希望或目标，她就必须保持无子女的状态。正如那位19世纪的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福勒（Margaret Fuller）在一个没有注明日期的片断里所写的：

我没有孩子，我心中的那个女人一直都在渴望这种经历，就仿佛对它的渴望肯定会使我无能为力似的。只是现在当我看着这些通过分娩而生出的可爱的孩子时，我才觉得，由于他们而由他们带给那位母亲的焦虑是多么地缓慢与无足轻重啊！缪斯的那些孩子来得愈快，痛苦与烦恼愈少，那留在心里的东西就会愈轻松。

一个年轻的姑娘也许会生活在恐惧之中，恐惧她母亲那种被孩子弄得精疲力竭的生活方式，并且一劳永逸地告诫自己，不，这一切都不是为了我。一个也许在与男



人早期的关系中已经经历过流产、爱孩子的同性恋女子，也仍然会觉得她的生命不太可能去承担一个养子的折磨，或一次人工受孕的责任。一个已经选择了独身生活的女人也许会觉得她的决定可以承担起一种没有孩子的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那种母亲身份的习俗，在一个节制生育的时代，影响了那些反对成为母亲的女人。这种习俗太伪善，太具压迫性，是对母亲与孩子的残酷剥夺。

然而，要是女人生了一个孩子，她就不会变成一个“无子女的”女人了吗？比如我，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他们随我的意愿来来去去，与那些仍需要推着婴儿车，匆匆忙忙赶回家喂奶，半夜醒来面对孩子哭声的年轻女子比起来，难道我不是一个无孩子的人吗？是什么使我们成了母亲？什么是小孩子的忧虑？怀孕与分娩会导致什么样的身体变化？养育他们需要多少年？那个从未怀过孕、当她接受一个婴儿开始哺乳的女人，情况会怎样呢？那个把她的婴儿塞进公共车站的储藏箱，麻木地回到她“脱离孩子的”生活的女人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个作为老姑娘生活在大家庭中，实际上在养育她那些年轻的弟妹，之后又当了修女的女人，她的生活又如何呢？

那个努力去妥善处理好几个孩子、一份工作，为孩子能有令人满意的看护和读上体面的学校而疲于奔命的女人，也许会对那个看起来很自由，由于脱离了孩子而显得

灵活机动的女人产生一种纯粹的嫉妒与愤怒（我就感到过）。没有自己孩子的女人，像玛格丽特·福勒，也许会认识到，当母亲生活在父权社会的束缚之下时，对母亲的关怀就是“迟钝而无足轻重的”，她庆幸自己一直处于“自由”的状态，而没有“被洗脑陷入母亲身份的圈套”。但是，这种两极的对立与分化也意味着想象力的失败。

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把“无子女的”女人看成是失败的女人（只有几个特殊的例外，比如，修道院隐居的修女，或圣堂里的贞女），这样的女人无法去谈她性取向的其他方面，由于对母亲的那种虚伪与姑息的尊崇，她是被忽略的。“无子女的”女人一直被人们当做女巫烧死，当做女同性恋被迫害，因为她们没有结婚，就拒绝给予她们收养孩子的权利。在她们身上可以看到那种男性霸权的明显痕迹：和家庭没有联系的女人，她背叛了异性配对与生育的那种规则。不过，人们仍然希望这些女人能够作为传教者、修女、教师、护士、未婚姨妈来为社会服务；如果她们属于中产阶级，人们希望她们无偿奉献她们的劳动，而不是出卖她们的劳动；希望她们任何时候都用一种温柔的口气去谈论女人的处境。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她们明显没有受到由于孩子而导致的众多日常生活的拖累，因为她们能够思考、观察、写作，所以，这样的女人在过去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极有价值与洞察力的目

光，让我们得以理解普通女人的生活经历。如果没有那些“无子女”女人的颇受争议的探索与知识，没有夏洛蒂·白朗特（她死于她的第一次怀孕）、玛格丽特·福勒（她的主要作品在她孩子出生之前就完成了），没有乔治·爱略特、艾米莉·白朗特、艾米莉·狄金森、弗吉尼亚·吴尔夫、西蒙·波夫瓦——作为女人，我们今天就会患上精神营养不良症。

“无子女的”女人，如果这个术语具有任何意义的话，由于数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男女角色的态度，仍然对女人分娩、哺育孩子的功能构成了影响。每一个与母亲习俗无关的女人都会用她的眼睛去看到她生活处境的残酷层面。

有许多伟大的母亲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正如我在别的地方试图去说明的，小说《简·爱》可以被当做一个女人的朝圣之旅来阅读，这是一个女人沿着传统女性诱惑之路的朝圣。在这条朝圣的旅途上，没有母亲的简一次次怀着自尊寻找那些保护、安慰、教育、挑战、养育她的女人。数个世纪以来，女儿们由于非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而变得坚强和充满活力，她们把具有实际生存价值的关怀与面向未来世界的激励结合起来，把对脆弱的同情与对我们被埋没的力量的坚守联系在一起。很明显，正是这种做法让我们获得了生存的机会，而不是我们那

些已经成为标志的偶然的成就，不是我们“特殊的处境”，尽管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灯塔，是我们应该所是的启明。

我们“要么”是母亲，“要么”是女儿，我们中无一人能逃脱这种命运，只有针对我们的惊讶、迷惑与更多的复杂性时，我们才既是母亲，又是女儿。那些是母亲或非母亲的女人，那些对别的女人有承诺的女人会不断赋予对方某种关怀的品质，这种关怀充满了对存在于真正母亲与女儿之间的不同身份与认同。一旦涉及到纯粹“母性”这个概念，作为女儿，作为我们母亲一种巨大磨难的回声，我们也许会去承担她们为了我们作出的那种勇敢而必需的有限努力的重负，去承受由她们发出的双重信息而带给我们的那种迷惑。然而那种迫切希望我们成为“女儿”的想象力却是胆怯的——因为只有自由精神——而不是“母亲”——才能被理解成永恒的给予者。对我们来说，母亲与非母亲一直是充满了那么多张力与冲突的两个概念，因为很明显，无论我们选择哪一个，它都会转过来反对我们。

去接受、整合、强化我们心中的那个母亲与女儿并非一件易事，因为父权社会的习惯已经促使我们去分裂、极化了这些形象，促使我们去把所有那些不想要的罪过、愤怒、耻辱、权利、自由投射到“别”的女人身上。然而，任何一种姐妹身份的激进观点都要求我们去重新整合它们。

10

作为一个本质上是在南方、20世纪30年代仍然是种族隔离的巴尔的摩长大的孩子,从生下来开始,我不仅有一个白人母亲,而且还有个黑人母亲。这种很少得到探讨,没有得到表达的关系,仍然控制着黑人妇女与白人妇女。我们不仅仅具有奴隶的身份,同时也是美丽的白人妻子和暧昧而淫荡的情妇,一方面是婚姻侵犯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是不可预料的合法强奸的受害者。对彼此而言,我们一直是母亲与女儿。尽管在最后的几年里,黑人与白人的女权主义者一直都在朝一种麻烦的姐妹身份转向,但人们仍然很少知道和揭示我们曾是母亲与女儿的那个时代。莉莲·史密斯(Lillian Smith)回忆道:

我了解我的老保姆,她在我生病的漫长日子里照看我,当一个小妹妹取代了我作为家庭中一个孩子的位置的时候,她给我保护,安慰我,喂我的饭,用游戏与故事来让我开心,让我躺在她温暖、深厚的胸脯上睡觉,我觉得对她谈不上强烈的爱,但却肯定是一种半带微笑的情谊……我知道,但从来就不相信我对她深深的敬意、温情与爱是每一个孩子长大后不再需要的一种孩子气的东西……不知为什么——尽管它对我痛苦的心来说似乎是不



可能的，但我敢肯定我会去超越这些情感……我知道用眼泪与感伤去谈论她，是在降低“我那位黑人老保姆”的身份，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人。

我的黑人母亲仅仅有四年的时间是属于“我的”，在此期间，她喂我吃饭，给我穿衣，陪我一起玩耍，照看我，为我唱歌，温柔、亲切地关心我。“没有孩子的”她，仍然是一个母亲。她是苗条的，仪态尊严，体态端庄，从她那儿——通过非语言的方式——我了解了许多一个生活在下层的人仍有可能保持尊严的知识。在我妹妹出生后，尽管她仍然在我们家干活，但她不再是专门照看我的人了。另一个保姆来到了我家，但她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感觉她属于我妹妹。20年后，当我离开我父母家，绝不想再回来的时候，我的黑人母亲对我说：“是的，我理解你何以会离开，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为了去过我的生活，我也曾经伤害过某人的心。”几年以后，她去世了，我再也不能见到她。

是的，我知道莉莲·史密斯所描述的那些东西，知道当发现一个人爱着的女人由于一定年龄之后不配享有这种爱而仍然被爱的那种混乱的感觉。那种被背叛的感觉，肉体被侵犯的感觉，许多年来都是不能言说的无名之物，因为没有人谈起过“种族主义”，甚至连“歧视”这个概念

都不曾进入我童年的世界。那完全是“事物应然存在的一种方式”，我们总是试着去压抑这种混乱与耻辱。

当我开始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又想起了我的黑人母亲，想起了她那种看待事物的冷静而现实的观点，想起了她身体的优雅与骄傲，她美丽轻柔的声音。有好几年的时间，她已经在不经意间离开了我关注的视线，在我回溯性的寻找中，的确就像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双重的沉默所要求她做的一样，她实际上已被彻底埋没了。

只是在青春期结束的时候，仿佛由于一个类似的指令，我们发现自己与我们自然的母亲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它转向了男人，从此以后，我们情欲与情感的能量便强烈地要求流动。我们的文化让以下的说法变得十分清楚，无论黑人母亲，还是白人母亲，或任何其他母亲，她们都是不值得我们深爱与忠诚的。女人变成了对女人的禁忌——不仅指性别特征，而且还包括诸如同事、相互缔造者、精神共同者这样的事实。在粉碎这种禁忌的过程中，我们重新与我们的母亲结合在一起，在与我们母亲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将打破这种禁忌。





第十章

暴力：母亲黑暗的心灵

我了解那些建有巨大厂房的街区，这些厂房让那个女人在其中度过一生中大多数岁月的厨房终日不见阳光。在它之上，你整天都能听到那些机器不断折磨人的轰鸣。只要知道许许多多的女人与女孩就工作在这些工厂里，你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她们的身体整天都在围着机器打转。那位母亲弄不清楚她为什么而活着。要是有一个孩子即将出世，她真的希望在出生时他就死去。结果就是她开始服用药物。我完全没有必要对你讲述，要是她孩子活着，她内心遭遇的那种痛苦，或得知孩子有什么问题，她所承受的那种打击。要是她在他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么做了，她会觉得自己是有罪的，并且会生活在对他的恐惧之中。要是这一切能够说明这个女人的身心状况，难道你还会对那些沉迷于酒精的女人

感到奇怪吗？要是孩子能够活下来，并且长大，你会发现他也是歇斯底里的，并且具有狂躁、易怒的特征……当你理解了这一切的时候，它就会像一根芒刺一样扎在你的心口上，同时你也会明白事情何以会这样，并且无可救药……

——《母性：劳动妇女的通信》

1915年妇女合作协会选编

1

1974年6月11日，“这个夏天第一个炎热的日子”，38岁的琼·米察尔斯基，一个拥有八个从两个月到18岁大孩子的母亲，举起了一把屠刀，在芝加哥城外自己的郊区住宅门前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上，砍杀并肢解了自己两个最年幼的孩子。正如她丈夫所说，这个“异常古怪的事件”给周围的社区造成了一种令人恐怖的震撼。当地的报刊把整版整版的篇幅贡献给了“人权”栏目，对米察尔斯基夫人的行为背景作了报道。许多文章都冠以了这样的标题：“这件事本不该发生”、“为何母亲会行凶？她们正在杀死自己”、“精神病个案中警察所扮演的角色：严格的限制”、“走进诊所也无法阻止突发事件的发生”，试

图为此作一种无罪和心理分析的解释；地方报纸还对维克多·米察尔斯基作了一次专访，在这次专访中，“丈夫谈到了那种受折磨的生活”。米察尔斯基夫人由于故意杀人而被指控，但由于精神错乱的原因被判无罪，被判定去一所州医院接受治疗。她丈夫提出离婚诉讼。

正如她丈夫、邻居、精神病诊断师、牧师与警察所描述的，琼·米察尔斯基过去的情况大致如下：八个孩子中，没有一个是她“想要”的。每一个孩子出生之后，她都会跌入情绪沮丧的深谷；第三个孩子出生之后，她与丈夫讨论过节育的问题。他“提到过输精管结扎，但从来就没有做过这样的手术”。她曾打算服用避孕药，但为了迎合丈夫的意愿，她又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在她情绪低落的时候，她会躺在沙发上，长时间地“一语不发”。被人描述成“爱整洁、衣冠讲究”的米察尔斯基说她从来就不知道对她的孩子使用暴力，“在所有的时间里，她似乎都显示出对她最小的孩子一种极端的爱”。他把她描绘成“一个美丽善良的妻子与母亲，尽管不是最善良、最美丽的妻子与母亲”。住在附近的那位牧师说，“自从1959年这一家人搬到这儿住的那一刻起，她看上去就是彻底绝望的”。她的女邻居发现她“性格孤僻，与人难以相处”；她从不开车，丈夫经常长时间不在家。此外，附近教堂的牧师也报告说，在她丈夫保持屋外整洁的同时，屋子里面却总显得

“脏、乱、差”。她“很少下厨房，家里的冰箱总是脏兮兮的”。但孩子们看上去倒是显得“穿得很漂亮”。每个星期，她丈夫会把孩子们带到外面去吃几顿饭；她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当一家人坐在饭厅的时候，她总是一个人站在厨房里。她会对自己高声大气地说话，有时甚至尖叫——但不是冲着孩子，而是对一些她“想象中的人”。根据那位牧师的看法，“我从来就没有看见她牵过孩子的手……她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十分在意他们安全与荣誉的母亲。不管怎么说，她曾表现出过某种暴力倾向。”

1961年至1966年，地方有关部门与这个家庭有过接触。琼·米察尔斯基曾三次自愿去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一次是正如她丈夫所说的，由于她“一次真正的忧郁症的发作”；一次是因为她担心“X射线”或“镭射线”已经进入了她家的房间；还有一次是由于被当成身心失调的“心脏疼痛”。在这三次中有一次，米察尔斯基把孩子们送到别人家去寄养。后来，由于发现他的一个女儿在一个寄养家庭中受到了虐待，于是，米察尔斯基下定决心，决不愿意让分散这个家庭的事情再次发生。

一旦回到家里，琼·米察尔斯基的狂躁不安就会加重起来，按照她丈夫的说法，只有当她处于“显得容易与人相处”期间，情况才有所改变。大体说来，当丈夫在身边时，她的情况就会好些，而当她单独与孩子们待在一起



时，她愤怒、恐惧、号叫的毛病就会发作。一旦意识到这种情况在恶化之中，米察尔斯基并没有遵守他“要让家人始终在一起”的诺言——即是说，他把所有日子里长期照料孩子的责任全部推给了他的妻子。没有任何地方的新闻报道与采访提出过应该给予这个家庭以帮助的建议，或者给予她一次从“母亲与妻子”的角色中脱身出来得以缓和与养息的机会。也许，她会拒绝这些建议与机会。

历史上有许多女人杀死了她们认为无能抚养的孩子，不管是出自经济方面的原因，还是感情方面的原因，这些孩子都是通过强奸、无知、贫困、婚姻，或匮乏，或反对节育与流产而强加给她们的。作为一条各地人们遵守的针对妇女或畸形儿、双胞胎或第一胎的成熟的社会法规，必须把那些令人恐怖和流行的做法与杀婴行为区别开来。

合法与制度化的杀婴行为通过阿拉伯人曾经在斯巴达、罗马流行过，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和传统的中国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它一直是未开化社会控制人口的一种手段。“在《旧约》中，就保存有父母双亲把他们孕育的第一个孩子不仅祭献给太阳神而且也祭献给耶和华的明显记录”。作为勇士的男人一直是稀缺的：“老海盗用一把剑刺向新生儿。如果那孩子能抓住它，那么，他就有希望活下来。”尽管多病、畸形的男婴与女婴都可能被杀掉或抛弃，双胞胎被看成怪胎，或被当成由两个不同的父亲两

次授精的产物。但出于不同的理由，主要是“嫁出”女儿的成本太高，以及对女性生命的轻视，所以，女孩子（以及她们的母亲）一直就成了这种流行性杀婴习俗的主要牺牲品。在教会获得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杀婴作为一条法规严格禁止，然而，它作为一种个别的行为仍是屡禁不止。在这些行为中，被强奸或诱奸的女人被烙上“罪恶”的标记，经受痛苦的折磨，或被处死。这些女人经常怀着负罪的感觉，自我厌弃，盲目的绝望使她们打掉已经怀在身上的胎儿。

教会在引发母亲杀婴之罪方面脱不了干系，因为它宣称所有非婚生的孩子都是“不合法”的。直到18世纪及之后的一段时期，私生子都被剥夺了参与贸易和进入行会的权利，也不能继承遗产，完全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由于私生子父亲的“罪孽”难以得到证明，所以，所有的惩罚都会落在未婚母亲身上；作为永恒之罪的当事人，她会被教会认为是“一切性问题的根源”。

从西欧的中世纪到18世纪末期，母亲杀婴是“最常见的犯罪行为”。在中世纪，惩罚是最严厉的。犯有杀婴罪的女人可能被活埋，用削尖的树干刺穿心脏，或被架在草垛上被烧死。“在扎陀……杀婴者会被人塞进装有狗、猫、公鸡、蝰蛇的黑色口袋。口袋必须沉在水面之下六个小时，还有唱诗班的少年在一旁吟唱：Aus tiefer Noth schrei

ich zu Dir(由于巨大的悲哀,我为你哭泣)。因为在牧师的心中,那些信奉异教的女人肯定是在与魔鬼打交道,一个未婚的母亲常常会被人设想成女巫。

到了18世纪末期,杀婴行为开始困扰立法者、统治者、作家的心灵。奥斯卡·维纳(Oscar Werner)认为,歌德《浮士德》中格雷琴的困境,在通常的意义上,是1770年至1800年德国文学中一个“最常见的主题”。在当时的欧洲,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杀死自己婴儿的母亲并不是冷酷无情的罪犯,仅仅是一个不计自己行为后果的人。奥地利的玛丽·特蕾萨和俄国的贵妇凯瑟琳,她们创办了弃婴之家和母亲诊所,用以收留那些非法受孕生下的儿童。弗雷德里克关心的是控制杀婴的法律应该更具连贯性,并且更人道。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必须强调非婚生子是与财产法的精神相背的,财产法认为,一个女人与她的孩子必须在法律上属于某个男人,即是说,如果她们不属于某个男人,她们肯定就是最无足轻重的人,法律上规定的每一条条款都将对她们非常不利。强奸的受害者在任何意义上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在已婚的情况下,妇女会导致年复一年地怀孕,她们在法律上不具有任何可以阻止丈夫对其身体进行滥用的权利。在嘈杂的住着营养不良和生病儿童的廉价公寓或简陋小屋中,新生婴儿的命运实际上就等于宣布死亡,他们也许会变成“事故”,或躺在

床上不知不觉被窒息而死，或被扔在那儿，停止喂食，任其自生自灭。

在马萨诸塞湾的夏洛林，至少有两个妇女，由于一种契约的信仰而造成的生活的压力，被弄得心神不定，烦躁不安，这种信仰给予男人，而不是女人，一种与上帝以及他意志的认识直接的关系。这两个女人通过尝试，或者说实际上的犯罪，杀婴，走上了一条毁灭之路，以期让她们生活中的那种焦虑与无助的状态得到解脱。尽管可以用神学术语来加以解释（因为神学是纯洁生活的语言），但她们的行为仍可以被认为是对父权制宗教和夫权家庭制度的反叛（这种宗教许诺给所有信仰者以身份与地位，但范围却只限于男人）。其中一个女人叫多萝西·塔尔拜（Dorothy Talbye），在她说出上帝给了她那么“明确的启示”之后，她试图去杀死的恰好不是她的孩子，而是她的丈夫。

英帝国派往印度的行政官员，在19世纪早期就痛苦地发现，在好几个印度的社会群落中，生下女孩的妇女往往接受符合惯例的指导，去杀死自己的孩子，因为她的嫁妆将会证明对一个生下她的家庭来说是一个过分沉重的负担。由于文化的差异，情况又不一样，比如在英国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一个自尊的家庭就有能力“嫁出”它的女儿，结婚是一个女人唯一的出路。比如在梅费尔的卡奇（Kutch）未婚妇女会成为被怀疑和被轻蔑的对象。所



不同的仅仅在于，在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中，她可能会在一个大家庭中享有有一种从属的地位；在一个规模很小的信奉所罗门教的村庄，她完全就成了一个让人丢脸的人，出生时就必须把她杀死。人们教唆母亲饿死她的女婴，或者把她泡在牛奶中淹死。有时候，人们把鸦片涂在母亲的奶头上，让孩子自己去吮吸奶头而死。正如一个胎儿无法阻止这种习俗一样，所罗门宗教那么多关于反对杀生的戒律也不能改变社会习惯所形成的那种压力。

维多利亚时期就经常发生主人诱奸（应该理解为强奸）女仆的案件。如果她们拒绝与主人发生性关系，那么，她们就有可能被解雇，当然，大多数怀了孕的女仆也会被解雇。1845年，迪斯雷利（Disraeli）就承认过，“正像在恒河沿岸发生的事情一样，杀婴现象在英国也合法而广泛地存在着”。不管怎么说，维多利亚女王就曾经赞同过废除对杀婴罪的死刑。

在美国，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挺身而出为被指控杀婴的妇女辩护，把杀婴与“政治、宗教、社会的奴役（即迫使女人成为一种顺从而可怜的牺牲品，导致她无形中那种最高贵、最崇高情感的彻底堕落）”联系起来。她为一个女人能够得到州长的赦免而四处奔走，这个女人名叫赫斯特·沃恩，20岁的时候被丈夫抛弃，之后被雇主“诱奸”，当他发现她怀孕后又把她解雇了。在寒冬一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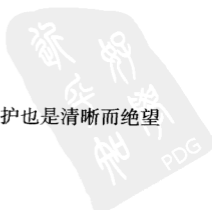
没有暖气的阁楼上，她生下了这个孩子。后来在情况危急之际，人们发现了她，但那个婴儿却已死去。尽管没有杀婴的证据，她还是被投进了监狱。斯坦顿致信给负责此案的纽约的律师，呼吁女人应该拥有与她们的地位同等的人（比如说女人）组成的审判团的权利，对男人与女人应该采用相同的道德标准。

1973年，《纽约时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了盛行于日本的杀婴事件。根据报道，平均每10天人们都会发现有一个新生儿被人塞进火车站的投币箱里，有时还会附上一张表示忏悔与罪过的纸条。仅仅在东京，一年之中被遗弃的婴儿就达119个之多。《纽约时报》并没有把这类死亡事件与废除自由流产的法律和限制使用避孕套的做法联系起来，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在同年（1973年12月）由波士顿妇女自由联合会定期出版的刊物上得到了报道。

只是斯坦顿为妇女权益所作的呼吁是人们第一次听到的女权主义的声音，由于受到父权制法律与习俗的压迫，这些妇女显然已经知道用一种她们熟悉的最绝望和极端的方式来为自己作无罪的辩护。

2

同样，琼·米察尔斯基所作的辩护也是清晰而绝望





的。在她被拘捕之后，她谈到过关于“献祭”的话题。如果我们假设她所说的一切完全属于一种“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语无伦次，那我们就没法理解她说的每一句话。献祭是一种“在臣服与抚慰的情况下对某一神明奉献出某物的行为；尤其指为了这一目的而针对动物与人的那种礼仪式的屠杀”。此外，它还指“失去某物是完全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琼·米察尔斯基忍受那种母性习俗的暴力已有19年之久，实际上，她一生中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似乎就是她的孩子（根据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观察，“她对她孩子的关注与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她仅仅是对存在的事态感到无能为力”）。值得注意的是，她丈夫也说：“对最小的几个孩子，她总是显示出一种极端的爱恋。”但她却杀死并肢解了其中两个最小的孩子。

报纸的大多数观点势必都要去纠缠于国家心理健康中心和那些与责任有关的法律是否已经能够有负于这个家庭。但是传统的精神病理学又为琼·米察尔斯基做了什么呢？它本应试着去对她的母性身份做出“调整”，或者事先就应该把她隔离开来。然而正如12个女人以集体名义发表在地方报纸上的一封信所指明的那样，那些建立在她和千百万有孩子女人身上的期望是“疯狂的期望”。社会没有认识到父权性质的母性身份本身所蕴涵的那种制度性暴力，反而去给那些终究以暴力方式来表达的妇

女贴上精神病理学范畴的标签。

这儿有一些心理学家就以下的主题所作的论述，该论题涉及到那些以各种方式试图去抗拒社会要求的妇女：

真正的事实是，一个不能忍受怀孕的女人，或对怀孕和生孩子抱有强烈抵触情绪的女人，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个女人在怀孕前的人格是不成熟的，在这种情况下，她就会被贴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标签……这是悬而未决的恋母情结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怀孕与分娩是女人气质最明显的证明，所以，那些被夸大的使生育力丧失的因素就显得尤其令人感到恐怖。母亲身份的证明具有某种压倒一切的优先性与敌对性。人们看不起女人性角色中的那种被动性，而与男人的竞争却又被过分地强调……作为一种对女人挑战的怀孕，她们是不接受的。

通过绝育，女人便自愿放弃了她的一部分女性身份……一些由于没有处理好对其母亲怀有敌对情绪的女人，也许就希望去平息那个被恨和正在恨的母亲，以期为了她们的愿望，为了父亲，为了成为父亲的孩子而得到宽恕。

（输精管结扎）常常被要求用来作为一种避孕的手段。有一点却几乎没有被人考虑到。一些情感上有毛病的女

人总喜欢她们的丈夫丧失生育能力，出于这样的原因，她们会设法强迫她们同样有情感障碍的配偶去做输精管结扎。

我并不打算提出一种幼稚的看法，认为那些实际存在的节育方法，或每两周一次的代看婴儿，能够“解决”琼·米察尔斯基的“问题”。为什么她不服用那些药丸？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据我们所知，有一种东西在迫使她产生一种连绵无期的厌恶感。就像我们现在了解的，这足以把她置于死地。也许她觉得她根本无法去控制她的生活，这种生活已经被灌输给了如此多的女人。这种没有自由意志、没有主动选择的母性身份上一条通向使意识失控的便捷之路。因为只有她丈夫、邻居、精神病工作者、牧师和警察谈起过她，因为她的愤怒与绝望是通过隐喻和暴力的方式来表达的。这种暴力先是转向她自身，然后是指向她所热爱的事物。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些微小的细节，这些细节充满了她向往体面而又有着不可承受的痛苦的岁月。

一个压抑的女人通常对性都抱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尽管米察尔斯基夫人接受了婚姻制度中所蕴涵的那种暴力，这种婚姻能够保证一个男人在“夫妻关系中的权力”，以致人们可以认为他是他妻子的强奸者，但她并不希望

以怀孩子为代价来过性生活。在第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她就明白她已经拥有足够多的孩子了。一旦她有了孩子，她就将面临双重的暴力，婚内强奸的暴力（一个被认为是他丈夫肉体财产的女人实际上就是一个被强奸的女人）与母性习俗的暴力。让我们考察一下制度化的层面，这种制度化涵盖了这个女人的一生。

没有安全、可靠的节育措施。由于米察尔斯基夫妇信天主教（他们属于路德宗的教徒），所以，他们肯定倾向于去反对任何一种避孕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说，只有非天主教徒在避孕方面做得比较好。克里斯脱弗·廷兹（Christopher Tietze），一个投身于人口控制运动的细菌学家，他曾经说，对妇女健康的危害几乎不可能是子宫帽、避孕套、胶状泡沫，或各种交替使用的避孕方法，只是要把它们看做是真正有效的的话，那还需在这些方法之外加上一种作为防范手段的在医学上安全、合法的流产措施。尽管药丸与宫内避孕器具有很高的安全系数，但仍然具有本质上的危险性和潜在的致命性。宫内避孕器会引起特别严重的经期腹绞痛（在安放后的一年之内，有20%的宫内避孕器使用者要求取出这种避孕器）、盆腔炎和子宫穿孔。现在人们已经了解到，药丸会引起血液黏稠，引发心脏病、胆囊与肾脏疾病、乳腺癌，以及可能会出现在其他器官的癌变。避孕药物与宫内避孕器对妇女长期的危



害仍然没有被人们弄清楚。甚至有些妇女仍在使用那种含有汞化学成分的子宫帽,现在人们知道,一旦怀孕,这种子宫帽就会导致胎儿的畸形与病变。这样的事情就不可能发生,一个会给许多男性敏感的生殖器部位造成影响的问题,就像避孕对妇女的影响一样,它会被考虑用如此危险,如此不可靠,甚至致命的方法来予以解决。

我们知道那些来自精神病机构内部对不想成为母亲的女人们的看法。我们不得不把这些声音与那些来自遥远历史的回声联系起来。以弗所的索拉努斯(Soranus of Ephesus),希腊的妇科学家,就只允许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堕胎:“保持女性的美丽”;避免母亲生命的危险,如果她的子宫对胎儿来说显得“太小”;像柏拉图在《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主张的,为了控制人口。圣奥古斯丁把流产看做是“富有‘贪婪之残酷’或‘残忍之贪婪’色彩的心智之作”。基督教神学家一生都在忙于那些琐碎的争论。如果一个孕妇遭遇一头公牛的袭击,她是否可以为活命而跑开,即使跑动会导致流产?16世纪的杰苏伊特·托马斯·桑切斯(Jesuit Tomas Sanchez)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如果一个女人在婚外怀了孕,如果她的男性亲戚发现了,要杀死她,她是否可以打掉胎儿以保护她的生命?桑切斯再一次回答:可以。在天主教教会内部,关于一个胎儿何时具有“灵魂”的看法,一直都前后不

统一。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肇始于德尔图良。德尔图良是一个爱作自我忏悔的女性性欲的厌恶者，此外，他还是真正说“堕胎就等于是谋杀”这句话的第一人。那些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一直都忠实于亚里士多德的信仰，他们相信如果胎儿（男性）被怀上40天，（女性）被怀上80至90天，那么堕胎就相当于谋杀，这是人们设想男女两性分别被赋予灵魂的时间。（在假设胎儿的性别是如何被决定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作猜测。）大约在1588年，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Pope Sixtus V），一个狂热的反宗教改革的教会卫道士，宣布所有的堕胎都是谋杀，应该用逐出教会的方式来予以惩罚。后来，他的继承者发现教会的这些法令难以真正地得到贯彻，于是在1591年废除了它们，例外的情况是，只有超过怀孕40天之后的堕胎才予以执行。到了1869年，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宣布恢复西克斯图斯五世决定的时机已经成熟：所有堕胎又再次被定性为谋杀行为。这也是现在官方和大多数天主教徒的立场。尽管情况如此，天主教妇女还是占了所有堕胎妇女的20%。

关于反对和赞同堕胎的争论各有各的说法，从试图以生物学和法律的角度去确定何时胎儿才会变成一个“人”，到最抽象意义上的逻辑学与伦理学的实践，可以说应有尽有。在这儿，我不打算去罗列这些争论，因为玛丽·戴利（Mary Daly）已经从一种女权主义的视角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这方面的概述。她指出：

……堕胎绝对不是这场革命所有或最后阶段所设想的那种“最后的胜利”。在之中和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女人会处于一种完全不想怀孕的状态之中？”尽管一些女人会把堕胎看做是她们自己必须去使用的一种手段，但却没有人认为它是最高理想的一种实现。许多人会把堕胎看做是一个蒙受耻辱的过程。那些导致流产的药物，即使在完美无缺的情况下，也会被人看做是一种防护措施，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会被看做是女性解放的完整呈现。尽管在这个问题上，那些废除堕胎法的男性支持者往往是短视的，但如果少数女权主义者在这件事情上被欺骗，那就会把女权革命与性革命混淆起来。

对合法堕胎的呼吁，就像对避孕的呼吁一样，已经被人描述成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一种女人对其道德命运的拒绝，是一种对生死重大问题的回避或玩世不恭。不管怎么说，对于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事实，我们不可能视而不见。下面介绍的是一些妇女经常采用的堕胎方法，这些妇女拒绝去做合法、安全、收费低廉的堕胎：她们用挂衣服的铁丝、编织用的线、蘸有松节油的鹅毛、芹菜秆，用

清洁剂、碱液、肥皂、Ultra-Tel(一种用海狸油、肥皂和碘酒配制而成的商用品)来涂子宫颈,喝泻药或水银,用烧红的煤块烤身体,以达到自我流产的目的。那些存在于地下的为别人提供廉价堕胎服务的人,通常都是些酗酒者、被剥夺了行医资格的人,所以,手术也常常在肮脏的环境中进行,他们给那些贫困的妇女做没有必要做的刮宫术,原因是这些妇女没有经济能力去做一次正规的妊娠检查。他们经常强奸他们的病人,或者对其进行性骚扰。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妇女只好到千里之外的某个地方去做有医疗安全保障的人流手术。

很明显,堕胎中一开始就出现的暴力是针对孕妇身心两个方面的。绝大多数人,女人,同样也包括男人,都会觉得即使要在他们身上做一个微小的手术,比如,从给自己打针到手术刀切开一根受感染的手指,或者从手指上挑出一根刺,也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一种被迫的恐怖的绝望相比,这种绝望能够使一个女人把一根笔直的衣架铁丝插进自己最敏感的身体部位,把她的身体交给一个无行医执照的陌生男人,或者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躺在一张肮脏的厨房桌子上,并且知道这样做,她会冒生病、被警察盘问,甚至死亡的风险。一些妇女事后能够用一种慎重但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方式来谈论这些经历。没有人能够被这种意在去疏远或淡化这



种创伤的企图所欺骗。一种非法的、自我施行的人工流产不可能是一次偶然的经历。它是痛苦、危险的，并且会被一种犯罪的罪恶感所笼罩。

即使在医院，在合法情况下做的手术，堕胎常常会给人笼罩一层绝育的阴影，作为一种对不希望怀孕的罪孽的惩罚，就像那些要求做简单输卵管结扎绝育手术的妇女，她们常常会被迫地做出子宫切除术这一唯一的选择。对一个做了不成功的自残性流产，并且大出血的妇女来说，叫她去面对地下行医者的残忍与医院里的那种残酷，其实本质上也就没有什么区别。

怀上一个不想要的孩子，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一种轻松的经历。反映在堕胎上的后果，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堕胎，与一个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相比，它给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带来的心理创伤肯定更严重。最近瑞典一项对近500名妇女所作的研究得出结论：不管怎么说，这一普遍的规律实际上并不存在。每个妇女对怀孕的反应，不管是想要孩子的怀孕，还是不想要孩子的怀孕，她们对堕胎的态度，即使是最轻松、最合法的堕胎，其实都是不同的。与堕胎有关的罪恶可能被转化成一种渠道，以此通向其他一些旧有的需要去消弭的罪恶感受。另外，它还可能是一个人一生面对那种认为堕胎即是谋杀之观念的一个结果。如果一个女人认为她的罪恶或悲哀是一种

惩罚，她就会试着去否定这些感受。不管怎么说，在堕胎中，就像在其他经历中（尤其是在性生活与生育方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残酷的。在那些经历中，女人会做出严肃的努力去找到我们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接受别人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要去怎样感受。某个女人的悲哀实际上也许是对那个让她怀孕的男人的愤怒；另一个女人的愤怒也许针对的是从事非法堕胎的人或医院给她带来那种遭遇；还有的，也许是希望有一个孩子，但同时又知道她的实际情况使之完全不可能，所以为这一重大的不幸痛感悲伤。

由于有100%有效、无害的节育措施可以利用，所以没有一个自由的女人会去“选择”堕胎。目前，那的确好像是，一个女人——由于很多原因——在堕胎时会变得非常沮丧，就仿佛那是一种针对自己的暴力，一种惩罚，一种赎罪。只是这一点很有必要被看做是对那种充满罪恶与惩罚的生态环境的一种反动，要知道如此多的女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一个女人总是乐意与异性性交，且充分的避孕措施被优先得到考虑的社会中，就不可能出现“流产的结局”。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就有可能大范围地使妇女自怨自恨的程度相对减弱，这种自我的怨恨是大多数妇女不想怀孕的心理根源。

堕胎是一种暴力：一种首先是妇女自己强加在自己



身上的深重而孤注一掷的暴力。它是一种更为普遍、更为流行的暴力——强奸主义暴力的产物，并且将继续去扮演那个控告者的角色。

3

从一个有思想的女人的观点看，没有一种伦理学的思想会赢得我们无条件的尊重与拥护，因为每一种针对女人的伦理之罪都是莫名其妙的莫须之有，要么多是含糊其辞。我们总是被置于那种(人为的)法律的保护之外，尽管就违法的行为而言，比如在卖淫与通奸的案子中，我们受到的惩罚就要比男人严重得多。

对妇女生命的不尊重被写进了男性神学教义的中心，织入了父权制家庭的结构，进入了父权制伦理的每一种语言。它表现在传统天主教那种卑鄙的伪善中，或表现在反对堕胎的所谓“生命权”的争论中。那是一种虚构，而非一种“未经证明的假设”——即认为对人之生命的尊重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理想，或正如约翰·努南(John Noonan)所说，“它几乎已成为历史的一种绝对价值”。女人们的身上已经被搁上了最沉重的尊重生命的负担，她们知道，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关于武力者、强奸者暴力的第一手资料，关于政治与社会制度的传统暴力，我们知

道得太多，在这种政治与社会制度中，我们拥有的东西太少太少，这种制度却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孩子、我们年老的父母：好几个世纪以来，别人告诉我们，这种暴力是世界存在的一种方式，而我们存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去减轻与平息这种暴力。

无论是神学家，还是生命权利的捍卫者，也无论是生殖专家，还是生态学家，他们都不会承认，在为“人性”与“人性的价值”忧虑的地方，女人并没有成为整个人类的一部分。为了“这颗地球上生命的品质”，仅仅去关心生态学思想、联谊会、策划双亲的计划，或人口的零增长，在这个时代只是偶尔去支持一下废除堕胎的法律，是不够的。堕胎的法律总是会随着经济、军事扩张的节奏，随着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或更强烈的消费主义的欲望而发生改变。在基督教早期的罗马，一个丈夫可能会要求或允许他妻子在某一次怀孕时去堕胎，也许在另一次怀孕时又禁止她这么做。我们已经知道官方教会在这方面的政策是摇摆不定的。在苏联这个使堕胎合法化(1920年)的第一个现代国家，实际流产的工厂条例最开始是由国家提出来的。当它与纳粹德国的情况形成非常明显的对照时，这些条例就被废除了，堕胎随即被宣布为非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堕胎又再次被合法化，以鼓励妻子进入劳动力大军，并且为家庭挣得第二



份收入。在整个过程中，由于继续推行一种不稳定的无效的节育方案，苏联实际上把堕胎强加给了妇女，而这些妇女本来就完全不想怀孕。在日本，就像我们了解的一样，一条自由堕胎的法律被废除了，避孕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效果，当出生率开始下降时，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形势就变得异常严峻。

中国的情况被生育专家卡尔·吉拉斯(Carl Djerassi)描述成“接近天堂”——实际上并非如此，对妇女仿佛是这样，但对流行病学家，却是另一回事。吉拉斯说：“中国也许已经，或者再过两年左右的时间就肯定会接近理想的天堂，服用避孕药的妇女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数多。此外，或者与北美和欧洲的妇女比起来，中国妇女不具有流动性，她们的工作和居住地很少发生变化，因为当地登记了她们工作或居住的地方，其潜力不可被超越。”（学生并不容易得到节育方面的知识，甚至在大学里，情况也是如此。官方只允许这种知识在已婚夫妇中间传播。整个社会不接受早婚和婚前性行为。）

吉拉斯宣称：“在过去10年中，中国在节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给世界的很多地方提供值得向之学习的经验。”在这些经验中，其中就有“中国在这方面的做法显得比美国更有灵活性……动物毒性试验不会超过6至12个月（与之相比，美国需要的时间是10年）

……承担临床试验的决定在实验科学家、临床医生和健康权威机构代表之间的‘商讨’中就得到了贯彻……这种为此目的专门设置的程序合理性的做法是为了‘尽可能地减轻人们的痛苦’”。

此外，“临床试验的项目是通过在妇女中‘做大肆的宣传’来进行的，这些妇女就住在居委会的附近。那些自愿者知道，他们在参与一个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她们有可能怀孕（当然，作为一个预防性的措施，堕胎是被允许的），但是，她们也清楚，这是‘一种为了革命事业的科学试验’，所以，甘愿去承担这种必要的风险”。关于“尽可能地减轻痛苦”与试验中妇女安全之间的冲突，甚至关于“那些知情的同意参加试验的病人（而非革命热情）的增加”，吉拉斯本人几乎就没有去表示过怀疑。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女人还是从限制她的家庭最多只能生两个孩子的可能性中得到了许多好处，这同样的做法在不久的将来也很容易被用于去扩大人口的规模。“革命事业”刚好就容易提出这样的要求：禁止避孕，堕胎不再被认可，就像近期在苏联发生的，人们把奖章颁发给那些生了10个以上孩子的妇女。

1975年3月17日的《纽约时报》指出，阿根廷政府希望在20世纪结束之前，让全国人口的数量翻一番，最近已禁止了节育知识的传播，并严格限制避孕药的出售。正如



那本庇隆主义的杂志《Las Bases》所载明的,其目的昭然若揭:

……当2000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将面临许多由于食品问题而人口稠密的邻国,相比而言,我们将会拥有300万平方公里实际上无人居住的土地。我们还不具有去开发这片辽阔、富饶领土的能力,如果我们不去开发,那么,它将属于那些愿意去开发的人……我们必须从基础的工作做起,这基础就是女人本质的工作——生孩子。

这些话具有相同的历史回声。在20世纪早期,当避孕变得愈来愈普遍时,英美两国感到恐慌,担心社会的中上层阶级会在生育的行列中“出局”,正是这些人,各种各样的避孕方法用得最普遍。与此同时,那些“低收入”——因此也是“低能力”——人群却仍在形成人口多的大家庭(就像我们看到的,贫穷的女人只是口头认可限制她们家庭规模的必要性,但她们知道的主要的避孕措施仅仅是禁欲或让自己去承受其痛苦的流产)。除争论中固有的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谬误之外(有一种观点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低能,而不能看成是富人只关心其财产的结果),有些观点却富有一种母性之“真正目的与意义”的迷人的诚实意味。不管是从基督教徒那里,还是

从弗洛伊德信徒那里，也不管是从法西斯主义者那里，我们都很少能够得到如此纯洁和清晰的关于母性习俗的描述，比如通过像乔治·W.克拉克(George W.Clark)写的《种族自杀——英国的危险》这类晦涩的小册子中所透露出来的那些观点。该书发表于1917年，大约在天职与规戒运动兴起的前夕。

克拉克的书是通过提出以下的观点开始的，他认为，由节育造成的人类生命的损失比在战争中失去的生命更让人感到恐惧(值得记住的是，有人认为，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摧毁了英国上流阶层中“男人的精华”。就不要在意那些普通的士兵了，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在一场壕战中被蹂躏的“优秀者和最富生气的人”，这场壕战人们把它称之为“让一切战争终止的战争”)。在下面这个问题上，克拉克完全是诚实的，他担心中上层阶级限制家庭的规模，当处于劣势的肉体和精神想继续去养育家庭时，就势必会给英国社会带来灾难。他把他的告诫分述于三个方面：①(家庭的)限制会威胁我们的帝国；②限制会威胁我们的商业贸易(“一个只拥有一个儿子的商人就不可能像他的拥有两个以上儿子的德国竞争对手那样，具有相同的去开拓新业务的商业动机”)；③国家防务会被限制所损害。他用以下向母亲发出的呼吁来得出结论说：



没有其他贡献的妇女可以报效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她的失败得到补偿，上帝与自然已把这项职责赋予给了她，单独地赋予给了她。别的每一样事情男人都能够去做。这就是女人的天职与荣耀。她是为此目的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她最好的年华必须用在保育事，否则，民族就会消亡。在一个民族历史最崇高的阶段，最富才干的女性最渴望去做的事情，就是生育优秀的儿子。只有颓废的时代才会使女人在一种无结果的状态中去追求自身的杰出与优异……

只要妇女不拥有对自己身体使用的决定权，无论在社会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保守主义、“人道主义”，或任何一种存在的伦理制度下，都无法保证一种自由的政策不会变成一种奴役的政策。我们看到联邦政府的保护计划已经对森林的砍伐、管道的铺设做出了让步，广袤的土地已经被剥夺。我们还看见与节育和堕胎相关的法律、社会舆论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随着军事的扩张、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或清教主义、“性解放”的文化气候此起彼伏，并且得到父权制社会的控制。



4

当我们想到某一种制度时，我们通常会把它与某一幢具体的建筑联系起来：梵蒂冈、五角大楼、巴黎大学神学院、财政部、麻省理工学院、克里姆林宫、最高法院。直到我们成为与这种制度关系密切的学生之前，我们都不能理解事物存在的那些方式，权力通过这些方式得到保护，在幕后、台下得到转移，那些看不见的协议会保证掌握在某些人的手中，而不会掌握在另一部分人的手里，会保证知识在这一部分人中间传播，而不会在另一部分人中间传播，那些与其他机构隐蔽的勾结与联系被人认为是互不相干的。当我们想到母性制度时，没有任何一幢象征性的建筑能够让我们记起，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权威、权力，潜在或实际暴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母性呼唤去惦记家园，我们倾向于相信家园是个隐秘的地方。也许，我们可以想象，在一排一排住宅的后院、郊区屋或经济公寓的后面，一个女人正在挂晒洗好的衣服，在跑去抱一个爱哭的两岁大的婴儿。或者，我们可以想象，有成千上万间厨房，在它们的每一间，孩子正在被喂饭，然后被送去学校。或者，我们可以回忆起我们童年时的房间，想起那个照看我们的女人。或者，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不会想到那些决定我们该如何去这些地方的法律，不

会想到那些强加在我们当中那一部分人身上的惩罚，这些人一直都在想按一种不同的想法来过一种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不会想到那些以一种不自然的安详与顺从的方式来描绘我们的艺术。不会想到那些非法剥夺许多妇女生育权利的医疗制度。不会想到那些几乎全是男性的专家，他们告诉我们如何去做母亲，我们应该怎样做事，怎样感觉。我们不会想到那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热衷于争论，在整天洗衣、煮饭、带孩子的事务中，我们是否会创造“剩余的价值”。还有那些心理分析学家，他们坚信母性的工作适合于我们，这完全顺乎自然。我们不会想到那种以母性制度之名从我们身上偷走的权力，不会想到那种对我们隐瞒的权力。

当我们想到母性，我们被期望应该去想起雷诺阿的作品：一个精神焕发的女人，与一群脸色红润、跪着的孩子待在一起，想起拉菲尔的圣母像，有时是那位安息日那天在干净的厨房点蜡烛的犹太母亲，她梳着辫子的头上搭着一条刚刚熨过的头巾；我们不期望想到一个躺在布鲁克林医院里的女人，人们用冰袋贴在她发炎的乳房上，因为她已经怀上了她不愿去养育的孩子；我们不期望想到一名同样怀孕的非洲妇女，由于美国商用婴儿食品制造商的缘故，她本来充足的奶水却不够去喂养自己的孩子；我们不期望想到一个怀上她父亲孩子的十几岁的姑

娘；不期望想到一个被匪徒强奸的越南母亲，当她被强奸时，她正在田里劳动，旁边还有她的孩子；不期望想到两个相互爱着的女人，她们一直坚持照看自己的孩子，以抵抗前夫与法庭的敌意；我们不期望去想到这样一个女人，她试图隐瞒怀孕的事实，以便能够尽可能地保住工作，因为一旦被发现，她就会在没有失业保险的情况下被人解雇；我们不期望去想到那些女人，她们的孩子是在无奶的情况下熬过来的，因为她们不得不把自己变成别人的奶妈；我们不期望去想到那个奴隶，她对自己的孩子非常严厉，对主人的孩子却无限友善与温情；我们不期望去想起那个女人，她在“无子”的情况独自度日，她记得她生过一个孩子，她有能力去爱他，并且希望去拥有他，但却不允许她去接近他，去看他；我们不期望去想杀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何为杀婴的幻想，不愿意去想寒冷的冬季一天又一天孤单地待在房子里与生病的孩子在一起是什么滋味，不愿去想一些人一连好几个月待在血汗工厂、监狱，或别人分得厨房为孩子焦虑的心情，这些孩子与一个较大的孩子待在一起，或单独被留在家中。男人们一直在谈论我们的“痛苦和欢乐”，但常常是在一种抽象的意义上。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我们一直都在承受这种制度所造成的那些压力，就仿佛它们是一种自然的法则。

母性习俗不能被接触，或者被看到。在美术方面，也

许只有珂勒惠支一直试图去表现它。它肯定仍然在被表现,以使妇女不再忘记我们人生经历中的许多场景,这种经历属于一个我们不能左右的整体。强奸与它的后果;作为经济依靠的婚姻,这婚姻仿佛是对一个属于“他的”孩子之男人的承诺;从女人那儿偷走孩子;那种把非婚生孩子称为“私生子”的观念;与节育与堕胎相关的法律;推销危险节育器械的大献殷勤者;拒不承认妇女在家里所做的工作是“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女人和爱 with 罪恶联系在一起的束缚;母亲社会福利的欠缺;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关爱孩子机构的匮乏;付给妇女的不平等的薪水,常常使她们不得不依靠男人;“专职母亲”的固定角色;被人接受的父亲身份的本质特征,它赋予男人以权力,赋予他处置孩子的特权,而又对孩子毫无责任感可言;心理分析对母亲申斥;儿科学的假设,认为母亲是匮乏与无知的;家庭中由女人来承担的感情负担——所有这一切都与看不见母性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它们决定了我们与孩子的关系,而不管我们是否乐意这么认为。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母亲,这种习俗会影响所有的女人——尽管方式不同——也会影响所有的男人。父权制的暴力与无情会经常通过母亲降临到孩子头上——不仅在那些“被殴打”的孩子头上,而且也在那些悲惨地被逼迫、被勾引、被摆布的孩子头上,这些孩子依赖的是一

个多变、焦虑的母亲，这个母亲天天为他们操心，成了他们感情的支柱，有些男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相信女人什么也不是，实际上就是一种专门为安抚与安心而存在的情感所在，或者说是一阵容易把他们摧毁的情感旋风。

就像我们必须做的一样，让我再次回到琼·米察尔斯基的话题。的确，绝望是在她心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她曾经爱过，也试着去爱，她号叫过，但没有人听见她的号叫，因为什么也没有，在她周围，没有人把她的困境看做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除了这个家庭主妇平常对这个家庭所做的，没有人看见其他的东西。她成了一个替罪羊，在她周围，有一种母亲黑暗的东西总是挥之不去——这就是那种母性习俗无形的暴力、罪恶感、对人类生命责任的无能为力感、报应与谴责、对她自己权利的恐惧、罪孽、罪孽、罪孽。心中有如此多的黑暗，这肯定是一种习以为常，早已是习以为常的痛苦：这个女人为她家人吃的忙得手脚不停，却不能和他们坐在一起，这是个早晨不能起床的女人，老是一遍一遍地用布来擦桌子的同一个地方，在超市里看标签的样子，就仿佛它们是用外文来写的似的，喜欢往里面有一把刀的抽屉里看。这个替罪羊同时也是个逃避价值的人：她的感情被一种受压抑的盲目愤怒的潮水所搅扰，这样一来，它们多半就会作为一种明确反抗的形式表现在一种极端的态势之中。由于了解



到“坏”母亲的绝望反应是对她自身的一种看不见的伤害，“好”母亲们便决意要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于是，愈是有病，愈是长久的痛苦，便愈是要去死死抓住那些被认为是正常的东西。这个替罪羊与这样的殉难者是不一样的，她无法理解反叛与抵抗。她代表了一种恐怖的企愿：去经历奇特的痛苦，去假定，我，一个单独的女人，本身就是个“问题”。

除我和“病态”的儿童虐待者，是否母性会在每个人的心中都释放愤怒与残酷？……我的孩子，当他们大约一岁大的时候，在我心中就释放过痛苦与残酷的幻想。由于是儿童，这些释放自然就带有一种孩子气的反抗、唠叨、哭喊、好奇的特征。

幻想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展开……我……用脚镣锁住一个孩子，把他的头往墙上撞，看着血与脑浆流溢出来……有时……我把他们单独留在房子里，然后迅速跑开……当这些幻想的画面消失之后，我看了看我的孩子，我会意识到我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我非常爱我的孩子。接下来，我又能再一次与他们温柔而耐待在一起。

但是，我确实在生气时（不是在愤怒时，愤怒会使我转向内部或转向摧毁的事物，而不是孩子）踢了他们一脚，用手打他们的屁股，扯他们的头发，把他们按在地板上

……我知道，被打的那些孩子是怎样变成那样的……

要我去承认我……已经打过和踢过我幼小的孩子，
我会感到羞辱……我会长时间处于一种自恨的状态中
……

（索诺马，加利福尼亚州里大学“女人经历”
某班一个学生的自传）

这是一种处于愤怒中的母亲、愤怒中的女人的自我仇恨。她无法超越自己狂暴的愤怒之情去看待那个孤单的孩子，即使在那样的时刻，也像蒂莉·奥尔森（Tillie Olsen）的安娜一样，她本人就是她丈夫施暴的一个攻击目标：

好几个星期以来，杰姆·霍尔布鲁克的情绪都非常糟糕。……除了对孩子们发怒，他什么也不能做，并且还经常记得打安娜……

安娜变得很痛苦与蛮横。如果有一个孩子妨碍了她，没有立即顺从她，她就会处于一种盲目的愤怒中去打他们，就仿佛那是些她要去驱赶的魔鬼。之后，在她工作的过程中，一旦想起那张泪流满面的小脸蛋，一种悔恨之情便会让她于心不安。“但愿我打的不是他们。当我让某



物受伤害时，某物似乎就会攫住我的心。”

在她的散文诗“大家伙”中，诗人阿尔塔(Alta)触到了母性那根敏感的神经：爱我们的孩子，去保护他们。正如琼·米察尔斯基曾经做过的，“像一个承受太多的母亲”，由于我们的愤怒与失望，我们仍然可以在他们那儿找到最近的目标：

一个留着自然卷发的孩子。我叫她凯，
一个小巧玲珑的人儿，当我试图去捉住她，
她看我的眼睛睁得又圆又大，
当我试图去为她
取上一个名字……

那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当时她在我的房间里
追赶那孩子，我高声喊叫
出去，出去，滚出去，她随即跑开，
只是那孩子仍然呆在那儿，毫无恐惧。
究竟是什么，会让一个孩子怕你。
你自己的孩子，你第一个孩子，这样一个孩子

……



不管你是否大难不死，他都肯定会原谅你……
为了能写到她，把她关到屋子外面，
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
怎么可能是仁慈，是爱，
甚至我又怎能试着
去为她命名？

也许没有我，她们也会自由自在
也许，我可以偷偷离开一会儿
在另外的房间里呆呆
她们也许会仍然爱我
当我再次回来？

在家中与年幼的孩子整天待在一起，是生活成为一种固定的封闭状态中，在独自哺养他们的同时，还要对他们尽够母爱天职的努力中，在加重自己人格的负担，以反抗那些自始至终认为她是母亲的教条的冲突中，什么样的女人没有梦想过“超越这些藩篱”？让它们完全成为过去？什么样的女人没有梦想过抛弃她身上那些被人们定义为正常的东西，以便能够去关心一下自己，或者能够去找到一种关心自己的方式？那些母亲们：领走她们上学的孩子，成排地在家长会上坐着，安慰超市童车里疲倦的

婴儿，披头散发地在家中煮饭，洗衣服，工作一天之后照料孩子，为孩子能够得到适当的关照与可进去念书的教室而奔波，当别人威胁要收回住房时等待供养孩子的支票，由于她们中的一员逃避欢乐，放弃性，然而仍然再次怀孕，让那些长长的针头扎进她们柔软的身体内部，由于孩子的哭喊而从她们永远也做不完的梦中惊醒——这就是那些母亲，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她们的幻想——她们的白日梦和想象的经历——我们就会理解那种愤怒、不幸、超负荷爱的力量、创造性绝望的爆发，我们就会理解那种扭曲了母性经验的机械性的制度化暴力。

多么令人吃惊，那些能够给予我们未来巨大希望与信念的东西（在这种未来中，女人与孩子的生活将通过女人的双手来改善与重建），完全在于我们努力去获得拯救的行动，为我们的孩子而进行的自我拯救的行动，即使这会带来母性制度的毁灭。这就是温柔，热情，对我们直觉的信赖，对我们不知道，但却仍属于我们的一种勇气的唤醒，对别人仔细入微的体察，对生命代价与不确定性的充分认识。母亲为孩子与疾病、贫困、战争、所有践踏生命的剥夺、冷漠所作的斗争，完全有必要成为一场怀着爱、怀着生命的激情而展开的普通人都能参与的运动。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母性制度就必将得到毁灭。

社会的变革要求这种可能性反映在父权制社会的每

一个角落。摧毁这种制度并不意味着取消母性，而是要让生命的创造与养分渗入到由抉择、斗争、惊奇、想象与清醒的理智构成的统一领域，正如任何其他困难的但却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一样。





后 记

……存在着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思维方式。与仍未诞生的知识相比,没有什么东西会显得更重要,更珍贵。因为由它引起的那种紧迫感、精神上的不满足将永不止息……

——苏姗·桑塔格:《激进意志的风格》

然而,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能做些什么呢?人们已经做出了一些颇有成效的、共同的努力来直面母亲身份制度,比如,全国福利人权组织、全国流产权利行动联盟,以及像自由选择的天主教徒、纽约黑人单生母亲姐妹联合会和在西雅图成立的女同性恋母亲全国救助基金会这样众多的专门组织。一个全国性的组织,MOMMA,拥有一份报纸和若干个国内分部,主要关注的是普通单生母亲所遭遇的问题。妇女健康—关爱运动是一股方兴未艾的力

量，正在挑战男性医学教条在妇女身上助长的那种无知与被动，已经在新一代妇女身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写这本书的四年之中，我已经看到了母亲身份的结果，这个结果是在对某一主题的女权主义的分析中几乎是由附带出来的一个问题产生的。这一主题现在似乎占据了有头脑女性——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或两者兼之——的集体意识。不同的作者一直都在呼吁一种新的女性统治主义；呼吁通过基因技术由女人来取而代之；要求通过社会全体成员，或所有“脱离孩子”的女性把孩子照管当做一种政治承诺来坚持；要求一种社会性的孩子抚养；要求回到一种社会的“乡村”观念，在其中，孩子能够被整合到成年人的工作生活之中；要求孩子在一个男女平权主义者的圈子里哺育，在没有性烙印的环境里长大成人。有人对“新的父亲身份”感兴趣，热衷于一种证据基础的确立，这是一种男人，同时也包括女人，能够和应该成为“母亲”的基础，或者热衷于父亲身份的重新定义，这种父亲身份会要求更主动、更持久地与孩子呆在一起。

寻找幻想，梦着梦想是重要的，另外，去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去开拓严肃的体验空间，尊重那些即使是失败的努力，也是重要的。与此同时，根据大多数女性目前那种被动的生活状况，倘若去纠缠于女权至上的乌托邦，去“要



求”避孕与基因技术对女人产生“改变”(那该是一种由她们来承受的何等巨大的压力),这多半是一种天真与自我纵容;应该去谈论那些给人印象深刻的“无子女”妇女,作为一种政治责任,她们把精力转向了孩子的照管;去谈论对女权至上主义的抵制;谈论那个去解决孩子抚养问题的社会团体。作为一种强迫苦役与体现了罪恶的孩子照管,在我们的历史中完全呈现的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如果女人抵制科学体制(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与之接近)的实验室与图书馆,那我们甚至不会知道什么样的探索与技术对我们身体的控制是致命的。的确,这个社会团体的里里外外对女人来说,已没有什么特殊魅力,比一般的大家庭或公共日托中心好不到哪里去。毕竟,这些做法并不能使我们认识到女性身体的真正复杂性和政治意义,不能认识它所代表的力量与脆弱的所有层面,在其中,母亲身份完全是一个组成成分,尽管是一个残酷的组成成分。

更进一步说,认定“哺育”是女性的一种特殊的力量,这是一种危险的、简单化的看法,应该把这一点扩展到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以期创造一种新的人类秩序。不管我们自身与以后给予未来的礼物是什么,它都会变成一种自食其果。关于女人在痛苦折磨下那种政治上失去自由的状况,罗斯·斯蒂伦(Rose Styron)这样写道:

一个女人被典型地赋予的那种想象力、“情感主义”——她发展起来用于保护她孩子的那种激情，对社会或家庭需求与要求需要变得敏感的同情心（或对人类动机与各种可能性的那种洞察力）——会使她成为一个针对折磨她的人事的极端的反对者。同时，这也会使她特别容易受到伤害。

这种情况对生活在父权制下的一般女性来说是真实的，而无论我们反对的是个别的男人、福利制度、医学与心理分析建构，还是毒品交易、色情作品、卖淫的组织网络。当一个单独的女人首先去反对母亲制度时，她也常常不得不以一个男人、她孩子父亲的身份去反对它，她对他们的感觉可能是爱、同情、友善，同时也可能是憎恨、愤怒、恐惧或罪恶。只要它仍然保持在一种水平上，由于它的存在，通过我们身上那种最宽宏、最敏感的东西，女人被得到控制，我们想去反对强暴的那种“母亲的”或“养育的”精神和斗士的心态就只能证明是一种倾向。女性力量与优势的理论必须充分考虑到我们自身存在的模棱两可性，考虑到我们意识的连续性，以及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蕴藏着的那种创造与破坏的潜能。

我坚信“存在着一些我们仍然未知的思维方式。”我

宫，我们会由于某种看不见的紧迫而不安定的信息变得兴奋不已，这种紧迫与不安定的确是无法平息的，我们会由于某种认识的潜能变得坐立不安，这种潜能我们仅仅才开始去猜测。我们既没有被“内在”，也没有被“外在”构造；我们的皮肤由于信号而活着；我们的生死与我们思想之躯的开放与封闭是联系在一起的。

只是我们身体的恐惧与仇恨会经常削弱我们的头脑。我们时代一些最优秀的女性也仍然试图通过一种外在于她们身体的方式去思考——因此，她们仅仅是在复制旧有的思维模式。在一个女人存在的方方面面与每一种其他的存在之间都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联系，学者的观点不承担止血棉上血的风险；享受救助的母亲接受她智力下降的后果。生存的问题是存在的，因为女性学者与救助的母亲都被卷入了为少得可怜的生存权斗争的行列。在一种建立在传统家庭与它恒久性基础上的社会中，她们都属于“边缘”人。

对于一代一代的妇女来说，那个意味着毫无选择、已成签约母亲的身体组织仍然是一种没有被人涉足或理解的女性资源。我们要么倾向于去成为我们的身体——盲目、顺从地按照男性对我们的理论——要么试着抛开这些理论去存在。“我不想成为维林多夫的维纳斯——或成为那部永久的该死的机器。”许多女性倾向于把肉体看



作是对心灵的否定。太多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被人理解成纯粹的自然，像大地与太阳系一样被剥夺与强暴；如果我们现在渴望变成文化的存在：纯洁的精神与心灵，那到不会让人感到惊奇。然而，明摆着的事实是，这种文化，以及它的政治制度已经让我们与之产生了分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自身也与生命产生了分离，变成了数量、抽象的死亡文化与权力意志，这种权力意志在这个世纪已达到了它最大的破坏程度。这就是那种女人在其中以人类的名义来谈论变化，谈论责任的抽象的文化与政治。

与工人掌握生产工具相比，由女人来重新拥有我们的身体，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加重要的变化。女人的身体一直都是疆土、机器，是可以被开发并流水线般产生出生命的未开垦处女地。我们有必要去想象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个女人都是她自己身体的主宰。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女人会真正去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带给世界的不仅仅是孩子（如果，或当我们作出选择），而且还有见识、思想、坚持的必要性、安慰，并且改变人类的存在——形成一种对世界的新的关系。性、政治、知识、权力、母亲身份、工作、社会、亲密关系会产生新的意义；思维本身也会发生变化。

这就是我们必须去起步的地方。

